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四卷

联共(布)、共产国际 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978-7-80199-607-7

I. 联… II. 中… III. 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1931—1937 ②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1931—1937 IV. K260.6 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1144 号

书 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

译 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 姚建萍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40mm×203mm 1/32

字 数: 373千字

印 张: 15

印 数: 1—1100册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199-607-7

定 价: 298.00元 (共五卷)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82517249, 82517244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刘宋斌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31—1937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ЕЙТНЕР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РАБОТЫ),
К. М. АНДЕРСОН, В. И. ГЛУНИН,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
И. КРЮГЕР, Р. ФЕЛЬБЕР, К. В. ШЕВЕЛЁ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2005年11月
于京郊自得园

译者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三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即原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四卷(两册)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2003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共收录自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期间有关档案文件411份,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有些文件阐述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在上海保卫战期间(1932年1月至2月)、在冯玉祥察哈尔抗日人民军发动过程中(1935年5月至8月),以及在有名的福建事变期间(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对中国事态发展所持的立场,有些文件披露了莫斯科对中国红军于1934年秋放弃中央苏区的计划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和中国红军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所持的态度,有些文件揭示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和莫斯科对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发生变动的反应。这一卷首次全面公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机构(政治书记处、七大前存在的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七大上成立的并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这个时期对华政策的问题的决议和指示。还公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讨论对华政策问题的会议的记录。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一卷首次发表了1932年至1934年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共中央、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以及远东局与1933年至1934年间驻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局之间往来的电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共中央1936年至1937年间往来的电报。该卷还收录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政治、军事代表给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书信、远东局成员给红色工会国际和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书信等,并且发表了共产国际档案中所保存的反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1年至1937年间工作情况的所有文件。

这些文件都很珍贵,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为了及时译介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2002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2003年上半年组织力量进行翻译。中译本分三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13、14、15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中译本全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放在第15卷末),第三部分从略。为反映文件原貌,本卷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作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

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方言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中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正文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在注释中则注明其名和父名的缩写字母。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 M.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K. B. 舍维廖夫博士热情地帮助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刘桂生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在此我们特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

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贵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

王昌滨(中共中央党校译审)；

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李永昌(辽宁大学教授)；

李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董友忱(中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定。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214.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
(1934年1月1日) 1
215. 施特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1月2日) 3
21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施特恩的电报(1934年1月2日) 5
2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2日) 6
21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2日) 7
2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埃韦特的电报(1934年1月5日) 9
220.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中国红军状况的
第9号综合报告(不早于1934年
1月10日) 11
2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4年1月12日) 13
2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4年1月12日) 17
223. 埃韦特关于《中国论坛》问题给中共上海中央局
的信(1934年1月13日) 19
2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17日) 24

2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施特恩的电报
(1934年1月20日) 26
226.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的电报(1934年1月25日) 27
227.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1号报告
(1934年1月27日) 28
2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鄂豫皖苏区委员会的信(摘录)(1934年1月底)..... 38
2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4年2月1日)..... 57
230.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1号报告的补充部分(摘录)(1934年2月5日)..... 60
231. 赖安关于中国工人和工会运动状况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4年2月5日)..... 63
23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55(B)号记录(摘录)
(1934年2月5日)..... 71
23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施特恩的电报(1934年2月5日)..... 73
234. 中共中央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报
(1934年2月6日)..... 74
23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4年2月7日)..... 77
23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施特恩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2月11日) 79
23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

- 常会议第 356(Б)号记录(摘录)
(1934 年 2 月 11 日) 80
238.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4 年 2 月 13 日) 81
239. 施特恩给中央苏区的电报草稿
(1934 年 2 月 15 日) 84
240. 埃韦特给施特恩的信(1934 年 2 月 16 日) 89
241. 中共上海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 年 2 月 22 日) 92
242. 李竹声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的电报(1934 年 2 月 27 日) 95
243. 埃韦特给李竹声的信(1934 年 3 月 6 日) 96
24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 364(Б)号记录(摘录)
(1934 年 3 月 21 日) 98
2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 年 3 月 25 日) 99
246. 李竹声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4 年 3 月 27 日) 101
2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会议第 367(Б)号记录(摘录)
(1934 年 4 月 3 日) 102
2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埃韦特的电报(1934 年 4 月 9 日) 104
249.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 2 号报告
(1934 年 4 月 10 日) 105
250.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4年4月10日)·····	109
251. 李竹声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4年4月11日)·····	112
25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368(A)号记录(摘录) (1934年4月11日)·····	113
2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68(B)号记录(摘录) (1934年4月11日)·····	114
254. 王明给埃韦特和李竹声的电报 (1934年4月23日)·····	116
255. 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4年4月26日)·····	118
25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4月29日)·····	119
2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76(B)号记录(摘录) (1934年5月15日)·····	122
25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李竹声的电报(1934年5月26日)·····	123
259.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 (1934年6月2日)·····	124
260. 赖安给哈迪的信(1934年6月4日)·····	132
26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381(B)号记录(摘录) (1934年6月8日)·····	141
262. 红色工会国际国际联络部给贝克的电报	

- (1934年6月13日)..... 142
26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6月16日)..... 143
26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6月17日)..... 146
265.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和阿布拉莫夫的电报
(1934年6月26日)..... 148
26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给格伯特的
电报(1934年7月1日)..... 150
267. 赖安关于中共领导人被捕一事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4年7月3日)..... 151
268.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4年7月3日)..... 154
269. 赖安给米夫的信(1934年7月3日)..... 157
270. 赖安关于艾萨克斯的声明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的信(1934年7月3日)..... 158
271. 雷利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便函
(1934年7月3日)..... 161
27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
议第9号记录(摘录)(1934年7月4日)..... 163
273. 王明和康生给盛忠亮的电报
(1934年7月10日)..... 165
274. 赖安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
(1934年7月14日)..... 167
27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给格伯特的
电报(1934年7月20日)..... 170

276. 中共上海中央局、盛忠亮和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4年7月25日)…………… 171
27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92(B)号记录(摘录)
(1934年8月3日)…………… 172
278. 盛忠亮致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4年8月10日)…………… 173
279. 赖安同志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
(1934年8月13日)…………… 175
2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95(B)号记录(摘录)
(1934年8月15日)…………… 179
281.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声明
(不晚于1934年8月22日)…………… 201
28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国工作的决议(不早于
1934年8月29日)…………… 206
2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策略的决议初稿
(1934年9月1日)…………… 209
284. 赖安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4年9月3日)…………… 225
2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4日)…………… 234
286.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4年9月14日)…………… 236
287. 施特恩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

运动的建议(1934年9月16日)·····	237
288. 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 (1934年9月16日)·····	243
289.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4年9月17日)·····	251
290.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的电报(1934年9月19日)·····	252
29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23日)·····	253
292. 阿布拉莫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9月26日)·····	254
293.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9月28日)·····	255
2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30日)·····	256
295. 盛忠亮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	258
296. 中共中央给盛忠亮的电报(1934年9月)·····	264
297. 王明就党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 准备一事给中共中央的信草稿 (1934年10月1日)·····	267
29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外事委员会会议 第15号记录(摘录)(1934年10月4日)·····	271
29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0月8日)·····	272
300.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4年10月11日)·····	273
301.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10月14日)·····	278

302.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10月15日) 279
303. 王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10月16日) 280
304. 阿布拉莫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10月18日) 281
3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
第16号记录(摘录)(1934年10月20日) 282
306. 中国红军指挥人员一年制特别培训班教学大纲
(1934年10月27日) 283
30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在华工作
的建议(1934年10月28日) 287
30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建立东方
作战中心的建议(1934年10月28日) 289
309. 赖安关于改组中共机关的建议
(1934年11月20日) 291
310.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赖安的谈话记录
(不晚于1934年11月20日) 295
311. 赖安关于国统区革命工会的书面报告
(1934年12月4日) 306
312. 赖安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关于
上海形势的谈话速记记录
(1934年12月22日) 318
313. 中共上海中央局给王明和康生的信
(1934年12月29日) 324
314. 贝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5年1月3日) 347
315.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

- 员会会议上关于德国问题的讲话(摘录)
(1935年1月9日)..... 352
316. 贝克给洛佐夫斯基的信(1935年1月22日)..... 355
317. 贝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5年1月22日)..... 362
31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434(A)号记录(摘录)
(1935年2月3日)..... 364
319. 胡秋原给王明和康生的信
(1935年3月10日)..... 365
3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军事
形势的通报材料
(1935年2月11日、3月18日)..... 373
321.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斯塔索娃的信
(1935年3月19日)..... 383
3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442(B)号记录(摘录)
(1935年3月21日)..... 385
323.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35年3月22日)..... 386
324. 施特恩关于政治工作讲座的速记记录
(1935年3月22日)..... 390
325. 米夫给斯大林的信(1935年4月19日)..... 404
326. 切尔诺莫尔季克和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5年4月26日)..... 405
32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 450(B)号记录(摘录)	
(1935 年 5 月 5 日)	406
328. 贝克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	
(1935 年 5 月 9 日)	408
329. 卡拉-穆尔扎给共产主义研究院世界经济和 世界政治研究所党委的声明	
(1935 年 5 月 16 日).....	428
330. 红色工会国际东方殖民地部关于中国革命工会 运动给国际工会会议的报告	
(不早于 1935 年 6 月 16 日)	436
331. 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信	
(1935 年 6 月 20 日).....	449
332. 郭绍棠关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任务的书面 报告(1935 年 6 月 21 日).....	453

214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

1934年1月1日于瑞金

发自中央苏区

1. 据我们在福建的代表^①发来电报说,蒋军第7纵队司令吴奇伟已派代表^②到福州,开始同我们的代表就互不侵犯问题进行秘密谈判,并表示了反蒋意图,他把密电码交给了我们的代表。同时蔡廷锴告诉我们的代表,蒋军中央纵队副司令、陈诚的助手^③薛岳也有这样的意图。

2. 我们已指示我们的代表继续同他们进行谈判,促使他们立即公开反蒋并贯彻执行我们的三项条件^④,要求他们直接向我们这里派代表;同时指示我们的代表同他们签订任何书面协议。

我们还用无线电向第1和第4独立团进行了通报,让它们在吴奇伟部地区开展更积极的行动,给以有力的打击并给他造成威胁,促使他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波戈列洛夫^⑤

① 潘汉年。

② 何人不详。

③ 原文如此。应为:副手。

④ 见第100号文件。

⑤ 秦邦宪。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8, 第 23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215

施特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4年1月2日^②于上海

第1号。

1. 在福建快速变化的形势下，我们的任务应该是：

(1)以援助19路军为借口，同49师密切配合，在1月间用3军团力量保持住漳平、屯岗(音)地区的基地，以便将来在东北战线作战和封锁19路军去广东的道路。对49师从下面争取士兵群众的工作应给以加强。3军团在广东方向的后方应通过武平、上杭、永定地区加强的游击队行动给以掩护，行动范围尽量向广东以及漳州方向扩大。

请尝试从49师那里取得装备和枪支，帮助武装3军团后方的游击队和地方力量。

(2)让由一个师支持的游击力量从归化向沙县移动，同时在泰宁、归化、宁化三角地带的风水山(音)山岭上准备第一道防线。

(3)所有其他已采取的措施应旨在使第7、第5和第9军团互相靠近行动，准备作为突击力量防备南京军队调过头来进攻主要苏区。

(4)第22师应在这里把主要兵力集中在它的左翼。

① 发报者和收报者是根据文件上的附注确定的：弗雷德(M. 施特恩)给(中共)中央的无线电报。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5月14日。

2. 请采取最积极的措施,以便从福建取得弹药、食盐、衣服等。

3. 至于北方战线,1月间在这里只应在一个师,最多两个师的支持下充分开展游击行动。

4. 你们能否从1军团拿出一个师和两个独立团,派它们去赣西北,以通过我们向赣江以西运动的部分力量的联合行动建立西方军并在南昌至九江铁路地区开展作战行动。如果你们同意,请制订短程路线并尽快发起战役。这会对整个形势产生很大的影响。当一两个月内赣西力量集中起来时,如果需要的话,你们可以再把它们派到南方沿赣江一带。这样一来,在以后的事态发展过程中,这两个军团可以在我们的直接指挥之下。

5. 应认真对待同吴奇伟和薛岳的[关系]问题^①,通过两种途径:间接的是通过我们的代表^②和蔡廷锴,直接的是通过重申根据三项条件专门向他们的部队提出的建议^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8,第 25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见第 214 号文件。

② 潘汉年。

③ 见第 100 号文件。

21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施特恩的电报^①

1934年1月2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致弗雷德^③。抄送代表^④。我们没有弄明白您12月21日关于[中共]中央质询您11月27日计划^⑤的电报^⑥，因为电文不清楚。从我们的电报中您可以得知，我们反对您的计划，并可以得知我们对您的职责的看法。为了避免发生这种误会，最好您去中央苏区。那里您可能更有用武之地。只有您确信去那里没有大的风险，才需要这样做。如果不能去那里，那就请您继续像以前一样给[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建议，但不要要求他们必须执行这些建议。政治委员会。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6(1933年发文)，第273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3年12月27日会议上得到批准(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74，第7、9页)。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附注确定的。

③ M. 施特恩。

④ A. 埃韦特。

⑤ 见第7页注⑤。

⑥ 文件没有找到。

2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4年1月2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致[中共]中央,抄送代表^③和弗雷德^④

答复你们关于接受记者采访问题的电报^⑤,我们认为,我们的代表^⑥不同你们协商,甚至不通知你们驻上海的代表^⑦,就以你们党或你们党代表的名义(我们还没有收到有关此事的所有电报,不能准确地理解电文)接受记者采访,他的这种行为是绝对错误的。我们坚决谴责我们代表的这种行为。我们代表在电报中向我们保证^⑧,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请你们同他一起寻找纠正这种错误的方式方法。政治委员会。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274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文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33 年 12 月 27 日会议上得到批准(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74,第 7、9 页)。
-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附注确定的。
- ③ A. 埃韦特。
- ④ M. 施特恩。
- ⑤ 见第 211 号文件。
- ⑥ A. 埃韦特。
- ⑦ 即盛忠亮。
- ⑧ 见第 212 号文件。

21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4年1月2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致[中共]中央,抄送弗雷德^③和代表^④

答复你们关于11月27日计划的电报^⑤。关于我们提出的作战问题的建议,或者我们从上海^⑥提出的这种建议,你们只应看作是建议。无论从这里还是从上海都不能像你们那样清楚地了解战场上的形势。因此与战场上的形势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应由[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我们认为,在目前形势下,11月27日的计划是不利的(我们有12月21日的综合报告^⑦)。

-
- ① 在文件的俄文译稿上有皮亚特尼茨基的批示:给克诺林、库西宁、王明同志阅,尽快发出。
-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确定的。电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3年12月27日会议上得到批准(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74,第7、9页)。
- ③ M. 施特恩。
- ④ A. 埃韦特。
- ⑤ 文件没有找到。指由M. 施特恩提出的并得到A. 埃韦特支持的作战计划,规定中央苏区红军的一个兵团向赣北推进,而另一个兵团向湖南突破。
- ⑥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或中共上海中央局。
- ⑦ 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江西、福建军事形势的综合报告。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74,第7、9页)。

请研究一下以下建议。随着蒋介石军队对邵武的进攻,我们觉得,应该为蒋介石军队和 19 路军提供在邵武地区发生冲突的机会。

你们的部队应该避开蒋介石的进攻部队,在迅速重新部署后,从北面和南面同时打击进攻 19 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翼侧和后方,最好是在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重复一遍,这只是建议,你们可以改变或根本不采用。政治委员会。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36(1933 年发文), 第 276—277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2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①

1934年1月5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③。过几天我们给您发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十三次全会^④的决议。暂时只转发主要思想。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已经造成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由革命危机向局部稳定过渡时期发生的第一个法西斯化浪潮的差别在于,现在资本主义世界结束了资本主义的稳定,在向革命危机过渡,这决定了革命危机必然到来的前景。世界在接近新一轮革命和战争。在中国是战争、干涉和革命。在日本是阶级大冲突之前革命力量的增长和反革命力量的动员。在德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仇恨在以另一些不太公开的形式增长,那里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开始。国际形势带有新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性质。

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全会号召[共产国际]所有支部毫不留情地根除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首先是列梅勒、牛曼[德国]、古特曼[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失败主

① 文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33 年 12 月 27 日会议上得到批准(见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74, 第 1、5 页)。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确定的。

③ A. 埃韦特。

④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于 1933 年 11 至 12 月间在莫斯科举行(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提纲和决议》,莫斯科 1934 年版)。

义者在评价德国革命前景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的主要口号是(建立)苏维埃政权。

中国共产党面临以下任务：动员所有力量反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中国的第六次“围剿”^①，千方百计加强红军和巩固苏维埃国家制度，继续争取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苏区，特别是在四川和江西；大力发展和领导国统区的反帝反国民党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建立无产阶级骨干力量以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国民党黄色工会中和在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当中切实开展工作。千方百计争取使赤色工会变成广泛的群众性组织，同时组织和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掌握游击运动的领导权，争取它的发展，特别是在伪满洲和华北；加倍努力做好争取士兵群众方面的工作。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279—281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220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 关于中国红军状况的第9号综合报告

不早于1934年1月10日于莫斯科

关于1934年1月10日前的中国 红军状况的第9号综合报告

蒋介石军队的进攻

由17个师和1个独立旅(15到17万人)组成的蒋介石军队在向延平、古田方向发起攻势。

蒋介石在其右翼(邵武至延平)实施主要打击,有13个师分4个纵队进攻;(4个师和1个旅)从西北对古田实施辅助打击。

进攻是在1933年12月初开始的。到1933年12月10日,右翼兵团不得不停止进攻,因为部队遭到很大损失,弹药用尽。1933年12月25日这个兵团才开始缓慢向东推进。

蒋介石的左翼兵团,其中有他的两个精锐师(87和88师),1934年1月1日占领了古田。据最新材料说,蒋介石军队占领了延平。

苏区代表^①和(90师师长)吴奇伟的代表^②在福州的谈判

据现有材料说,吴奇伟的代表向中国苏维埃政府驻福建政府代表提出了相互停止作战行动的建议。谈判还在继续。但是中国

① 潘汉年。

② 何人不知。

红军司令部决定预先打击吴奇伟部队，以加快他的反蒋行动。

(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通知苏维埃政府代表，驻江西南京军队总指挥(蒋介石)的助手陈诚，也有意向中国红军司令部提出停止作战行动的建议。

中国红军的行动

红军第7和第9军团的任务是，积极在福建蒋介石进攻部队的后方采取行动，而第5军团则应保卫设防的泰宁地区。

1、2军团、工人师和4个独立团集中到永丰城以南，目的是突破敌人设防地带和向北进攻。

7军团呆在将乐地区；派军团部分力量和游击队到沙县地区进行政治工作和同19路军士兵联欢。

中共在19路军中开展政治工作，以期把它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19路军部队中最倾向于转到中共方面来的是49师(这个师由19路军中的那些在同日军作战失败后从北平地区调来的部队组成)。

中国红军司令部向19路军49师派了代表。

中国红军第17师击溃了敌77师一个团，缴获了400多支步枪和11挺机关枪。

全宗514，目录1，卷宗818，第33—34页。

打字稿，副本。

2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中央苏区的电报^②

1934年1月12日^③于上海

绝密

致中央苏区

福建军阀战争的发展进程说明,形势越来越复杂了,因此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需要巧妙地应对。

1. 在福建遭到的失败^④,迫使蒋介石放弃从北面继续对我主要地区进行直接进攻。从去年12月起,进攻停止;蒋介石一旦取得对福建问题的满意解决,较大规模的进攻定会恢复。同时还将进行较小规模的战役,其兵力将逐步向我地区渗透。这个时候广昌和宁化的北部和东北部战线要求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目前我们的第5和第9军团^⑤负责完成任务,我们认为,它们的目标应该是破坏敌人在邵武至黎川、邵武至将乐和邵武至顺昌道路上的交通线,为此需要设伏,等待敌人沿道路、山口和峡谷向前推进的部队。这些任务应该由一些不大的军事单位同时来完成。在未弄清东南部情况之前,我军主力应多少避免进行大的战役。如果我们

① 发报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送东方书记处,已送别尔津、洛佐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不晚于1934年2月23日。

④ 原文如此。指19路军的反蒋行动。

⑤ 原文如此。这里和下面均应为:集团军。

还能从这里和第 10 军^①占领的地区派遣非军事人员^②参加这些行动,以活跃在光泽、崇安和浦城地区的游击战,那我们就能大大延缓蒋介石作战行动的恢复。

2. 在各战线的消极作战阶段和后来的非决战阶段过去之后(这种作战行动,在蒋介石所采取的旨在包围福州的坚定作战行动的逼攻下,导致了 19 路军的失败和撤退),现在 19 路军的状况是:福建的力量只能靠防御和战术反击来延缓垮台的进程。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延长最后这个阶段,为此在完成我们的直接任务的同时,在福建地区只进行间接的战役。我们应该力争使南京军队在福建的核心力量滞留到夏季,而这之前,在 19 路军的垮台过程中,广东和南京之间可能发生进一步的纠葛。

3. 19 路军这个名义上独立的军事力量,有四种垮台的途径:

(1)失败和向南京投降。

(2)归并到闽东南受日本人鼓励的匪帮里,很明显,这些日本人是日本介入的先行者。

(3)加入粤军。

(4)寻求投奔红军的途径。

为了能在这个过程中赢得更多的东西和尽可能防止出现另外三种前途,我们 3 军团应该选择永安这个最合适的地区作为作战基地。7 军团应从沙县进行增援,还需要你们已在一些战线上采取的游击战。我们在这里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不帮助 19 路军继续成为独立的因素,而要拖长同南京的实际斗争过程,以赢得时间把 19 路军的绝大部分士兵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和获取它的武器。

4. 目前在福建的作战阶段,还是与我们在北部和东北部较为稳定的战线相对抗的积极应对和进行运动战的时期。我们应该巧

① 原文如此。这里和下面均应为:新的第十军团。

② 原文如此。看来是指红军部队穿便衣的代表。

妙地从这个暂时延长的时期取得最大的好处，我们认为，靠我们突击部队同游击队合作，进行英勇的和快速的战役行动，是可以做到的。在这里，占领土地的问题应该完全从属于歼灭南京人有生力量、根除亲日地主匪帮和队伍，以及瓦解 19 路军部队并把它们吸引到我们方面来的任务。同时要使粤军不进入这个战场。

这就是为什么第 3 和第 7 军团的行动，应该同有助于在分田地和武装自卫的口号下把农村居民动员起来的政治行动以及瓦解敌军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们认为，眼下战役将一个接一个地迅速进行并具有战线变换灵活的特点，这些军队必须采取行动，完全不要考虑后方的交通线和保卫领土的任务。

因此，保卫领土的任务，只有在它有助于建立新的游击区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

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利用福建的运动战时期，争取延缓南京军队的快速推进，我们应该努力延长这个阶段，给从东北和东面进攻在我们手里的汀州的蒋介石军队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

5. 如果上面拟订的计划能够完成，那么南京人就不得不推迟恢复对主要地区的直接作战行动，这也是因为福建的持久战使敌人在财政上有很大消耗的缘故。

这会给我们提供借助于游击战和其他斗争方式加强在东北和东面瓦解南京部队的机会。

如果目前我们在广昌战线和宁化战线的警惕性，仅限于防备敌人在这些重要战线采取出乎意料的行动，那么我们还需要注意防备蒋介石试图向我地区突破的以后阶段，而最好的办法是从泰宁、将乐地区向邵武和崇安方向采取积极的反击行动；同时要充分掩护归化、永安扇形战区。

为此，必须把我们能 在 1、2 月份集结或建立的所有预备队集中在广昌地区，以便以后投放到建宁和泰宁，从那里组织我军主力

在上述战线进行反击。

6. 不管我们考虑的西方战役是否合适,在该战线进行较大战役的时机已经丧失。但作为旨在吸引敌人注意力和牵制敌人兵力的手段,我们赣西部队采取的行动值得给以重视和加以领导,而可能的话,也应该用独立的部队给予加强。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可在某种程度上防止来自北面的威胁,保持前线的稳定,在中心地区部署最低限度的兵力。

至于南面的广东^①,由于要歼灭福建人,那里的兵力会越来越向东集结,而赣江战线将会掌握在何键手里。何键还要保护广西。这样一来,考虑到福建失败的结局,可以勾画出我们将来的兵力部署:

(1)第5和第9军团,而在完成目前战线上的任务时还有第3军团,都要作为突击力量在东北战线与第10军和游击队共同采取行动。

(2)7军团、22师主力部队和目前驻扎在东南部的独立军事单位,在东面战线和东南战线采取行动。

(3)在中心地区,暂时主要担任预备队角色的一军团,要积极协助赣西兵力的集结,并与西方军保持直接联系,同它协调自己的作战行动。

7. 除了以前计划组建的部队外,还要在新的福建地区组建新的部队,这应该是第3和第7军团的任务。为此,要利用经过培训的干部。学院和学校^②应开设新的完整学制的系。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7—12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意思是:在中央苏区南部边界,即在粤军活动的地区。

② 指红军的中央指挥学院和其他指挥学校。

2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中央苏区的电报

1934年1月12日^②于上海

作为补充^③我们强调以下几点：

1. 福建目前的政权，最近必定要垮台。即使 19 路军主力采取军事行动，也无法阻止目前的迅速垮台、福建部分军政首领向南京的投降和另一些首领转到广东人方面。

这个发展进程正在把福建事变给我们带来的暂时而有限的优势化为乌有，南京的强大军队在准备继续包围中央苏区。

2. 同时 19 路军的垮台和南京同它的斗争，不仅使我们能够而且也使我们的努力，去把 19 路军的部队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或使其脱离（19 路军），去获取武器，解除或动摇敌对部队的武装，歼灭地主武装，以及给予向前推进的南京军队以重大的打击。

加强对 19 路军的活动，应在决定性的时刻，也就是在福建首领即将向南京投降或者 19 路军向广东撤退的时刻达到顶峰。

福建政权即将彻底垮台，这要求我们必须士兵和群众面前更加有力地揭露福建军政首领的消极投降主义政策、他们同广东

① 发报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日期是根据第 221 号文件确定的。

③ 指对第 221 号文件的补充。

和南京的谈判和妥协、他们过去和目前的背叛行为和他们的整个政策。在目前形势下,最好是更广泛和更详细地向士兵和群众说明红军同 19 路军签订的协议的基本内容和性质^①,指出同 19 路军签订协议,是在争取实施协议、继续同南京作斗争、同红军实行军事合作和把 19 路军争取到红军方面来等方面向后者施加影响的一个手段。要继续同敌视南京的福建人士进行上层交往,眼下这样做是有好处的。要防止我们的代表成为军阀的人质。必须根据以前的建议加强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和工农的游击行动。

3. 不管目前福建的斗争结局如何,日本都将会采取各种更具侵略性的行动,加强和扩大其土匪队伍,很可能在最近的将来还会采取公开的和直接的干涉行动。

4. 据得到的情报说,不久前举行的两广代表会议^②,就反对南京军队向广东边界推进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12—13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183 号文件。

^② 不清楚讲的是 19 路军和广东当局代表举行的一系列会晤中的哪次会晤。

223

埃韦特关于《中国论坛》问题给
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①

1934年1月13日^②于上海

绝密

代表^③关于《中国论坛》问题给中央局的信

(又见报告^④)

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讨论一下涉及《中国论坛》的问题和建议,以便我们能够在星期二的例行会议上达成协议。

首先,讲几句开场白。你们当然知道《中国论坛》编辑^⑤的政治面目,因为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他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阶层,在美国受的教育,一段时间当过资产阶级的记者,没有任何革命经验,没有受过党的培训,他只是几年前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兴趣。一开始他同在上海当新闻记者的南非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这个人一直对艾萨克斯有很大的影响,决定了他托洛茨基主义的“同情心”和越来越明显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倾向。大约在半年前,托洛茨基分子格拉斯(人们这样称呼从南非来的这个人)离开上海到美国去了。显然,他在那里立即同托派组织取得了联系,同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曼努伊尔斯基同志。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2月26日。

③ A. 埃韦特。

④ 看来指第227号文件。

⑤ G. 艾萨克斯。

样显然,他从美国给艾萨克斯写信,继续对他施加影响和给他作出指示。

有许多指令指出,艾萨克斯遵循这些指示行事,一些征兆表明,托派同艾萨克斯一起制定了为公开进行托派反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逐步建立基础的计划。

我仅举出几个事实:艾萨克斯越来越明显地不愿意同我讨论《中国论坛》的内容问题;他对一些问题默不作答,因为在这些问题上他发表意见会把自己束缚起来;他在最近两个月特别明显地不愿意执行我关于一些文章的写作方针的建议并抵制这个方针;不愿意提及苏联及其社会主义建设(在11月号的一篇文章中,甚至没有提及两个五年计划和列宁去世以来取得的巨大胜利);他在同人们的谈话中把一些看法改变成在他看来容易接受他的观点的看法(我们通过一些人了解到他这样的看法,认为“苏联在执行民族主义政策”等等)。

这里要补充另一个需要给以极大注意的很重要的因素,即组织《中国论坛》的读者协会。组织这个协会的想法最初不是来自艾萨克斯,实际上是很早(9到11个月)以前由党倡议的。它完全独立于这种想法的所有者。很自然,像《中国论坛》这样的报纸(唯一合法的报纸)的组织作用应该是很大的。工人和特别是承担定期散发《中国论坛》工作的学生小组,在寻找半合法的组织形式,来进行讨论,来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和在更大范围散发《中国论坛》这个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革命报纸的刊物。

我们已几次同你们讨论过委托可靠的同志或党团来领导读者小组的问题。我们第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读者小组还不多,而且艾萨克斯的意向还不十分明朗。但现在,一方面,读者小组在迅速产生,而另一方面,艾萨克斯(和隐藏在他身后的托派分子)在打算利用这些小组作为继续搞破坏工作的组织基础。

因此,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加强我们对这些读者小组的政治领

导和组织领导。我们在这些小组中越强大,托派分子争夺它们的威胁就越小。

我们都赞同这样一个看法:我们都非常关心《中国论坛》的继续出版。这个重要刊物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具有更大的意义。但是在艾萨克斯手里,它可能成为有害的工具,至少在有限的时期内会是这样。问题在于,托洛茨基分子艾萨克斯在法律上可以以目前的名称出版这个报纸(而大家知道,名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具有很大的意义)。还难于剥夺他在法律上的印刷权利和把这个权利赋予另一个可靠的人。

我曾努力寻求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使问题得到体面的解决。因此,大约在4个月以前,当他对我说他打算写几本关于中国的书,但在这里他没有时间写时,我建议他到我们“家里”去。在那里,他不仅有时间,而且也有新的认识、新的印象。我给自己提出了两种任务:第一,我把很大希望寄托在人们对他产生另一个方向上的影响;第二,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能把编辑工作委托给另一个可靠的人。

一开始,艾萨克斯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他对我说,由于他需要调整一系列的工作(他在加瓦斯通讯社、在《中国论坛》报社等的工作),他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也许他在1934年春天或夏天动身。我怀疑他给美国写信,询问了指示。但几天前,我通过一个人得知,他在同你们的可靠朋友之一交谈时,无意中说出这样一句话:“建议他回家,这是试图收买他。”这种看法十分明显地表明,他的托洛茨基主义已发展得多么严重了。

我告诉你们这些细节是为了便于你们作出决定。问题具有很大的意义,为了同艾萨克斯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同你们就所有措施充分协商一致。

还有某种(当然是微弱的)希望,意思是我们提出的措施,使我们能够避免发生公开的决裂,并对《中国论坛》建立有力的监督。

但要对公开决裂做好准备。不管怎样,必须解决目前这种不能忍受的局面。

我们建议采取两种措施:

1. 党的一般措施。
2. 党对艾萨克斯的措施。

先谈后一种措施。

我们应该要求他:(1)社论和其他最重要的文章在付印前要交给党检查;每一期的内容在付印前应进行讨论,而每期最重要的文章应经我们检查。(2)《中国论坛》现在或将来拥有的所有联系(同情者团体、读者小组等)也应转交给党。(3)艾萨克斯应该同我们一起工作,同托派断绝关系。

这是基本的几点。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建议,请在星期二以前准备好。我认为,只能我们同他谈,因为你们处于地下,不便这样做。但需要你们对他说明,同他谈话的人是根据中国党的授权进行的。

至于党的直接措施,我认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要把所有读者小组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要弄清楚,哪些人加入了不久前成立的委员会^①并要加强我们在其中的主导作用。要把我们特别工作的目的和必要性以及存在的危险告诉最可靠的同志。

2. 要同印刷厂工人建立直接联系,部分工人是党员,很忠实于艾萨克斯(也就是忠实于《中国论坛》)。

3. 要同翻译(党员)^②建立联系,并要弄清楚艾萨克斯对他有多大影响。

① 指《中国论坛》读者委员会。

② 何人不详。

4. 要同分发机构,特别是其领导人^①建立联系,以便取得在上海和省里的所有联系。这个人物是非常重要的。

5. 尽可能多地组织《中国论坛》记者和读者小组,要求刊登受到中国报刊抵制的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广泛的消息。

6. 组织一个不大的由可靠的同志组成的《中国论坛》常设记者队伍。

上述某些措施要予以实行,至于其他建议,你们要考虑一下。请在星期二告诉我们还有什么考虑。我认为,现在艾萨克斯想避免公开决裂,也可能还服从某些指示,在暗中搞破坏。他请求给予指示,可能将坚持让格拉斯从美国返回。但另一方面,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他现在就公开反对我们。

在这样的问题上,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因为延误时间只会对艾萨克斯有利。此致

敬礼

P^②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25, 第 1—6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何人不知。

② 原文如此。

2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 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4年1月17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致中共中央

鉴于存在来自福建方面的建立反中央苏区的新战线的威胁，我们建议讨论以下建议：

1. 是否需要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致函 19 路军，提出这样的口号：你们的领袖同日本代理人蒋介石签订协议，背叛了民族解放斗争，请转到工农红军这一唯一争取民族解放的军队方面来吧！

2. 能否在转到红军方面来的口号下组织 19 路军部队起义，特别要注意 49 师，要解除忠实于 19 路军指挥部的部队的武装，为此要利用 3 军团^③。

3. 能否采取积极行动，阻止南京人通过占领福州来取得建立进攻红军的设防出发地区的可能性。

① 文件于 1934 年 1 月 15 日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成员 (O. B. 库西宁、B. Г. 克诺林、Ф. 黑克尔特、王明、B. 布龙科夫斯基) 飞行投票通过，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34 年 1 月 21 日非常会议上得到批准(见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76, 第 29 页)。

② 译电日期。

③ 原文如此。应为：第三集团军。

4. 能否在上海,在整个国民党中开展反帝运动,举行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和罢工,提出“日本人滚出福州!”“打倒日本代理人蒋介石!”等口号。

5. 在自己的宣传鼓动中,党应该汲取福建的教训,说明“第三党”,即“生产党”^①、社会民主党、托派等的真实作用,根据福建的经验揭示它们的道路会把人们引向何处。

请让我们随时了解情况,请告你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政治委员会。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7(1934 年发文),第 7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指人民生产党,即陈铭枢及其追随者在福建 19 路军起义时期建立的组织。起义被镇压下去后不复存在。

2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施特恩的电报

1934年1月20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①和弗雷德^②

据各种消息来源报告,《中国论坛》编辑艾萨克斯是托洛茨基分子,并在组织托派小组。我们同艾萨克斯没有联系,我们不支持他。请告你们的意见,为孤立他和使他离开,可以和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47(1934 年发文), 第 10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① A. 埃韦特。

② M. 施特恩。

226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的电报^①

1934年1月25日^②于上海

绝密

到目前为止,在8、9月份转交给党24.56万法郎,重复一遍,24.56万法郎,6.16万美元,重复一遍,6.16万美元,101452墨西哥元,重复一遍,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重复一遍,5000瑞士法郎,1864荷兰盾,重复一遍,1864荷兰盾。

党将提供从上述经费中支付给青年^③和党的款项的清单。1月23日。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61(1934年收文),第271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发报者和收报者是根据文件内容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
③ 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227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 1 号报告

1934 年 1 月 27 日^①于上海

致米哈伊尔^②。驻中国代表^③的第 1 号报告

最近的报告您是在四周前收到的^④。详细的军事报告,据弗雷德^⑤说,您将会从下一邮班收到,由于定期发去的电报略为说明了形势,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新情况,我想只报告最重要的方面。

1. 福建。福建政权的垮台比可预期的要来得快得多。首先,不可想象的是,甚至在众所周知的中国条件下,19 路军还在避免发生任何这样规模的严重冲突。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们不能从整个这次交易中得到预期的东西,即把 19 路军的大部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获取武器和大大削弱蒋介石的力量。原因有两个:(1)19 路军的投降政策不仅促进了撤退和部分部队转到南京方面,而且总的来说导致预先防止了 19 路军主要部队同红军部队的接触。由于担心[19 路军]部队违背 19 路军指挥部的意志,在同红军接触时,两军之间可能出现反对南京的联合行动,所以[19 路军]部队被调到很远的东南部地区,结果目前在 19 路军主力和红军之间部署了地主的自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 1934 年 2 月 20 日。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А. 埃韦特。

④ 可能指第 171 号文件。

⑤ М. 施特恩。

卫队和地方武装,以及部分广州军队。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除了试图防止部队转向红军外,还在于为把 19 路军并入粤军开辟道路。(2)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党以及我们来自中央苏区的朋友们在这个军队中做工作不够。中央苏区做工作不够,部分原因是以前的错误政治方针所致,这就是为表面上遵守同 19 路军的协议^①赋予了太大的意义,而不去动员群众和士兵实现这个协议,对他们完全隐瞒了这个协议。这样的方针不仅涉及对协议的利用问题,而且必然对福建的整个政治工作产生消极影响。

最近三周(从 1 月初起)出现了转机。首先,现在我们总的作战行动是要歼灭地主的自卫队(首先是在我们地区的边界上),接近 19 路军的主力;其次,[中共]中央完全赞成我们的建议:不要管奸细和协议,而要在士兵中间认真做工作,利用协议把士兵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同时在 19 路军指挥部中的苏维埃代表,要留下来把进步人士召集在一起,对他们施加影响,提出建议,做破坏工作并向[中共]中央通报情况。现在能否把 19 路军足够大的部队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这首先取决于南京试图解除它的武装或将其并入广州军队的缓慢程度和发生磨擦的程度。对我们来说,在这方面没有多大困难地取得很多成绩的时机已经错过。

除了这项工作外,我们的主要意图是要歼灭南京在福建的几个师,至少要延缓蒋介石的进攻时间。总的来说,尽管福建事变暂时为我们提供了种种有利因素,但最终结果还是为苏区带来了进一步的严重威胁,而这种威胁在最近几个月就可能出现,并且已不能靠我们的部分战绩将其排除。日本已取得蒋介石的公开同意,在充分利用福建的局势。在它的影响下,建立了武装队伍。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了 20 分钱领取了日本国籍。福建新省长^②是百

① 见第 183 号文件。

② 陈仪。

分之百亲日的。

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发生福建事变和日本向那里渗透的时候,在国统区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乃至罢工行动。(这也是对您发来的电报^①的答复)。但是必须加强在码头上和在船舶航行中的影响,以期在那里引发严重的动乱,因为福州和厦门现在正在成为同我们作战的重要中心。

2. 福建事变还有另一个结果,即进一步削弱蒋介石的进程放慢,他的地位至少暂时得到了加强。这首先意味着,广东将不得不表现出谨慎态度。国民党四中全会^②对现有状况和现有矛盾根本没有作出什么改变。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暂时得到控制,但不是因为全会及其决议,而是因为蒋介石在福建取得的胜利。正是这些胜利致使即将到来的南京与广东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而且冲突双方将进一步进行武装。在这方面,南京已经赢得了最重要的预备性战斗。蒋介石现在更加坚定地要造就法西斯化的干部和组织,以加强他的影响和权力,这也是四中全会作出的所有决议所致。由于南京和广东之间的矛盾本质上取决于英国的政策,所以必须考虑到以下情况:英国还在同日本进行瓜分中国的谈判,它还希望日本进攻苏联,而日本在华南进犯得还不太深,在这个时候,英国将试图延缓广东同南京的公开冲突。这种延缓之所以已不是复杂的事情,是因为广东军阀的地位在福建事变以后更削弱了。

机械地推测南京有很大的加强那是错误的。这一年的赤字最少是4亿墨西哥元。它抵补赤字的能力从来没有这么小;省提供的款项在减少;取得外国贷款越来越难;(美国的棉花和小麦贷款

^① 见第224号文件。

^② 国民党四中全会于1934年1月20日至25日在南京举行。

未必能兑现^①)；国内银行家拒绝接受所需款额的支票；同苏区的斗争没有取得多大成绩；在一个地区取得的成绩基本上被红军在其他地区取得的成绩平衡。无数的多半是自发的地方农民暴动，表明普遍在闹风潮。罢工运动仍在进行并在席卷新的地区。存在着发生新的军事哗变的威胁；日本的侵略行动在继续；英国准备将其以前的策略变成公开的直接干涉策略，或者间接并吞策略（四川、长江地区的“国际”宪兵队）。

3. 与此相联系，孙殿英将军率领 41 军发起的进攻是有重要意义的^②，他在上海的代表^③已同党的特科建立了联系。据报告（我还没有拿到报告译文），我们党在 41 军中约有 200 到 300 人（部分同志以前是在察哈尔军队中工作）。好像他们能对 4000 名士兵施加影响。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谨慎对待，因为这个军队中的许多党员在坚持党的方针方面是靠不住的（右派、托派同领导核心联系薄弱，有薄弱的领导，等等）。

41 军代表的“建议”^④，我已通过最近一次邮班寄去了。我们的方针是：不管它的什么代表讲了哪些空泛的词句，这个军队都是中国典型的军阀武装，它的司令部都在寻找地盘，因此它会同“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军队发生冲突。41 军的特殊驻扎地使它变成了对于我们来说尤为重要的军队，同时也变成了特别便于日本和英国利用的对象。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英国试图对这些武装施加影响（绝不排除日本的影响），以利用它们来实现英国的目的，建立甘肃至蒙古以及在四川方面的屏障。5 万人的军队在蒙古的逗留以至向其内部地区的进一步推进，会吃光一切，这肯定会激起蒙古的

① 指 1933 年美国向南京政府提供 5000 万美元贷款，用于购买棉花和小麦。

② 指孙殿英将军为在中国西北建立他控制的地区在反对南京投降政策口号下采取的行动。

③ 何人不知。

④ 文件没有找到。

敌对情绪,这种情况日本也会大加利用。我们希望防止发生这种情况。但我们完全不希望这支军队向南推进太远,直接靠近我们的川陕苏区。这首先决定了我们的以下策略:(1)加强我们对士兵施加影响、进行瓦解和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的工作;(2)加深同甘肃军阀的冲突,制造同陕西军阀的冲突,以削弱他们,包括削弱 41 军的军阀。现在 41 军试图占领甘肃省的宁夏^①,至今尚未得逞。

如果您对 41 军内部的工作或同 41 军的工作有什么指示,请您电告我们。我认为,不必过早作出什么起义的尝试,而只是有步骤地灌输我们的影响,同这支军队一起行动,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和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区,获得尽可能多的机会。

4. 党的问题和运动

(1)[中共]中央全会^②结束了。还没有详细的通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③也结束了工作。有必要十分认真地做反空袭的准备工作。

(2)您将从下一邮班收到关于工会活动、罢工行动和在上海坚定不移地恢复我们的(阵地)的报告。

(3)满清王朝的复辟^④,使人可以接触广泛的阶层,我们坚决建议党在我们总的工作范围内对这个问题给以必要的关注。此外,反对日本傀儡君主制度的斗争,可以有效地同反对国民党的整个政策结合起来。

① 原文如此。应为:占领与甘肃省相邻的宁夏省。

② 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于 1934 年 1 月 15 日至 18 日在瑞金召开。

③ 中央苏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34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1 日在瑞金举行。

④ 1933 年底 1934 年初,日本代表和伪满洲国当局开始准备在这里实行帝制和让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登基。登基仪式在 1934 年 3 月 1 日举行。

(4)王明和老板^①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已被中央局^②采纳,这封信定会促进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的建立。不言而喻,我们也征询了[中共]中央的意见,但暂时还没有收到。我们认为,民族革命战争问题具体化的运动是很必要的,也是长期的,它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和组织作用,特别是在战争过程中。同时这个计划对于揭露国民党和在中国日益增强的法西斯主义也是好的。

目前在广泛开展运动的道路上,需要克服的困难是相当大的。如果我们只同宋庆龄和一般组织提出这个计划,这不会具有多大意义。只会得到很微弱的反响,这种事以前我们也经常做过。信中很正确地建议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但目前的形势是:几乎无法把许多知名人士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甚至为了实行有限的计划)。现在人们非常胆小怕事,被蒋介石和法西斯分子的屠杀威胁吓坏了。因此我们应该进行较长时间和较系统的准备工作,直至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向社会各界提出委员会扩大的人员组成。

(5)鄂豫皖苏区。据我们最近得到的信息说,这个地区留下来的部队处于不利于进行防御的环境。那里的情况实际上是这样:我们在那里还有 2000 名武装人员,被夹击在几处贫瘠的山梁上,而在附近的地区,敌人摧毁了村庄,消灭或赶走了村民。我们的军事努力消耗在不断寻找食品上。在这种时候,没有扩大地盘的希望。除了饥饿和在战斗中的重大损失,还发生了流行病,减少了我们本来就不多的力量。分化瓦解和叛逃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取得[中共]中央的同意,决定大胆突围并扮演游击队角色在新的地区设防固守^③。这比慢慢被消灭要好。现在江西[中共]中央正在同鄂豫皖苏区代表讨论我们的建议。

① 康生(见第 182 号文件)。

② 这里和下面指中共上海中央局。

③ 见第 228 号文件。

5.《中国论坛》。我附上我就这个问题寄给中央局的信^①。现在事情是这样：据斯拉文^②的信息说，“读者协会”完全在党的管辖下。最关键的人物，即《中国论坛》发行部领导人是绝对可靠的党员^③。现在“读者协会”党员干部得到了关于艾萨克斯“方针”的通报，正在准备关于《中国论坛》上的托洛茨基主义提法的材料。

同艾萨克斯的辩论(米尔顿^④和我都参加了)还没有结束，但已经表明，他对所有基本问题的认识都完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他没有公开讲出自己意见的地方，多是要外交手腕，而不是不清楚。尽管存在这种情况，但还有不经公开斗争把他挽救回来的可能性。至少我们打算这样做，当然不忘准备同他作斗争的措施。我们建议建立一个由他、党的代表和我们中一个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在答复这个建议时，艾萨克斯请求“让他考虑一下”。可以推测，他在以某种形式拒绝这个建议。

我已经电告过您^⑤，我再重复一遍：(1)我们需要新的编辑。只能是合法的美国人(来自美国)。任何别的人都会被驱逐出境。如果您那里没有什么其他人，那就马上把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派来。她在政治方面不够强，但可以帮助她，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报纸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2)您应该打电报给美国党，让上海“乐维尔印刷公司”主人剥夺艾萨克斯的全权，并把这些权力赋予另一位可靠的美国公民，最好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必须给我们寄来新的委任书。请一准备好就电告我们，我们给您发去委任书应寄的地址。我认为，主人应是党员。我们曾特别主张挑选

① 见第 223 号文件。

② 李竹声。

③ 何人不知。

④ T. 赖安。

⑤ 见第 230 号文件。

可靠的人做股东。(3)如果发生什么重要情况,我们会用电报向您作出简短的报告。

6. 米尔顿的四川苏区之行。米尔顿回到上海后,报告了您的建议,按照您的建议,一有机会他就要去苏区。根据他的个人请求,我曾询问中央局是否同意派米尔顿去四川苏区做政工人员。中央局说军事顾问是更需要的,但最后答复是表示同意。

去四川的困难是很大的,因此要用几个月时间做准备。

按照米尔顿的愿望我向您报告一下自己的意见:

(1)既然米尔顿想去那里,您应该通知党或我,您是否同意他去四川。

(2)因为[中共]中央在江西,外国政工人员在中央苏区不是十分需要。

(3)但是在四川,政治领导是很薄弱的。那里有经验的领导同志很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政治方面相当不稳定。像米尔顿这样的同志,在那里作为政工人员会很有帮助的。这个地区关系重大,在我看来,有很大发展潜力,从将来的战争角度看具有很大的政治战略意义。

(4)米尔顿去四川,绝不能消除为四川派军事顾问的必要性,您应该做准备。

(5)为米尔顿着想,需要您告诉我们,派他去做什么工作。需要有给中共的委任状。当您派同志到中国来时,我请求您始终要注意到这一点。

7. 弗雷德去中央苏区已开始做准备。如果不发生什么情况的话,可能过两个月起程。当弗雷德离开时,需要您派一位军事代表来。

代表

- 附上两个文件：1. 关于福建问题给[中共]中央的建议^①。
2. 关于《中国论坛》问题给中央局的信^②。

对报告的补充 1934年1月27日

我认为有必要简要地报告一下，同弗雷德共事本质上没有改善，最大的努力是，力求做工作少发生摩擦。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为了将来向您提出我同弗雷德有政治分歧的问题，考虑到弗雷德的敏感，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在采取很高明的外交手腕的情况下下进行。

1. 王明和老板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问题和运动问题。弗雷德建议靠取消计划的(2)、(3)、(4)点创造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可能性：(2)普遍动员居民，(3)普遍武装居民，(4)保证为抗日建立战时基金。这几点不应该由正在组建的委员会提出，而应该由党提出，并且是在组成委员会之后。计划应该缩减，使之能“吸引”像宋子文(原财政部长)这样的人物参加。为做到这一点，似乎一开始就必须把宋庆龄排除在工作之外(好像她太“红”了)。米尔顿和我未接受这些建议。计划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具体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答复。取消这几点会意味着我们的观点附和反动政客的观点，不能达到弗雷德所预期的“积极分析”这些人物的目的。在进行辩论和拒绝他的建议之后，弗雷德在中央局会议上很缓和地提出了取消(2)、(3)、(4)点的问题，会议也未接受这种意见。

2. 关于瓦解 19 路军的问题。像以前一样，弗雷德建议收买 19 路军一些师级将领，每人 1 万美元，派他们去香港，他们不在时，俘获他们的师团。尽管我有种种理由，但我未能说服他，毫无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 223 号文件。

疑问,他真的认为,我妨碍实现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从各种原因来说建议是毫无意义的:(1)“收买”师级指挥员解决不了师团本身的“命运”。已有足够多的指挥员丢下了自己的师团,并且他们中一些人去了香港。此外,在中国军队中还有军官干部这样的概念,他们有自己的地位,不能全“收买”。(2)为达到此目的,我们没有这么大数量的钱。(3)不能放过哪怕是很小的可能性对比较好的人施加影响,我们认为,我们工作的主要方面只能是在士兵群众中做工作,再加上直接解除武装的行动。

我请求您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虽然对待敏感的同志^①不是始终都容易作这种决定的,因为作出的决定如果不能使他信服,尔后他就会把这些决定用到所有其他问题上。

代表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30—34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① M. 施特恩。

2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中共鄂豫皖苏区委员会的信

(摘录)

1934年1月底^②于上海

致鄂豫皖苏区共产党的信^③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最近的工作报告^④和同你们代表^⑤进行的详细讨论,使我们能够对一些事件和鄂豫皖苏区内部和周围的情况,对这些苏区到1933年10月底,即国民党军队在刘镇华指挥下进行了最近一次最血腥的进攻之后的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概念。1933年下半年,鄂豫皖苏区的英勇战士一直是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敌人的优势兵力、饥饿和疾病、叛徒的肮脏勾当)进行斗争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当红军的主动权,多少能在敌人进攻时得以恢复时,哪怕是暂时的,就应该体现在,主要由残酷的必要性和寻找粮食所决定的作战行动上,当疾病降低了红军的作战能力,而医疗设备和其他设备的短缺不能得到满足时,当在最危急的战斗时期,各种分子

① 发信者是根据文件附注和第227号文件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5月14日。

③ 文件上有批注:弗雷德(M. 施特恩)给鄂豫皖苏区的信。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何人不详。

充当叛徒，从内部打击抗敌的红军时，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红军和游击队一方面要保护苏区人民，使之免遭由刘镇华指挥的国民党刽子手进行的残忍大屠杀，一方面要在连绵不断的斗争年代，更加英勇地作战，尽管遇到许多挫折和犯过许多错误，而这些挫折和错误可能是可以避免的……^①

Ⅲ. 目前阶段和对下一个斗争时期的准备

在你们最近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是由[党委]书记^②于[1933年]11月10日签发的），我们看到了由游击队和根据群众的倡议所成立的侦察小组采取行动而争得阵地的新希望。在这里我们也得出结论：这是在这种严重形势下的唯一行动途径。

从王家河地区向原苏区，即第三和第二扇形地区、高山岗所在的第四扇形地区、南部扇形地区（黄阴寨〈音〉和天台山）等扩大游击行动，应该在恢复我们在群众中的地下网和组织劳动人民的革命群众斗争的同时继续进行。这两种方式应该紧密结合起来，否则游击行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进行或者被孤立。老百姓挂白旗的情况不应阻挡我们特别重视这些地区，因为旗子的变换大多是纯表面上的，群众指望这样做可以避免遭杀戮。现在他们已经有了痛苦的经验。我们在老百姓当中的地下群众工作，如果在这种时刻严格秘密地进行，是不会难做的。在未等地下组织打下十分牢固的基础之前，我们基本上应该集中组织不大的侦察小组，把它们看作是将来把一些积极而有经验的小组并入游击队的基础。通过这项工作，我们要为群众加入独立团和游击队奠定基础。

至于我们还保存有阵地和多少未受到敌人触及的地方，我们应该迅速根据白区的那些原则建立地下组织，同时清除所有可能

^① 下面省略了信的Ⅰ、Ⅱ部分，其中分析了1932年年底至1933年秋鄂豫皖苏区作战行动的主要阶段和教训。

^② 何人不详。

在将来成为宪兵队骨干的分子。我们做这些工作时,不应让我们的作战干部为保卫我们剩下的地盘,使之免遭敌军新的进攻而过早地在战斗中牺牲。为了做地下工作,要在游击部队中留下足够数量的干部,而在侦察小组中要隐蔽一部分干部,余下的作战部队应该准备在阵地守不住的情况下放弃所在地区。今天主要的任务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保卫仍在我们手里的不大的地盘,而是保存干部和力量。在每次防御战中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时刻:从军事角度看直接防御已经没有意义,所以最好寻找其他解决办法。当然,我们知道,苏区防御不能也不应只着眼于军事角度。也不能把从政治角度看过早地放弃防御,同从军事角度看得到好处,即保存作战干部相提并论。在目前阶段进行决战的条件还不成熟。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和相应地制定我们的战术。

屠杀老百姓的血腥行动、摧毁一些县城和“强迫疏散”的做法,今天已经到了我们最后的五角堡垒的中心。当敌人攻势恢复时,继续借助以前的战术全力守住这些五角堡垒,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饥荒是另一个敌人,根据你们的报告,我们现在还不能同它作斗争。如果饥荒暂时还不像过去一些时期感觉得那样尖锐的话,我们现在则应该预见到将来的情况,并结合种植新一茬庄稼和没收粮食的可能性来考虑我们的抵抗力量。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军队被纯属保护庄稼,也就是保护还在我们手里的小块田地束缚起来。这样的策略将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限制我们对其他失地群众的影响,我们怀疑,试图直接保护我们军队的那些地方的群众会愿意接受我们保护他们的田地。他们不参加我们的作战部队,不是因为敌视我们的部队或者谴责我们的部队,而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这样的策略面对敌军新的进攻不能保证完全保护他们的田地。其实,我们的部队要靠地区剩下的很少的粮食来养活。所有这些情况使我们作出决定,不让我们的主力承担直接保卫剩下地盘的任务,并将如何保存和加强宝贵的

作战干部和力量问题提到了首位。

当然，作出这样的决定并非易事，因为在这里也有另一些政治考虑，在同我们坚持到底的群众面前，我们感到自己的责任，我们也应该想到我们的伤病员，等等。

我们想在下面阐述的计划，完全考虑到了问题的这个方面。只是在我们需要作出抉择：要么考虑这些想法，要么保存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偏重了后者。我们的一些建议不应被错误地理解为机械地离开所在地区，让它在我们作战部队寻找新的斗争、等待和发展地区时完全凭命运摆布。以后的建议的主要思想是试图说明，在建立新的游击中心和苏维埃中心的时期，如何保存和加强我们的作战部队，同时现在就准备在有计划地采取行动的过程中，通过内部和外部在最有利时机的共同努力来恢复老的苏区。我们在考虑到这一点的同时，应该十分坚定地和一致地作出决定，准备作出一些不可避免的暂时牺牲。

如果你们将得出关于达到同样目的的途径和手段的其他结论，你们当然有充分自由根据你们比我们更了解的实际情况来利用我们的建议。

最后，我们应该说，尽管你们犯了种种错误，为此你们在自责，失去苏区不只是由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改变的主观因素决定的。客观因素本身十分强大，足以摧毁我们甚至组织得很好的抵抗。我们能在持续一年的斗争过程中进行抵抗，同志们和群众能像真正布尔什维克那样去献身，这完全是你们的功劳，同志们。你们的坚定性和准备坚持的意志，没有被反革命分子的背叛行径和我们自己队伍中的软弱表现所动摇。我们把这看作是我们能从暂时遇到的挫折中恢复过来，收复我们失去的阵地和在鄂豫皖地区实行革命的保证。

IV. 下一个时期的计划和任务

一、党组织的工作：

1. 恢复共产党的委员会，除前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同志外，

再补充一些工人、贫农和在斗争过程中表现出有能力以布尔什维克的清醒头脑和对党的忠诚解决艰难任务的同志。党委的每一个成员,包括遴选的同志,应负责由党委、扩大会议或党委常设执行局作出的决议给他确定的专门工作方面。

2. 党委成员和遴选的同志,依靠地区和分区党员积极分子的帮助,以负责领导同志身份出现的特殊活动领域是:

(1)在原苏区的整个地区和与之相毗邻的地区建设党的地下组织网。这项工作应该根据地下工作原则严格集中进行,其基础是在每个分区、地方政权机关、游击队和师以下的部队(团)等单位建立由3至5人组成的支部。至于后者即军队和游击队,它们要从头重新开始秘密地做工作,随着群众运动的开展和为加强整个党的组织、活跃党的生活和加强党的健康影响,以及清除不可靠分子、消极分子、官僚主义者等在部队和支队中的清查工作的进行,逐步地把组织发展成公开的。原来的地方支部应得到扩大和加强,使它们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秘密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安排好现有白区的工作。还在我们手里的地方组织,也应秘密安排自己的工作。

已恢复、扩大和因此被派出的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单位,即地区和地方整个革命工作的领导、指导、施加影响和进行监督的机构。

支部成员也是负责人,每个人负责自己独特的工作部分,例如负责领导共青团组织,负责领导战斗的侦察小组并同它们保持联系和通过它们同附近的游击队保持联系;领导侦察工作和瓦解敌军和警察支队的工作。指示主要是口头的,应通过适当的渠道传达给相应的执行机构。这样一来,整个情报应来自下面。

当红军各部队和游击队中的党组织恢复到能开始健康合法地运作的时候,就要脱离地下网,转到对红军(部队)或游击力量的政治领导上。

3. 对红军和游击力量的政治领导

领导同志即政治委员，应由党委挑选和任命，必须考虑到他们的能力、参加军事斗争的经验、政治发展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他们的工作是从政治上指导每个部队（团以上）政委的工作，指导和监督部队中党的生活，帮助部队指挥员提高作战能力和部队的纪律性，在政治运动问题上指导部队中的党组织。应特别注意根据我们党的政策保持部队同群众生活的联系问题和根据阶级斗争原则帮助组织民众进行各个阶段的土地革命。

部队政委是司令员在军事问题上的助手，是他们在政治问题上的顾问和监督员。政委在部队中的作用是以部队分队党支部为基础的，而这些支部由团或师党的委员会领导。

部队政委可以是部队党的委员会主席。以后当部队党组织变得强有力和健康时，主席将由支部委员选举产生，而政委如果未当选，他还是委员会委员，但任命的结果他就不是委员会主席了。部队分队指挥员的任命应由政委和党的委员会主席批准。空缺职位的候补人选可由政委任命或委员会推荐。这两种人选最后由最高军事或政治领导人批准，战时在一个月內批准，和平时期在三个月內批准。被批准当指挥员的同志，应拥有在军事问题上和革命纪律问题上的全权。只有政委可以根据上级指挥员或特科的建议解除指挥员行使的职责。

4. 特科。应建立特科作为党委对付反革命向党、青年^①、红军和游击组织渗透的革命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

特科的同志要派到红军和游击队中去，要与党的委员会、部队政委等保持密切联系，进行自己的特殊工作。

特科在地区的分支机构在工作中要与侦察小组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侦察小组中要建立由最可靠的积极分子组成的专门

^① 原文如此。指中国共青团。

小组。

5. 党在宣传鼓动方面的工作,不应通过上述组织系统在其秘密存在时期所利用的渠道进行。在这些渠道之外,始终有青年组织、广大农民组织,等等。

※ ※ ※

这里提出的许多组织计划条款,在某种程度上是放弃了党的一般组织工作方式,自然许多工作方式是你们使用过的和普遍使用的。

我们试图勾画出符合你们组织目前状况的组织工作示意图,你们应该仔细研究提出的每一条的适用性,如果你们认为它实行不了,你们就应该寻找建设党的组织和使之免遭内外敌人损害的别的方法。

你们使用提出的计划时,既不要一切都重新做起,也不要把一切都一成不变地硬纳入新的组织方式。这里最好是走中间道路,即一开始造就干部骨干,在现有组织框架内按新的方针进行工作,然后这些干部应该进行组织清理工作,使组织适应新的要求。在这项工作过程中,部分以前的党员将不再被纳入新的组织。将出现新的干部,也应该出现,将从战士队伍中提拔上来。

我们在这里不研究中国共青团的组织问题,因为你们自己能容易作出必要的结论。我们的建议是,不要在改组党的组织系统的同时开始改组中国共青团。当党的组织系统建立在健康的工作基础之上时,可以单独着手解决青年组织问题。

对待在党组织领导下的其他群众组织也是一样。关于群众组织,我们在下面将用专门一个部分来谈农民组织的工作。

二、农民组织的组织结构及其任务

把党的活动和对广大群众的影响仅限于通过我们地下党组织的渠道或经过游击队和红军的组织来进行是不对的。正如上面所说的,后者在群众中的工作任务并不限于建立对群众施加影响和

对他们进行领导的组织形式。党对农民组织的领导应该通过他们自己的结构，即通过地方农民互助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农民自卫队和恢复苏维埃委员会来实行。

上述的每一种形式应该看作是土地革命运动及其组织的连续发展阶段。它们的地位可能是不合法的、半合法的或合法的，这取决于发展阶段。上面指出的委员会是按阶级原则组织起来的群众代表机构，我们党的成员应该是其中的领导党团。主要应通过宣传鼓动工作来与其他派别、富农、警察等的影响相对抗。

农民组织应该是党在土地革命阶段实现苏维埃运动任务的最有力工具。我们在拟订它们的组织结构时，应该考虑到：(1)我们还保留着政权的地区；(2)我们失去政权的地区；(3)为建立我们的政权并将其作为在鄂豫皖更广泛的基础上收复失去的地区的工具，我们应该给以关注和做工作的地区。

1. 我们地区的农民组织

在敌人对我们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或者在我们的游击力量渗透到相邻地区之后，应该把地区剩下老百姓中的积极部分组织到地方互助和保卫分支组织中去（在这里，我们认为，阶级敌人在我们的环境中不是不可战胜的），这就是：

(1) 贫农和中农是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其宗旨是抵抗敌人的进犯、大兵的掠夺等。苏维埃机关在履行自己作为地方政权的职责，在向游击队和红军提供粮食和供给援助时应该依靠这些广泛的组织。

(2) 农民自卫队，这是广泛的农民组织中最活跃的部分，当警察进犯，大兵抢劫时，它们在苏维埃机关军事部的领导下完成自己的任务。它们的队伍应组成由自制武器或自己弄到的武器武装起来的十人组。它们应该是由农民自卫队形成的游击部队和侦察小组的预备队，建立游击部队和侦察小组是为了在相邻地区同敌军作战，或者在敌人进犯并推翻苏维埃政权时在一些地区继续同敌

军作战。

2. 失去地区的农民组织

在恢复我们失去阵地的(道路上)的初步行动,应在发展互助自卫组织的过程中采取,这些组织将显示出同白军的举动和已恢复的国民党当局的行为、同重新出现的富农和他们夺回已经分出去的土地的做法,同收取道路和哨所捐税和同建立白色警察等等的斗争精神,保卫自己的住宅、土地和收成。这些组织不仅应在经受了国民党政权复辟的老百姓当中建立,而且也应由逃难或被敌人强行疏散的人们组成。在聚集了疏散百姓的相邻村镇和城市,我们为恢复自己的影响而进行的地下工作,首先应特别重视老百姓争取返回自己的土地上的斗争和组织返回的工作,不管国民党的政策如何,要争取老百姓尽快返回自己的家园和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反对国民党殖民主义政策、国民党学校体制等的斗争。这种反对强行疏散和争取尽快返回的斗争应该为侦察小组的扎根提供最好的条件。

在为国民党的政策制造混乱和同它的警察进行斗争时,我们应该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进行建立农民自卫队的工作,将自卫队作为正在活动的侦察小组和游击部队的预备队。

这种斗争应该把通过农民暴动恢复苏维埃政权、解除警察武装和对白军为镇压苏区而进行的讨伐采取作战行动作为终极目标。

实现终极目标的过程,受地区总的形势的左右,可能是短暂的或者是长时期的。我们的地下革命行动委员会、恢复苏维埃委员会,应该使自己的组织工作、宣传鼓动工作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形势。

3. 附近地区的农民组织和我们的策略

为了迫使敌军改变其目前针对我们地区内部的行动,以及阻止敌人在从红军手里夺去的地区实行“恢复”政策,需要在我们地

区以外的地区和相邻的县开展尽可能广泛的农民运动。

每次敌军试图在一个地区镇压红军部队、游击队或农民的发动时，都应该从其他周围地区采取有效手段把敌军引诱出这个地区。当敌军准备向什么方向推进打击我军时，它们始终都应该在其后方遇到新的战斗。这应该是我们反对镇压土地革命的政治军事战略的基本内容。在战斗中遵循这个最高原则，我们不仅能赢得巩固我们的胜利和加强我们的防御所需要的时间，而且同时能保卫我们的成果，保证在新的广泛的基础上发展和不断扩大土地暴动的最好方式，从而便于我们得到加强的军队稳步地向那些将从我们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的新的地区推进。

在我们原苏区失去的地区的现有条件下，这个原则应做一些改动，因为我们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敌师团和警察部队实施两道包围而变得复杂化了。在战斗开始阶段，可能是另一种情况，敌人还要使包围圈合拢。而现在，迅速摆脱包围并在我军和敌人集结的军队之间留下一定的空间将是更适宜的。

但是，我们在作出这个结论时，应该同时强调上述措施和我军纯军事撤退或撤离之间存在的差异，事先为进行力量改组和恢复斗争而拟订和准备的地区除外。

在我们现在所谈的地区，不怕被人错误理解，广泛的农民运动将部分具有我们讲失去的地区的第二条款中所指出的组织特征，而部分地具有我们组织土地革命力量时所采用的一般形式。应强调这些组织形式中的哪一种，这将取决于所谈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一些地区，我们的地下组织能从诸如保卫没收行动和分配土地运动的农民自卫队这样发达的形式开始，在另一些地区，我们应该从宣传分配土地开始，与分配和保卫收成等行动一起进行。这不应仅仅是你们党组织的任务。我们也建议相应的（中共）省委，要特别注意把与你们毗邻的地区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我们还从这里派出一些同志去组织、领导和监督鄂豫皖边区的这项工作。侦

察小组是我们将来的游击力量的萌芽,在任何情况下一开始都要着手成立,以阻止敌人企图在还没有成立侦察小组的地方或其成立处于开始阶段的地方建立警察部队。如果在这些地区发现在敌军进入苏区时从那里逃出来的农民,以及部分被敌人强行疏散的群众,那么成立侦察小组以组织农民返回自己的家园,就能给这些地区的农民组织补充力量。

如果敌人对保留下来的苏区的压力,现在还没有大到成为红军大撤退理由的地步,我们则应该在苏区以外的地区着手准备农民运动,以便在红军不得不放弃自己根据地的最后阵地时,及时为它的斗争建立基地。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拥有的时间不多,建立这种基地的任务就会落在来到新的地区的红军肩上。这当然一开始就会削弱我军的作战能力,并在敌军追击、实施强有力进攻情况下,妨碍农民组织的顺利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起码应该做的工作是,在红军部队进驻新地区一开始,就要巩固和加强部队中党的组织,以使它们能够在新的地区毫不迟疑和不犯错误地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务。

当红军放弃老的地区时,应该留下支队的部分力量进行游击战,用新的力量补充已在活动的游击队,以便于红军的撤退和阻止敌军对红军部队的追击。我们所讲的游击力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直接防御的办法来完成保卫地盘、百姓和收成的任务。相反,他们应竭尽全力保持骚扰敌部队的主动权,一有可能就要利用优越于其武器实力和战士数量的机动性、灵活性战术。仅由十人组成的小组,如果它们除了充当不断骚扰敌人的源泉和一有可能就歼灭敌人而不追求其他战斗结果的话,则可以在各地连续两夜给敌人各部队驻地制造混乱。

※ ※ ※

在提出的计划的不同条款中和下一个时期的任务中,我们试图把你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诸如怎样把红军的斗争同游击队和群众

的斗争结合起来的主要问题上。只有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大大巩固党,振奋我们党的队伍中的精神和坚定不移地发展符合目前不断变化的条件的组织形式,实现这个目标才会有保证。

(2)^①接下来要简要叙述一下具体的军事政治行动计划供你们审议,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应该谈谈瓦解敌军和为红军进行侦察的问题,以及一些战术问题。

1. 瓦解工作

在关于你们斗争情况的工作报告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明显的证明,说明你们对那些进犯我地区并同我军作战的敌部队进行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瓦解工作。这不仅是你们的疏忽,这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对这项工作的共同忽视,结果红军作战时得不到本可以指望得到的瓦解国民党士兵方面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向被迫对我们原来地区进行血腥活动的国民党士兵发出的号召,如果由群众自己在我地下组织的组织和领导下坚决地发出,那才会有一定的效果。向敌军渗透的另一种形式可以由被疏散的群众在我们地区以外的地区使用。这应该是专门从目前无家可归的青年当中挑选出来的人员的任务。这些人要根据我们的建议以个人身份进入警察局和敌人部队,其唯一目的是给从内部做瓦解的工作打下基础,从而帮助红军的斗争。

我们就另一个问题所谈到的侦察工作要与此协同进行。我们对敌人部队的了解至少应达到这种程度:我们知道敌人相应的师或团准备何时和向何处采取行动,以便能及时建议我们的游击队和红军部队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给敌人设下出乎意料的埋伏或避免遭到敌人免不了要进行的打击。在每个军队和游击队中,应该设有几个侦察小组,不断获得侦察情报,并迅速报告我们的部队。应特别注意在目前属于敌人的地区留下合适的人员,他们充

^① 原文如此。

当敌人的向导,可以根据游击队的指示行动。在所有这样的场合,都应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力量,防备可能出现的“两面派”。为使敌人误入歧途,我们应该利用散布关于我军行动的假消息的做法,并且作为对这种消息的补充,我们应该采取欺骗行动,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到所希望的方向。

2. 在目前形势下可能是有益的一些关于战术的意见,在目前阶段,我们不能让红军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没有游击队的支持、群众的积极帮助和同群众的紧密联系,没有在瓦解敌军方面及时采取的措施,等等。

现在我们应该把整个红军看作是我们最宝贵的干部队伍,最好在最近的阶段,当它们在新的地区恢复自己力量的时候,加以利用。我们应该备加保护红军这个重新建设强大军事组织的骨干力量,而不是让它在这个时候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去“赤裸裸”地作战。根据这个原则,下一个时期的斗争应该这样进行:只有在战斗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采取作战行动。在山区和谷地里的最重要战略阵地,已经落入敌人手里。在这里,敌军在设立瞭望台和修筑防御工事。红军不应进攻这些事先做好准备的阵地。骚扰敌人的行动现在是唯一可行的斗争手段,这完全应由游击队承担。独立游击队数量越少,协调它们与直接在地区游击指挥部指挥下活动的大量游击支队的行动就更容易。地区游击指挥部也应在游击总指挥部的领导下行动。要从红军的常规部队中只挑选那些已具有进行这种特殊的作战行动的必要经验的指挥员和战士来进行游击战。

红军剩下的部队现在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如果他们未处于敌人的打击之下的话)来重新部署自己的力量和加强革命纪律,提高士气和作战能力。在敌人进攻时,红军应避免发生冲突,放弃阵地,不进行防御战,并在协助事先做好准备的撤退的那些游击队的保护下向拟定的方向撤退。在计划的撤退过程中,能给敌人造成损失的唯一办法应该是:离开追击敌人一定的距离,红军迅速分成

三部分,其中主要的两部分离开撤退的主要方向,准备隐蔽处,从那里可以用火力突然袭击敌人,而较小的第三部分继续撤退,以把敌人引诱到最初选择的方向上。根据这种伏击的结果,三部分可以放弃最初的方向选择别的方向,或者他们还可以通过迂回行动回到老的地方。红军停留在某一地区或地方时,它的供应问题由游击部队来解决。不要采取露营地的直接防御。侦察和巡逻小组及哨兵应报告敌人的接近,给主要部队提供足够的时间,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有计划地进行撤退。指挥部始终应该考虑将选做下一个露营地的地区。由这些措施即所有的战术撤退可以形成战略撤退,当党委和总指挥部认为有必要时,就可以作出战略撤退的决定。

现在我们详细地解释一下什么是**战略撤退**。这种撤退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都是合理的,它不同于像在敌人的逼攻下匆忙大撤离的一般撤退。一般撤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并有大量的牺牲,保存力量和重新掌握主动权的希望也很小。

当然,有计划**的战略撤退**,应该有在老的地方仍很活跃的游击队作掩护,应该有在政治上不合法的一些组织作掩护(这些组织是留下来在我们能重新恢复失去阵地之前的一定的不合法时期继续发展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结论:从上述意见中可以得出:1933年11月初的形势要求(我们)作出有利于**普遍撤退**的决定,其主要目的是保存作战干部,目前要把守住地盘问题作为次要问题放一下。但是,由于后一个问题要求采取许多政治措施和组织措施,目的是要在较晚时期收复失去的地区,所以如果敌人的压力不太大,而总的情况还允许整顿红军部队并使他们能够在目前所在的地方进行休整的话,那么军队就可以不急于**普遍撤退**。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我们还应该为**普遍撤退**做一切必要的准备,以防在我们不得不撤退时发生不知所措的逃亡行动。

某一个地方的暂时收复,如[1933年]10月14日收复黄壁障

(音),或游击小组的成功行动,不能看作是预示着可以全面进行恢复的信号。这些信号本身从游击战角度看使人备受鼓舞,但不是对红军部队最近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充分根据。不是所有红军部队都应参加在原苏区贫瘠荒芜地区的游击战。他们的绝大部分应成为新的红军即在人数上和力量上更强大的红军的骨干力量。现在这只能在新的地区做到,而这些地区我们应该在离老的地区不太远的地方寻找。使人备受鼓舞的信号,我们应该看作是可以更好地为红军完成新的任务做准备的证明。准备工作应该是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就像我们在上面试图说明的那样。

V. 战略撤退计划的示范稿

如果你们认为上面对总的形势作出的分析正确,而提出的措施是应予以采纳的唯一可行的办法,那你们就应该研究一下下面的战略撤退计划。这个计划只是大致的,作为你们在目前条件下可以自己决定问题的例子(我们在这里不能像你们那样看到这些条件)。

※ ※ ※

在鄂东北原苏区内部进行战术撤退后,应接着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战略撤退,可以在河南南部从罗山地区向桐柏方向撤退,其最终目标是建立新苏区,可能是包括西新集、桐柏、万和店、唐县镇、厉山等城镇在内的湖北、河南边界地区。

作为桐柏方向的补充,来自湖口地区的部队应该选择滨林市(音)方向,以便在湖北的随州湖地区建立新的游击区,基地可设在浙河、马坪岗(音)和平靖关。

1. 为此在准备阶段应紧急派出:

(1)最先是党的干部,以便在上述地区着手建立地下地方组织系统。

(2)继他们之后,应是一定数量的侦察小组,每个小组都是单独在不同时间去上述地区的不同地方,同他们一起前往的还有党

的干部。

(3)此后,侦察小组和人数不多的游击队应派到与上述地区交界的地区。

(4)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应从河南和湖北的其他方向派游击队去那里作战,直至红军抵达拟订的驻扎地区。

从开始采取上述措施到决定红军部队开始向新的地区移动,可能要有两三个月时间,这就为组建游击队工作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时间,以便为开展对农民群众的组织工作准备条件。

2. 下一阶段:

(1)要在老苏区,特别是在安徽边界方向,提高游击战的积极性。

(2)28 军和 74 师应该在湖北东部开展游击战。

(3)25 军部队应准备离开老根据地到新的地区去。部队的行动应便于他们离开相应的不同地方,如果可能的话,在越过敌人包围圈的路上要避免作战。

3. 撤退应把尽快向拟订的地区转移作为目标。为了避免同敌军发生冲突,部队应准备在撤退过程中分成几部分,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独立到达他们驻扎的地方。

4. 目前在鄂东北活动的所有部队中,我们认为,以下部队应用来建立和建设新的地区:

(1)侦察组,约 20 个(主要由一帮人组成的)特科营。

(2)约 10 个游击小组,每组 10 支步枪和四五个游击组,每组 30 支步枪。

(3)目前存在的独立作战连中的三四个连,3 个独立团和 75 师、73 师的所有其他基干部队。

5. 74 师将与其他部队配合在安徽目前的地区继续作战行动。如果那里的形势严重,它们也应作出在东部准备新地区的独立计划。

6. 在湖北、河南老的地区,我们的部队约有三分之一要留下来,在这些地区游击指挥部的领导下以 30 到 50 人不等的不大队伍和 5 到 10 人的小组进行游击战。

7. 在新的地区,瓦解附近敌人部队的工作应与地下组织向新的地区渗透的工作同时展开。

8. 准备阶段将派出的部队,不应知道所研究的部队撤退行动的最终目的。

9. 如果敌人的压力未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准备时间,鉴于形势应把计划做这样的修改,使部队在抵达指定地点时能迅速开展组织工作,以把他们的斗争同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

※ ※ ※

这个草稿,我们重复一遍,应作为示范,而不是必须不折不扣执行的计划,由你们研究一下。我们不知道,你们能否找到机会在向西推进时不经激烈战斗穿过铁路地区。我们也不能由这里作出判断,为新起点^①拟订的地区实际上是否合适。也可以是当地条件更有利、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行动起来、敌人部队不太积极和更经不住瓦解等的其他地区。你们应该仔细斟酌所有这些方面,不受这里提出的草稿左右,制订出你们的计划。

VI. 结论

鄂豫皖原苏区的危机形势,不只是由这里所指出的和你们在最近的工作报告^②中所自责的错误引起的。客观因素,首先是粮食不够,在不小的程度上是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如果我们讲普遍撤退,这主要还是考虑到饥饿的情况,若是我们不能进行春耕,那么在 1934 年上半年情况就会更严重。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不建议放弃收复失去阵地的战斗。

^① 原文如此。应为:为建立新苏区。

^② 文件没有找到。

我们建议把决战推迟一段时间，暂时发展游击战和为将来的决战创造其他前提条件。在这个间隙，应最关注为我们的作战干部创造这样的条件，使他们在这种条件下不仅免受敌人的有害影响、饥饿和分化，而且得到恢复力量和进一步发展的适当环境。

尽管你们遇到了严峻的形势，你们应当不失去信心和政治上的乐观主义。在你们的英勇斗争中，你们能引诱敌人十几个师离开江西红色地区，使他们不能开赴江西参加对红军发起的新的进攻。这件事本身就是红 25、28 军和游击队的英雄战士在党组织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

总的情况未给任何悲观主义提供根据。相反，在你们遭到暂时失败时，其他地区的红军不仅能够经得住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而且能够在福建地区取得新的可观的战绩，因此江西、福建地区苏维埃政府能够建立新的武装力量并把它们投入到抵抗国民党最近一次进攻的战斗中。现在国民党的进攻被中止了，我们的力量完全做好了重新迎击敌人的准备，如果敌人恢复大规模的战斗的话。

在四川，我们的军队（其骨干力量是 4 军团^①）在过去的一年中能够击溃国民党的进攻并展开自己的攻势，结果我们今天有了大面积的和巩固的苏区，有几百万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有强大的红军，为了继续进行斗争和在不久的将来把苏维埃政权扩展到这个省大部分地区，它们得到了很好的武装和装备。我们不谈在国统区其他地区，如在江西西部、在湖南、在湖北西部、在陕西和在北方即满洲取得的比较小的成绩，那里的人民革命军部队在我们的领导下，开展了在抗日战争中被国民党出卖的那些志愿人员的作战行动。所有这些成绩使得我们有可能在我们党组织的领导下提高群众的积极性。我们的党组织在稳步地聚集更多的组织和政治力量及影响，以至无可争辩地领导反对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

^① 原文如此。应为：第四集团军。

走狗即国民党和其他反革命组织的斗争。

有这样的基地和前景,同志们,你们应该在党的队伍紧密团结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以新的力量更巧妙地进行斗争。在目前时期,我们应该从鄂豫皖苏区的失败和损失中吸取教训,并在现在为将来取得的成绩准备条件,继续在中国革命的最前列进行战斗。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8,第 46—64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2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① 给中央苏区的电报^②

1934年2月1日^③于上海

致中央苏区

请研究一下作为南京恢复进攻时期行动计划主要条款的以下建议。

综述我们在[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期间的行动,揭示出一些错误,尽管在尤溪和沙县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些错误终归减少了随着19路军的垮台取得预期优势的机会。

在我们下一份电报^④中,将谈这些错误,以及对本阶段的评价,还谈战役和战术建议。

1. 除了来自黎川地区的第5纵队重新发起攻势外,我们还不得不投入同来自延平至顺昌地区,以及从抚河西岸向广昌推进的第4、第56和第80师的作战行动。蒋介石要用目前从沿海地区调来的一些师团组成新的东方战线,这需要更多的时间。鉴于对广东做了军事上的准备,这个战线的左翼要比其他部分更强大一些。所以最近主力集结的地区将是在黎川以南,延平以西,中心在

① 发报者是根据文件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弗雷德(M. 施特恩)提出的行动计划。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5月14日。

④ 见第239号文件。

建宁,是第一目标。至于我们对付 19 路军在龙岩地区残余部队的行动,应该是迅速而果断的。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不要被拖入现在不需要的、为这些残余部队的命运而同广东进行的战斗,也不要南京和广州军队之间地区留下除游击队之外的任何其他队伍。如果在我和广州之间的冲突不能避免,那么最好是向南突破到武平以西地区,占领一个地区后,不再继续进行对广州的行动,以便为将来在我们三项条件^①基础上利用广东和南京之间的冲突创造前提条件。

2. 我们对抗南京的东方战线将由两个军组成。

(1)第 1 军及其直接任务:5 军团保卫设防地带。9 军团的大部分部队与第 1 和第 4 独立团配合,转入沿抚河向北进攻。第 1 和第 3 军团从泰宁重新发起对金坑方向的主要进攻行动,以便同 34 师汇合,从那里转向东,绕过我第 5 和第 9 军团与之作战的敌师团的翼侧。

东北的游击队同第 10 军新的兵团一起派出主要力量,在光泽至邵武方向展开游击行动。将由它们建立我们的第 1 游击军团。

(2)第 2 军,由 7 军团加上第 61、62、41、42、8 和 9 团组成,其主要任务将是引诱敌人第 4、56、80、9 和其他师团离开沙溪和闽江以西的作战地区。为此从尤溪至沙县地区由南面和东面向延平方向的运动,以及向漳夏(音)方向的运动,应旨在阻止敌人新的师团向顺昌和泰宁靠近。

万一这些任务不能全部完成,第 2 军将把乐作为其在邵武总方向上活动的主力部队的出发点,以便同第 1 游击军团建立联系,掩护和直接支援第 1 和第 3 军团的行动。

第 2 军的外侧将由来自归化的第 7 独立团、来自永安的第 9 独立团和来自龙岩的第 2 独立团在大田至尤溪方向采取游击行动

^① 见第 100 号文件。

加以保护。由这些部队将建立第 2 游击军团。

这样一来,第 1 和第 2 军同两个游击军团的协同作战,将以在最短时间内破坏敌人新的攻势为唯一目的,直至东方战线上其他部队能够转入决战行动。

3. 取代现在留在第 2 军中的 9 军团的部队,教导团将逐步把他们训练好的部队经广昌派到 9 军团去。汀州教导团将充实第 2 军。

4. 组织南方战线将从建立新的师团开始,这个师由集合在连城的部队和 19 路军在龙岩的余部中可以补充的人员组成。同时将建立由第 8 和第 5 独立团、连城^①营和其他地方游击队组成的我们的第 3 游击军团。我们在瑞金和零都的军校学员,应视为预备师,以备急需。

5. 在一定时期,作为作战单位的中央军^②的任务,将在第 1 军和西方军之间分配。晚些时候驻扎在乐安以西的所有部队将列入西方军。在黎川至广昌方向出现不利形势的情况下,9 军团将重新成为中央军的骨干力量。

6. 在新厂西北地区的独立部队将成为我们的第 4 游击军团。如果可能的话,在东南即 22 师右翼的独立部队也应该这样做。它们应该成为我们的第 5 游击军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8,第 68—69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原文如此。可能指来自连城地区的营。

② 原文如此。这里和下面应为:集团军。

230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 的第 1 号报告的补充部分 (摘录)

1934 年 2 月 5 日于上海

驻华代表^① 1934 年第 1 号报告的补充部分^②

致米哈伊尔^③。大约一周前,我给您寄去了报告。利用可靠的人动身的机会,我再给您寄去一些补充的消息。您将从这个邮班收到米尔顿^④关于罢工运动和工会运动情况的报告^⑤。关于米尔顿,我再次请求对他的工作作出正式的决定。

1.《中国论坛》问题。我们曾在电报^⑥中请求您立即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或(来自美国的)另一位较合适的编辑来领导《中国论坛》。请不要让我们等得太久,因为刊物出版的较长时间间断,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有益的。虽然艾萨克斯(编辑)将根据法律把印刷设备和其他东西交给我们指定的继任人,但是他至今仍坚持要求发表声明,向公众说明他辞去编辑职务和《中国论坛》暂时停止出版的原因,是经费上有困难。我建议他说明,他辞职的原因是住

① A. 埃韦特。

② 见第 227 号文件。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④ Т. 赖安。

⑤ 见第 231 号文件。

⑥ 文件没有找到。

地有变化(移居北平)。(只是对广大公众这么说;而真正的原因将通报给党和其他人士)。至今他不同意这样做。他关于经费困难的声明,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合适的,自然,在刊物的恢复出版方面不能改变什么。我们是否将用以前的名称出版,还没有作最后决定。我们有行动自由。问题的解决总的来说取决于您能多快给我们派一个人来。如有变化,我们将电告您。

2.“亚洲人”(海因茨·缪勒)事件。大约一年前,我曾向您报告过在上海有布兰德勒分子“亚洲人”^①。他几次在街上偶然见到我。不久前,当无法避开他时,他问我,能否帮助他把他的一份声明转交给联共(布)中央,他是联共(布)党员。我回答说,我不能同他保持联系,不能答应做什么事情。这以后,他找到官方机构^②。在那里,自然,也拒绝接受他的信件。据我从其他人那里获悉,他仍然认为布兰德勒对德国的态度是正确的。

其他问题,我随下一邮班写给您,因为最近的一次报告只过去了八天,这期间没有发生什么未电告给您的重要事情。

3. 我请求把第十三次全会的决议和决定^③快点寄来。此外,我还请求把第七次国际代表大会^④召开时间和日程安排的准确通报寄来(您关于这个情况的电报,在最主要的条款上错乱了)。在同中央局^⑤的交谈中,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中国的代表团应由20到30人组成。其中一部分然后要留下来学习。[中共]中央建议波戈列洛夫或伊思美洛夫^⑥参加。如果这在技术上可行,那就好了。请告您对此的意见。

① 见第84号文件。

② 可能指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

③ 见第9页注④。

④ 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最初拟定在1934年下半年召开,后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举行。

⑤ 指中共上海中央局

⑥ 分别为:秦邦宪和张闻天。

代表^①

※ ※ ※

附录：发自中央苏区的两份电报^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39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

① 下面略去文件中与中国无关的部分。

② 附录没有找到。

231

赖安关于中国工人和工会运动 状况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4年2月5日于上海

米尔顿的报告

亲爱的同志们：

在这封信中，我想对上海劳工联合会^②的立场和上海的罢工运动提出一些看法，还想简要地分析一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所面临的另一些问题。

1. 正如已经向你们通报的那样^③，上海赤色工会和反对派^④的人数已从1933年1月的近3000人减到10月的不到500人。到1933年12月中旬，上海劳工联合会总人数仍在这个水平上，分布情况是这样：省码头工会有168人，分22个码头工会小组；棉纺工会有230人，分20个工厂小组；丝织工会有80人和一些失业者；印刷革命工会有24人，分2个工厂小组；还有12个失业者小组，约100人，未参加工会。

这种急剧的减少和危机局面的出现，如果从总体上说，则主要

① 收报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文件上有附注：米尔顿(T. 赖安)的报告。上海。1934年2月5日。

② 原文如此。这里和下面应是：上海工会联合会。

③ 不清楚讲的是什么文件。

④ 这里和下面指国民党黄色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

是因为党忽视和低估了工会工作,党和上海劳工联合会没有能力根据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和领导工人和失业者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党和赤色工会脱离 1933 年发生的群众性自发罢工浪潮和工人的其他行动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以及未能(同工人)建立联系和独立参加由国民党工会组织和领导的那些行动。(从 1933 年 5 月到 1934 年 1 月,无论是党还是上海劳工联合会都没有组织、领导和参与上海的任何一次罢工行动)中央和江苏省委在 12 月份的专门决议^①中分析了导致出现这种局面的突出的和主要的不足和倾向,这个决议的副本,我估计你们是有的,因此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大谈特谈这些不足和倾向。但是与此相联系必须指出,上海劳工联合会和党在组织上遭到的损失,以及这个时期群众工作的绝对不能令人满意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1933 年春,特别是 5 月份对积极分子,以及对一系列工厂支部和工会小组的大逮捕造成的;而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干部转移到苏区,更加削弱了省委和上海劳工联合会的政治领导和实际领导。

2. 在最近 6 周期间,即从 1933 年 12 月 15 日到 1934 年 2 月 1 日,在上海劳工联合会和党的领导下,一些工会的组织巩固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1)1 月,我们的省码头工会,在(日本、英国和中国航运公司的)四个重要码头组织领导了五次规模不大的罢工,有 1100 多名工人参加,并且有 600 名驳船工人参加了在国民党工会领导下举行的罢工。我们领导的五次罢工,争取满足一些局部的要求,如提高工资、改善伙食等,最后以全部或部分胜利而告终。码头工会会员人数增加到 779 名,包括以前未在工会中的 270 名党员,这些会员来自 22 个码头(包括属于日本、英国和美国航运公司的四个最

^① 可能指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白区革命工会运动”的决议案,见《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第 2 卷,北京 1985 年,第 306—320 页。

大的船坞)的40多个码头小组和委员会。1月28日前,在船坞上举行过四次半合法的反帝群众大会。还举行过一系列统一战线性质的码头工人会议,并选出104名代表参加这个月的代表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将成立赤色码头工会,通过基本行动纲领并为争取局部要求和一般要求的罢工斗争做准备。在2、3月间,工会能组织一些规模更大的罢工,同时席卷几个或更多的码头,主要与工资、劳动合同、解雇、承认经选举产生的码头委员会等问题有关。

与此同时,船坞上的整个日常工作,要尽一切努力真正在统一战线基础上开始开展专门的反日和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和旨在阻止运载军用器材、军队供给品、军队和日货的怠工行动。现在很大注意力用在巩固工会、培养新干部、更大胆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上,以便最终渗透到黄色码头工会和国民党拖轮和驳船工会中去,与反六次“围剿”^①和反帝斗争紧密结合来开展码头工人的日常斗争。

(2)眼下,在有工厂小组和一些工会会员的18家棉纺企业,棉纺业赤色工会的工作状况几乎依然如故,只在一家为集聚力量挑选出来的企业(三星七厂,有5000名工人),状况有一定的好转。1月间,这家工厂的工会会员人数从11名增加到181名,200名其他工人组成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兄妹小组,由20名会员组成了两个反帝小组,为准备罢工争取一些起码的局部要求,在工人积极分子当中本着统一战线精神组织几次会议。在1月底,为了组织罢工,举行了有来自七个棉纺企业30名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可是由于准备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又保密工作做得很差,这次会议被捣毁了,所有代表都遭到了逮捕。但是,根据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和准备(特别是围绕特殊的新年要求)组织一些行动的计划,上海劳工联合会可能在2月间至少在两家大棉纺厂发动两起罢工行动。

^① 这里和下面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3)最近一个月,在电台职工当中,主要是在共青团的领导下,取得一些成绩。在上海的主要电台,多数通讯员组织起来了,根据统一战线策略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在1月24日,未采取罢工行动,就迫使领导同意发给新年奖。也是在1月,在国际台,经过全体通讯员在我们领导下举行短暂的罢工,满足了提高工资的要求,并从去年6月起补发提高后的差额。1月最后一周,本着统一战线精神举行了代表会议,有由五个电台和电报局之中的四个电台和电报局选出的代表参加,目的是为建立将吸收电台和邮电局各类职工参加的赤色工会做准备。

(4)1月间,失业者小组和委员会收集400多名失业者。在几个慈善组织中开展了争取增加补助金的活动,在闸北和其他工人区开展了减少和免交房租的活动,还在准备到市政委员会去游行,捍卫失业者的一些要求,并要求没收日本码头的军粮。但总的来说,失业者当中的工作仍然做得很不令人满意,特别是在纺纱厂和其他关闭工厂工人当中的工作,这些工厂多数(有3.5万纺纱厂工人)在不久前发生了同盟歇业。在失业者中的工作至今与反国民党和反帝的斗争联系不够,基本上未赶上组织失业者和与工人发动的同时开展他们的群众性行动的客观有利时机。

2. ①1月间,上海劳工联合会吸收了上海动力公司和照明公司的16名工人,并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其中有100多人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在英美烟草公司的工厂里,为开展具体的罢工行动成立了统一战线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又选出64名代表参加总的准备罢工的统一战线大会。

3. 上面列举的成绩,本身并不大,也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反映出党和赤色工会,为了在加强上海革命工会运动和独立组织、领导罢工行动方面有决定性的改观,作出了认真的努力,并开始进行有

① 原文如此。应为:(5)。

效的动员。然而很清楚,这些步骤只意味着刚刚开始实行向广泛的群众工作方面的必要转变;眼下在建立赤色工会和反对派方面及在开展海员、铁路工人和市政运输工人的群众性行动方面绝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国民党工会(即铁路工会、动力工会、邮电工会、驳船和码头工会、印刷工会、烟草工会和受国民党、第三党^①和改组派^②影响的工会)中的工作,还只是需要有效地加以开展和将其提高到应有的水平;组织总经济罢工、政治游行问题和与开展具体的群众性反帝反国民党行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的罢工问题,还需要作出决定。在这些和另一些同时出现的问题上,我们集中了全党和上海劳工联合会的最大注意力。

4. 谈谈这一年1月份的罢工行动,这种行动仍在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城市扩大,特别是在上海和河北,它在转到同反国民党和反帝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更高的政治水平。在党和赤色工会的政治影响下,作为我们在开滦煤矿的40名工会会员和26名党员的工作成果,1月14日,在开滦有五个矿井的矿工举行了罢工,反对塘沽停战协定^③中涉及工人的条款(国民党同意查禁所有工人组织,禁止他们在非军事区举行活动),并提出了以下要求:(1)承认矿工工会和选出来的群众代表;(2)恢复所有被解雇矿工和失业矿工的工作;(3)废除一号制度并由工人选举工长;(4)解雇所有新招募的职员;(5)取代五天工作周实行六天工作周;(6)中国新年付双月工资;(7)支付罢工期间的工资。尽管动员大量军警,以及国民党通过调解作出种种破坏罢工的努力,罢工还是迅速扩展到了其他矿井,有3万矿工参加,罢工工人同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破坏了矿区铁路。据媒体报道,有部分矿工停止了罢工,但是,尽管

① 指当年中央文献和书籍中通用的由蔡廷锴所建的组织的称谓。

② 原文如此,指改组派。

③ 指1933年5月31日在塘沽签署的日中停战协定。

矿业公司和河北省当局同意一些要求,即恢复被解雇矿工的工作和承认工会组织^①,罢工仍在继续。中央^②和联合会^③派一名同志^④去开滦,并给河北省委和赤色工会发去关于罢工的专门指示以及在天津和北平地区组织铁路工人和其他工人的政治声援游行和其他支持行动的具体建议^⑤。

这个时期上海和长江上游码头工人和驳船工人的发动也具有重大意义,这些行动不仅还在发展和越来越转到我们的领导之下,而且不久前在离九江不远处发生罢工时,还采取了同被动员来歼灭罢工工人和保护国民党军人装备运输的警察和帝国主义军队(在九江罢工中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在上海驳船工人罢工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武装斗争方式。群众的不满情绪和码头工人的高昂战斗精神、这个领域(罢工)行动发展的更加激化了的革命性质,以及不久前党和联合会的政治影响和群众工作的加强,使得我们在这里不仅有必要和有可能开展群众性罢工行动,争取实现局部的和普遍的经济要求,而且也有必要和有可能在我们领导下把这种斗争作为反国民党和反帝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到更高的政治水平。

在下次报告中,我将更充分地谈到上海和其他地区的罢工运动和其他行动,以及我们在这些行动中的工作和领导作用。

5. 在分析其他省份赤色工会和反对派的状况和工作时,没有

① 关于1934年1月的开滦煤矿罢工,见M. 帕什科娃:《1934年上半年的中国工人运动》,载《民族殖民地问题资料》,莫斯科1935年第2期,第13—14页。

② 指中共上海中央局。

③ 这里和下面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

④ 何人不详。

⑤ 可能指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给河北省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河北代表处共产党党团的信,见《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第2卷,第346—352页。

必要在这个阶段评论省委的各种报告和材料,你们有这些报告和材料的副本。在12月份才恢复工作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①(从1933年5月起它几乎不存在了),现在刚开始提出其全国性的任务,以便对各省的赤色工会和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系统的领导、管理和监督。除了特别集中加强上海劳工联合会的地位和群众工作外,执行局的很大注意力应放在河北和满洲的工作上,在1月间已向那里发去信件和指示,其副本你们很快就会收到。在接下来的4至6周期间,执行局将向河北、山东、河南和福建派出一些组织指导员。

6. 最后我想就几个问题简要地谈点意见:

(1)我认为,目前在国民党地区,革命工会运动的状况极其不能令人满意,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党内,特别是在省地领导干部中间,无论对整个工会工作的重要性,还是对党在这个领域的具体任务,都缺乏政治上的明确认识。其标志之一是,现在在多数省份,有很大百分比的工人党员还不是他们所在企业的工厂工会小组或委员会的成员;甚至在上海,例如在最近几周之前,码头上的139名党员中只有6名是码头工会成员,或者参加了工会工作。因此绝对有必要现在在党内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决议^②和中共中央第五次全会决议^③进行讨论时,对全党进行一次真正的政治动员,以便消除存在的忽视建立赤色工会和革命反对派的现象,发展群众性的罢工运动和广泛的失业者行动。

(2)在党内和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内最近出现了下面的倾向:鉴于工会组织薄弱和大大落后于正在发展中的罢工运动,试图把党

^①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

^② 见《共产国际在民族革命中战略与策略(以中国为例)》第322—352页。

^③ 指中共中央第五次全会关于经济斗争和白区工会工作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50—70页。

和赤色工会的任务仅仅局限在组织争取局部要求的行动上,而不把这些行动同宣传工作和组织某些部门争取一般经济要求的罢工和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日常群众工作联系起来;这种倾向甚至在中央局^①不久前给江苏省委的信^②中也有反映,信中没有把组织和领导日常争取工人和失业者的起码的和至关重要的需要和利益的任务和问题,同组织更广泛的经济罢工及政治罢工和游行的任务联系起来,开展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广泛鼓动和宣传问题也是一样。这个不足当然立即得到了中央局的纠正,但仍有必要在党内和联合会内继续进行反对以下两种倾向的斗争:1. 低估开展争取群众局部迫切而强烈要求的行动的重要意义;2. 不想扩大每个局部的行动和把它提到更高的政治水平,不想把每个行动有机地同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六次“围剿”的任务结合起来。

(3)在执行局^③的下次会议上,我们将再次讨论仍然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海员工会联合会的工作,这次会议之后,我们将把关于工会状况和活动的详细报告寄给你们。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35—38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指中共上海中央局。

② 指中共上海中央局 1933 年 11 月 23 日给江苏省委的信,又见中共上海中央局 1933 年 11 月 23 日关于检查江苏党工作的决议中关于职工运动的部分(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卷,第 423—429 页)。

③ 指中华全国工会联合会上海执行局。

23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 355(B)号记录

(摘录)

1934 年 2 月 5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18.(5641)——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的建议(给中共中央的第 436 号电报)^①。

决定:18.——采纳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建议。责成米夫、王明和库西宁同志在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建议基础上起草给中共的复电(电报稿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密电处第 502 号电)^②。

听取:21.(5644)——发自上海的关于《中国论坛》的电报^③。

决定:21.——认为《中国论坛》杂志有必要继续存在,必要时要为此拨出资金。责成王明和米夫同志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起草关于编辑部人员组成的建议^④。

① 文件没有找到。电报内容见第 238 号文件。

② 见第 233 号文件。

③ 指 A. 埃韦特 1934 年 1 月 27 日给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其中说,鉴于《中国论坛》编辑 Г. 艾萨克斯坚持托洛茨基观点,可能不经过斗争不同意放弃自己的职位,必须紧急寻找把出版杂志的权力转交给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或另一个可靠的人的办法。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61<1934 年收文>,第 267 页)。

④ 见第 247、253 号文件。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克诺林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77, 第 6—8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23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 处政治委员会给施特恩的电报^①

1934年2月5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弗雷德^②，抄送代表^③。答复你们2月1日电报^④。从军事上考虑，我们认为同广州人谈判在以下条件下签订临时协议是可行的，也是所期望的：取消封锁，我方不作任何领土让步，并在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以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和广州人方面的欺骗，保证我们实际上的行动自由。这是对你们报告的条件的补充。政治委员会。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7(1934年发文)，第 18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见第 232 号文件。

② M. 施特恩。

③ A. 埃韦特。

④ 文件没有找到。

234

中共中央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报^①

1934年2月6日^②于中央苏区

发自中央苏区

关于你们2月3日的建议^③，我们有以下意见：

1. 我们同意你们的估计，敌人推进的主要方向是建宁，但广昌和将乐不是敌人进军的辅助方向。另两个辅助方向是：在西面，由永丰向沙溪、龙岗地区推进（兴国、宁都地区以北）；在福建，向沙县推进。

2. 我们的支队在闽南作战的主要目的，不是保存19路军在龙岩的残余，而是保卫永定、上杭苏区，因为这个地区对于我们同非苏区的交通和贸易特别重要。如果敌人从广东向这个方向派出两个师，那么即使这是暂时的举动，我们也不得不向上述方向派遣两个或三个师。

3. 根据我们的估计，同广东在我们三项条件^④基础上的谈判不会取得成果；在最近的将来将会是这样。

4. 虽然你们提到的1军团没有特别的名称，而实际上它已经有了。根据我们的决定，1、3、5、9军团对陈诚的军队应给以抵抗，

① 收报者是根据电报内容确定的。文件上有批注：(中共)中央对(1934年)2月3日建议的答复。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5月14日。

③ 可能指第229号文件。

④ 见第100号文件。

并向它们发动攻势。在东北邵武地区活动的游击队是你们提到的第1游击军团。5军团的作战行动在根据你们的建议进行。9军团不能顺利地沿抚河发起攻势，因为它要克服敌人的许多工事。这个军团由6个团组成。按照你们的计划，为了进行作战，它的4个团应编入第2军。我们决定，5个团将在我们在康都地区的5军团的左翼活动。1、3军团是突击部队，但需要注意以下情况：(1)3军团的主力部队不能保证约在2月10日之前从沙县运走战利品(因为运输工作可能在2月10日结束)。(2)不可能对金康(音)发起反攻。我们不能采取突破敌人设防地区的行动。即使能这样做，我们也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蒙受巨大的损失。何况如果我们转向敌人的翼侧，他们则能早于我们到达建宁，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敌人进攻最激烈的时候，同6、9军团一起给以打击。

5. 你们给第2军提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7军团只是由3个团和62独立团的1个营组成。同时我们应该考虑到，7军团是由游击队组成的，从其成立之时起从不具有坚强的特点。再者，这个军团的一个半团留在东北地区，在敌后活动。61团改组为34师的第3团，在保卫我们在泰宁和将乐的主力部队。你们指出的这些团，三分之二已编入9军团。顺便说一下，实际上第2军只由一个师组成。只有它仍在实行沙县的机动防御和牵制敌人在归化地区的兵力。

6. 至于建立新的部队和利用教导团和军校干部学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首先要充实现有部队。

7. 你们提到的游击军团，在形式上是与我们成立的军事部相适应的，这些军事部领导所有地方游击战役和游击组织，领导相应地区独立部队的训练和作战行动。因此没有必要改变它们的名称或对它们进行改编。

8. 革命军事委员会 1 月 30 日的决定^①已经执行。在没有特别必要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应作出新的部署,否则这会导致丧失时间、破坏已作出的决定和损害对决定的信任。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8, 第 71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① 文件没有找到。

23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4年2月7日^②于上海

昨天,1934年2月6日,我们收到以下报告^③:

“从苏区回到四川的信使^④(12月份他在那里)报告说:在我们手里有17个完整的县和6个没有城镇的县。人口有900万。在敌人进攻、屠杀和从一些地区赶走老百姓之后,现在人口有700万。

正规红军有5个军团,每个军团有3个师。(总)人数7万(四军团现在是所有军团的主导常备军),武器装备良好;有组织的地方力量是10万装备简陋的人员(这些数据可能约有30%的夸大)。

搬走的绥定兵工厂,有熟练技术工人,每天生产3000到5000发子弹,还修理步枪。红军约有1000万发子弹。缺少统一的作战指挥。

经济和财政状况很好。有足够数量的粮食,价格也便宜。

党很薄弱。约有1.5万名党员。

① 发报者和收报者是根据电报内容确定的。文件上有批注:来自四川苏区的消息。

② 日期是根据电报内容确定的。

③ 可能来自中共上海中央局。

④ 何人不详。

工会工作仅处于起步阶段。
苏维埃政权还薄弱,组织得不够好。
在成立中央局。也在建立无线电联系。”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70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23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施特恩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2月11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①和弗雷德^②，转[中共]中央。现发去我们对不久前的作战行动的一些想法。请予讨论。我们觉得，我们指挥部的计划和措施，特别是在最近，几乎一直像是被敌人强加的，造成了对我们部队的多余的重新部署，由于经常转移使它们失去了积极参加战斗的能力。似应争取在我们已经取得一些成绩的地段歼灭敌人，不要试图在全线同时打击敌人。其实大家知道，我军常在运动战中而不是在突破敌人设防地区的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应该充分利用我军的主要优势，即它机动作战和从翼侧突然进攻敌人的能力，而游击队同时从后方进攻敌人。重要的是要在歼灭敌人某一集团军方面争取决定性的胜利。政治委员会。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7(1934 年发文)，第 21—22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A. 埃韦特。

② M. 施特恩。

23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 356(B)号记录

(摘录)

1934年2月11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18.(5674)——关于继续使用赖安同志的问题。

决定:18.——赖安同志应留下来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代表^①支配,以指导员身份做工会方面的工作和完成东方地区书记处招募学生的任务^②。不派他去四川地区。赖安同志在上海的生活开支由红色工会国际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半分担^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78, 第 5—6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A. 埃韦特。

② 指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学校挑选学员。

③ 对决定:18 的附注:A. 洛佐夫斯基阅。

238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①

1934年2月13日于上海

致米哈伊尔^②

在轮船离开前几分钟写下了这几行字。我应该向您报告，我一个人无法控制这件事以后的进程。您知道，江西和福建的形势很困难，我们近期的前景不妙。不带多余的悲观主义应该承认，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区突破的一些地方，广东的积极活动现在威胁着我们最重要的“贸易路线”，敌人的兵力在增多，而我们的兵力至少相对而言在减少。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行动自由。我们的局部战绩（如2月初在福建沙县的战绩）不能对此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这种状况使实施上海策划的有一定战略目的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复杂化了。最近频繁出现这样的情况：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实行弗雷德^③提出的建议时，往往做一些改动（有时是大的改动，有时是小的改动，但同样都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情况以前也经常发生，但现在新的情况是，弗雷德对此作出的反应越来越多。暂时我应该听之，这是一回事。但如今这种反应开始采取这样的形式，其后果我必须及时地向您作出预告。

① 文件上有批注：1934年2月13日给米哈伊尔的信已送米夫同志。

② H. A. 皮亚特尼茨基。

③ M. 施特恩。

弗雷德越来越主张批评瓦格纳^①，进而宣布取消他的代表资格，原因是瓦格纳不执行他的指示。我最终违心地同意要求瓦格纳“作为弗雷德的代表要尽力执行他的军事建议”^②。我经常给弗雷德指出，所有决定在表面上和实际上都被[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接受了。但是不管瓦格纳有什么作用，认为这些问题靠给瓦格纳一道“命令”就可以解决，那是对[中共]中央和其他组织的作用的严重估计不足。相反，存在着这样的危险性：弗雷德和瓦格纳之间的意见分歧可能演变成同[中共]中央和其他组织关于各种错误或关于未利用局势和对局势利用不够的更严重的意见分歧。如果军事形势将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那么在[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就可能出现意见分歧。我看到这个危险，我会尽一切努力防止事态这样发展。如果弗雷德不能实现他的建议，是因为他的建议重要和那里较好地领会了他的建议，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是他们拒绝他的建议还是有改动地接受他的建议，同样都不会给弗雷德提供发牢骚的权利。

在这种形势下，吸取过去的教训，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中央来说，不能是简单地声明：犯了大的错误。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从目前的形势出发，提出最好和最必要的建议，并告诫不要采取其他措施。

我将力求防止发生在这封信中以悲观的语气所提到的矛盾的尖锐化。但我也有压力，因为弗雷德威胁要控告我，说我“妨碍他实施他的措施”。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在信中向您提出，因为发电报就太长了。2月1日，弗雷德通过邻居^③询问您，您如何对待可能同广东举行的谈判^④。这份电报的稿子至今我不清楚。几天之后讨论广东问题

① 即 Q. 布劳恩。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人员。

④ 文件没有找到。

时,弗雷德才告诉我,他给您发了询问电。作为您的代表^①,我要求为了工作允许我制止这种做法。弗雷德有权给您发电报,但至少在此事涉及政治问题和指示时我应该知道这件事。再说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您早在12月份就作出了决定,如果出现谈判的可能性^②,这个决定基本上还是有效的。当时我们是根据[中共]中央的错误报告,从推测广州已开始进行谈判出发的。如今开始进行不直接谈判的建议完全悬而未决,至少暂时是这样。您可以相信,在这方面我们将会利用任何可能性。目前只存在为鼓动目的利用南京和广东之间矛盾的可能性,但必须把这种利用同揭露陈济棠的政策结合起来。晚些时候能做什么呢?晚些时候也只能等着瞧。不应抱着虚假的希望。不过我也反对弗雷德背着我征询您的指示,同时不等到答复就在给江西的指示中试图提出以下意见:“……暂停对广州的进一步行动,以便为根据我们的三项条件在反对南京和日本人的行动中采取相互谅解的政策扫清道路。”^③

这个提法后来做了修改,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任何理由同广东“在行动中相互谅解”。

所有这些东西在中国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在这里每一个步骤都有实际的后果。但是我只有在得到您的允许制止这里的混乱时才能承担责任。

代表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44—45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① A. 埃韦特。

② 见第 201 号文件。

③ 可能指第 229 号文件的初稿。

239

施特恩给中央苏区的电报草稿^①1934年2月15日^②于上海

1. 如果要做一些自我批评的话,那我们应该承认,尽管有(尤溪、沙县)^③一些战绩,我们还是不善于从福建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的形势中获取最大的好处。我们的行动迟钝、不坚定,也不及时。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有远见的打算和(福建古田)计划作了改变,我们的主力部队随之向后和向前进行了不必要的调动。另一方面,敌人行动迅速,也很成功,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迅速消灭了福建的起义^④,这对南京来说是个大的胜利,是在政治上要比军事上更重要的胜利。这意味着,如今南京可以在以后几个月派遣20个新的师团来对付我们,同时还可以准备和推迟同广州不可避免的冲突。在南京和西南之间的军阀战争还没有采取现实的方式之前,我们应该只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要过于考虑我们地区周围各军阀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它们的地区利益。可见,我们红军和游击力量的巧妙计划和迅速行动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是更迫切需要的。

① 在文件上有批注:草稿是由弗雷德(M. 施特恩)起草的,未发出。在文件副本上有附注:对我们在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间的行动的批判性分析。由弗雷德发给[中共]中央(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818,第81—83页)。

② 莫斯科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5月13日。

③ 红军部队在闽西占领的地点。

④ 指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间19路军在福建的反蒋行动。

2. 如果我们命令 3 军团在所需要的时间内到达永安地区,我们就可以牢牢钳制住第 49 师,并同由尤溪出发的 7 军团一起向 19 路军正处在投降过程中的其他部队进逼,我们就可以把蒋介石的一半胜利变成他的重大失败。蒋介石的师团还是在专攻 19 路军,并没有准备同我们接近的部队作战。我们的 1 军团晚些时候转移到福建,就可以承担沙县的任务。在机动的作战行动中开展这种行动,根本不必管我们自己的后方交通线,正如我们在 1 月 12 日电报^①中所建议的,我们可以把 3、7、1 军团调转东北去对付蒋介石为保卫其翼侧所留下的 4、8、56 师。由这里把我们在福建的调动发展成在建宁地区的会战,要比 1 月 25 日匆忙停止福建的战斗来得更自然。我们能否及时到达蒋介石发动攻势的危险地区呢?对于这个问题,回答可能是这样的:只要考虑到我们对 4 个师的迟钝作战行动(而这 4 个师在保卫侧翼时出色地进行了机动作战),进攻就可能早早开始。

3. 在每周都在迅速恶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决定同陈诚的师团进行会战,这是正确的。我们已经准备了约 20 个团,最好对陈诚的翼侧发动决定性的反击,不等过几天才能向我们靠近来支援 5、9 军团的另 6 个团的到来。与运出战利品有关的等待^②和失算,大大降低了最初寄托在决战上的胜利希望。在这里,我们唯一的优势是时间因素,这就是尽可能在蒋介石开始从东面调来其他师团之前的最短时间内进行战斗。

4. 在我最近的一份电报^③中,考虑到业已形成的局势和你们已经作出的决定,我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没有建议采取补充行

① 见第 221 号文件。

② 这里的意思是:导致丧失时间的等待。

③ 见第 299 号文件。

动和再次集中力量。你们的计划应该是加快执行的^①。你们最近的电报^②没有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认为我的建议是有益的。我应当重复一遍，鉴于缺乏远见的打算，我的建议被作出了严重错误的解释，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我最好是不加以干预，以免负责同志生气。

我不奢望得到什么权利来对你们的决定作出评价，我不能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提出建议，这是莫斯科确定的，并在不久前再次重申了这一点^③。我希望，瓦格纳^④同志的参加有助于很好地解释来自上海的建议，他应该知道自己的职责。

5. 我请求你们注意到，军事问题不同于只有一种答案的数学例题。许多可以使用的解答方法之中哪一种最好，在作出尝试之前，谁都不能说出来。远离战场的人应当提出总的建议。每个直接在当地的人，了解特殊情况和可能性，始终应该把总的建议加以具体化。但是，即使是最好的分析也决不能奢望得到(神的)启示。考虑到这一点，我应该说明，建宁方向是在我建议把预备队集中在广昌的时候规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的指出“延平以西”地区，在当地可以解释为沙县、将乐或泰宁。

在1月初，我提到泰宁、邵武方向，这也可以解释为金康(音)。在作出恰当解释的情况下，很少能产生像你们在2月6日电报中进行的那种争论和反驳的理由。

6. 在提到迅速和所期望地将4个军团合并为第1军，而7军团暂时可以接触得到的部队联合时，围绕樟村并没有提出任何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234号文件。

③ 见第216号文件。

④ O. 布劳恩。

令人担心的行动。实际上只是以此来强调它们在会战时的任务的明显不同，鉴于敌人东部战线在加强（这只是几周的事），我们应该利用两个战略军团来补充我军在南部业已加强的左翼。当然，这两个军团的组成应该是有变化的，这要看受樟村、建宁地区战争结局所左右的事态以后如何发展。

7. 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与 19 路军残余部队有关的行动会妨碍上杭、永定地区的防御？或者用新的部队加强 9 军团左翼的建议（新的部队可以迅速由教导团组成）怎么是与对局势的正确估计背道而驰的呢？如果 9 军团的一些团留在 7 军团地区，那自然它们可以暂时在 7 军团的领导下进行战斗。

在现代战争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营和团应该善于在为专门目的组建的军团中作战，战争结束后它们可以回到自己的根据地部队。

我还要反驳对我关于军校的某种建议的某种不理解。如果我们把军校看作是战略储备，那么是不是说这样做将会影响它们学习的继续呢？完全不会。

8. 如果同来自东北方向的 34 师和游击力量的行动相配合，把突击力量派到敌人在黎川以南的兵力集结处的东侧，那么谁会怀疑我们的会战将具有更多的胜利机会呢？但是在会战中只靠正面反击是绝对不能取得大的胜利的。顶多敌人回到自己的防御工事里，我们不能取得可靠的战绩，而我们的力量仍然受到牵制，那个时候新的出乎预料的进攻就会从沙溪、龙岗或沙县、延平地区开始。即使敌人能够在我们出现在他们的翼侧之前到达建宁，那我们最好还是出现在他们的翼侧，而不是进行正面反击。

2 月 10 日前留下来保卫沙县的 3 军团的失算，从决战要求的角度来看是很严重的。

9. 我们希望，尽管有这种失算，我们还会在最近取得胜利。我们应该取得胜利，否则我们就不能对抗来自沙县和永丰的新的威胁。

我建议以游击军团的形式来保证对活动在各个边境地区的独立部队的统一领导,这个建议具有的意义要比你们电报中赋予的意义更大。这些力量要与军事部相一致,这是对的。我们也不建议成立什么。建立提议中的游击军团的意思,是组织对游击队的更集中的领导,以便更充分地利用它们的能力,使之成为在我们地区周围的稳固支柱。在它们之间,我们的正规部队能够带有自动掩蔽的翼侧进行活动。我们应该看得比目前局势更远一些。

10. 我倾向于怀疑,[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否真的认为,来自上海的建议会导致“破坏计划和损害对计划的信任”。我将继续做工作,尽我所能,我只请求正确解释我的建议。在我能准备新的建议之前,发这样一份长电是必要的。

我希望不再有争论。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76—78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240

埃韦特给施特恩的信^①

1934年2月16日^②于上海

作为对弗雷德建议给中央苏区发的电报^③的答复,我应该声明,我不能同意发这样的电报(或任何其他这类电报),主要原因是:

1. 军事代表的任务应该是根据对现实情况的分析尽可能提出最好的建议。部分或全部地采纳关于军事问题的这种建议只能是[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事情。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办法靠命令、纪律或指责来“强迫”人接受来自上海的军事计划或指示。只有一种解释、说服的办法,即指出建议本身的重要性;问题是要设法说服[中共]领导,使之相信实行这种计划的优越性和采取某些其他行动的弱点或危险性。存在必须极力坚持实施来自上海的建议的时机和形势,过去在我完全同意和支持情况下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严重的困难和看到[中共]领导作出的巨大努力,我们应该承认,[中共]领导试图尽其所能完成伟大的事业,我们应该尽可能提高[中共]领导的威信。对作战行动或错误的任何批评,都应当以最积极的方式进行:要吸取教训,指出另一些更有利的选择;指出如何能争

① 文件上有批注:代表(A. 埃韦特)对弗雷德(M. 施特恩)草稿的书面答复。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5月13日。

③ 见第239号文件。

取到更有利和最有利的局面和力量部署,提出超前一定时间的思想和计划,同时要充分意识到,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没有实施以前考虑好的计划的行动自由。(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计划采取行动的重要性不减)。

2. 在您的批评中,这些想法被完全抛弃了。提供的电报实际上不含有改善目前状况的建议。它只含有消极的批评和对领导的最令人沮丧的指责。电报中赞扬敌人的战略战术,讥笑我们的努力。其中认为,蒋介石的“巨大不幸”由于我们的错误而得以防止。关于领导的行动没有一句善意的话,而指责的话却很多,如“迟钝的、不坚定的、缺乏远见的(行动),等待,失算”等等。

3. 这种批评的结果会是最致命的:

(1)就是像江西这样的很强的领导,在一种最危急的局势下,一时也会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它要考虑到,并且是很认真地考虑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上发生分歧的可能性,并应该采取措施防止发生这种情况。

(2)不知所措会直接影响到前线的多数行动,因为对我们主力部队的领导是精确集中的领导;不知所措会给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

(3)军事代表同[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合作的基础实际上会被破坏,至少会受到严重损害。政治代表如果不尽一切努力制止发出这样的电报,那他就不能再继续工作了。

我说到这一点是为了表明,绝对不能允许对很严肃的问题和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抱这样的态度。我从这份电报提出的意见中和在这种形势下所使用的批评方法中看到了很大的危险性。虽然电报不会发出,但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老是起草这样的电报稿呢?我应该把这样的电报看作是对党的领导的一种攻击的开始,而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因此也是不能容忍的。

必须克服可能产生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和这种批评的思想和

观点。

我在这里不分析作战行动中的某些错误。过去的教训可以吸取,也应该吸取,但要谨慎,要考虑到行动很困难的情况,始终要以积极的方式,要抱着加强我们领导的目的。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79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241

中共上海中央局^①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2月22日^②于上海

致中央苏区

关于南京和广州之间的对抗^③

虽然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认为目前在广州和我们之间没有谈判的基础^④,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以下因素:

南京在福建的胜利^⑤加深了南京和广州之间的矛盾,一时加强了南京反对西南的政策,给南京在将来的斗争中带来了一定的优势和主动性。与其营垒中倾向于在取得福建的胜利后立即进攻广东的意见相反,蒋介石选择的政策是,先在以后几个月期间试图歼灭或削弱我们,缩小苏维埃的地盘,巩固福建,将其作为同我们和广东作斗争的新基地,同时开展对广东的政治攻势,并将同战备结合起来,在广东和广西之间加进一个楔子。

蒋介石的政治攻势表现在:试图迫使广东当局将其右手杨永泰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南京取消[国民党]西南政治会议,收买

① 发报者是根据文件上的附注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5月14日。

③ 文件上有附注:代表(A. 埃韦特)的草稿,(已发出)并由[中共]上海中央局通过无线电发出。

④ 见第234号文件。

⑤ 指南京政府军队镇压19路军起义。

广东师团指挥官和迫使粤军从闽南撤出，在广西助长搞掉白崇禧的企图。广东对此作出了软弱的反应，暂时可归结为：请求保留目前的政府主席^①，声明说实际困难使它必须在目前推迟解决解散西南会议问题。与此同时，广东和广西之间的关系由于广西培植亲南京势力而尖锐化了。

广东的地位还因为以下情况而更削弱了：现在英国在对南京实行很谨慎的政策。英国感兴趣的是延缓，而可能的话，则避免现在在南京和广东之间发生公开冲突，因为现在这种冲突的结局会对广东不利，也就是对英国不利。陈济棠的政策也是旨在延缓不可避免的斗争，希望南京出现新的困难，希望英国在日英美在华南的矛盾日益加深的基础上给予（广东）更积极的支持。这样的政策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些优越条件。我们应该考虑到，尽管有帝国主义者的种种花招和有利于妥协的种种因素，公开的冲突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最关心的是，以对我们最有利的形式利用目前日益加强的对抗和即将到来的斗争。

因此，党在目前的政策应该是：

1. 在广东的群众和士兵中开展广泛的鼓动工作，指出南京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准备反对广东人的战争；反对陈济棠这个广东人的敌人的政策；号召士兵停止反对红军和苏维埃的斗争，因为红军和苏维埃准备在三项条件^②基础上共同同敌人——南京和日本作斗争。

2. 利用一切迂回的途径接近粤军士兵和指挥官，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同南京作斗争，我们就打算不进攻粤军。要散布消息说，南京的进攻将在近期开始，南京决定解除粤军的武装并用南京军队和北方军队取代它们，等等。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应该广为宣

① 林云陔。

② 见第 100 号文件。

传共同斗争的建议和我们的三项条件,并要求把粤军撤出赣南,以便同南京作斗争。

无论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样的鼓动工作都会促进士兵和一些军官团的分化瓦解,加强南京和陈济棠的反对派,为我们利用即将到来的斗争从政治上准备有利的条件。

我们应该立即着手做这项工作,并在以后还要给予加强。这项工作决不会影响我们现在和将来对广东采取的军事步骤。我们的直接目的应该是,同广东那些真正反对南京和对陈济棠不满的部队建立一些联系,并为我们创造更加有利的局面。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8, 第 96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242

李竹声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

1934年2月27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政治委员会，抄送王明和老板^②。

按照来自四川同志^③的通报，1933年底地区^④形势的基本特点是：

我们地区的面积约有16万平方公里。我们有正规红军7万人和地方武装10万人。为了加强军政工作，[中共]中央和上海认为，有必要向那里派最强的同志。我们建议派王明和弗雷德^⑤。

请电告你们的意见。斯拉文^⑥。2月27日。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61(1934年收文)，第233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3月3日。

② 康生。

③ 何人不知。

④ 指四川苏区。

⑤ M. 施特恩。

⑥ 李竹声。

243

埃韦特给李竹声的信^①

1934年3月6日^②于上海

秘密 亲启

敬爱的斯拉文,鉴于总的形势,我们也在我们之间的近期联系中采取了一定的预防措施。因此您在这个时期将收到的每个文件不都是集体准备的。据我所知,您已经收到了给四川苏区的9页信件,因为我未能在信稿到达您那儿之前对其作出什么改动,所以现在我以秘密的方式告诉您我对这个问题的个人意见:

1. 当然,您将决定,在目前什么是最需要寄给同志们的(以及从技术上能寄多少)。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告诉同志们以后6个月总的战略方针,其目标是把我们的政权扩大到四川的决定性地区和歼灭敌人。这些方针应该是信的中心点。还需要加上简短的前言,说明四川的成绩和能力,明确要防止发生轻视防御和在对敌斗争中不努力坚守就放弃我们的部分土地的现象,防止出现对我们苏区目前的扩大产生“满足”情绪的危险,说明在发展我们正规军的同时在白区准备进行游击战和一般政治工作的必要性,等等。

2. 叙述这样的总方针和总战略计划,可以很容易限定在4页内,这样就能不费劲地用密写墨水抄写。此外,我们还可以用几句

① 文件上有批注:关于弗雷德(M. 施特恩)给四川的信的草稿,代表(A. 埃韦特)给斯拉文(李竹声)的信。上述1934年3月6日给四川苏区党的执行局的信的草稿没有发表,草稿上有批注:弗雷德的草稿,没有照此发出(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810,第81—89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5月13日。

话向同志们提出关于政治工作的明确建议，如加强党、共青团、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在实践中组建有群众基础的苏维埃，依靠我们的基本阶级力量，从苏区来组织在国统区的联络和工作，主要在四川、陕西等省实行我们的革命政策和采取镇压反革命的措施。

3. 如果您从技术上能够让这个同志^①带来信^②中提到的“组织纲领”，那您应该这样做。如果不行，可以将此事推到下一邮班。

4. 我认为，“前言”和“分析”^③可以由军事计划的简短前言代替。但是，如果您决定采用另一种方式，那我请求您彻底去掉几个表述法。我只谈及一些：我不认为，我们有根据说，我们“迅速回到了^④最初在巴中、通江、南江的根据地”和“我们还很快丧失了最初的土地成果”（第1页）^⑤，或者红军“甚至后撤数百里，可以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第2页），或者说“敌人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第3页），或者“湖北、湖南苏区的可悲历史”（第4页）等。这种表述法提出了没有事实根据的观点，必定会对四川的同志产生很不利的影响。批评意见应该提出，但要以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为依据。

由于我们不可能在近期见面，而迅速传寄文件是必要的，所以我想，最好对草稿作出您认为有必要的改动，并把它寄回。军事计划和建议您很快就会收到^⑥。此致

敬礼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80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指信使，何人不知。
② 指 M. 施特恩信草稿的一个部分。
③ 指 M. 施特恩信草稿的两个部分。
④ 原文如此。应为：后撤到。
⑤ 这里和下面均引自 M. 施特恩信的草稿。
⑥ 文件没有找到。

24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 364(Б)号记录

(摘录)

1934 年 3 月 21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14. (5843)——阿基莫夫同志关于中国苏区状况的报告^①。

决定:14. ——责成米夫(负责人)、王明和阿基莫夫同志根据交换的意见为政治委员会下次会议起草给[中共]中央的全面政治战略计划^②。

还责成这些同志起草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开展敌后游击运动和关于瓦解敌人工作的简短指示^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克诺林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82, 第 4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后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34 年 4 月 3 日决定, 起草文件的程序和期限有变化(见第 247 号文件)。

③ 对这一点有批注:(1934 年)3 月 31 日完成。И. 米夫。见第 245 号文件。

2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3月25日^①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②，转[中共]中央。我们觉得，中央和全党未意识到中央苏区形势的严重性，未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进行防御和粉碎[敌人的]第六次“围剿”^③。必须动员和集中党的一切力量来解决这个任务。要击溃敌人一个进攻的集团军，以便有可能进行以后的积极作战行动，使敌人失去主动性。我们觉得，在黎川地区打击陈诚集团军是最有利的，不过你们应该从具体情况出发决定这个问题。必须把6、8、16和10军团的行动同反六次“围剿”的总计划协调好。为了吸引敌人的力量，最好6和16军团向南昌以南运动，8军团向北运动并沿赣江西岸推进，而10军团军向南运动。6、16和8军团的下一步任务是在赣江以西建立新的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请你们把我们关于军事问题的所有指示看作是建议。我们特别强调在敌后尽最大努力开展游击行动的必要性。地方党组织应该挑选干部去建立新的游击中心。敌人的交通线，特别是九江至南昌的铁路和福建的闽江，应该处在我们游击队的长期影响之下。破坏工作和瓦解敌军的工作应给予最大的注意力。敌后游击行动

① 电报译出的日期。

② A. 埃韦特。

③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和破坏工作是反对敌人新策略的最重要手段。为此不仅应由苏区派出力量,而主要应由国统区党的组织选派力量。现在军事行动要求定期和有计划地补充红军的队伍。请讨论经几个阶段逐步使其转到动员体制上来的可能性。例如,能否从党员、工会会员、共青团员和贫民团团员开始,对一定的年龄实行动员,使之参加少年先锋队 and 赤卫队,以便进行普及训练,然后靠他们来补充军队。要千方百计加强红军中党的无产阶级阶层和党的政治工作,并从纪律方面和社会方面同开小差行为作斗争。必须坚守从敌人那里夺得的城镇,在它们周围设立防区并吸收劳动人民参加对这些城镇的保卫工作。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47(1934 年发文), 第 49—51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246

李竹声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4年3月27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②，抄送王明。

[中共]中央报告说，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认为可以派他去作为出席代表大会^③的代表？您的代表^④和[中共]上海中央局认为，他的旅行安全难以保证。此外，应该考虑政治后果。斯拉文^⑤。1934年3月27日。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61(1934 年收文)，第 200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 1934 年 3 月 31 日。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见第 61 页注④)。
④ А. 埃韦特。
⑤ 李竹声。

2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 367(B)号记录

(摘录)

1934 年 4 月 3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2.(5885)——中国问题。报告人:阿基莫夫同志。

讨论参加者:别尔津、王明、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康生、米夫、洛佐夫斯基、萨发罗夫、黑克尔特、库西宁、克诺林同志^①。

决定:2.——责成米夫(负责人)、王明、康生、别尔津和阿基莫夫同志在 5 天内根据交换的意见起草军事政治指示^②草稿,并将其提交政治委员会批准。

听取:3.(5886)——关于《中国论坛》。

决定:3.——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责成米夫和王明同志起草关于杂志的拨款和性质的建议,并将其提交政治委员会批准^③。

听取:4.(5887)——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因病是否适宜去苏联的电报。^④

① 报告和讨论材料没有找到。

② 见第 256 号文件。

③ 见第 253 号文件。

④ 见第 246 号文件。

决定:4.——认为他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能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83,第 37—39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248 号文件。

2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 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①

1934年4月9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③。[我们]反对毛泽东出行^④，因为我们不认为能够使他在旅途中免遭危险。即使需要大笔开支，也绝对需要在苏区组织对他的治疗。只有在完全不可能在当地医治和有病死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政治委员会。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7(1934年发文)，第 58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见第 247 号文件。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确定的。
③ A. 埃韦特。
④ 见第 246 号文件。

249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2号报告

1934年4月10日^①于上海

致米哈伊尔^②。(第2号报告)。发自驻华代表^③。

我只是在邮件发出前几个小时才得知可以发邮件。因此不能给您寄去详细的报告。只有在(信使)动身时间改变,我才有可能向您报告重要的日益高涨的罢工运动。

所以我只能采用发电报的方式:

1. 北方形势:南京政府因发生福建起义^④遇到了困难,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暂时推迟全面执行塘沽协定^⑤,特别是关于实际承认满洲分离的条款。

实际上目前日本提出的最后通牒^⑥,不仅可以弥补以前的“时间损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线再次推进的前奏,目的是争取在北方实行比以前更全面的统治,建立包括山西在内的广泛的反外蒙古战线,以便以广泛战线的形式发动对苏联的战争。

日本的行为同时也促使英国行动更加积极,不久前西藏军队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5月13日。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А. 埃韦特。

④ 见第84页注④。

⑤ 见第67页注③。

⑥ 这里可能指1934年3月1日溥仪登基之后,日本加强了对南京政府施加的压力,目的是争取中国尽快承认满洲国和中国接受日本当局关于停止国民党党部在华北一些地区的活动的要求。

进犯四川^①就是证明。

我们将更加积极地应对这种事态发展,加快本着王明和老板^②的信的精神开展宣传运动。

2. 我们前线的形势:南京政府对福建、江西的压力在不断加强。它占领一些城市以及泰宁、将乐、归化部分地区(我们已经电告)^③。越来越难于有效地包抄敌人的翼侧;最近我们不会有大的战绩。正在进行的许多战斗也给我方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我们希望,夏季不失去太多的土地。这不会消除形势的严峻,因为现在蒋介石的攻势在有步骤地开展,没有长时间的间歇。

在四川,尽管敌人在这里也向一些地区进行了渗透,但形势仍然是比较有利的。我们的反攻应该显示出一些战绩。那里没有理由恐慌不安。不过我请您参阅信使 12 月份带去的报告^④,我仅提纲挈领地将其向您作个叙述。

3. (3 月底 4 月初的)罢工行动:新的更有组织的罢工浪潮开始了;在北方:(唐山)开滦矿工^⑤和水泥厂工人举行了罢工。不言而喻,日本人企图浑水摸鱼。斗争的原因在于工人向企业主提出

① 指 1934 年 2 月底 3 月初西藏军队进犯西康,目的是为了收复以前被四川省当局军队占领的一块土地,因为在这块土地上有几个寺庙。

② 康生。见第 182 号文件。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见第 235 号文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1934 年 5 月 14 日收到的这份电报的另一份上,可能是在有埃韦特真正报告的一个邮件里,有亲笔用德文补写的文字:“代表关于四川的意见:依然存在派遣军事行动顾问问题。此外,再派一名政治工作人员。(中央执行局建议派王明和一位外国同志)。到这个地区来很难,但到夏天形势可能有变化。存在很大的危险性:我们的人将会过于长期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和目前的地盘,而不是根据我们的力量,在敌人还没有建完道路和工事和还没有协调好对我们的行动时,争取尽可能扩大我们的地盘”(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40 页)。

⑤ 关于开滦煤矿罢工,见 M. 帕什科娃:《1934 年上半年的中国工人运动》,载《民族殖民地问题资料》第 2 期,第 12 页。

的要求和对黄色工会领导的愤怒。英国领事^①以“开滦矿业公司”名义要求中国当局无情地采用武力，中国当局照办了。

我们派去了组织人员，给予了一切可能的支持。

上海：10家丝织厂罢工^②。有4000名工人参加；此外，在各工业部门以及码头发生了大量小规模罢工。丝织厂工人包围公安局一天，解救了一名被逮捕的领导人。

人力车工人制定了斗争纲领，提出了具体要求，矛头是反对企业主、调解人和租界当局（为了帝国主义运输企业的利益）提出的“改革”建议。暂时我们的影响不大。

4月9日发生了（上海城郊）虹桥500名农民的武装行动，反对以扩大机场名义没收他们的土地。在美国轰炸机飞行员霍克把“兀鹰”号飞机降落在这里后，机场上发生了农民袭击军队的事件。军人动用了机枪，迫使农民后撤（迄今有3人被击毙）。尽管实行了戒严，运动还在发展。

浙江：有10万工人的丝厂地区，至少有1万名工人参加的反对降低工资的罢工，已发展成为在各个地方的大罢工。在湖州，工人摧毁了政府大楼，举行了大罢工^③。

我们派去了组织人员，给予了一切可能的支持。在从湖北到浙江的所有这些行动中，都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解救了被捕的工

① 何人详。

② 可能指1934年3月2日（另一些材料说3日）至4月22日“美亚”公司工厂举行的罢工（见M. 帕什科娃：《1934年上半年的中国工人运动》，载《民族殖民地问题资料》第2期，第6—7页；《关于“美亚”股份公司工人斗争的文件》，载《民族殖民地问题资料》，莫斯科1934年第8期，第58—90页；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4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1927年8月—1937年7月）》，广州1988年版，第227—229页。

③ 1934年3月底4月初，在湖州五新（音）厂向罢工工人开枪射击引发了所有企业工人和商人的大罢工。见M. 帕什科娃：《1934年上半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12页。

人,包围了公安局和公司的行政大楼。蒋介石下达了禁止罢工和消极抵制的新指令,还下达了解散所有参加罢工或支持罢工的(国民党)工会的命令。

您晚些时候将收到更详细的评价。

4. 取代《中国论坛》出版新的反帝报纸。我们一得到答应给的女编辑^①,我们就尝试开始出版。我认为,这将是可能的。艾萨克斯编辑肯定晚些时候试图公开出版托派刊物。在《新共和》周报^②上(纽约,1934年3月14日),我们发现了比森签署的呼吁书,号召筹集款项保存《中国论坛》。我们不想就此发表议论,暂时印刷设备形式上还不在于我们手里。这种事只有在女编辑出现在这里时才会发生。当然,不排除在最后时刻艾萨克斯不守移交印刷设备的诺言。但是我们无法在依法移交之前制造设备。关于所有其他问题的报告,下一邮班寄去。

代表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90—91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

①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② 《新共和》是美国的一家周报,从 1914 年起在纽约出版。

250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①

1934年4月10日^②于上海

致米哈伊尔^③，(发自驻华代表^④)。

弗雷德^⑤的突然离去使我不得不再指出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我这样做不只是为了驳斥弗雷德个人的报告，而且也是为了向您提出一个绝对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请求：一旦弗雷德返回中国，要把他(的工作)限定在军事问题上，解决政治问题时，他应该服从于代表。最近几个月的事态发展不该再重复了。

除了以前我已经报告的^⑥之外，还有以下情况：

1. 3月中旬，弗雷德第一次不给我看军事电报汇报和他对这些汇报的答复。真正的原因是试图孤立我；(他)提出的原因是：“不合法”，“这太危险……”等等。因为这之后不久弗雷德就离开了，所以(我们之间的)冲突才得以避免。

2. 3月，弗雷德转为不给我看，就给中共上海中央局寄(电报)草稿(涉及的绝不是纯军事问题)。理由是“时间(来不及)和不合法”。真正目的可能只有一个：向中共上海中央局通报冲突问题。

① 在文件上有批注：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已阅。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5月13日。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④ А. 埃韦特。

⑤ М. 施特恩。

⑥ 见第238号文件。

3. 随着他的欲望的日益膨胀,弗雷德开始尝试对[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总体上谴责性的批评。虽然这之前几周,我曾尝试对他施加影响,使他根据形势对作战方面的错误作出认真的批评,并把这种批评同积极的建议结合起来,但弗雷德还是把1934年2月15日的(电报)草稿寄给了中共中央^①,而最后经弗雷德本人同意,这个草稿未再散发。

为避免可能出现这类曲解,说什么我“反对批评”,或者我声称“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我把弗雷德(电报)草稿的副本和我否定的书面答复^②寄去。

至此我结束抱怨,并给您附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以下文件:(1)弗雷德的草稿,即1934年2月15日给中央苏区的电报;(2)代表于1934年2月16日对此作出的答复;(3)代表就弗雷德1934年3月6日给四川的信的草稿^③写给斯拉文^④的信;(4)弗雷德关于四川苏区军事任务的草案^⑤。

最后,我认为非常需要给上海派一位懂军事的同志,他将做工作,提建议,进行观察,提出警告和给以推动,同时在不断复杂化的形势中保持镇静。我不贬低弗雷德的军事能力,我认为,您从另一个角度处理问题,能够挑选出更合适的朋友。我个人认为,弗雷德不需要去苏区,因为时至今日他已找到了足够的理由推迟他的江西之行。弗雷德提出去四川,我实在不能理解。

代表

① 见第239号文件。

② 见第240号文件。

③ 见第243号文件。

④ 李竹声。

⑤ 1934年3月6日给四川苏区党的执行局的信草稿没有发表,草稿上有附注:弗雷德的草稿,没有以这种形式发出(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810,第81—89页)。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75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251

李竹声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4年4月11日^①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②。[中共]中央通知说,很满意弗雷德^③的工作,并希望他在最近回来,以便去四川。在上海有另一位懂军事的同志是完全必要的。斯拉文^④。4月11日。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61(1934 年收文), 第 197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 1934 年 4 月 20 日。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М. 施特恩。

④ 李竹声。

25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 368(A)号记录

(摘录)

1934 年 4 月 11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21. (5930)——把宣传中国苏维埃成绩和中国红军斗争成绩的工作委托给戈帕涅尔和王明同志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宣传委员会的建议;为此要让王明同志参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宣传委员会并要允许该委员会专门为此项工作把一位中国同志列入编制。

决定:21. ——采纳这个建议,但专门为此项工作把一位中国同志列入编制的要求除外。代替这一点,戈帕涅尔同志应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协商实施这项工作的办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84,第 1、5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368(B)号记录

(摘录)

1934年4月11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27.(5936)——关于《中国论坛》报的性质问题。

决定:27.——采纳米夫、王明和康生同志起草的建议(见附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附录

关于《中国论坛》性质的建议^①

《中国论坛》报(如果不能继续用以前的名称出版,或者用别的名称出版)应该是与中共中央局^②有联系并由该局领导的,但它不应具有公开的共产主义性质,而按其方针应该是反帝反法西斯的刊物,它奉公守法,同情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反帝运动,包括(在国民党地区的)游击运动和苏维埃运动。

它每月出版应不少于两次,一有机会可更多次出版,至少每周

① 文件上有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О. В. 库西宁、Б. 布龙科夫斯基、Ф. 黑克尔特和 Д. З. 曼努伊尔斯基的签字。

② 指中共上海中央局。

一次。它应同时用两种文字出版,英文版面应面向中国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中文版面应使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使中国工人能看得懂。

在《中国论坛》报周围要组织读者小组和广泛的工人通讯员、农民通讯员和学生通讯员网,并对他们加以利用,作为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方式。

1934年4月9日。米夫、王明、康生。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84,第 6—7、15 页。

记录为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附录为打字稿,原件。

254

王明给埃韦特和李竹声的电报^①

1934年4月23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②，转斯拉文^③。注意到日本人^④的声明，有必要发表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签署的声明，反对日本厚颜无耻的勒索，同时强调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背叛行径导致日本提出了这种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耻辱的要求。声明中应该强调指出，国民党从华北撤军并把军队调到华中，这就便于日本人占领华北和进而占领整个中国。在这个声明中，要再次呼吁国民党军队共同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⑤，还要重提六项条件^⑥，表明可以开展神圣的对日国民革命战争。请保证中国红军同奴役中国人民的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34 年 4 月 23 日非常会议审议了文件草稿，会议责成 H. A. 皮亚特尼茨基和王明最后审定电报（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86，第 2 页）。

② A. 埃韦特。

③ 李竹声。

④ 指日本外务省调查局长官天羽英二 1934 年 4 月 17 日发表的声明，声明中实际上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严厉限制它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军事经济和技术领域同所有其他国家建立联系的要求。声明全文见《太平洋》杂志，莫斯科 1934 年第 1 期，第 212—213 页。

⑤ 见第 100 号文件。

⑥ 指 1934 年 4 月 20 日由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条款，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卷，第 681—686 页。

行为作斗争^①。同时要加强反帝组织活动并准备在5月9日^②国耻周年日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把以前的21条同日本今天的声明联系起来。有可能的话,要组织短时间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为表示抗议在厂门口和学校里组织示威活动。

王明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47(1934年发文),第72页和72页背面。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1934年5月5日发表了《党、团中央为声讨国民党南京政府告全国劳动群众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272—280页。
- ② 指1915年5月9日，这一天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21条要求”，接受这些要求意味着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见《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541—543页。

255

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

1934年4月26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①。我问过,是否花钱(5万)^②购买武器和药品。您没有作出明确答复而又问起资金的事^③。弗雷德^④告诉我们说,由于无法转给苏区,斯拉文^⑤那里存了很多钱。在上海,钱转来转去保存。请告知,这是怎么回事。

米哈伊尔^⑥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47(1934 年发文), 第 81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
- ① A. 埃韦特。
② 原文如此。未指明货币名称。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M. 施特恩。
⑤ 李竹声。
⑥ H. A. 皮亚特尼茨基。

25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4年4月29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②，转[中共]中央。在敌人进行第六次“围剿”^③的这个阶段，发去我们的想法和建议。[中共]中央应加以研究，并采纳他们认为合适的部分。

1. 同时从北面和东面发起攻势的敌强大集团军，在逐步“蚕食”苏区，对整个苏区的威胁增大了，特别是来自东北边区方面敌军的威胁。

敌军缓慢的步步为营的推进，使我们对敌设防阵地的反攻变得非常困难，收效甚微。只有在敌集团军之间的间隙，我们还能在进攻的敌人的翼侧和后方采取积极的行动。在有利的力量对比情况下，这种积极的行动，也只有在我们前线兵力的工事防御同我们机动拳头对敌人翼侧的积极打击和游击力量深入敌后的行动结合起来，才能带来明显的效果。如果在敌后纵深和交通线上有游击小组活动的话，它们的任务将是：勇敢地袭击敌人出动的部队，特别是它的后方，摧毁敌人在修筑的堡垒和道路，为敌人的物资运输

① 文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4年4月27日会议上获批准（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87，第6页）。

② A. 埃韦特。

③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设置障碍。

2. 为了缓和中央苏区的处境,国统区党组织的迫切任务是,有计划地开展游击运动,特别是在农民采取行动的地方,首先是在以下地区:湖南的郴州;沿平汉铁路线;浙江西南部;(第10军也要作出努力),福建东北的福鼎和寿宁地区,以及厦门方向;广东的东江地区。要同至今仍无领导的广西游击队取得联系,让它们向湘粤边境地区运动。

3. 由6军团和在赣江东岸重新组建的部队以及地方游击力量共同努力,突破敌人在吉安和赣州之间地段的封锁,为赣西苏区同中央苏区的合并创造前提条件,决不能让敌人把这些地区分开。我们认为,这次战役具有很大意义,因为实施这次战役将使蒋介石难以包围中央苏区。

4. (1)如果关于贺龙在东面采取行动的消息确凿,那就可以批准和加快他将在1934年夏季在东南方向发动的攻势。

(2)也要为我们在长江南岸湖泊地区的力量确定向南面湖南省推进的任务。

(3)第三独立师和江西西北角游击队的任务,仍然是定期袭击九江至南昌的铁路线。

5. 有计划地采用各种办法瓦解敌人部队的工作刻不容缓。要尽可能投入更多的力量和资金来向敌人部队和警备队进行政治渗透,广泛开展在敌人薄弱地方的破坏活动(如机场、军用列车、运送军队和弹药的船只、交通线等)。

6. 在国民党地区要宣传保卫和积极支援中国苏区的口号,广泛宣传苏区的成就、那里实行的经济和政治措施,同时要把它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联系起来。

要把华北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天津的工人运动引导到这些口号上来,还要引导到反对国民党军队向南调动,便于日本人占领华北的行动上来。在那里,要利用工人运动的发展来开展反帝斗争,

建立工人纠察队和游击队。

7. 单独的任务是：像以前指出的那样^①，扩大四川苏区。还必须着手扩大陕西苏区，为此，我们认为，需要为组织孙殿英军队起义做准备工作^②，之后利用起义部队来争取扩大陕西中部（红 26 军活动地区）的苏区。

8. 最后：支援中央苏区红军反击六次“围剿”第二阶段^③的斗争的所有措施都应该是“突击”实施的。这无疑将有助于红军的斗争和不损失很多有生力量就粉碎敌军对我地区的进攻。

请经常把最重要的军事行动通报给我们。

请确认译出密电。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7（1934 年发文），第 86—90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不清楚指的是什么文件。

② 见第 31 页注②。

③ 指蒋介石军队在镇压福建起义之后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2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 376(B)号记录(摘录)

1934年5月15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17.(6069)——中国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部关于出版中文报纸《红十月》的建议^①。

决定:17.——[1]认为在莫斯科为苏联劳动者和为国外发行出版中文定期大众报纸是适宜的。每月应出版不少于一次。

[2]报纸的主要任务应该是:

(1)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经验。

(2)国际报道,阐述全世界和远东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

(3)报道苏维埃中国的状况。

(4)揭露正在准备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宣传苏联的和平政策。

[3]责成中国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部向联共(布)中央文化宣传部提出这个问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90, 第 6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后来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报纸名称作了改变。1934年7月至1935年1月间以《中国报》名称出版。

25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 处政治委员会给李竹声的电报

1934年5月26日于莫斯科

绝密

政治委员会致斯拉文^①。通过您收到了来自江西[中共]中央关于购买药品、食盐和用于生产子弹的原料的电报^②。您给他们转寄了我们寄去的用于采购的所有款项吗？如果没有，请马上告知还有多少钱，每月您能无特别风险地给[中共]中央转寄出多少。为了利用采购和向江西提供物资的机会，需要在南方，可能的话在澳门设点，并从那里经福建港口建立特殊的联系路线。请弄清楚这种可能性。如果可以这样做，那我们就可以为此派去一名外国同志帮助做这项工作。应该成立一个公司，从事贩卖四川鸦片生意和从四川向江西倒卖白银。这样我们就可以为购买江西红军所必需的东西提供极重要的资金援助。候复。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7(1934 年发文)，第 130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李竹声。

② 文件没有找到。

259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

1934年6月2日^①于上海致米哈伊尔^②。驻华代表^③的报告^④。

I. 在我转入说明中央苏区的形势之前,我谈谈日本在4月17日以新的更尖锐的形式宣布的政策^⑤及其后果。帝国主义报刊和国民党报刊的共同方针过去和现在都是,把日本外务省对最初声明作出的一些不大的文本改动,说成是实质上放弃了最初的文本^⑥。这期间,日本精心地利用了最初的成功。现在,当日本威胁要在北方使用武力时,已经解决了铁路、邮电、海关等问题,这是向中国承认满洲国迈出的一步,使用一切手段和方法奴役中国的方针将会得到更快得多的发展。日军还会更加渴望占领一系列省份和战略据点,实行制造挑衅的政策,暂时在这方面还没有遇到军事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6月26日。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А. 埃韦特。

④ 文件上有批注:机密中国文件。И. 米夫。

⑤ 指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的声明(见第116页注④)。

⑥ 中国政府1934年4月19日的答复声明(见《太平洋》杂志,莫斯科1934年第1期,第213页)和列强报刊和外交代表对日本要求的反应,促使日本外务省在4月下旬作出解释,表面上稍许缓和了4月17日声明中提出的要求。这些问题也成了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或外交部同日本政府或外务省交换照会的题目(见《太平洋》杂志,莫斯科1934年第1期,第213—216页),这些照会的内容在报刊上有报道。

抵抗。同时日本政府将坚持要求南京政府接受更多的要求,并且日本将通过南京首脑同中国所有有关地方政府和省府“进行谈判”。

在其他帝国主义列强采取众所周知的立场和英国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愿意尽快利用日本的侵略性来对苏宣战和重新瓜分中国的情况下,日本最近在实施对中国的阴谋勾当时没有遇到任何大的困难。现在这些措施具体能实施到多远的地方,只能猜测。不过现在已经很清楚,北方的措施能实行到比湖北远得多的地方。据报刊(《密勒氏评论》^①)报道,日本把整个北方分成四个地区:(1)绥远和内蒙古;(2)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省;(3)新疆省;(4)河北和山西省。第一个地区已可采取军事行动,第二个地区处于全面占领的过程中,新疆在实行建立“东土耳其斯坦王国”的方针^②。在河北,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已经在日本手中,还可以随时采取例行的步骤。这个省和满洲是日本武装干涉苏联的巨大中国桥头堡(但这决不意味着,武装干涉苏联实际上只有在日本在中国实行其北方计划时才会开始,而是相反)。

在这个问题上,宋子文以信任的口气所谈到的他的西北(陕西、甘肃)之行的印象具有一定的意义。“这些地区的所有将领都有反日情绪;如果苏联支持他们,他们准备进行斗争”等等。

这些动向在中国不是新闻。虽然现在没有多大意义,但是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它们能够创造一定的机会。

我还要告诉您,宋子文以诚恳的方式表达了要同党的代表谈谈的愿望。我个人对此没有任何期待,就是因为这里谈的是他。但我要把此事告诉党,党有可能授权它的“特科”的可靠成员同他

① 《密勒氏评论》是美国的杂志,1923年至1950年在上海出版。

② 见 C. 孟:《日本的下一步动作》,载《密勒氏评论》,上海1934年第68卷第13期,第501页。

谈谈。宋子文的反日立场不要估计过低,而他的怯懦不能估计过高。

此外,日本在努力向南方渗透。成绩不小。在驱逐了蔡廷锴的“人民政府”之后,日本在福建有了省长这个代理人^①。福摩萨(即台湾——译者)居民被用轮船大批运出,如运到厦门等地。在福建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说有什么特别的。在广州,已经有几个月时间,特别是从日本最近这次声明时起,是一片沉寂。没有一句反日言论,几乎没有一句反南京政府亲日政策的言论(虽然南京、广东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理由很简单:(1)害怕;(2)日本实现了很大规模的经济渗透和“人员上的”政治渗透。有组织地从福摩萨向广东走私日货和原料的活动采取了很大的规模。据说,胡汉民已经在亲日阵营里面(至少日本驻华大使^②早就赞扬他是“中国最聪明的国务活动家”)

再有,现在日本在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以取得中国在它对苏宣战时表示支持的坚定许诺。总的方针当然已经讨论和调整好了,虽然还没有达到具体协商的阶段。

所有这些事件的后果,从我们的利益角度来看,还不太清楚。对反对派的压力和恐怖比任何时候都大,在很大程度上迫使这些人保持沉默。

党还在4月17日前夕,鉴于北方形势紧张发表了呼吁书^③。4月17日以后,我们发表了新的呼吁书^④,并加快了以六条纲领^⑤

① 陈仪。

② 有吉明。

③ 可能指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193—202页。

④ 可能指1934年5月5日《党、团中央为声讨国民党南京政府告全国劳动群众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272—280页。

⑤ 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基本纲领》(见第116页注⑥)。

为基础组织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行动。组织了收集签名运动，根据党的情报，已经收集到约 1700 个签名，其中 700 个是有中等影响的无党派人士的签名，多数是以前的志愿者领导人。我根据以前的经验，根据中央局和我们都无法核实的情况，对这些信息持怀疑态度。这些人士的代表已被派到其他省份去强化这种运动了。

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歪曲我们方针的行为，国家改良派企图破坏纲领，把它化为乌有。这种企图被制止了。一些党员也有这种倾向。

在党员当中，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看法，其原因只能用日本或法西斯所搞的阴谋勾当的影响来作解释。例如，一个“同志”（上海的学生）声称：“纲领是不能实现的；当全部力量都要用于对日斗争时，那我们怎么能同英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呢？如果全都要去进行斗争，那谁将工作？如果钱都花到战争上，那从哪里拿到办教育用的钱呢？”另一个北方的同志声称：“纲领不好，应该作这样修改，使之能用来做合法工作，并使政府也不能反对我们”。

再有，危险在于，至今运动基本上局限在收集签名上，而组织和政治任务被忽略了。

现在在采取措施反对所有这些歪曲，对这种看法既采取组织措施又进行尖锐的思想斗争。

不久，纲领将公布于世。但是需要我们合法报刊对它的支持。我们的报纸^①由于没有史沫特莱还是不能出版。

在其他点中谈党以后的措施。

II. 中央苏区的危险形势。军事形势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其他问题，在最近几个月大大尖锐化了，没有希望在最近争取到有利于我们的根本改变。此外，还存在这样的危险：秋天敌人会全力从四面猛攻我们已经大大缩小了的中央苏区，放弃以前的缓慢推进、

^① 指《中国论坛》。

挖通道和修碉堡的战术。换句话说,将开始进行集中而迅速的打击。

关于事态发展,您已经收到大量关于军事问题的电报,其中最重要和最近的电报,我再次附上^①。我也附上[中共]中央的防御计划^②,这个计划已通过另一个渠道电告了您。[中共]中央最近的电报^③将在6月初寄给您,在这份电报的结尾,他们征询您的建议和决定。我不想在这里重复,而只对中央提出的两种可能性作一些评论。

1. 从起草[中共]中央报告时起,形势又发生了对我们更加不利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广昌和建宁的失陷以及敌主要兵团的进一步推进。此外,由于不间断的战斗和不充足的战利品,我们的弹药储备大大减少了。我们的损失巨大。开小差现象在增加。

2. 敌军的大量集中和不断地挖通道和防御工事(如果敌人在同我们的斗争中将继续取得成绩的话),使中央一号建议难以实施。中央一号建议是:“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当然,把我们的基本力量分成小的游击小组,可以在许多据点、许多地方长时间给敌人制造麻烦,但仅仅这样做决不能保证有效地保卫中央苏区。

3. [中共]中央说:“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

① 可能指中央苏区1934年5月5、6、15—17、25和28日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同本报告保存在一个卷宗中的还有关于作战进程、计划和双方兵力部署的报告。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810,第98—109页)。

② 可能指中共中央1934年5月15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其中叙述了把中央苏区分成5个战区(或地区)和一些分区的计划,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5月17日批准了这个计划,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810,第102—106页;又见《土地革命战争记事(1927—1937)》,北京1989年,第390页)。

③ 文件没有找到。

4. 我个人认为,不应把[中共]中央指出的两种可能性截然对立起来。4 军团^① 1932 年在预先未作计划的情况下向四川采取的远征行动表明,除了游击兵团,我们主力的一部分,应该留在老的地区,以防止敌人在没有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面而神速地占领这些地区。这一部分军队不应人数很多,否则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共]中央电报中规定的方向顺利地进行突破。在这个方向上,我们的基本力量,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使用。

虽然敌人从 4 军团 1932 年的远征时起学会了许多东西,虽然他们有比 1932 年更加强大的、我们必须克服的防线(赣江、赣湘边界和湖南湘江一线),虽然敌人在采取行动之初会拥有比 1932 年多得多的军队来组织追击,但对于我们的进一步推进来说反正都一样,恐怕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突破,那长江还会长时间成为我们同 4 军团建立有效联系的很大障碍,而同正在转移的贺龙 2 军团取得联系,进而建立新的苏区,将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但游击小组和江西、福建地区的兵团,将进行类似于我们留在以前的鄂豫皖苏区的力量所进行的斗争。蒋介石把很大一部分力量留在这些地区,既是为了镇压群众,也是为了“调解”广东和广西的问题,为此他好像预先得到了日本“不干预”的保证。

关于川陕苏区的情况,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消息。我们曾尝试建立直接无线电联系,但未取得成功,因为由于我们的撤退,国民党地区和红军地区之间的运输联络点都被摧毁了,而建立新的联络点需要很长时间。从中国报刊的报道中可以看出,红军试图建立从通江往西到南江、广元,再到甘肃的交通线。同时报道说,红军还在绥定以北。所有报道在这样一点上是一致的,即红军保存了自己的力量。

^① 原文如此。这里和下面均指四方面军。

鄂豫皖的部队和贺龙的部队都在开展积极的游击活动,但没有把其他敌军从江西吸引开。同它们的联系只是在借助于不常来的信使进行。

为加强支援中央苏区的斗争,党采取了一些措施。除了向一些组织和领导干部作出关于形势和必须提高积极性的更现实的通报外,还向最重要的地区(铁路线、码头、作战地区)派去了一些同志。现在第二技术员(7人)学校在举办。还有游击学校在举办,目的是为了加强在国民党控制区的领导工作。由于地下条件艰苦,整个工作经常发生间断现象。

Ⅲ. 上海“美亚”丝织厂工人举行罢工和开滦煤矿矿工采取行动之后(您已收到了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①,经济斗争开始低落。除了一些小规模罢工外,最终5月中旬在(英资)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家工厂发生了工人罢工^②,反对打算关闭工厂的意图。我们立刻尝试让另两家工厂参与罢工,至今在其中一家工厂(有4000名工人)搞成了。总共有6500名工人参加罢工。一部分海员和码头工人决定从6月1日起停止为这家公司装运产品。尽管蒋介石早在5月份下令镇压罢工行动(命令是根据英国大使^③的要求下达的,大使个人对这些烟草工厂表示关心),但罢工仍在继续。国民党工会一开始反对罢工,而后来在罢工爆发之后却站出来“率领”罢工。蒋介石下达命令后,它则积极准备对其实行镇压。

不能说,我们在领导这场斗争(例如,丝织厂工人的斗争),但我们的影响在起作用,尽管我们的组织很薄弱。

除工人采取了行动外,在迄今一直运输盐的江苏船夫当中,很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罢工于1934年5月18日开始持续近一个半月,见M. 帕什科娃:《中国1934年上半年的工人运动》,第8—10页。

③ A. M. Γ. 贾德干。

明显也发生了很大骚动。为此最近开始使用轮船运盐。约有一两万帆船船夫和四到六千工人没有工作做。由 40 条船组成的代表团想到南京政府请愿,在到达南京之前被炮舰驱散。这次行动是自发的。

所有其余问题晚些时候再谈。

附言:现在我们在做菲律宾和马来亚的工作。两个党的代表在这里。菲律宾提出了详细的报告,表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果您现在收不到这个文件,我们将随下一邮班寄去。有 1.5 万人参加了我们的五一游行;其中约有 2000 名改革派。在我们的影响和领导下掀起的大罢工浪潮过去了,取得了部分成绩。

在马来亚,4 月底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这个英国殖民地有几天铁路运输瘫痪了。工人的要求是经济方面的。进一步的消息在军事报告中。

同印度支那没有任何个人联系。同爪哇也一样。

报告结束^①

附录:关于军事问题的 12 页报告^②,以及党的一些报告的译文^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112—115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

① 原文如此。

② 见第 128 页注①、②。

③ 文件没有找到。

260

赖安给哈迪的信

1934年6月4日于上海

亲爱的乔治^①：

在我动身之前，你建议我有机会给你写信，同你交谈我对这里的情况和工作的印象。由于某些原因，我迟迟未能这样做。但是我想让你看看几个零散的札记，谈到这里情况的一些方面和涉及党^②和局（远东局）工作的一些因素以及我在这里一直坚持的观点。

—

1. 根据江西、福建地区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注意到中央红军^③蒙受的一系列惨重的军事挫折和损失，以及因此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缩小，可以推测，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预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同时要顽强地保卫现有的中央苏区根据地，可能的话，还要

① 乔治·哈迪。

② 指中国共产党。

③ 这里和下面指中央苏区红军部队。

使用红军轻装的和机动的部队进行机动灵活的防御战,并在中央苏区目前的和原有的土地上以及在相邻的地区大大发展和加强强大而活跃的游击队。

2. 在这方面,我想简要地,因而不是全面地谈谈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六次进攻^①的革命战争,至今既没有取得对我们有利的结果,也未能使局势完全变得有利于我们。

(1)某些同志,也就是弗雷德^②认为,最近几个月,反革命军队在我们闽东^③、赣北、赣东北和赣南战场上取得的局部和暂时的胜利,是“[中共]中央实行错误政治路线”的结果,而这种路线似乎体现在一系列的军事战略战术失误上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缺少”中心作战计划^④上。我认为,这种立场是错误的,与事实,与列宁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粉碎第六次进攻的斗争中,尽管在战役中有一些战术错误和某些政治失算,诸如在福建“人民政府”^⑤时期所犯的错误,但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还是竭尽全力在这种具体条件下和在这种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下来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军事讨伐。当然,仅从“狭隘的”军事观点出发,在业已形成的情况下,即使犯了最近时期所犯的那些战术错误,也会从根本上改变江西的形势。正因为弗雷德不能理解这一点,正因为 he 面对日益增大的困难开始动摇,特别是在 1933 年 12 月以后,正因为他没有充分注意到红军比较有限的机动能力、客观因素和无法纳入计划的方面,弗雷德对中央苏区军事形势采取了不切实际的观点和态度,并得出结论,认为所有困难和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定和采纳纸面上的计划来“解决”。这种观点

① 这里和下面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② M. 施特恩。

③ 原文如此。应为:闽西。

④ 原文如此。可能指红军总行动计划。

⑤ 指 1933 年 11 月 20 日福建 19 路军采取反蒋行动时成立的政府。

的“成果”之一是去年 11 月提出的湖南计划^①，看来，如果当时实行这个计划，那就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等于自愿消灭中央苏区。11 月的湖南计划的某些成分，可能现在可以运用，或在最近的月份里可以运用。但是时间、事态和条件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决不能也不应该把这种情况当作证明，证明在 11 月以及 12 月提出的这种公式化的取消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2)另一些同志，包括吉姆(代表)^②在内，基本上正确地同弗雷德的上述方针和一些其他政治方针进行了斗争(这决不意味着弗雷德的所有建议和计划都是不对的，有些建议和计划，如福建的 8 月战役^③，在许多方面是典范性的)，然而约在 6 个月以前，他们改变了立场，并至今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占有优势的、总数近 50 万的南京军队，在北面、东北面和东面战场与中央苏区对峙，它们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和积极支持”，与参与包围战役和进攻行动的粤军和湘军等一起，在目前的情况下，预先决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迟早”将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换句话说，这些同志，特别是从去年 12 月起，一方面阐发了关于本阶段在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决战的失败主义“理论”，而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仍在考虑红军能否“坚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现在是在到秋季的问题。要清楚地意识到，中央苏区过去和现在不只是处在军阀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一般包围之中，而且特别受到由得到帝国主义支持并在使

① 指 M. 施特恩提出的中央苏区红军基本力量向湖南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突破，以打击从北面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的侧翼和后方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遭到了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反对并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拒绝(见第 218 号文件)。

② A. 埃韦特。

③ 指 1933 年 7 月至 8 月间根据 M. 施特恩的建议由专门组成的东方军向闽西采取的作战 M 行动。

用新的战术的大量敌军和数千碉堡防御工事等构成的牢固军事包围圈的扼制,但是必须明确声明,这样的机会主义观点(如上述“方针”)、这样的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投机行为是不能允许的。国统区在开展保卫和积极支援红军和中央苏区及争取苏维埃革命在一省或几省取得发展和胜利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上述观点和行为只能导致并且实际上已经导致了对这种群众性革命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的削弱。

(3)这把我们引导到了主要方面,因此我想赋予其特殊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应该意识到,造成中央苏区目前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军事形势和江西、福建地区暂时遭到重大挫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党在非苏维埃地区,特别是在主要工业中心城市和工业领域,首先是由于群众工作做得很不够而没有能力在最近一个时期发动强大的群众性运动,来积极支持和保卫中央苏区,并给予国民党帝国主义的第六次讨伐行动以毁灭性的打击。

从顺利地组织和领导罢工运动、农民革命斗争或反帝运动并把群众在具体问题上的日常斗争同粉碎第六次讨伐行动结合起来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否认清了群众保卫和帮助红军和苏区的迫切重要性了呢?为了扩大苏区和建立新的苏区,必须从总体上强调指出,苏维埃革命与非苏维埃地区群众运动的巨大脱节,以及党落后于国统区的革命运动,包括党没有能力防止或阻止敌人调运军队、装备,以及兵力动员等,加之党内“流行的”固定看法(什么既然红军和苏维埃群众粉碎了第五次国民党讨伐行动,他们肯定也会粉碎第六次讨伐行动),构成了决定江西目前结果的主要因素之一。举一个例子,如关于在非苏维埃地区的怠工和破坏行动问题。除了奉[中共]中央之命或在其直接领导下沿边界或在中央苏区附近实施的袭击和各种游击行动外,还有一个事实是,在从第六次进攻开始时起(到1934年6月1日)的近一年期间,党、赤色工会和其他组织没有能力阻止发出哪怕一列火车、一艘舰船或一架飞机

去反对中央苏区,由于轻视和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满意,没有能力阻拦敌人从北方向江西、从上海向九江、从上海向福州、厦门地区、从杭州向南昌等地运送国民党军队和军人装备,哪怕是五分钟。我认为,很明显,党在非苏维埃地区,特别是在工会工作方面和领导罢工运动方面的群众工作水平比较低,加之不善于把争取日常经济政治要求和需要的斗争,同日常有步骤地组织、动员和领导工人、农民和劳动群众保卫苏维埃运动、保卫红军和保卫苏区的工作结合起来,这不仅是整个党的主要弱点之一,而且也是促进江西目前军事形势不利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为迅速和彻底克服这个因素,党应该竭尽全力,并且已在竭尽全力。

二

1. 必须就建立中国人民民族防御协会^①和扩大在党的领导下的反帝民族革命战争问题上几句。从收到由王明和老板^②签署的含有关于这项工作的指示和建议的第二封信^③时算起,到这个月(6月)已有半年时间了。在这重要的6个月期间,广大群众反帝情绪特别是反日情绪,以及憎恨和革命义愤令人难以置信地高涨和激烈起来;在这6个月期间,顺便说一下,满洲、察哈尔和北方等地的革命游击战争扩大了。在这十分有利的客观形势下,取得了怎样的进步呢?上述这些专门的建议在怎样的程度上得到了贯彻执行和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呢?从扩大和加强具有反帝情绪的工人、士兵、农民、学生和其他团体、委员会和组织的统一战线角度来看,或者从党组织和领导具体的反日行动和其他群众性民族革命行动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形势,除了满洲东南部和湖北北部的游

① 原文如此。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② 康生。

③ 指王明和康生1933年10月27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见第182号文件)。

击行动有发展外,实质上与6个月以前的形势一样:处在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水平上。

例如,今天,即6月初,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人民民族防御协会至今还在形成过程中。在上海,王明信中提出的宣言稿^①约收集到2000个签名。由15人组成的临时执行委员会^②,是为了领导建立组织工作和开展群众工作成立的,但还没有开始运作。暂时有不多于5%的签名者组成了积极的反帝团体或委员会;连一个宣言也没有发表或者散发,没有实行任何群众性措施;特别重要的是,在建立中国人民民族防御协会过程中,目前首先特别重视的是非无产阶级、非农民和非士兵群众。

造成这种危机形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党没有切实迅速地利用日益增多的机会来建立中国人民民族防御协会和其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和首先来扩大反帝民族革命运动并把它提到更高的政治水平上呢?这种反帝民族革命运动的扩大是不均匀的而是自发的并且具有新的动力。我认为,这里有一些相互关联的原因,其中:(1)对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宗派主义运用,暂时在群众工作的多数阶段占据优势(向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成员、白军士兵、无党派反帝学生和其他人中的渗透和在他们当中坚持进行的反帝工作,进行得缓慢并且不坚定)。(2)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等的斗争,总的来说,不仅还没有完全打下基础,或者没有紧密地和令人信服地同争取工人、农民和劳动人民的直接的非常重要的阶级要求结合起来,而且也没有在此基础上得到充分的发展。(3)不善于利用没有解决事件、众人关注的问题,未在“紧张”时刻加强所有群众性统一战线行动,成立中国人民民族防御协会和动员群众进行具体的反对帝

① 指《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见第116页注⑥)。

② 可能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

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行动(例如,直接在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典礼^①之前和进行的时候;同时紧随日本外务省发表四月“不许干涉中国!”声明^②之后;在不久前从北方撤出张学良的10个补充师^③的时候等)。(4)王明信中提出的积极批评,涉及广泛运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政策问题,实际上在多数场合被歪曲了;至今不是利用而是^④……,并依靠倡议和动员具有反帝情绪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学生(实际的中国人民民族防御协会组织,太多是从统计角度说的)收集多少和多么多“有影响的”签名,而不是从建立广泛的、积极的、有首创精神的反帝统一战线团体和委员会系统,以筹备和建立中国人民民族防御协会和开展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有战斗性的群众运动的角度来对待这项活动,而群众运动的大胆开展,特别是通过发动各种群众性反帝统一战线行动,将能够为其进一步有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并将成为不断发展在我们领导下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一种手段)。(5)对国民党加强了蛊惑宣传和谎言,即同它的“民族复兴和剿共”、“新生活运动”^⑤等政策有关的论调的揭露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是抽象的和系统的。与此同时,对整个群众工作的认识很有限,也很一般,整个群众工作和群众行动同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本问题联系不够。(6)除了向省里寄几份通告外,很迟缓也很不愿意在北方、在广东和在长江上的中心城市努力推动中国人民民族防御协会的建立,借口是等待“先”在上海建立巩固的基地。

鉴于这些不足和倾向,我认为,不仅可以理解为什么最近党的

① 见第32页注④。

② 见第116页注④。

③ 指张学良调部队到华中交由同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总司令部调遣。

④ 下面几个手写字体不清楚。

⑤ 旨在复兴和宣传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礼、义、廉、耻)的文化思想运动。1934年2月由蒋介石发起,持续到中日战争爆发。

群众工作和它对反帝民族革命运动的直接领导(而不是影响)总的来说还处在不能令人满意的水平,而且也可以确定,为了迅速实现必要的转折,应该做什么。

※ ※ ※

鉴于必须立即把这个札记寄给转寄它的同志^①,时间不允许我更详细地阐述一些其他方面,特别是涉及工会一些问题的方面,以及涉及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筹备总罢工及其口号等问题方面。关于这些问题存在着一定的意见分歧,因而对开展工作是有影响的。因此下面我从上述批评意见的角度对我们局(远东局)的工作和责任问题提出几点看法,以此来结束这个札记:

如果根据我在第一、第二两点中提出的意见作出结论,认为[中共]中央或它的上海局对所说的形势负有全部责任,那是不对的。远东局(我们局)应对上述弱点,特别是在群众工作方面和国统区党、赤色工会等组织状况方面的弱点负有很大部分的责任。总的来说,我们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对省委和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和工作任务给予真正系统的关注。例如,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们局90%的时间和工作都只是研究江西、福建地区的特殊军政形势;在我们局“发现”上海党员人数从3000多降到500之前,九个月时间(从1933年1月到11月)过去了;在没有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同志研究总工问题和1933年12月的反战反国民党计划的其他方面之前,我们局自己没有研究过这项工作问题;在一年间,我们局一次也没有详细讨论和采取措施来检查和帮助中国共青团的工作;一般来说,党的组织问题实际上被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并常常是处于“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外”,为使我们自己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我们在尝试帮助、指导和监督党的建设和巩固工作,等等。

^① 何人不知。

※ ※ ※

虽然可能我应该早谈这些问题,但现在我要使你相信,我在这里一直提出和坚持要解决这些问题。无论如何我相信,上面所谈的“印象”中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能够被以什么形式用来加强这里的工作,包括我们局的工作,这是迫切需要的。当然,你认为怎么合适你就可以怎么利用这个札记的任一部分或者全文。

致最良好的祝愿和友好的问候!

米尔顿^①

附言:至于我嘛,如果你和同志们有机会(如果不是经常的话)能给我寄来有你们的观察和建议的札记,即使是非正式的和“非官方的”,那我是非常感激的。这对工作肯定是有好处的。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116—119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① T. 赖安。

26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 381(B)号记录

(摘录)

1934年6月8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4.(6165)——中国问题。中共关于经费支持的请求^①。

决定:4.——从未付中共款项中和从1934年后备基金中寄去10万卢布。

责成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根据交换的意见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稿^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294, 第 3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可能指中共中央 1934 年 5 月 28 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电报中请求提供 100 万墨西哥元的援助, 用于购买药品和军服(见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61 <1934 年收文>, 第 132 页)。

② 文件没有找到。

262

红色工会国际国际联络部^①给贝克的电报

1934年6月13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贝克。通过我们通知您的那位朋友^②，您将收到1万元^③，其中2705元给您用到年底，6050元用于工会工作，还有1245元的后备金也用于工会工作。请确认收到款项。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47(1934年发文)，第148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发报者是根据电报内容确定的。
 - ② 文件没有找到。何人不知。
 - ③ 未说明货币名称。

26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4年6月16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致代表^③，转[中共]中央。

1. 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④。争取保存中央苏区的前途，是与在外部地区、在交通线上和在靠近敌人设防地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这样大规模地开展游击运动，在苏区内，机动能力非常有限的军队的处境，到今年秋季敌人发动新的攻势，作出最后努力来突破苏区的防线时，就会发生危机。但是在夏季，红军若竭尽全力，是能够采取主动把业已形成的不利形势改变为有利的。为此，必须完成两项任务：(1)为防备不得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2)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现在四省边境地区就有可观的游击行动和第10军的核心力量。这次战役，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对

① 文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4年6月15日会议上得到批准(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95,第5页)。

② 密电译出的日期。

③ A. 埃韦特。

④ 文件没有找到。中共中央计划的某些原则见第259号文件。

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扩大从福鼎到鄱阳湖的游击区,是在中央苏区军队面前可能出现的任何选择中的最重要任务。

2. [即使]考虑到目前的战线防御有暂时被削弱的风险,我们还是建议随第7军之后再投入三个师,它们绕开敌人战线行进,如沿着经过尤溪的中心线前进,然后向北,以便深入敌后以果断的行动切断现在从沙县、建宁扇形地区进攻中央苏区的敌集团军的交通线。在7、8月间,这个军团独立作战时,不要去占领敌人的堡垒,可以同第10军和北面的游击队一起给敌人的整个战线造成这样的威胁,使敌人不先尝试消除这个新的威胁,就不能下决心投放力量进攻中央苏区。

3. 归根到底,即使秋季战斗结局不利,我们在中国东南部还有三个主力作战集团军:(1)由7、3、10军团组成的、在目前的中央地区东北部活动的集团军;(2)留在中央苏区进行游击战的集团军;(3)在湘赣边境上的西部集团军,这个集团军将包括撤到那里的中央苏区部队,还有6军团等。

4. 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

需要在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十三次全会决议^①和中共五中全会决议^②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做解释工作,说明斗争的前景和目前的困难,以及红军采取灵活策略的必要性,其目的首先是要保存有生力量和为其发展和加强创造新的条件,以便在有利的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提纲和决议)》,莫斯科1934年。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23—79页。

时机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展开广泛的进攻。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47(1934 年发文), 第 150—154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26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4年6月17日于莫斯科

政治委员会致上海

1. 在最近的电报中,我们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开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的措施^②。随着部分部队返回东部,我们也考虑到通过中国东南部和通过长江同红军保持联系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福鼎,也可以通过湖口、彭泽(鄱阳湖北面的港口)以隐蔽的方式从外面提供弹药和药品。

2. 请从苏区和从上海经意大利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或者军阀代表处寻找联络途径,以便通过最经济和最可靠的途径购买和提供弹药。你们能否为此建立自己的隐蔽的中介公司?请尝试通过这些公司出售四川红军有的商品,为中央苏区换取武器。

3. 请让你们的特科采取各种途径去努力瓦解敌人的部队,包

① 文件于1934年6月17日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成员(И. А. 皮亚特尼茨基、Д. З. 曼努伊尔斯基、Б. 布龙科夫斯基、王明、Б. Г. 克诺林)飞行投票被通过并在政治委员会1934年6月21日非常会议上被批准(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95,第153页)。

② 见第263号文件。1934年7月,根据这个建议,中共和红军领导向福建北部派遣7军团,名为“抗日先锋队”,任务是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的战线后面开展游击运动和在闽浙赣皖边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括收买某些环节的指挥人员。这将是供应红军同时也是削弱敌人的最近途径。针对日本人在东南部的侵略行径,要把这项突击性工作同政治宣传运动结合起来。

4. 在福鼎地区发展广泛的游击运动可能引起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直接冲突,在我们巧妙利用这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促使白军士兵群众转到我们方面来。

5. 请经常通报形势和购买武器药品的情况。我们已开始根据中央的请求暂时给你们寄去一半费用。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47(1934 年发文), 第 165 页。

打字稿, 原件。

265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和阿布拉莫夫的电报

1934年6月26日于上海

艾尔文^①致米哈伊尔^②和阿布拉莫夫

很难找到必要的时间向你们说明必须暂时中止同斯拉文^③联系的原因。

1. 哈格尔^④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同党的联络人,因为他同来自菲律宾的日本同志有联系,而将来他将同其他党和同信使有联系。

2. 他未充分做好准备就要讨论地下组织活动问题。鉴于无论是你们的代表^⑤还是其他同志都没有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注意到目前形势的极端严重性和党的一定的弱点,我感到自己作为党员有责任帮助我们的朋友,哪怕是一点点。

在你们的电报^⑥中以及来自江西[中共]中央的电报^⑦中,提出了购买和运输药品、子弹和飞机问题、破坏工作和瓦解白军工作,以及大笔开支问题。这需要认真而很周密的准备,制定灵活的

① H. H. 格伯特。

② H. A. 皮亚特尼茨基。

③ 李竹声。

④ 何人不详。

⑤ A. 埃韦特。

⑥ 见第 245、255、258、264 号文件。

⑦ 文件没有找到。

计划,这个计划可以根据前线的条件和封锁线的变化作改变。我怀疑,是否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在这些场合,党表现出许多弱点。福建事件表明,技术准备薄弱,对事件的政治意义估计不足。无论是购买和运输装备的机会,还是瓦解 19 军和其为数不多的士兵转到红军方面来的机会都没有完全利用。

党的联络组织薄弱。由于联络系统太复杂,我们经常丢失我们的同志(来上海的同志有一系列的例子^①)。这个联络系统应作改变和加以简化。党内的联络问题,可以说也是一样。每次暴露都应该带来深入研究组织系统和作出相应修正的结果。如果说党的一个秘密接头住所暴露导致几乎所有其他住所都暴露^②,这就表明联络系统不好。只有认真研究暴露的原因,才能有效地同奸细作斗争。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121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见第 267 号文件。

② 指 1934 年 6 月中共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的一系列暴露,结果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许多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当时的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

26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
际联络部给格伯特的电报^①

1934年7月1日于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在1934年每月应该收到7418金元,重复一遍7418金元。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47(1934年发文),第185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发报者和收报者是根据电报内容确定的。

267

赖安关于中共领导人被捕一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4年7月3日^①于上海

绝密

对最近被捕事件的意见^②

致东方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

党的委员会和上海、河北、四川、福建等地领导积极分子的暴露和被捕人数的日益增多，特别是不久前由于斯拉文^③和另16位同志被捕^④，党遭到的沉重打击，十分尖锐地向党提出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更加强了一个突出的任务，这就是反恐怖反奸细问题。我在这里不准备全面研究这个问题，但我可以谈一些意见。

1. 我认为，如果拿上海作例子，必须承认，由于最近的被捕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党的工作联系和一些工作方面暂时的遭破坏，党蒙受了巨大损失，这不仅是（虽然也主要是）政治反动派得到加强、叛徒活动增多、公安委员会和外国情报机构采用了新的变化了的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9月10日。

② 文件上有批注：送给了王明同志，看了所有这些意见并转给了康生同志。王明1934年9月10日。

③ 李竹声。

④ 指1934年6月14日以李竹声为首的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人及上海和江苏省党组织工作人员被逮捕事件。

侦察方法所致,而且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由党的工作的保密安排和组织方法有严重缺点和漏洞造成的。再有,这是在群众面前揭露奸细不够、同奸细行为作斗争不够和同其他基本任务联系在一起的保卫党的群众性政治宣传运动的规模根本不够大的结果。可以指出这样一些弱点,如党的领导系统过于集中;各机关和党的领导委员会的职能同专门技术机关的职能的结合是表面的,没有先例的;粗暴破坏最起码的保密规定(文件、档案和住所地址的保存,两个和更多的领导同志在一个住所居住,等等);不善于深入研究和使全党(包括基层党组织)了解敌人的方法,同时作出如何同敌人作斗争的具体指示。

2. 作为对党应该和能够实施的决定和措施的补充(而且在这里我们局^①能够也应该给党以帮助),为了加强反恐怖和反奸细的斗争,必须做以下工作:必须对最广大的群众实行反恐怖的政治动员,将其视为反六次“围剿”^②和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有机部分;分散管理和大大改进党的技术管理机关,以及党的领导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加强干部的教育、提拔和调动工作;提供基层、州、地委员会,而首先是党支部的主动性、政治领导水平和独立活动能力;在这场斗争中更广泛地利用报刊;向群众揭露所有叛徒和奸细,并采取措施制止他们的进一步活动,等等;我特别建议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个部就上述问题给党去一封信,最好是除了去信以外,还有王明同志的一些文章。这样的文件现在会具有任何时候都不具有的巨大意义。

3. 最后,必须让你们知道,我们局(在2月?^③)对出现的局势作出的反应不够迅速,对反恐怖斗争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总

①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②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③ 原文如此。

的来说,在解决这些任务时很少给党以实际帮助。再有,必须十分坚定地声明,你们的代表^①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他对有步骤的组织工作估计不足,他从前同托洛茨基分子艾萨克斯有联系并保护后者,多是保护他粗暴地和不止一次地破坏保密规定的行为,今天他还以机会主义的“借口”保护这种行为,说什么“为了做工作”这些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大家,其中也包括我,都不是始终严格坚持保密规定的)——所有这一切对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干扰了党,而不是帮助党。

米尔顿^②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125—127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A. 埃韦特。

② T. 赖安。

268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4年7月3日^①于上海

绝密

艾尔文^②致米哈伊尔^③。

共有17位同志被捕,其中有4名妇女,名字不详,因为同许多部门的联系已中断,而且组织的副书记^④以及许多负责联络的同志也被捕了。被查获的东西有:通过冈斯^⑤妻子收到的你们(?)^⑥的邮件,其中有王明关于代表大会日期^⑦的秘密信件等、政治报告和鄂豫皖军事计划、北方(北平)军政工作计划、中国国统区三个月工作计划、党在工会中和几乎在所有省份青年中的工作计划、党三年半来的指示和决定^⑧、护照和许多报刊(?)、代表名单^⑨。不太可信的是,其中也有您最近关于军政形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⑩。

简单谈谈我们对暴露原因的看法: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7月5日至7日。

② H. H. 格伯特。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④ 可能是李竹声。

⑤ 何人不详。

⑥ 这里和下面,原文如此。

⑦ 文件没有找到。指共产国际七大召开的日期(见第61页注④)。

⑧ 看来,这里讲的是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文件。文件没有找到。

⑨ 可能指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名单。

⑩ 可能指第263号文件。

第一,中央与江苏省委的直接(?)联系和江苏省委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等单位的直接联系遭破坏。

第二,可能对我们现在才知道的斯拉文^①同米茨凯维奇^②和宣传鼓动部部长^③居住的房屋有监视。

第三,可能有奸细,但这很难确定,可能太集中了,同特科的联系中断,该科工作薄弱。

第四,从斯拉文方面来说,没有任何警觉性,对另两个想进来的同志没有发出发生情况的任何警告信号。除了我,党不想同其他同志保持联系,虽然他们认为我也不能在这方面给他们以帮助。您的代表^④将于[1934年]7月7日取道海参崴离开这里。对密码、全部指示、有损声誉的文件等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一旦我们发生问题,您的声誉也不会受到损害。需要竭尽全力挽救党。我们同一个人保持联系……暂时是宣传鼓动部^⑤。一旦他被捕或米茨凯维奇被捕,我们将同斯拉文的妻子^⑥保持联系。她很少为人所知,斯拉文没有同她在一起居住。她懂上海话,不知道(我们)名字,或者我们将同其他同志[保持联系],以便不失去同苏区和中国党(?)电台的联系。斯拉文不会讲什么,他们将迅速同他断绝一切联系。我们近期的工作计划是:第一,恢复同特科的联系,逐步恢复同其他单位而首先是联络点的联系,特别是同满洲联络点的联系,以便有可能派出代表。

在六天内,应从苏区来六位同志。我们不知道哈尔滨的秘密接头处是否暴露,不过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对它们进行改组。

① 李竹声。

② 盛忠亮。

③ 可能是黄文杰。

④ A. 埃韦特。

⑤ 原文如此。意思是:同宣传鼓动部部长。

⑥ 何人不详。

第二,在深入研究最近的暴露事件^①和很难恢复的联系之后,要在我们所处的新的水平(?)上同江苏建立联系。由于处境艰难,我不能在一周间收到或发出两次以上的电报。在失去秘密接头住所的情况下,工作要求延缓作出答复。请为了您的平静(?)研究一下我们所处的这种特别危险的局势。请告知您的决定。(库尔特)^②。7月3日。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61(1934 年收文),第 95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见第 267 号文件。

② H. H. 格伯特。

269

赖安给米夫的信

1934年7月3日^①于上海

亲爱的米夫同志：

同中国同志一恢复工作联系，我就把很大注意力用到组织问题上，特别是巩固和建设党的问题上，同时要与反帝工作和工会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您和同志们同意这样做，也许最好把此事通报给党。这样的正式确认可能显得不那么重要，特别是在收到共产国际^②最近明确规定了我的工作范围的电报^③之后。然而这是必要的，或至少是合适的，因为不久前艾尔文^④已向您作出通报，说您的代表^⑤没有正确地向中央^⑥通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委托给我的任务。同时他官僚主义地歪曲了您以前的指示，其中顺便还说：“米尔顿^⑦应仍由代表支配……”^⑧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1，第 44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 1934 年 9 月 10 日。

② 可能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H. H. 格伯特。

⑤ A. 埃韦特。

⑥ 可能指中共上海中央局。

⑦ T. 赖安。

⑧ 文件没有找到。

270

赖安关于艾萨克斯的声明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4年7月3日^①于上海

关于艾萨克斯[1934年]5月20日的“声明”

致东方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将从这一邮班收到原《中国论坛》编辑艾萨克斯的声明^②。没有任何必要在这里评论声明的实质，或者指出这一反革命文件的目的，这从内容本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但是我应作出以下说明：

1. 在最近一年间，你们的代表^③始终对这个托洛茨基分子艾萨克斯和对《中国论坛》杂志实行机会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不顾很明显的事实，即艾萨克斯过去和现在都是托洛茨基分子，他极力利用刊物及其读者群从组织上加强中国的托派运动，你们的代表未经[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允许，未经我们允许，自冒风

① 日期是根据第267、269号文件确定的，因为这封信是与这些文件一起随一个邮班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

② 原文如此。指Г. 艾萨克斯给中共中央的信，见H. R. 艾萨克斯：《我与中国斯大林主义者断绝关系》，载《新国际》，纽约1934年第1卷第1期，第76—78页。

③ A. 埃韦特。

险,在很大程度上把整个公开的群众工作和原中国民权同盟^①、鲁格保卫委员会^②、反战会议^③等的技术事务管理机关都集中在艾萨克斯手中。当上海中央局、我们的朋友和我开始坚决反对艾萨克斯和反对刊物的方针时,你们的代表站出来保护艾萨克斯,借口是“艾萨克斯是个诚实人,他从不叛变革命”等等。你们的代表坚持要同他保持“友好的”工作关系,甚至指示我同艾萨克斯会面。这样的会面在2月份有两次,后来我拒绝执行这种指示。

2. 最终,在[中共]中央和我们局^④的压力下,你们的代表表面上开始同艾萨克斯作斗争,他这样做是机械的,事后才告知[中共]中央和我们局。这一年3月《中国论坛》停止出版后(本来在我们确定的条件下,在史沫特莱或另一个什么人到来之前是可以避免停刊的),你们的代表继续同艾萨克斯会面,付给他500美元,似乎艾萨克斯将这些钱用到了印刷设备上,你们的代表保卫鲁格运动的领导权留给了艾萨克斯,继续相信这个托洛茨基分子的“诚实”和他把印刷设备转交给党的“承诺”。只是现在,在艾萨克斯发表“声明”和卖掉印刷设备并把得到的钱转给当地托派之后,你们的代表才“承认”,“艾萨克斯最终成了敌人”等等。有些迟到的“承认”是为了不再谈这件事。

我认为,你们的代表对艾萨克斯和与此事有关的政治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只能说是恶劣的自由主义机会主义,是完全缺乏布尔什维克式的警惕性,基本上是朱尼斯(?)^⑤的工作特点。同时我也

① 原文如此。应为:中国民权保卫同盟。

② 指1932年为解救1931年被捕的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分部工作人员Я. М. 鲁德尼克和И. Н. 莫伊谢延科-韦利卡娅夫妇而成立的委员会,这对夫妇是以鲁格名字进入诉讼程序的。

③ 指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大会于1933年9月30日在上海举行。

④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⑤ 原文如此。应为:吉姆,即A. 埃韦特。

应在这方面作出说明,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我不同意弗雷德^①的观点,特别是你们代表的观点,我犯了一个错误,即我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和建议限定在我们局的范围内了,我本应该把这些问题提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面前。

米尔顿^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128—129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M. 施特恩。

② T. 赖安。

271

雷利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便函

1934年7月3日^①于莫斯科

致皮亚特尼茨基同志^②

我们认为,需要向艾尔文同志作出以下答复:

在译电员^③到来之前(他已经动身,将不晚于8月1日到达艾尔文处),艾尔文不应同中国同志进行任何会面,在译电员到来并分配(密码、电台)工作后,可以让艾尔文在我们委托他向斯拉文^④同志本人转达什么的时候同斯拉文同志会面。

关于最后一点,您,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不久前给艾尔文同志发去了指示^⑤。

艾尔文同志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应同邻居^⑥会面。我们已本着这种精神给艾尔文同志发去了指示。

在中国国内建立运输武器的站点之前,艾尔文同志不应本人或通过自己的同事接触这件事。在这里,艾尔文只能从旁观察和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批示:雷利斯基同志。根据最近的暴露事件,需要给艾尔文(H. H. 格伯特)发电报,让他十分小心,并有附注:已阅。雷利斯基。(1934年)7月7日。

③ 何人不知。

④ 李竹声。看来,文件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不知道他在1934年6月被捕的时候准备的。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 指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国部的工作人员。

告诉我们发生的情况。

关于党内联系问题也一样。

如果我们机构的领导人将为中国同志建立机构,那是于事无补的,并且我们的机构将会大暴露。

雷利斯基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122 页。

打字稿, 副本, 亲笔签字。

27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处务委员会会议第9号记录 (摘录)

1934年7月4日于莫斯科

听取:1. 中共五中全会^①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②结果(报告人:王明)。

决定:1. 到8月底要准备好以下文件,这些文件应同中共出席七大^③的代表进行讨论,然后作为材料发给中共中央:

- (1)一般政治的(负责人:王明同志)^④,
- (2)关于满洲组织的任务(负责人:马季亚尔同志)^⑤,
- (3)关于工会工作(负责人:琼森同志)^⑥,
- (4)关于党的建设(负责人:康生、切尔诺莫尔季克同志)^⑦,
- (5)纲领草案(负责人:米夫同志)^⑧。

主席:П. 米夫

① 见第32页注②。
② 见第32页注③。
③ 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④ 见第283号文件。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 文件没有找到。
⑦ 文件没有找到。
⑧ 文件没有找到。

全宗 495, 目录 154, 卷宗 531, 第 73—74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273

王明和康生给盛忠亮的电报^①

1934年7月10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王明和康生致米茨凯维奇^③。在上海恢复我们的领导机关后,我们建议:

1. 江苏省委和省青年组织^④暂时从上海迁到该省另一个合适的城市。
2. 在上海成立由3到5名成员组成的市委,不下设任何机构,它应通过省委而不是直接与[中共]上海中央局取得联系。
3. 上海的主要工作重心放在地委身上,地委应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并尽可能分散,相互不直接进行联系,而只通过市委。
4. 认真审查和挑选干部,特别是为[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技术单位挑选干部。这是我们从暴露事件中得出的初步结论,旨在从组织上进行改组,使我们能够把[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同省委和地委分开,把工作分散,避免由于某一环节暴露而发生更大的暴露。请把我们这些建议寄给[中共]中央审批。我们希望[中共]中央批准这些建议,为了在得到答复前不丧失时机,我们认为,你们现在就应该着手进行所建议的改组工作,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刻贯彻执行

① 文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4年7月11日会议上得到批准,批文是:批准并以王明和康生名义发出(见全宗495,目录4,卷宗298,第4—5页)。

② 加密日期。

③ 盛忠亮。

④ 指中国共青团。

这些措施有重要意义,哪怕是暂时这样做也好。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7(1934 年发文),第 198—199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274

赖安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

1934年7月14日于上海

致[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意见^①

敬爱的执行局成员：

寄去以下建议供你们审议：

1. 我们曾建议[中共]中央就不久前发生的逮捕事件^②发表声明和号召^③，作为对声明和号召的补充，特别是为了克服可能出现的任何恐慌或投降主义倾向，为了得出必要的结论，加强反恐怖和反奸细斗争和改进所有党组织的秘密工作方法，最好是向有联系的省委，特别是这里和湖北，发出关于这些问题的专门信件和口头指示。我们强调，同时应该采取具体步骤，来分散党的领导系统，加强支部和基层党委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改进和（在需要的地方）改组各技术和专门机构的工作，等等。在这方面，每个党委都应该准备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从组织上和政治上更牢固地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地问题上。这是与完成党的三个月工作计划^④联系在一起的
中心任务。

2. 应尽全力加强中国人民全国武装防御协会^⑤领导机关的工

① 文件上有批注：列入机密中国文件。И. 米夫。（1934年）9月13日。

② 见第267号文件。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文件没有找到。可能指中共上海中央局起草的工作计划。

⑤ 原文如此。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作和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特别是在上海和湖北。应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人民全国武装防御协会宣言^①的广泛传播,特别是在铁路、海洋运输、纺织企业工人当中和士兵当中,在士兵当中及在工厂、铁路、码头、农村和学校建立积极的反帝统一战线斗争委员会,根据我们最近的决定和工作计划广泛开展具体的反日和反国民党的群众性统一战线行动。可能的话,不要像最初计划的那样,8月份在上海举行中国人民全国武装防御协会全国代表会议,而应准备先在上海和北平召开地区或省代表会议。中国人民全国武装防御协会省级委员会也应起草和发表关于新运价表、恢复北方铁路运输等的简短公开声明。

3. 长江中游省份的毁灭性干旱和北方的水灾,使我们必须在工作联系一恢复,就向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工作的可能性和党在面临大范围闹饥荒情况下的迫切任务的专门指示。党组织应该向民众说明并使他们相信,饥荒和群众的贫困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主要是国民党一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特别是由于大量的军费开支和旨在消灭工农红军和苏区的讨伐行动而被大大加重了。在上海和其他工业中心城市,党和赤色工会应该广泛展示示威游行、街头和工厂集会、罢工和群众性哄抢商业仓库和日本仓库的大米和其他粮食储备等方式的群众运动,要求立即救济失业者及水灾和饥荒的受害者,增加大米配给量,支付与大米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提高相适应的更高工资,要求市政府随时和无限制地供水等等。在农村和县城,首先是在三个月行动计划中挑选出来开展党的工作的那些中心城市,应该组织示威游行和群众哄抢绅士、商人和军阀的大米和粮食储备的行动。这种行动应该同抗捐抗租,要求为农民和农业工人分配收成的斗争和同主要的夺取土地的斗争紧密

^① 指1934年7月12日的《抗日宣言》,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北京1989年,第365—369页。

地结合起来。在白军士兵中的专门工作措施,也可以从成立普通士兵中的行动委员会开始,开展反对再次减少大米供应,反对利用军队镇压“米”暴动,反对夏季军训和反对从北方向华中、向江西调动军队来同红军进行反革命战争等等的斗争。所有与反饥饿斗争以及与主要工作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实施的行动,都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反对第六次“围剿”^①和国民党、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取积极支援和保卫红军和苏区的斗争的一部分。

4. 请把你们想让我们起草或参与起草的任何信件、宣言和文章告诉我们。此致

敬礼

米尔顿^②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131—132 页。

英文手稿。

①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② T. 赖安。

27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国际联络部给格伯特的电报^①

1934年7月20日于莫斯科

绝密

给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国分会拨出17420荷兰盾,重复一遍17420荷兰盾。这相当于7200金元。拨给后请电告。

答复您第269号电^②。请兑换马克。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47(1934年发文),第210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① 发报者和收报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没有找到。

276

中共上海中央局、盛忠亮和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4年7月25日^①于上海

绝密

中共上海中央局、米茨凯维奇^②和艾尔文^③致米哈伊尔^④。

我们又给苏区寄去5万墨西哥元。到9月中旬还需要寄40万墨西哥元,重复一遍,40万墨西哥元,因为晚些时候,看来几乎没有机会了。我们还可以每两周寄去9万墨西哥元。兑换荷兰盾可能要有2.75%以上的损失,但不是马上兑换。请把钱寄来。7月25日。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61(1934年收文),第58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7月28日。
② 盛忠亮。
③ H. H. 格伯特。
④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27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
治委员会会议第 392(Б)号记录**

(摘录)

1934 年 8 月 3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28.(6386)——埃韦特同志关于中国形势的通报。

决定:备案待查。责成埃韦特同志起草包含具体建议的详细报告,并召开政治委员会专门会议讨论问题^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302,第 8 页及其背面。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280 号文件。

278

盛忠亮致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4年8月10日^①于上海

绝密

米茨凯维奇^②致米哈伊尔^③。鉴于您的代表^④已经动身离职，我们觉得有必要报告我们对他的工作的意见。第一，总的说来，尽管他在自己的留驻期间遵循了共产国际的路线，[然而]他常常犯一些很严重的错误，例如，在对福建事变^⑤的评价上，他认为，第三党^⑥和社会民主派^⑦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他未经允许就擅自以[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名义发表对记者的谈话^⑧，在谈话中他对许多问题的阐述都是与党的意见背道而驰的。

第二，他背叛[?] ^⑨了中共五中全会^⑩的决议案，没有提出“中国起义^⑪处在危险中”的口号，低估了[中共]四中全会以来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第三，他对于《中国论坛》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警惕性，甚至当[它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8月15日。

② 盛忠亮。

③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④ А. 埃韦特。

⑤ 见第84页注④。

⑥ 见67页注①。

⑦ 曾经参加福建发动的一个政治团体。

⑧ А. 埃韦特以“中共领导和负责成员”名义同记者的谈话，见《共产党谈对福建的看法》，载《中国论坛》第3卷，上海1933年11月30日，第1—3页。

⑨ 原文如此。

⑩ 见32页注②。

⑪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中国革命。

的]编辑^①被揭露[为托洛茨基分子]后,他还在区分托洛茨基分子和诚实的人^②,没有采取措施组织出版党的……^③《中国论坛》。第四,他在对农民地区和[敌人]后方的苏维埃运动的评价上得出了悲观主义的结论,低估了苏维埃运动对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性。他还试图以同样的理由来解释鄂豫皖苏区所遭到的暂时失败。在一位勇敢的[?]^④同志去年所写的并为您的代表所赞同的一封信^⑤中,明显地表现出悲观主义的和取消主义的情绪^⑥。在大多数关于军事问题的指示中,他都没有向中央苏区作出政治性的指示。第五,他对在中国国统区的工作不感兴趣,工作无任何计划,没有给予国统区工作以政治上的支持,特别是在组建党的问题上。他为青年^⑦什么都没有做,也不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所以,我们觉得,你们代表的工作并不是很令人满意的,我们希望,您尽快派一位政治上强、具有丰富的实际组织工作经验、懂俄语的代表来。我们的意见与波戈列洛夫^⑧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在他的电报中说了一些真正婉转恭维的话^⑨。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61(1934 年收文), 第 43 页。

法文打字稿, 原件。

① Г. 艾萨克斯。

② 原文如此。看来,是指埃韦特的意见:艾萨克斯虽然是托洛茨基分子,但他是个“诚实的人,永远不会背叛革命”(见第 270 号文件)。

③ 以下文件中有遗漏。根据意思应为:在党的监督下。

④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军人。

⑤ 指的是 M. 施特恩写的信。

⑥ 见第 205 号文件。

⑦ 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⑧ 秦邦宪。

⑨ 文件没有找到。

279

赖安同志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

1934年8月13日于上海

致[中共]上海中央局各位委员

亲爱的同志们：

1. 据十分可靠的消息，在浙江，由于进行反饥饿斗争，引发了强大的革命农民运动，在许多乡村和县城，伴随着农民运动发生了群众性的抢米风潮，在地方当局和[国民党]党部的门前举行了群情激昂的示威游行，并发生了捣毁这些机关的行动，甚至发生了与警察和军队的越来越高涨的武装斗争。鉴于[中共]中央可能不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应当把这个情报报告给中央苏区，所以迫切需要迅速地行动起来和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形势所提供的机会。既然已经清楚，这个运动，正如报道的那样，在浙江中部和西南部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那么它就会为这些地区建立新的苏区和游击区，为浙江和江苏北部之间沿铁路和军用道路的各种游击运动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加有利条件。

赣东北和闽北苏区能够做和将要做的工作，是向浙江派遣干部和游击队等等，作为补充，[中央]上海中央局也应该采取措施，从江苏抽调几位同志派往浙江中部，特别是派往那些农民运动最激烈和为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创造了最多和最有利条件的中心地区。为了争得领导权和扩大正在发展的群众性农民运动和游击行动（这些运动和行动是在发生严重旱灾的地区，特别是在安徽西南

部、湖北中部和东北部以及河南南部地区,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还应该根据七月建议^①对安徽、湖北及河南党委作出补充性的指示并给予帮助,以便建立新的游击队根据地和苏维埃根据地,以及协调这种运动与抗日战争的关系。

2. 关于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②的工作及与此有关的问题的几点意见。

(1)在上海、天津、北平、厦门等地,党、赤色工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及其他组织应该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使9月18日^③成为动员民众的突击日,争取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和扩大旨在发展群众性支持行动和具体援助北方及福建红军的抗日讨伐行动^④的运动。与此相联系,应该组织各种形式的群众性行动,例如,在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领导下组织支持抗日战争的地方代表会议和示威游行;在士兵中,在工厂、街道、学校和农村,组织“飞行的”和秘密的抗日群众集会及小组讨论会;组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即使停止工作五分钟也好,以示抗议),特别是在日本人的工厂和码头,应该把准备这种罢工的工作与日益高涨的争取尽快满足工人局部迫切经济要求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对销售日货的商店和仓库进行纠察,还要抵制日货运输;在工人住宅区、在商店里、在大学生中间和在其他地方,为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斗争基金,为红军和义勇军募集捐款;在市政会议、政权机关、[国民党]党部驻地附近组织群众性的示威游行,要求救济旱灾和水灾的受害者,还要组织群众性的抢夺日本仓库、绅士、商人等的粮食和商品的行动,以救济失业者和饥饿者;派遣工人参加游击队、义勇军和红军;

① 可能指第274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全国委员会。

③ 指日本开始侵占中国东北三周年。

④ 指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7—8月间从中央苏区向北方的讨伐,这支纵队是由驻扎在福建省的第7军的基础上组建的。

开展专门的游击行动,等等。同时,应该尽最大努力,在工厂、码头、商店、部队、军营、农村和学校以建立抗日行动委员会的统一战线形式为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奠定广泛的组织基础,正如为加强和从组织上巩固党和工会一样。

(2)李杜将军公开赞同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基本纲领^①,并加入该委员会,这个事实目前在北方和东北诸省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这会为在他控制和影响下的那些义勇军队伍(似乎有近10万人)中开展公开的群众性行动提供(即便是在有限的时期内)某些特殊的条件。这还可以为合法渗透到许多义勇军部队中并在其中开展公开的群众性工作提供途径。如果确实李杜指挥的兵力可观,最好是正式找李杜谈一谈,也可以以红军的名义找他谈,以尝试根据[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制订的条件^②同他的吉林部队签订作战协议,或者同个别的师及人民革命军^③、游击队签订作战协议,这也是为了利用他与宋哲元、Sun Tu-ying^④、Liang kwei-ying^⑤及 Hung Chi-hai^⑥的关系。然而,不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向满洲和河北省委发出关于派遣干部前往李杜部队中和其他比较重要的义勇军部队的指示:派一些干部去组建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合法的连、团等士兵委员会以及军士委员会(用各种名称),而派另一些干部去从事严格的秘密活动和组建秘密党支部,应该赋予这种工作以特殊的意义,而且要吸取张家

① 见第116页注⑥。

② 见第100号文件。

③ 看来作者把1933年8月初冯玉祥军队垮台后由吉鸿昌和方振武将军指挥的号召“讨伐蒋介石”的部队称为人民革命军。

④ 原文如此。可能指孙殿英。

⑤ 原文如此。可能指梁冠英。

⑥ 原文如此。可能指冯占海。

口的教训^①。人民革命军现在应该公开地支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纲领,在义勇军、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宣传这个纲领,甚至利用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纲领作为扩大自己在义勇军部队中和游击队中的影响的一个手段,并且在必要时作为与这些部队协调作战的一个手段,同时人民革命军要独立地建设自己的队伍。

(3)为了扩大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群众性鼓动和宣传——这是十分必要的——还应该尝试创办该委员会合法的中央机关刊物,也许,这个机关刊物可以在法租界出版。如果它不是该委员会的“官方”出版物,而只是作为“私人”出版物,则可以由一两两位像马相伯、S. L. 张博士^②、廖仲恺夫人^③等这样著名的活动家“个人”赞助出版;它要作为一种抗日的刊物,一开始不要直接攻击南京政府。如果这样的报纸或杂志严格地由党来控制 and 编辑,那么,即便在受到很大限制的框架内工作,也可以发挥巨大而有效的作用。

这个建议应该考虑一下。此致
敬礼

米尔顿^④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134—135 页。
英文打字稿, 副本。

-
- ① 原文如此。意思是吸取张家口的教训。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当时的意见,是指对共产党员在 1933 年 5 月组建的冯玉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的地下工作重视不够。
-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 ③ 何香凝。
- ④ T. 赖扬。

2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395(B)号记录 (摘录)

1934年8月15日于莫斯科

听取：21. (6327)——阿图尔^①同志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决定：(1)责成米夫、皮亚特尼茨基、王明、康生、弗雷德^②和阿图尔同志讨论所提出的建议，然后再次提交政治委员会批准^③。

(2)责成阿图尔同志以书面形式提交自己报告的主要内容^④。

(3)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在地区书记处内讨论一切有争议的问题。

(4)在参加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⑤的中国代表团抵达后，与其详细讨论所有问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① A. 埃韦特。

② M. 施特恩。

③ 见第 282 号文件。

④ 见附录。

⑤ 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见第 61 页注④)。

[附录]

**埃韦特同志 1934 年 8 月 15 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上所作的报告**

注^①：这个报告不是速记记录，而是后来根据口授所作的记录，它既有[对口头报告]的缩减，也有某些补充。省、市名称及专有名称是用英文写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上海战争^②和满洲被占领后，日本征服中国的方针仍在继续，没有遇到真正的抵制。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的声明^③带有某种新意，该声明正式通知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今后只有征得日本同意并在其监督下它们才能够采取某种行动。早在这个声明发表前的几个月，日本对南京政府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目的是迫使它彻底投降。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完全了解日本向中国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它们的行为，特别是英国的行为，更像是赞同。

日本大使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许多要求(据说，有几百条)，可以概括为以下几大类：

1. 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置于日本的监督之下。中国要保证不采取任何旨在反对日本的措施。在日本与苏联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支持和实施日本提出的措施。中国必须征得日本的同意才能向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提供租界地。获取贷款也是一样。

2. 日本要监督武器的进口和生产。要由日本人来替代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顾问。

① 文件注。

② 指国民党 19 路军和居民在上海和吴淞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抵抗。

③ 见第 116 页注④。

3. 对日本商品实行优惠的税率。要进一步对日本作出让步，特别是在内蒙古和外蒙古方向建设用于反对苏联的战略铁路方面。承认日本向袁世凯提供的贷款。

目前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给日本帝国主义设置任何障碍。尽管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尖锐，但是美国在中国的表现却十分消极，目前只限于增加自己的武器装备。

日本和英国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在远东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甘愿牺牲某些工业部门的利益，其中包括纺织部门的利益，指望把日本的侵略推向苏联，并在爆发斗争时既可以削弱日本，又特别可以削弱苏联，重新恢复自己在亚洲失去的阵地。英国准备在下一瓜分中国时提出自己的兼并计划并实现它。（从西藏边界推进到四川，进入新疆，力求加强自己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建议组建国际宪兵并建议美国同英国一起来组建，但美国一直拒绝这样做，其中也包括拒绝利用在广东搞的阴谋和分割南方的隐蔽威胁。）

南京政府的政策

所谓的中国中央政府和国民党的政策是在下列情况下实施的：[第一]，在日本对华战争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背景下，第二，在红军和众多游击队进行斗争的背景下，第三，在国民党内部及国民党军阀之间发生激烈矛盾的背景下，第四，在发生与旱灾和水灾这样重大自然灾害相联系的严重经济危机的条件下。这种政策可归结为：一直放弃对日本任何抵抗，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同革命运动的斗争上，而革命运动是唯一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力量。义勇军运动遭到暗中破坏，被取消，遭到迫害，抵制运动^①和开展这种运动的团体也遭到了同样命运。日本为自己向中国出口的最主要商品争得了优惠税率。这种税率既是针对中国工业

^① 指抵制日货。

的,也是首先针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的。允许与满洲发展交通运输和在福建对日本人做出进一步让步,是指望以此来讨好日本。在日本的压力下撤换了原财政部长宋子文^①。他与美国签订的关于进口棉花和小麦的贷款协议^②遭到抵制,无法实现。在福建任命了一个明显的日本代理人^③当省长。不顾大家抗议,在北平政治会议主席的位置上保留了日本公开的走卒黄郛,他利用南京的支持,执行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政策。今天日本已经不满足于直达运输了,而是转向通过军队控制的山口免税运入日本的和满洲的商品。此外,南京拒绝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在南京的营垒中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矛盾和某种对抗,而蒋介石以对日本有利的方式克服了这些矛盾和对抗,现在汪精卫在更加公开地执行他的这个屈服于日本的方针。

通常的借口是:在中国,不消灭红军就不能抗日。

最近蒋介石的某些动摇已经很明显,其意义不应估计过高。这种动摇表现在蒋介石和黄郛之间矛盾的激化上。至于说到北方,黄郛想把华北都拱手送给日本,主张中国完全屈服于日本并站在日本方面参加对苏战争。蒋介石动摇的真正原因隐藏在日本不断加大对他和南京政府的压力中。日本越来越藐视南京政府并频繁通过南京的首脑与省及当地机关进行谈判。在日本营垒中越来越多地议论说,不应该相信蒋介石,他的方针,特别是在与其他列强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是不明确的,他可能伺机反对日本。根据蒋介石自己的言论和他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④的宣传,他的方针可以概括如下:“日苏之间战争不可避免。这场战争将发生在

① 1933年10月,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② 见第31页注①。

③ 陈仪。

④ 蓝衣社成立于1932年3月,于1938年4月解散。

1936年。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在中国消灭红军，否则就有与中国苏维埃和与苏联打疲劳战的危险。”

从今年开始蒋介石的军事地位有所加强。他在过去，特别是在去年先后镇压了三次军事叛乱：1. 冯玉祥在西北(张家口)的叛乱^①，2. 孙殿英指挥的第41军的叛乱^②，3. 19路军在福建的叛乱^③。尽管广州和南京之间的矛盾仍然像过去一样存在，尽管在其他省份仍然像以前一样存在着强大的反对派，但是当前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蒋介石取得上述三次胜利后，他的所有敌人现在都想避免与他争斗。蒋介石相当巧妙地利用这种局势，企图通过加强自己的军事地位和做出某些政治让步，来进一步削弱南方阵线。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的，将来也不可能达到，但是目前他已经取得了主动权，迫使他的敌人转入防御。他的军事力量的这种加强直接影响到政治领域，因为他的所有政敌(例如，胡汉民)都直接依赖某些军阀的支持，但是，现在军阀们都过于谨慎，不轻易采取什么行动。这种情况还会长期继续下去，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会发生变化：日本[在中国]采取进一步的坚决的侵略步骤，爆发日本对苏联的战争，或者我们红军取得新的重大胜利。

日本对苏联的战争准备

虽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有其自己的目的，但还是应该把它看作是对苏战争准备的一部分。不把中国的大部分，特别是它的北部变成日本的桥头堡，日本发动对苏战争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只有一个满洲对于实现这种目的是不够的。另一方面，日本向华北

① 指由冯玉祥建立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1933年5月至8月发动的反对蒋介石的行动。

② 见第31页注②。

③ 见第84页注④。

的实际渗透已经如此之深,以至军事占领只是第二位的问题,推迟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由于“抵抗”的结果,而是由于考虑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日本在实现这种帝国主义目的和战争准备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困难。日本国内的经济越来越不景气。除了财政困难,又开始爆发与示威游行相联系的农民骚动等等,尽管还处在开始阶段。在满洲,日本帝国主义尽管竭尽一切努力,但未能把义勇军运动镇压下去。相反,在今年义勇军运动相当活跃,在同日本人和伪满洲国军队的斗争中表现出高超的技能。除了受我们影响的革命军队中的2500人外,根据我们的估计,还有3万名义勇军不在我们领导下,但部分与我们合作(根据南京政府的估计,当然是过高的估计,满洲义勇军人数约达13万到14万人)。此外,日本帝国主义直到现在都未能取得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其中包括英国,在与苏联开战情况下的支持。德国发生的事件和它在欧洲的孤立,减缓了获得盟友的过程。乘苏联歉收之际而搞的投机也没有得逞。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日本军国主义营垒内部在对苏联开战时间问题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歧。在军方会议上和在报刊上相当公开地进行着这种争论。为了掩盖自己的战争准备,在加紧挑衅的同时,还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唱起了和平的高调。这就造成了一种印象:日本确定在冬季开战,指望顺利越过黑龙江等等。日本军队在日本北方寒冷的气候条件下举行的一系列演习就证明了这一点。

国统区党、工会及群众组织的组织状况和工作概述

(更详细的统计在最近几周内就得到)

在审核[下面]列举的所有数字时应该考虑到,在秘密工作、中国幅员辽阔和联络不畅的条件下,很多地区和省份没有寄送任何报告,[中共]中央与很多地方组织既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间接联系,许多地方的统计材料,有的部分是不可靠的,在这种统计中,没有考虑到与苏区比邻的白军占领地区。在此基础上所列出的有关

党组织、青年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数字，可能增加约 20%。

共产党	21966 人
赤色工会	5651 人
共产主义青年团	9285 人
农民组织	39403 人
反帝组织	4645 人

只在白军控制的两个省份中有真正巩固的党组织：在江苏有 6010 名党员，其中在上海有 700 名，在湖北有将近 9000 名党员。在这两个省份中对白区工作的组织是最好的。最近在这两个省不仅在采矿、纺织和水泥工业的工人中间举行了一系列积极的罢工，而且还组织了抗日工作；在这两个省对白军士兵的工作也做得比其他省好。党在铁路员工中间牢固地站稳了脚跟。领导们正在与那里出现的相当严重的右倾进行严肃而具体的斗争。

至于江西省^①的工作，上海组织工作水平的低下特别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考虑到一年半以前呈报的党员人数是 2000 到 4000 人，那么最低的水平确实已得到克服，尽管党员从 500 增加到 700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个数字，当然是过高的估计，但是组织工作状况，特别是积极性程度，除了组织一些罢工外，还有待于改进。

满洲的工作要比湖北差，这基本上可以用那里的政治领导和干部软弱来说明，尽管那里存在日本的恐怖，但是在满洲活动的自由还是要比在中国最重要的白区多一些。我们的人民革命军还在执行宗派主义的政策。在转入与其他义勇军团联合行动之前，提出了过多的条件。我们曾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广泛抗日统一战线，并向我们在那里的力量提出了在较大游击队中开展活动，使之尽可能给予小股日本军事集团以毁灭性打击，并在边远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任务。最近几个月来，这项任务部分地顺利完

^① 原文如此。应为：江苏。

成了。

在热河省,尽管存在着客观的机会,但是党没有进行任何工作。

在山西省既不存在较大的党组织,也不存在较大的青年组织,尽管这个省是个十分重要的省份,有数十万矿工、铁路员工和在白军士兵中开展工作的有利土壤。在这个省,必须建立省委;直到现在该省的工作都是由北平来做的。

在山东省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省委被敌人消灭了,至今还没有恢复。日本人在这个省的势力在增强。我们在矿工、铁路员工和农民中间开展工作有良好的基础。

位于我们四川苏区以北的陕西省的工作,与那里存在的条件根本不相适应。现在该省存在着三个领导机关:一个是领导陕南,还包括甘肃南部,另一个是领导北部,第三个是领导中部。在陕西中部我们拥有一些武装游击队,有200到300人。借助于游击队,在白军部队中组织了一些哗变,然而,由于准备工作不慎、犯有机会议错误和行动不够果断,一开始就被镇压下去了,因而对于加强我们的工作帮助不大。

在河南省,党组织的进步和团结都很明显。河南省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当地党组织的领导没有遭到敌人任何严重破坏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省份之一。除了南部几个游击区外,我们在那里有将近2000名党员。在铁路员工和纺织工人中间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在士兵中间的工作得到了加强,与所谓的灰色军事力量^①开始建立一定的联系。我们的游击队大约有3000人,给它们提出了在通往北平的铁路线以东开展活动和逐步与皖北游击区建立联系的任务。

安徽省。只是在它的北部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与河南保持某种

^① 指没有纳入南京政府武装力量编制的地方部队。

联系的党组织。[中共]中央认为,在那里大约有 1000 名党员。在三个县有党小组活动。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些小组同河南省的游击小组建立比较密切的联系。

湖北省。在大工业区汉口只有一个不大的青年组织和一个左派作家组织。没有党的组织。可能,在该省有几个小组,但是同它们没有任何联系。[中共]中央试图往那里派遣一些同志,但至今总是立即受到敌人的阻挠。在这个省缺少任何组织工作,这就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因为那里不仅有重工业,而且还有几个大兵工厂以及大量的失业者和逃难者。那里在白军中的工作也很重要,那些白军经常被派去进攻江西,也有部分被派去进攻我们的游击区。

四川省。尽管最近一个时期四川白区的工作有所改进,特别是县委和支部的工作有很大改进,但[这里]仍像以前一样表现出很大的软弱性。和以前一样,我们在 10 万盐矿工人中间的影响还是很小的。在党的组织中仍然存在着过多地注意上层的传统,没有把做上层工作与做相当重要的群众工作联系起来。在该省的许多县都有游击队,一部分是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一部分则是反对缴纳捐税等的独立农民武装。以前,省委在游击队斗争上犯了一些错误。他们不是去扩大和联合分散游击小组的行动,而是用各种方式依靠狭小的农村去“夺取政权”,其结果是失败。同苏区的联系很不够。已经采取了加强工作的措施,从上海派去了一位省级党组织(大约有 1500 人)的新书记^①。

福建省。在 19 路军起义时成立的省党委在 3 月被蒋介石摧毁了。由于叛徒出卖,多次进行逮捕。现在只有与厦门市有联系,从那里实施对该省南部的领导,那里的工作已经安排好。(在厦门大约有 160 名党员,300 名工会会员,6 月举行了有 3000 人参加的

^① 何人不详。

抗日示威游行)。在该省还有很多游击小组,以及一些完全孤立于中央苏区之外的小苏维埃根据地。党和青年团的社会成分还不好,学生起着过于大的作用。

广东省(广州)。在全省没有一个像样的组织。在广州存在一个左派组织(作家、学生等等),大约有100人。某些工作是由香港的党组织(大约有150名党员)来完成的。在该省北部存在着一个与湘南保持联系的不大的委员会。

湖南省。那里的情况也不好。已有三年时间没有恢复党委了。我们只与省会长沙的一个小组和南方的一个小组保持着联系。我们在江西和湖南边界活动的游击队[和他们]有较多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经常。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在中央苏区,为了与这个省建立联系和在那里组建党组织作出了很大努力。作出这种努力是出于打通湖南的迫切需要,并考虑到保住江西已不可能了。该省的形势是有利的。农民受到了无情的掠夺,他们必须把自己收成的五分之四缴纳租税。甚至资产阶级都激烈地反对苛捐杂税和没收政策,其相当数量的代表因为反对缴[税]而经常蹲监狱。

浙江省。尽管党组织薄弱,但是今年该省还是发生了大量的严重冲突。除了一些农民起义,在有10万工人的地区还发生了大约有1万丝织工人参加的行动。像在最近的多数行动中一样,在这次行动中工人阶级也表现得很积极。(示威游行、宣布总罢工、关闭所有商店、释放囚犯等等)^①由于缺乏坚强的组织,党领导这种斗争很不得力。现在这个省发生了可怕的旱灾。秋收作物的90%毁掉了,有2000万农民在挨饿。在最边远的一些地区自发地组建了“土匪队伍”,我们对他们施加的影响很小。党在这个省已经加强了自己的工作。语言的障碍使从其他地区派到那里去的同志的工作复杂化了。在浙赣铁路上,现在正在开展专门的工作。

^① 见第107页注③。

党在工会和经济斗争方面的工作早已是最薄弱的环节,也看不到有任何根本性的改进。有 5650 名会员的赤色工会太软弱,在斗争中发挥不了决定性作用。党在互助团体、兄弟会等一系列组织中以及国民党某些工会中也有影响。尽管在国民党工会中的工作由于几乎完全不能开会而难以进行,但是党在这个领域的工作无论如何是与客观条件不相适应的。尽管存在着这种软弱性和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在一系列工业企业(如上海棉纺工业和烟草工业)中丧失了组织能力,然而在其他一些重要领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在开滦煤矿^①矿工的多次行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把 1260 名矿工组织起来了并为建立矿工工会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在平汉铁路和平张(家口)铁路的北方铁路员工中建立了一系列可靠的据点和铁路员工工会筹备委员会。在河南省以及在江苏省的三条铁路线上也已开始做工作。

上海码头工人(党已经开始向他们中间渗透)按其重要性来说属于第二类工人,在那里我们现在已经有 300 人的一些工会小组(顺便说一句,上海码头工人有 14 万,这个数字是很不够的)。在“美亚”公司 13 家丝织厂工人 50 天的罢工(有 6000 人参加)^②过程中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尽管罢工失败了,但是党由于自己积极进行领导而加强了自己的影响,并关注工人退出这一斗争时仍能保持其组织性。在这次罢工期间,发生了围困警察局和政府大楼事件,一些被捕的罢工领导人被释放,等等。在上海,最近一次罢工(90%的工人参加)遭到失败之后,电力公司决定不向国民党工会交纳任何费用。这个举动是在我们在这个企业中的几个不大的党小组的影响下作出的。

越来越多的工厂关门或者一周中工作日在减少,本来就很微

① 见第 106 页注⑤。

② 见第 107 页注②。

薄的工资在不断降低,企业主们新的进攻现在已包含蒋介石企图解散国民党工会,考虑到这些情况,应该期待工人的斗争迅速而广泛地展开。最近一个时期罢工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罢工已经成为更大规模的、更长时期的和更富有战斗性的斗争,同一类工人常常在一年内举行几次罢工,参加罢工的行业数量比以前多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在不断地增强,工人们的要求也在增加,并且常常与政治要求联系起来,在许多次罢工期间工人们成立了武装自卫队,并使用原始的武器。

党与我们的海员工会一起经常采取统一战线策略,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企图通过举行“考试”的方式用自己的法西斯年轻干部来替换(长江上的)河运船队和近海轮船的老轮机手、老大副和老船长。我们建立了有43艘拖船和4艘轮船(3艘中国轮船和1艘英国轮船)的船队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支持我们反对新考试的纲领。我们海员工会的两个领导人也被选入了该委员会。同时党开始把船队上层人员的要求与大约4万名海员的要求结合起来。蒋介石看到,这个运动可能给他针对红军的军事计划带来明显的损失,于是他就把旨在取缔不理想分子的考试推迟到1935年。

我们作出了关于今后工会报纸要比现在更按时出版的决定。应该出版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的《中国工人》、上海总工会机关报的《上海工人》、海员工会机关报的《中国海员》,在北方出版《北方工人》。

所有这些成绩基本上表明了中国工人高涨的革命战斗精神,表明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党的弱点,不善于充分利用这种潜力。为不单独历数每一个弱点,必须特别强调指出,第一,在失业者中间没有做任何工作。甚至在存在过失业者委员会(委员达100人)的上海,在遭到连续逮捕之后,[它们]实际上也消失了。第二,在国民党工会中的工作也没有实质性改进。第三,我们的赤色工会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组织方面都过于软弱。吸收

非党工人和同情我们的工人参加我们的工会工作做得很不够。到目前为止我们工会的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全部由党员组成。第四,党不善于搭建桥梁和同众多的工人互助组织建立联系,或者自己建立在我们的影响下用各种名称的互助组织。第五,还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只是在罢工开始时才知道工人的行动,我们的鼓动宣传只是一般性的,而工人的要求,我们不了解,不能将其具体化和将其表述出来。第六,没有充分利用工人的这些行动,也没有把罢工行动同总的抗日斗争和对红军的支持联系起来。

除了普遍加强我们的组织和我们在这方面的影响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是将上海变成一个大的斗争中心和为全国培养干部的中心;将工作集中在重工业、运输业、军事和民族工业^①方面,加强日本企业中的工作;在考虑到革命运动传统的情况下把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加强我们的组织,特别是要加强长江轮船航运和沿岸的组织;克服重要省份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强对失业者、从事繁重劳动的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工作。

总之,关于党的工作可以概括如下:尽管在各个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弱点,但是可以认为有以下重大进步:对我们在中国的复杂革命策略的理解加深了;党在执行自己的革命路线的同时,已根据下层干部的水平表现出了巨大的机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托派和右派的[影响]并且更具体地开展反对对革命路线的取消主义和叛徒行为的斗争;虽然取得的成绩是很不够的,党还是渗透到一些新的地区和工业部门了(矿工、码头工人、铁路员工中间)。

党的反帝工作也存在着同工会工作同样的一些缺点。广大群众非常赞同党的反帝革命政策。当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于1933年建议在一定的条件下与所有的军队或军事集团共同进行反对日本

① 原文如此。

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时候^①，这种赞同大大加强了。今天这个建议已经成为我们在各省总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与同情我们的反帝拥护者的组织联系根本不适应这种情况。处在我们影响下或领导下的反帝组织只有 4650 至 5000 名成员。现在党已根据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纲领^②，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开始征集反帝人士(签名)。几个月前已经征集到拥护这个纲领的签名大约有 2000 个，其中大多数是前义勇军指挥员、知识分子、商人等，其中还包括 600 到 700 名工人和各种组织的代表。征集这些签名是为了成立发起组，倡议组建一个庞大的群众性组织。但是，存在一种危险性，即党无法给所有这些人安排满有步骤组织好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南京政府的恐怖活动)一切都可能付诸东流。

特别重要的是恢复出版我们的公开反帝刊物(首先是《中国论坛》)。以前的编辑艾萨克斯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同我们完全决裂了。他起草了一份反对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文件(两个月前还没有发表)^③，在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苏联、中国革命、德国形势)上公开地表达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他甚至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把我们建立的一个不大的印刷所交给我们指定的享有治外法权的一个人，他卖掉了印刷所，而钱，按照他的说法，交给了托洛茨基分子。因为半年前我们在上海就没有[这样]一个合适又合法的人了，所以继续不间断地出版杂志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已经采取了恢复出版杂志的措施(公开发表，半公开发行)。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艾萨克斯过一段时间就会开始积极从事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行动，他将试图建立一些小组，也可能晚些时候出版一种小报。但是这种活动不可能给我们党的工作带来实质

① 见第 100 号文件。

② 见第 116 页注⑥。

③ 见第 158 页注②。

性的麻烦。

白区的农民运动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发发生的,由我们领导的比较少,只是有时受到我们的影响。造成这种情况极少是我们党组织实行错误路线的原因,而更主要的是缺少党的组织。在很多地区党正在进行反对苛捐杂税、高额地租和赔款以及为争取收成分配的斗争。但是每年至少都发生 10 次或 12 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都没有党的领导,关于这些起义党常常只是从报刊的报道中知道的,多数起义由于缺少领导很快被残酷镇压下去了。处在我们影响下的农民组织的人数,[中共]中央估计有 4 万人,但是这个数字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其中大部分是根据总的估计和报道得出的。

我们的苏区和最重要的游击区

我不想重复在以前的关于我们的严重形势和敌人对我们所采取的策略的报告中已经讲过的东西,只想说一说最近事态发展中的一些重要方面。

我们有两个巩固的苏区: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和四川的苏区。我们有两个大的、但无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的游击区:豫皖游击区和鄂川黔边区游击区。

1. 在中央苏区(包括福建、江西—湖南边区和江西北部—浙江地区)最近几个月,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来我们的情况恶化了。敌人得以完全包围了江西北部—浙江[地区]并且切断了我们那里的军队与其他军队的任何联系。我们在江西北部的第 10 军^①已经长时间处境十分艰难。在我看来,未必有希望突出包围。至少,我们以前的这种企图都以失败而告终。只存在一种希望:借助于游击战在比较狭小的区域继续固守。这涉及江西东北部和第 10 军。位于江西南部——福建的中央苏区同样处境也很艰难,敌人大大地缩小了我们的地区,夺取了便于战略推进的据点,为自己的继续

^① 这里指的是红军新编第 10 军团。

推进修筑了较好的道路网并建立了一个彼此相联系的小型碉堡(几千个)体系。敌人以优势的兵力强加给我们一个接一个的战役并且总是在自己的据点附近。我们尝试避开这种使我们一再丧失领土的[打击]。但是,接受战斗从来也没有使我们取得完全胜利,而只是取得部分胜利,因为敌人总是能很快地调来增援部队。这种战斗与过去年代的那种典型的战斗有本质上的不同,那时我们经常得以粉碎和解除大批部队[达两个师]的武装,而没有很大的伤亡。而今天,在一次战斗中我们伤亡 1500 人到 2000 人的情况并不少见,即便敌人的损失多一些,那也是在数十倍优势兵力的情况下少有的情况。在整个中央苏区我们拥有大约 4 万支步枪和 1400 挺机枪。弹药的严重缺乏极大地影响了这些武器的使用效果。我们的兵工厂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低质量弹药的需求。鉴于形势的严峻,[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进行了总动员。同时通过并开始实施保卫所剩下的苏区和在苏区外开展游击战的详细计划^①。到现在为止已经动员了大约 6 万名后备人员,他们的武器装备极差。现在敌人的前哨距离我们的首府瑞金只有 60 公里。事态的进一步不利发展会迫使我们在竭尽全力防御能力之后,在敌人的湖南一线寻找突破口。条件是这样的:只有在这个方向突破,才有胜利的机会,才会有助于建立新的苏区。但是敌人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意图,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所以敌人为了防止这种事态发展开始了积极的准备。

我认为,只有在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的时候,[中共]中央才能采取撤离我们苏区的步骤。我们党的领导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最严重的形势下表现出了坚定性和果断性。还有一种尽管不能确保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在我们缩小的地域内固守。但同时[中共]中央也已开始准备让我们的主力部队向湖南方向突围。这种突围将

^① 见第 128 页注^②。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因为敌人对此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从我们第4军团^①由湘鄂地区向四川进军的实例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无论我们的处境多么严峻，敌人都不可能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相反，我们却可能以我们的主力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同时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部分力量留在老区及其附近地区，使其转入游击状态。

四川苏区。在江西，我们的艰难处境是由敌人的优势造成的，与这种情况相反，在我们的四川苏区，（最近以来）大量领土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错误的政治和军事策略造成的。1933年夏天，我们的军队从当时较小的苏维埃根据地展开了强大的进攻。向各个方向的进攻都是顺利的；进攻使我们获得了拥有800万人口、一些重要城市的整个一大片土地，获得了武器兵工厂和技术装备、资金等大量战利品。这是最近几年所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但是这些胜利根本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我们的政权并没有得到充分巩固，我们的军队不仅没有大踏步地向前推进，而且也没有利用所有条件组织对已占领地区的防御。为该地区苏维埃化做的工作也很少。群众组织也发展得不够。当敌人以10万兵力在几百公里的全线转入反攻时，我们远没有利用所有防御手段，没有在任何地方采取巧妙的战术打破敌人的战线。只局限于使用防御战术，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后开始全线撤退。冬天迫使敌人停顿下来，但是春天敌人又向我们发动了新的进攻，迫使我们的军队继续退却。我们的领导宣布这个夏季进行大反攻，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反攻并没有进行。毫无疑问，如果能加强四川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话，在那里过去有今天也还会有进行大规模进攻的一切条件。现在我们（除个别一些地方外）已经被挤压到川陕边界的山区。不过，甚至根据敌人的材料说，我们还是完整地保存了我们的有生力量。我们红军拥有3.5万到4万支步枪。弹药比江西多得多，食品也是

^① 原文如此。应为：红军第四方面军。

如此。此外,我们还有众多的后备力量,因为在我军撤退时,有很大一部分男性居民跟我们一起撤退了。整个这个地区的形势根本不能同江西的严峻形势相比。然而,无法理解的是,我们的领导却建议撤离这个省,爬山越岭去陕西。四川的政治形势,对我们来说可能比中国任何一个省都更有利。由于提前征收30岁到80岁人的捐税,所有农民都处在贫困之中,他们不仅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而且在许多地方公开举行起义;该省的军阀们虽然在形式上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但是他们没有采取最有效的行动;碉堡体系还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该省难以接近,其他省的军队现在未必敢于进入;在那里没有任何铁路,可用来运送火炮等重兵器的道路很少;这个省在经济方面是独立自主的,有人口5500万或6000万;在建立广阔而巩固的根据地时,四川具有向各个方向,包括向其他一系列省扩展的可能性。贺龙在长江以南活动,在那里已经有一些反对缴纳苛捐杂税的独立的农民军。从传播革命的角度和军事战略的角度看,这个地区展现出比我们的中央苏区具有的更多的发展前景。

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加强那里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克服我们军队中有害的游击习气。需要尽快做这件事,因为存在着事态按照贺龙及其武装力量的方案发展的危险。

贺龙的军队在四川、湖北、贵州三省交界地区活动。最近贺龙渗入贵州相当深,据资产阶级报刊报道,那里的基础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很有利的。近几年来,贺龙的队伍大约从3000人增加到6000至8000人(据明显夸大的资产阶级报纸报道,已经达到1.6万人)。贺龙不顾来自党的领导方面的各种指示和警告,一味地进行游击战。他不建立任何永久性的根据地。他从来不认真保卫已经占领的城市或地区,而是从一地方转移到另一地方,避免与敌人交战。同时他和他周围的一群人执行一种非常危险的内部政策(他借助于枪毙来“消除”与党的领导同志存在的意见分歧)。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向他派去自己的亲信,建议他转到蒋介石方面来,这

就证明敌人并不是不知道他的情况。顺便说一句，贺龙命令把那些派来的人统统枪毙了，并将此事报告了[中共]中央。

我们的河南游击区。在[这里]我们有 3000 人到 4000 人参加集中领导的游击战并编成几个相当大的兵团，但是没有巩固的苏区。最近这些军队取得了明显的战绩，除其他方面，还导致白军 6 个师长被蒋介石下令撤职。鉴于从 1932 年秋起这些军队得到了加强的这一事实，可以得出我们是有能力的结论，并且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尽管存在着困难，我们的有生力量在中国还是站稳了脚跟，并在有利时机到来的时候将会得到迅速的发展。

除了在这些地区的力量和我们在满洲的力量，我们在国内各地也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游击兵团，他们加在一起也有几千人。

我们的整个武装力量

江西等地	40000 支枪，地方力量和后备力量	60000 人
四川	40000 支枪，地方力量和后备力量	约 50000 人
贺龙	8000 支枪，	——
河南	4000 支枪，	——
其他	3000 支枪，	——
<hr/>		
	95000 支枪	110000 人

(这是最大的数字)

党员的大约人数

江西等地	80000 党员	工会	140000	会员
四川	15000 党员	工会	?	
游击区	3000 党员			
国统区约	27000 党员	工会	5650	会员
<hr/>				
	125000 党员		145650	会员

共产主义青年团约有 5 万名团员。其中有近 1 万人在国

统区。

谈谈 19 路军在福建的起义

1933 年 11 月 20 日在福建宣布成立所谓的人民政府。这以前几个月就已清楚,19 路军反对蒋介石。1933 年夏天我们在与 19 路军的战斗中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加强了该军指挥人员与红军签订互不进攻条约的愿望。在不停止我们的军事行动的同时,我们与该军的代表在上海和我们的中央苏区进行了谈判,最后签订了著名的临时协议^①,不过该协议从来没有得到所谓的人民政府的正式批准,但是它的一系列条款的内容,至少部分地实现了(释放在福建的政治犯,部分地解除封锁,没有发生任何军事上的相互进攻)。

在利用这个协议及其内容方面我与[中共]中央发生了分歧。由于缺少快速的通信联系,我以答记者问的方式犯了一个形式上的错误,我是在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向报界发表谈话,阐述了党的立场^②。在这次答记者问中谈到了关于互不进攻的“秘密协议”,同时指出了众所周知的红军多次重复的主张:红军准备与其他军队和军事集团共同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其中也包括共同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蒋介石等人作斗争。必须指出,我们与 19 路军的谈判不是什么秘密,相当具体的情报已从 19 路军代表那里泄露出去,被所有资产阶级报刊抓住,并用耸人听闻的口气加以评论。在答记者问中对秘密协议作出的谨慎表述,同时也是(除了对福建政府性质的界定外)对轰动一时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运动的驳斥,按照这种宣传,共产党人已经同 19 路军结成了同盟,甚至首先企图在福建动员群众去贯彻协议并对白军展开瓦解行动,以便加强他们对蒋介石进行的战争的抵制,哪怕使他们靠近我们一步也好。

① 见第 183 号文件。

② 见第 173 页注⑧。

[中共]中央坚持认为,存在着秘密协议是不应该讲的,因为这样做会损害我们与 19 路军建立的关系。由于实行这样的方针,党没能把福建人民政府的短期存在充分用于宣传鼓动的目的。只是在福建政府垮台前不久[中共]中央才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开始展开广泛的鼓动宣传运动。然而,福建政府的垮台如此之快,以至这种为时已晚的宣传运动未能取得大的成绩。

我认为,关于这类条约或协议是否可以利用的问题是根本不能解决的。毫无疑问,有很多场合必须无条件地保守秘密,如我们与 19 路军、与冯玉祥谈判及在其他一些场合我们都要保守秘密。但是在 19 路军起义后,在士兵中间进行这种宣传运动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样,他们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福建政府必然垮台的情况下就会转到我们方面来。这里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中国将来的事态发展中还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即在敌人部队与我们之间将进行谈判,签订条约,等等。在每一个单独的场合需要具体地研究形势,但决不能从政治上束缚自己的手脚,甚至许诺一切都保密。

最后的建议。肢解中国、继续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对苏联开战的桥头堡,这在我们党的面前越来越尖锐地提出了保存和扩大我们苏区和游击区的问题。虽然革命前景是极其有利的,但是还是应该承认,如果不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那么事态的近期发展对我们来说将是困难的。不能指望,在最近 12 个月内我们能使我们的根据地有实质性的扩展。甚至更可能,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中央苏区的大部分土地并以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其他省建立新的苏区。很清楚,即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的苏区,也不可能像存在多年并且组织得很好的中央苏区那样。但是中国的形势就是这样,蒋介石“在 1936 年前消灭”我们的目标是不会实现的。因此,随着远东国际关系的发展将会展现出广阔的前景。保存和扩展苏区,特别是相应地建立新的苏

区,应该与建立民族革命政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各省建立民族革命政府同时进行,这种政府是向苏维埃政权的一个过渡阶段。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304,第 6、13—31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81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声明

不晚于 1934 年 8 月 22 日^①于莫斯科 绝密

致政治委员会各位委员及马季亚尔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声明^②

由于在 8 月 15 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没有时间继续讨论中国问题^③，本应报告中国党组织状况的康生同志没有来得及发言。但鉴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代表团认为有必要作如下声明。

阿图尔同志^④报告了党员人数，他报告的数字是与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的数字完全矛盾的。我们认为，阿图尔同志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所宣布的数字根本不符合实际，也是不负责任的。根据阿图尔同志的计算，在国统区大约有 2.8 万党员。这个数字与十三次全会^⑤之前中共中央所报告的数字大体一致。当时中央统计有近 3 万党员，经常与中央保持组织上的联系。

① 文件上标注的日期。

② 文件上有批注：送东方书记处米夫同志、马季亚尔同志。我已送还。П. 米夫。
[1934 年] 8 月 27 日。

③ 见第 280 号文件。

④ A. 埃韦特。

⑤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见第 9 页注④）。

此外,我们还有3万党员,由于恐怖和工作条件的艰难没能与中央组织保持经常的联系。然而,他们拥有自己的地方组织并在进行党的工作。我们不知道,阿图尔是从哪里得到许多省组织的数字的,根据中央的报告,这些省的组织早已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关于这些组织的状况[他]不能提供明确的资料。此外,阿图尔同志否定一些组织的存在,例如,在内蒙古、山东、中国西北、中国西南等地区都有党的组织。事实上在那里存在具有一定党员数量的组织,这些组织进行着相当积极的工作。我们还从当地获得了关于这些组织工作情况的报告。而阿图尔同志却不了解这些情况。阿图尔同志根本不知道某些数字,例如安徽、福建及其他一些省的数字。根据所有这些不完整和不准确的材料他作出了关于国统区党员人数的结论。

至于中国苏区的党员人数,他只谈到了两个苏区——中央苏区和四川苏区;根据他的统计,中央苏区有8万党员,而在四川苏区,照他的说法,有2万党员。仿佛再也没有其他苏区了。显然,阿图尔同志也不知道有多少苏区。例如,他不知道中央苏区的边界,竟把临近的一些地区列入了中央苏区,而实际上中央苏区——这只是^①江西地区。

此外,我们还有下列苏区:

- 湘赣苏区 (第8军团)
- 湘赣鄂苏区 (第16军团)
- 苏浙闽苏区 (第10军团)
- 湘西鄂苏区 (第2军)^②
- 福建苏区 (第12军团)
- 鄂豫皖苏区 (原第4军)^③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应为第2军团。

③ 原文如此。应为第4军团。

川陕苏区 (原第4军)
 川西南苏区
 陕甘苏区 (第26军团)
 广东东江苏区及其他一些小游击区

根据[中共]中央的材料,所有苏区的党员人数为35.6万人,而决不像阿图尔同志所认为的那样,是10万人。加上国统区,我们共有406860名党员,而根据阿图尔同志的计算,有12万名党员。阿图尔同志关于全国有12万名党员的计算^①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我们的数字是完全准确的。康生同志在来这里^②之前召开了专门的组织会议,这次会议统计了各省的党员数量(见附录一)^③。这个数字是经中共中央核准的。此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前夕,我们在莫斯科集中了党的大量文件,甚至比中央本身有的还多,对党员人数专门作了补充性总结(见附录二)。如果政治委员会需要,我们可以提供所有文件。阿图尔同志提供的数字,只是根据自己的记忆。他没有确切的资料,所以他提供的数字是不准确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附录二

在国统区

省份	党员人数
上海	4000
江苏	8000
湖北	4000
陕西	2500—3000

① 原文如此。应为数字。

② 康生于1933年7月抵达莫斯科。

③ 附录一没有发表,它含有自1931年春至1933年初这一时期关于一些省份、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党员人数的不完整资料(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822,第8—12页)。

山东	700
山西	500
安徽	1460
湖北—河南	2500
福建	1000
浙江	300
满洲	3000
四川	2000
内蒙古	<u>700</u>
	31160

在苏区

省份	党员数量
----	------

江西	100000
----	--------

湘赣	30000
----	-------

福建	40000
----	-------

湘鄂赣	50000
-----	-------

赣东北	20000
-----	-------

湘西鄂	28700
-----	-------

鄂豫皖	25000
-----	-------

四川	50000
----	-------

广东东江[地区]	<u>2000</u>
----------	-------------

345700

+31160(在国统区)

+30000(在国统区,

与中央组织没有联系的)

 总计:406860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22, 第 5—7、13 页。
打字稿, 原件。

28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国工作的决议

不早于 1934 年 8 月 29 日^①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中国的建议^②

1. 建议中共中央在华南的一个港口建立一个不大的,但有工作能力的采购和向苏区运送武器、弹药和药品的机构。应该物色一位合适的外国同志来协助这项工作。责成王明和弗雷德^③同志弄清楚为此目的使用瓦西里耶夫同志所推荐的几位人选中的一位^④的可能性。责成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了解一下弗雷特同志推荐的那位人选^⑤。弄清楚使用所推荐的人选的可能性的期限为三天。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批示:“征求政治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文件是根据 1934 年 8 月 1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决议拟定(见第 280 号文件)并以飞行表决的方式通过的(表决的日期没有指明)。”文件上还有飞行表决的参加者王明、康生、И. А. 米夫、И. А. 皮亚特尼茨基、B. Г. 克诺林、Ф. 黑克尔特、Л. З. 曼努伊尔斯基、B. 布龙科夫斯基的亲笔签字和批注:“同意这些建议。阿图尔同志[A. 埃韦特]、И. 米夫。”决议 1 至 4 项所阐述的原则已写入 1934 年 9 月 4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的电报(见第 285 号文件)。

③ M. 施特恩。

④ 何人不详。

⑤ 何人不详。

2. 建议中共中央从中央苏区抽调一名有威信的政治工作人员和一名军事工作人员来加强第二(贺龙的)红军的领导,在目前条件下这支红军的斗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3. 电告[中共]中央我们支持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意见^①。认为向第4军派遣一名军事专家是适宜的。

4. 建议中共中央:

(1) 在国统区加强宣传苏区所实行的经济和政治措施;

(2) 起草和发表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号召中国人民更积极地支持红军这支能够捍卫中国的独立和完整的唯一力量的斗争。责成库恩·贝拉同志起草这个宣言的草稿^②。

(3) 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③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要利用一切反对派和反对蒋介石的力量。

(4) 加强[中共]上海中央局并对那里的党的机关进行必要的改组。通知[中共]中央,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采纳了我们关于[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与省委和上海市委分离的建议^④。

5. 责成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通过自己的特别全权代表斯塔卡诺夫同志^⑤加强帮助满洲党组织的工作。

6. 责成东方书记处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学生中抽调5名同志,经过短期培训后派往满洲游击队工作。

7. 责成东方书记处抽调一批中国同志派往新疆工作,目的是(经过甘肃和青海)与红四军建立联系。

8. 责成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与有关机构商谈关于协助斯塔卡诺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对决议第2项的批注:“已阅。17/Ⅺ,库恩·贝拉。期限:2周。”

③ 见第182页注④。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陈道南(音译)。

夫同志弄清楚利用与马仲英^①部队一起被拘留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可能性问题。

9. 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和雷利斯基同志本人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②的中国代表团和国际列宁学校及其他院校的学生及时到达。

10. 责成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提出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新的代表人选,此人应该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被派往中国。

11. 委托王明和米夫同志对本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总的监督。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304,第 11—12 页。

打印稿,原件。

① 与中国新疆当局进行斗争的马仲英将军部队于 1934 年 6、7 月间被扣留在苏联境内。详见: B. 巴尔明《1931—1934 年苏中关系史中的新疆》——〈远东问题〉,莫斯科,第 6 期,第 92—93、99—103 页。

② 见第 61 页注④。

2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策略的决议初稿

1934年9月1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关于中国形势和共产党策略的提纲初稿^①

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

现在世界已经临近革命和战争的第二个回合^②。太平洋地区是集中阶级矛盾和国际对抗的世界性策源地之一。而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太平洋地区矛盾的轴心和殖民地革命的中心。国际帝国主义为最后瓜分中国和镇压中国革命所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争夺巨大的销售和投资市场的斗争,而且也是争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无限来源的斗争,由于多年持续的经济危机,原料和廉价劳动是帝国主义现在特别需要的。进行这种斗争也是为了

① 该文件在1934年9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工作人员会议上讨论并作为基础被通过。委托王明(报告人)考虑所交换的意见对草稿进行补充和修改(见全宗495,目录154,卷宗531,第80—81页)。在下面的注释中指出了1934年9月9日王明所作的修改和补充(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808,第47—49页)。

②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达到发展的新阶段并且世界正在临近革命和战争的第二个回合。在事态的这种情况下,中国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实际历史意义。

最实质性地^①准备太平洋战争和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以及^②为了建立从远东进攻苏联的桥头堡。同时它又是帝国主义者为了对殖民地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当代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③和地位已上升到头等重要的原则高度,因为当代中国革命,作为伟大的苏维埃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不仅是在为争取全人类近 1/4 人口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而^④它占有为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统治、反对太平洋和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武装保卫所有国家劳动人民的祖国——苏联而进行的国际革命斗争的总战线上的一个最前沿的阵地。

由此直接产生了当代中国革命的困难和优势。

中国革命的主要困难在于,它的主要敌人——国际帝国主义者^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镇压中国革命。当代中国革命的优势在于,它除了在自己国内^⑥拥有取之不尽的最丰富的力量外,理所当然地不仅得到各国革命无产者和劳动人民^⑦的热烈支持和同情,而且还得到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的热情支持和同情,这种进步力量正在真诚地反对^⑧流血的罪恶的必然使全人类遭受苦难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两种前途:或者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将防止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反苏战

① 原文如此。

②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补充了以下一词:特别是。

③ 在修改和补充的稿上代替这句的是:因此。

④ 原文如此。应该是“而且”。

⑤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增加了“即”。

⑥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以下增加了“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发动的公开的群众性革命斗争,正是现在由于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在相当大地区苏维埃革命胜利不断增长的影响”。

⑦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增加了“在他们中间攻击资本主义的思想现在已经成熟了”。

⑧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增加了“法西斯主义和”。

争的爆发^①并且这次胜利发生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或一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前;或者是帝国主义战争,首先是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反苏战争^②和一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或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③先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中国革命目前已成为继苏联之后的世界革命^④的第二个决定性因素^⑤。

完全可能,远东事态,也包括中国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将完成革命和战争向第二个回合的过渡^⑥。

二

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和中国的两种出路

虽然世界帝国主义者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极其尖锐^⑦,但他们对中国^⑧却执行着一个共同的政治路线:彻底^⑨瓜分中国^⑩和对中国人民实行彻底的殖民主义^⑪奴役。为达到这一目的[竭尽]全力镇压中国人民的^⑫一切民族解放运动,^⑬特别是它的最高形

-
- ①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以下内容被勾掉了:“并且发生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或一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前”。
 - ②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以下内容被勾掉了:“一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或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 ③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以下内容被标上了着重号:“先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 ④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增加了:“堡垒”。
 - ⑤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增加了以下内容:“和世界政治的重大因素”。
 - ⑥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补充了以下内容:全世界历史性的事态发展现在让中共承担起最负责任的、最复杂的和最光荣的战斗任务。
 - ⑦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为:虽然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 ⑧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增加以下内容:实际上。
 - ⑨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彻底”一词被划掉了。
 - ⑩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增加以下内容:“自己的势力范围”。
 - ⑪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勾掉了“彻底的殖民主义”。
 - ⑫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为:“解放运动”。
 - ⑬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勾掉了“特别是它的最高形式——苏维埃革命”。

式——苏维埃革命。同时，帝国主义者既亲手又通过代理人——中国^①国民党和非国民党的军阀和政客之手^②推行这条路线。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热河和察哈尔的大部分，实际上对整个华北进行军事控制并加紧准备侵占全中国，英国帝国主义武装占领西藏和川边(音)并把手伸向四川及中国东南各省，法国帝国主义强行占领南中国海的9个岛屿并把手伸向云南和广西，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华中不停地制造阴谋，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在中国也空前活跃，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国际帝国主义亲手^③公开地瓜分中国和不加掩饰地奴役中国人民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20年来，各军阀集团之间持续不断的内战(有时在这些省，有时在另一些省，有时是大规模的，有时是小规模的)基本上是日英美帝国主义者为加强和扩大自己在中国某些地区的势力范围而进行的隐蔽或间接的战争形式。对人民群众各种革命运动的无情斗争，对华北抗日游击运动的血腥镇压，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对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军事“围剿”，实质上与日本强盗在满洲和热河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一种伪装的和隐蔽的形式。军阀和政客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帝国主义在华政策的执行者。因此才有国民党“不抵抗日本侵略”、“中日亲善合作”、“欢迎在中国的国际合作”等政策。因此，很清楚，蒋介石

①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中国”一词被划掉了，增加了以下词语：“前满洲王朝、被推翻的北洋军阀、安福派军阀和现在的”。

②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增加了以下内容：“有的以公开的形式，有的以伪装的形式。1931年9月18日的满洲事件(指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满洲的开始)，揭开了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新的时期——公开的武装的彻底瓜分中国及对中国人民进行彻底的殖民主义奴役的时期。尽管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极其尖锐化，但恰恰由于这种尖锐化，帝国主义强盗们才用更多的力量，明目张胆地坚决地推行自己对中国的基本路线。”

③ 在修改和补充稿上删去了“亲手”。

“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无非是帝国主义者以下口号的一种隐蔽形式：“为了能够毫无障碍地瓜分中国和奴役其人民，要尽快消灭中国革命。”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政策和他的新法西斯组织即所谓的“蓝衣社^①”的极端反民族性和极端反人民性。

但是，与蒋介石和其他军阀们的意愿相反，中国人民的政治路线明显与帝国主义者这一政策相对抗，这条路线是由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的唯一领袖——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的。它体现在以下三位一体的口号中：为捍卫中国的独立和完整，武装起来的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的这个民族叛逆和民族耻辱政府——是顺利组织和实施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而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是武装起来的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坚定的军事和政治领导者。

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为反击蒋介石、刘湘及其他军阀不断的军事“围剿”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和苏维埃革命所夺取的新胜利；中国苏维埃政府对日本占领者公开宣布的神圣的民族革命保卫战争，上海英勇的民族武装保卫战^②，中国军队在山海关、热河、察哈尔对日本进犯的武装抵抗；在满洲和华北日益发展的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辽阔地域的各个角落，工人、农民、士兵、大学生及所有劳动人民群众不断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罢工、示威游行和武装行动，全世界的华侨对国民党卖国政策不断增强的愤怒和不满——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中国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桎梏、争取自身解放^③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和自发的、高级的和低级的斗争形式的一条不间断的链条。甚至 1933 年底的所谓

① 见第 182 页注④。

② 见第 180 页注②。

③ 原文如此。

福建事件^①客观上也是中国广大民众反日反蒋情绪的一种反映。

由此看得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的斗争相结合,反帝革命斗争与土地革命斗争相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革命战争相结合,反对日本侵略与推翻蒋介石的斗争相结合——是挽救中国的唯一正确的、正义的和现实的政策。由此看得出来,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目前苏区的斗争,就是全体中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

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决定着当代中国的整个政治生活。这条或另一条路线的胜利或失败决定着中国的这种或另一种出路,也就是说,或者是彻底受到殖民主义奴役的中国,或者是独立和自由的中国。

三

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

中国正经受着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由于蒋介石推行史无前例的卖国政策,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国家已经变成了外部敌人经常实施军事行动的对象。中国现在是任人宰割。(甚至葡萄牙用一部分自己的^②力量就侵占了[南]中国海的岛屿!)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以及帝国主义者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转嫁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劳动人民身上,中国的国民经济正经受着灾难。由于水灾、旱灾、虫灾、战争和失业,每年死于周期性饥荒的有数百万人,有时甚至达到数千万人^③。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鼓励和强迫^④广泛种植和公开销售鸦片,有数千万人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毒害(例如仅在满洲,根据官方统计,近两三年吸

① 见第84页注④。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

④ 原文如此。

鸦片的人数就从 900 万增加到 3000 万，此外，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年龄在 16 至 45[岁]之间)。所有这些外部和内部的情况直接威胁着中国人民今后的民族生存；中国和中国人民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但是，与此同时，在全体中国人民的眼中和心目中已经存在自己的民族希望和民族骄傲，这就是在国内广大地区由几十万工农红军和苏维埃人民政权体现的苏维埃革命的胜利。

在苏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被推翻：寄生虫地主和军阀的土地和财物已经被没收，归属于人民；中国农村的症结——高利盘剥现象已经被消灭；所有军阀官僚主义的捐税被取消，代之实行最合理的、最文明的税务制度——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制；妇女摆脱了封建残余的桎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尽管处在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和敌人严格的^①经济封锁中，苏维埃政权还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为工人开办社会保险，对农民实行国家和社会救助并把人民的教育和保健提高到中国前所未有的高度。苏维埃政权开始竭尽全力鼓励和帮助国民经济各部门——农业、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苏维埃开始组织群众为抗洪抗旱和抗虫灾并为争取好的收成而斗争。苏维埃自上而下都由人民群众选举和重新选举产生。苏维埃政权的每个工作人员，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到一般机关的技术性事务秘书，都领取与工人中等工资相等的报酬。苏维埃政府是真正人民的政府、廉洁的政府。红军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是英勇而光荣的军队。这样的政府和这样的军队，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大众所梦寐以求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除了为进一步改善苏区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状况而斗争，还公开地声明并坚决准

^① 原文如此。

备在不远的将来为在全中国实现中国人民的以下最低要求而斗争：

1. 同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进行民族的武装保卫战，争取收复被帝国主义占领的所有中国领土。

2. 没收所有汉奸和地主的土地、粮食及一切财产并无偿地分给人民。

3.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并为工人[实行]社会保险。

4. 取消一切军阀官僚的捐税。

5. 为了防止洪灾对所有江河及堤坝(黄河、海河、长江等等)进行大修，采取与旱灾和虫灾作斗争的国家措施。

6. 实行全民的免费教育。

7. 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言论、结社、出版、居住、信仰、游行、罢工自由等权利。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把推翻非苏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看作是实现这些最低要求的首要条件。

中国的苏维埃，作为[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和在共产党垄断的政治领导下所实行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自然，不能仅为上述最低要求而斗争，[它们]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最高的和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基础上为争取中国人民的完全彻底解放[而斗争]。这种专政要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在这一过程中实行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在苏维埃政权扩展到工业中心城市情况下保证使这种革命很快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根据具体的经验确信，中国只有走苏联的道路，才能从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从一个军事弱国变成一个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只有苏维埃才能把中国从最后的崩溃和贫穷中解救出来”

(斯大林)^①。

中国的苏维埃向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劳动人民,甚至向君主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劳动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中国的苏维埃教导欧洲的无产阶级,其中包括西班牙的工人们,应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消灭反革命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权,否则就会像德国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他们随后将走向法西斯的伪装^②。

四

中国革命发展现阶段的基本特点

苏维埃革命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几年了。尽管在总战线的个别地段遭受过局部的失败,但它在该国几个省相当大的地区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然而,直到今天它都未能在决定性的阵地上^③给予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中国苏维埃革命仅仅直接依靠该国不太大的地区的力量和资源,就能够打退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帝国主义和军阀们的不断军事“围剿”,这个事实,无疑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它[这个事实]一方面在实践中表明中国苏维埃革命拥有取之不尽的力量和资源,另一方面,鲜明地[反映了]当代帝国主义的严重腐朽、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大动荡和[动摇]。然而,反革命力量虽然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几年来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和推迟了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目前中国阶级斗争状况的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是在过去的的时间里斗争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不能真正地彻底地战胜自己的对手。因此,现阶段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特点就是,在通向自己决定性胜利的征途中占优势的

① 《苏联共产党(布)第16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第22页。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

是^①非常持久的、多年持续不断的和顽强的斗争性质。

这个突出的现象和基本的特点首先是由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和弱点决定的。

总之,苏维埃革命的力量主要在于,一方面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革命的红军,有人民的苏维埃政权,有根据地,有中国苏区和非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对苏维埃和红军的无限热爱和信任,以及对它们的斗争的忘我支持。另一方面,在反革命营垒里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和纷争,中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苏维埃革命在当前条件下的弱点,一方面是苏区和非苏区之间革命群众斗争发展的不平衡、苏区经济的落后和地域的分散、红军军事技术装备的薄弱。另一方面,它直接面对着实际上以军事力量统治和占据着中国大工商业中心城市和港口的、还没有被充分削弱的世界帝国主义的强大实力。

以蒋介石和其他军阀为代表的反革命力量主要在于,他们获得了国际帝国主义者以及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浙江的金融高利贷资产阶级)的军事、军事技术、财政和精神上的支持,他们通过征收高额捐税和掠夺的方法疯狂地剥削工人和农民来弥补军费的开支,他们还能够利用被他们欺骗的和饿得骨瘦如柴的劳动人民作为雇佣的士兵,让他们去攻打他们的同胞兄弟——工人、农民和他们的红军。而中国军阀及其主子帝国主义的弱点首先就在于,他们缺少共产党和红军所拥有的东西,即战无不胜的共产主义的力量和中国劳动群众的忘我支持。

世界斗争的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正在战斗的国家的命运最终不是由军事技术决定的,而是由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决定的。

最近一年,蒋介石在黄郛和汪精卫的积极帮助下通过进一步

^① 原文如此。意思是：“带有”。

公开地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并把华北置于日军的直接控制之下，取得了并且正在取得日本帝国主义新的军事和财政援助。这种援助一方面使蒋介石能够迅速反击华北（吉鸿昌、方振武、冯玉祥和孙殿英的部队）和华南（福建的 19 路军）抗日反蒋军事行动，而另一方面使他有可能会将一切可以由他指挥和调动的部队调往江西、湖南和福建去“围剿”红军和苏维埃。这种情况导致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进一步破产和在军事上的暂时局部的加强。因此，出现了蒋介石对苏区第六次“围剿”^①的特别巨大的规模和持续不断的性质，以及红军在反对第六次“围剿”的斗争中比较缓慢和逐步地向前胜利推进^②。

在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这种持久的长期的斗争状况还要继续多久？何时在他们之间进行最后的决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取决于国内和国际事态客观上的进一步发展进程，[而且]还特别取决于这两个敌对营垒之间平时的斗争。国际和国内性质的许多征兆已经清晰可见，这些征兆表明决战的时刻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到来。

五

对决战的准备和中共的策略

目前中共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和在中国夺取苏维埃革命的决定性胜利，以便拯救中国人民，使之免遭彻底的殖民主义奴役，进而制止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和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爆发。

1. 执行这一策略方针的首要条件，是动员苏区和非苏区一切可能的革命力量，来反对蒋介石和刘湘对苏区的第六次“围剿”以及将要面临的新的“围剿”。中共这一策略方针的正确初始想法应

^① 指的是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②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使红军逐步走向胜利。

来源于以下基本方面：

(1)当前革命运动发展的主要特点及其与中国革命决定性胜利的各种近期前景的联系,这种前景产生于远东和世界范围内以及中国国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2)策略手段不同寻常的灵活性和机动能力,这种手段使党能够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和资源去进行反帝斗争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以及为革命最大限度地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和冲突;(3)每一个相应时机主要打击对象的选择和对中国不同地区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同条件、不同水平和不同规模的区别对待;(4)最大限度地利用革命的有利条件来克服它的弱点,并利用反革命的不利条件来抵消它的优势^①。

根据这一总的基本策略方针,中共在国家的主要不同地区给自己提出了下列具体任务：

1. 苏区的主要任务：

(1)全力加强和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和最广泛地开展对敌人的机动灵活的游击战。

(2)通过加强苏维埃建设及同苏区和非苏区劳动人民群众的战斗友好接触来开展反对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

(3)进一步改进和精简苏维埃国家机关,并通过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苏维埃的日常工作和加强苏维埃的基本依靠力量——群众组织(首先是工会、贫农团等等)的战斗力来提高其工作能力。

2. 国统区的主要任务：

(1)在“抗日救国”口号下,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推翻以蒋介石为首的汉奸政权。

(2)通过组织农民和饥民争取大米、粮食和住处^②及反对捐税的日常斗争,在蒋介石“围剿”苏区部队的大后方开展群众性的游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住房。

击战,目的是对红军进行战斗支援和建立新的苏区。

(3)加强对工人斗争的领导,目的是在铁路、水路运输部门和大城市中的重要企业建立党和赤色工会的据点和巩固的阵地。

3. 日本占领区的主要任务:

(1)夺取群众性抗日游击运动的领导权和通过最大限度地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游击队,建立所有抗日力量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在群众和游击队之间建立紧密而友好的相互联系,来进一步扩大这种运动。

(2)组织建筑工人和饥民的日常斗争,目的是在敌人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地区和一些大城市建立党和工会的据点。

(3)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口号下,动员中国、蒙古、朝鲜和日本的人民群众参加反对日本君主帝国天皇及其溥仪玩物^①政府的统治。

4. 在西北省份和其他民族边区的主要任务:

(1)在反对共同敌人——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和非国民党军阀的斗争中建立中国民众、维吾尔族穆斯林、蒙古族和东干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

(2)组织农民群众的日常反对捐税、地租及高利贷和争取大米、粮食、住处^②和燃料的斗争。

(3)开展农民群众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游击斗争。

5. 海外华侨共产党人的任务:

(1)在“救国”的口号下,使华侨摆脱国民党的颓丧的^③影响。

(2)组织广泛的运动,号召华侨给予红军和抗日游击队以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

(3)积极参与并联合华侨所在国的劳动人民一起进行反对帝

①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傀儡。

②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住房。

③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已经动摇的,已经减弱的。

国主义的斗争,在海外的劳动人民中间大力宣传中国革命,[目的是]广泛组织援助中国革命的“中国人民之友协会”等团体。

同时,各地区党的组织都应该特别注意到,在战争、革命和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党在瓦解敌军和争取[它们]转到革命方面来的工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为这项工作动员和培训我们拥有的最好力量,是全党最重要的任务,中国苏维埃革命今后发展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任务的解决。由于不同寻常的^①民族危机、国民党的分崩离析和雇佣军的实现^②,以及中共和红军威信的提高,完成这一任务的客观条件无疑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工作和善于工作。

此外,全党还应该更多地加强宣传苏区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方面的工作,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作为唯一能够拯救中国的力量——红军和苏维埃的斗争。与此同时,党应该更系统地和更具体地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号召“中国和苏联的工人和农民结成兄弟联盟”。苏联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比对其他别的国家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怀疑,苏联今天的生活就是苏维埃中国未来的前景。最后,全党应该更加重视把小资产阶级争取到革命方面来的任务,近几年来这个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正在迅速地革命化,把它吸引到革命斗争中来具有重大的意义。

六

为党的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为了顺利完成上面提出的策略任务,为党的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和决定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摆脱奴役和贫穷状态而斗争的唯一领袖,中国苏维埃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雇佣军的存在。

革命今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问题,首先恰恰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弱点。1931年初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①,根据列宁主义中央的总路线,粉碎了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左”的李立三路线和右的罗章龙反革命集团,在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方面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近几年来中国苏维埃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就,首先是因为中共及其领导的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党在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壮大、它的统一和团结、它的战斗力和机动灵活性的加强、它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的增加和加强。

然而,中共直到今天在自己的工作中仍然有很多严重的弱点和缺点。其中在中国非苏维埃地区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弱点和缺点,应该指出以下一些:不善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帝抗日统一战线;不善于在企业中聚集工人的力量和不善于在黄色工会及国民党工会中工作;在瓦解和争取敌军,特别是其主要部队方面没有进行系统的工作;对敌人的蛊惑宣传和手腕反映迟缓并对其采取轻视的态度;对于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学生群体中的工作重视不够;在党和群众组织的组织系统中及其工作方法上存在着公式化和保守主义,对于干部的教育、培养和提拔不够重视。苏区工作中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缺点和弱点有以下几点:苏区(鄂豫皖苏区和第2、第4军团所在的地区等)的群众工作做得不够;对于与苏区毗邻的地区的劳动群众和居民的工作做得也不够,有时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在执行经济政策等方面存在着过火行为和失误。

正是由于我们工作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弱点和缺点,才出现从组织上巩固党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不够和主观因素相对落后于革命群众斗争的客观要求的局面。

为了克服自己工作中的弱点和缺点,保证顺利完成面临的巨大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应该解决下列主要的组织方面的任务:培

①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养和提拔数千名新的党务工作干部、军事干部、苏维埃干部和工会干部；建立和加强独立的、有首创精神和工作能力的、担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党组织；加强同各种反革命集团（“蓝衣社”、“国民党改组派”、“社会民主派”^①、“少年中国党”^②托洛茨基—陈独秀派等）的思想斗争，提高所有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政治理论水平；以十倍的努力和注意力去改善和加强秘密工作和反奸斗争；根据阶级斗争的新条件改变旧的和寻找新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在坚定地坚持把自我批评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作为党的领导和整个活动的基础的方针的同时，还必须同把它们歪曲成^③空洞的词句、冷嘲热讽和毫无根据的严重的政治诬陷的倾向作斗争。应该最大限度地使自我批评和党内斗争带有说服教育的性质。当前，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矛头既应该指向公开的右的机会主义倾向（表现为不相信革命力量，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革命斗争表现出悲观失望的情绪），也应该指向“左”的和宗派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妨碍党在政治舞台上以一切反帝反蒋力量统一战线的领袖和组织者身份出现。

在中国苏维埃革命走向决定性的和彻底的胜利的征途上，党遇到了许多巨大的困难和国际国内方面的难题。但是最后的胜利永远属于像我们这样用正确的和不可战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武装起来的党，属于不怕任何困难和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的党。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08，第 52—69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指所谓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于 19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福建省活动。

② 中国青年党，1923 年成立。

③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变成。

284

赖安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①

1934年9月3日^②于上海

致东方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

草草地写了几点述评，谈的是随着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对中央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七次“讨伐”^③而出现的军政形势和近期前景的几个方面。

与第六次进攻“最后阶段”的局势相比，也就是与大约在1934年6月初敌人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基本上停止和暂时受到限制时的局势相比，现在的局势对中央苏区和红军是更为有利的。尽管南京政府为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在定于11月份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④前夕取得这种胜利，可能会作出巨大的努力，但是顺利保卫中央苏区和坚决粉碎第七次进攻，以及夺回在第六次“围剿”中失去的部分苏维埃土地，扩大苏区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① 文件上有批注：收入绝密中国公文。[1934年]10月20日П.米夫。米尔顿[赖安]关于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第七次“围剿”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措施问题致东方书记处的报告稿。

② 信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4年9月13日收到的。

③ 这里及以下指的是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的第五次“围剿”最后阶段。

④ 指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会增大。

从可以证明这种估计正确的因素和事件中,我简明扼要地指出以下几点:

1. 由于超额完成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在6至8月间的动员计划^①和工作计划以及在夏天成功实施的一系列战役,红军有效地突破了敌人在中央苏区东南部和西部战线的包围,同时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阵地,现在红军迫使敌人分散[自己的兵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的军事部署,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甚至改变其在江西北部的军事部署。当前红7军在浙江南部^②和红6军在湖南东南部顺利实施的战役^③,还要带来某种附加的战术上和阵地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在最近几个月内可能具有更大的意义,更不要说在浙江西南部、湖南东北部和中部可以建立新的苏区以及这个因素的意义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战役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战绩,其中有:给敌军主力部队以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延迟和部分地瓦解了第七次“围剿”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在福建战线;保证了相当多的弹药、药品、食盐、火药、物品等的供应(尽管步枪、机枪等的数量还不太多);对政府军的一些师起到一定的精神瓦解作用,在许多参谋人员中也发生了这种情况;其次,红军第10军团在这个时期胜利地保卫了自己在江西东北部的根据地以及在安徽南部的苏区。此外,总的说来,近几个月在江西、福建、湖南和安徽等省的各种游击队和游击小组的战斗力的增强了,他们的行动更加协调,开展得更加

① 指中央苏区通过改行义务兵役制和动员中央苏区新的适龄男性居民去红军服役的办法补充和扩大红军部队的计划。

② 见第176页注④。

③ 指第6军团在1934年8月开始的向湖南省的进军,于1934年10月以在广东省东部与第3军会师而告结束。

广泛和有效。

2. 刘湘的主力、第5和第6野战军8月底在万源地区的惨败，不仅意味着敌人受到了惨重损失，而且意味着至少暂时消灭了他们在四川的进攻兵力的核心力量。红军当前反攻的开始和随后在万源—城口地区取得的一些重大胜利，已成为战争的转折点，使阶级力量对比继续更快地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显然，这不仅对于完成收复在春天和夏初“围剿”过程中丧失的地区及扩大和巩固川陕边区的苏区的任务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反击对中央苏区的第七次“围剿”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里我想强调指出，迫切需要在[中共]中央和四川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工作关系和加强对四川苏区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3. 最近几个月表明，贵州东北—四川东南的苏区和游击区的状况有一定的加强，而贺龙的部队取得了一些新的胜利。报刊的一些可信的报道表明，贵州北部至少有六个地区处在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之下，包括德江、余庆和石阡等重要地区。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建立和巩固稳定的中央苏维埃根据地，扩大这个根据地并保证贺龙部队和红军其他部队之间的协调作战和游击行动，特别是在湘西和川东南地区。

4. 湖北东部、安徽西部和河南南部的苏区、红军和游击队的状况在6至8月间也大有改善，这是因为在最近几个星期内取得一些重要胜利（例如，在麻城—商城地区，敌人的两个旅实际上被消灭，缴获了大量步枪和弹药），也是因为成立了几个新的游击中心。这对于扩大这个地区迅速发展的农民反饥饿的革命斗争和建立新的游击区及苏区都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也能够和应该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成功地开展游击行动和在平汉铁路地区的怠工行动方面，以及在抵制敌军从北方向江西的调动方面。

5. 至于满洲和北方，则可从其他一些事件中指出，夏季的几个月已经见证了义勇军和游击队的抗日斗争及群众运动的迅猛高

涨,群众运动与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比以前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虽然联系的还不够。显然,这又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开展[支持]抗日战争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现在基本上是自发的、不协调的),孤立“左派”国民党及其他假“左派”首领,运用灵活的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在队伍中和斗争中^①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牢固基础,以及将该运动与保卫和支持苏区、红军和苏联的斗争更紧密的结合起来,仍然是满洲党所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最近几个月在这个方面可能取得的进步,除了其他作用外,在加强反对第七次“围剿”、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方面也应起到不小的作用。

二

1. 农民的群众性战斗行动和游击行动不断高涨的浪潮,是最近几个月来国统区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重要因素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些行动基本上是自发的并开始在遭受旱灾和饥荒的地区,特别是在浙江、湖北、安徽、河南和江苏等省传播开来。这种运动在最近几个月随着饥荒和经济混乱的进一步加剧将会得到迅猛发展,如果党来组织和领导它,它的巨大规模和比较高的革命水平就会成为粉碎第七次“围剿”和建设新苏区和新游击区的一个强大因素。其次,与此相联系,由反饥饿、争救济、夺[储备]粮食、降物价、抗捐税、夺土地等迫切任务而引发的这种运动,从种种迹象看,将很快导致主要工业中心城市的失业者运动和罢工运动的加强和扩大,还会得到来自工人发动方面的新的鼓励和领导。

2. 关于反帝运动:当广大群众的革命愤怒情绪继续高涨,并随着国民党采取的每一步卖国行动和随着日本对这个国家发动的战争的继续以及向内蒙古、华北、东北、福建等地的经济渗透和军事侵略的扩大(更不用说英帝国主义在四川、新疆、滇西等地及法帝

^① 原文如此。

国主义在云南和广西的情况和行动)而加剧时,事实是:群众的这些不断高涨的反对国民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和仇恨,除了主要在满洲和华北掀起的民族革命运动和战争的进步浪潮外,还没有形成在当前条件下有可能形成的强大的群众行动。例如,当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纲领^①的提出和发表得到广泛响应并具有相当大影响的时候,党既未能为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②——中国共产党建立群众性的组织基础,也未根据该委员会的纲领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和广泛的统一战线行动。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不仅是由于最近的“围剿”和逮捕,党的机关的许多联系部分地和暂时地被破坏,而更是由于多数省份和地区的基层党组织没有被充分地动员起来去完成党在这方面的任务,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存在着分散的问题及群众性的反帝工作与完成党所面临的其他任务缺乏紧密配合的问题。此外,现在不论是反日发动还是红军的斗争都没有广泛展开,而白区党的组织至今未能组织和领导强大的群众运动来积极支持由红军发动的抗日战争。现在根据[中共]中央7月26日的指示^③所采取的步骤表明,很快就要发生某些变化。从这个角度和现在的情况来看,最有可能的是,今后几个月我们将成为反帝运动和民族革命战争取得伟大成就和其日趋激烈的见证人。

3. 关于各政府部队和省部队内部状况的零星情报,特别是与革命的士兵运动有关的情报表明,革命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士兵大批开小差,士兵哗变也在增多。例如,在四川、河南、贵州、湖北等省白军中发生了这种事件,更不必说在“满洲国”发生的起义和哗变了。在河南,例如,当命令第20军向江西转移的时候,有3

①· 见第116页注⑥。

② 原文如此。应为:中华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③ 文件没有找到。

个团全部逃跑了；还有梁成伟(音)将军部队的3个团前不久在亚开州(音)附近起义了。在贵州，夏季的头几个月，省军的一个师全编制转到了红军方面。来自福建的“秘密”报告也指出，在政府军的一些师中，特别是在前19路军的士兵中，存在着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和革命的骚动。所有这些机会和当前形势的需求都要求从根本上改进党在白军士兵、警察和“绥靖”部队中的群众工作，这项工作可能会很快带来巨大的效果。

4. 6月至8月间罢工运动的低水平是当前抑制这种运动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是迅速克服这个因素的一切必要条件还是存在的。这个时期的罢工，主要局限于轻工业部门，局限于出租车司机、电气工人、啤酒酿造工人、橡胶和火柴生产企业工人的小规模的分散行动，并且都是短期的。与1934年头四个月罢工斗争的蓬勃发展及很高的革命水平相比，现在在工人罢工运动中出现了暂时的沉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白色恐怖部分地有所加强及党和工会在最近几次“围剿”过程中受到一系列沉重打击(这种“围剿”严重地损害了工作)、失业现象进一步增加等，以及黄色工会领导人最近的背叛和强化了了的蛊惑性花招；另一方面是由于党和中华全国劳工联盟^①存在弱点和不足之处，特别是在组织和领导罢工和失业者斗争方面做得很差；还由于在最重要的工厂、矿山等部门集中[力量]不够和业已发起的行动持续时间不够长；在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和轻视在国民党工会中的工作；工厂、港口、铁路及其他行业的支部和工会小组的状况以及从组织上给以加强的工作都不令人满意，多数党组织不善于利用最尖锐和最迫切的局部经济和政治要求，不能有机地和具体地把争取这些要求的斗争同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及保卫苏区和红军的斗争等结合起来，甚至由于很多党委会和党的组织对工会工作认

^① 原文如此。应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识的混乱和不清楚,这只会助长对群众工作的这个主要领域的估计不足和轻视。根据[中共]五中全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①,[中共]中央正竭尽全力结束这种局面,近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即在海员、上海人力车夫、唐山矿工等中间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除了危机的空前加深和对工人及劳动人民进攻的加强等,党的工作的这种好转同群众的革命不满情绪的增强也表明,罢工斗争的暂时低落将很快让位于罢工运动的再次迅猛高涨。党在非苏区的这方面任务仍具有重大意义,而完成这些任务将显得更加迫切。

三

1. 由于革命形势的日趋紧张和特别是经济危机的灾难性加深(这种危机现在已经达到新的最低点并且没有因为所有民族的和阶级的对抗在持续不断的激化而减弱,南京最近向日本人投降的举动和已经激化了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加加剧了民族和阶级的对抗),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国民党集团和形形色色的“独立的”封建资产阶级集团(诸如蒋介石、黄郛—安福系^②、西南委员会^③、陈氏兄弟^④、汪精卫、宋[子文]—孙科)及其他集团加大了压力和在不小的程度上[由于]前不久和现在进攻红军的战役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及由于这个时期苏维埃革命和一些非苏维埃地区的革命群众运动取得了进一步胜利,尽管是大小不一的胜利,近几个月来,除了其他情况,国民党营垒内部的矛盾大大加剧了,而南京的地位更加削弱了。

在可以证明这一点的重要事实中,有前不久航空局头头(蒋介

① 见第 32 页注②。

② 中国北方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因 1918 年在北京成立安福俱乐部而得名。

③ 指国民党西南政治委员会。

④ 指 CC,即中央俱乐部,由陈立夫和陈果夫于 1929 年成立的国民党派系。

石过去的右臂)的被处死和不久前尖锐的内部冲突、“蓝衣社”^①领导的撤换和改组(包括撤掉蒋[介石]的人——邓文仪),这一切都表明,不仅在国民党各主流派内部而且在占统治地位的蒋[介石]集团内部不断加剧的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紧张的阶段。因此,围绕拟议撤换铁道部长的内部斗争^②反映出在政府圈子里的分歧在不断加大。同时,南京和广东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疏远也大大地加大了。这表现在受英国教唆的广州反对新的对日本人有利的税率上,表现在在西南召开的一系列旨在反对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支持保留西南政治和军事委员会和加强粤桂黔湘反国民党军事联盟的军政会议上,表现在广东对待中央苏区采取相对消极的和临时防御性的军事政策上,等等。何键自广州返回后在南昌被暂时逮捕,也反映出南京与湖南之间关系的尖锐化和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南京和西南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中,湖南的军阀们很有可能站在西南的一边。

统治阶级营垒内部的这些业已成熟并加剧的分歧,当然还会发生迅速的变化和变动。然而,它们也清楚地反映了加速国民党互解的内外矛盾的加深。

2. 对日本人和南京当前政策的一些说明。这种政策的主要方面和目标已经清楚地确定下来,无需作说明。现在,日本人在企图加强自己在满洲及东北各省的地位并扩大自己的军事基地和战役行动,同时特别注意对福建、西北、山东和河南进行进一步的经济政治渗透和控制,更广泛和更积极地参与对红军的作战行动,并且为了让南京正式承认“满洲国”和获得在全国范围内的附加经济让步,在加强对南京施加的压力,在长江流域省份大大加强了自己的

① 见第182页注④。

② 指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1934年7月1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关于撤换顾孟余的决定的争论。

活动,甚至企图缔结更牢固更积极的反苏维埃联盟。南京在这方面的投降和最近一再做出的让步已经众所周知,例如,7月的税率,恢复铁路运输^①,把江湾造船厂交给日本人,任命日本海军顾问到马美(音)海军基地,等等。在不久前[8月底]结束的朱古岭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让黄郛集团在一切政务中放开手脚的决议——迄今为止黄河以北各省的军事控制权形式上仍然握在蒋[介石]的手里。毫无疑问,很快还会向日本人继续做出让步。

正如已经指出的,尽管在南京和日本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首先是在“互相”让步和南京希望限制日本在华北的统治权问题上的矛盾)，“相互协调”政策现在已经并且以后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国际和国内的所有矛盾。

已经明显地形成了这样一种形势,这种形势对于快速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和群众运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有利,而特别是这种群众运动的矛头是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目的是更积极地支持和保护苏区和红军。

致同志式的敬礼!

米尔顿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137—140 页。

英文打字稿, 副本。

① 指日本和中国当局签订的关于从 1934 年 7 月 1 日起恢复在日本占领满洲后中断的北平和奉天之间的铁路运输。

2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4年9月4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政治委员会致中央苏区、[中共]中央

第一,我们建议[中共]中央在中国南方的一个港口建立一个为苏区采购和运输武器、弹药和药品的不大而有效的机构。最近几天我们将找到一位合适的外国同志并派他去帮助你们的同志做这项工作。请告在什么地方和如何组织这项工作最合适。第二,我们建议[中共]中央从中央苏区抽调一位有威信的政治工作人员和一位军事工作人员来加强对第2[贺龙]军的领导。但是这项工作应该做得谨慎并且应该派遣懂得策略的同志,以便不激怒贺龙反对[中共]中央。第三,我们同意你们关于四川问题的意见。我们认为四川省的苏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帮助第4军^③指挥部,根据你们的请求^④,我们向那里派遣一位军事专家^⑤。第四,我们认为,中共中央应该做好下列工作:(1)在中国国统区加强对

① 文件是以政治委员会委员们的飞行表决方式于1934年9月2日通过并于9月3日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批准。

② 解密的日期。

③ 原文如此。应为:第四军团。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何人不详。

苏区实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措施的宣传；迄今为止这项工作都没有认真地去做；(2)向中国人民发表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号召积极援助红军这支能够捍卫中国的独立和完整的唯一力量(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起草这种宣言的草稿并寄给你们)；(3)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①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利用一切在野的反对蒋介石的力量；(4)加强[中共]上海中央局并对那里党的机关进行必要的改组。在这方面，从你们的电报^②中还看不清楚，你们是否同意我们把省委同[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同[中共]上海市委分开^③的建议。

全宗 495，目录 1，卷宗 48(1934 年发文)，第 9—10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见 182 页注④。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见第 73 号文件。

286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4年9月14日^②于瑞金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

广东的代表^③仅作为建立联系的信使[已经来到],带来了具体的建议。我们让他给陈济棠带去了一封信^④,附有去年我们向第9^⑤军提出的那些[协议]条件^⑥。在我们的策略中^⑦,广东提出的目标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利用我们作为反对蒋介石的屏障。

波戈列洛夫^⑧[1934年]9月14日。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3(1933年收文),第21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
- ① 在文件上有批注:已送皮亚特尼茨基。
- ② 电报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4年9月19日收到的。
- ③ 据一些资料说,他姓李,见《朱德选集》,北京1983年,第17页,据另一些材料说,他姓徐,见《中国党史资料》第66期,北京1998年,第166页。
- ④ 看来,是指朱德1934年9月给陈济棠的信。
- ⑤ 原文如此。应为:第19路军。
- ⑥ 关于互不进攻、取消封锁、建立自由贸易、实行民主自由、武装民众、组织反对蒋介石的运动和准备共同武装反击南京的建议。在朱德给陈济棠的信中重复了这些原则。见《朱德选集》,第17页。
- ⑦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以这种策略。
- ⑧ 秦邦宪。

287

施特恩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 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

1934年9月16日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四川—新疆问题的建议

毫无疑问，四川苏区就自己的有利位置、自己的实力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言，可以在中国苏维埃化的事业中发挥极大的作用。既然早已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华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那么从四川苏区方面来说，这项任务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进行^①的，下面将谈谈这些条件。

由于江西中央苏区遇到了困难，四川[苏区]问题就提到了首要地位。我们从这里可以关注四川苏区并对其今后的发展给予切实的帮助。由于形势的原因中共中央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放下四川苏区不管，让它自行发展和放任自流，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以后不仅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而且在日本发动对苏战争情况下也会影响日本后方的战略地位。

四川苏区可以发挥其历史作用的条件，主要是主观方面的条件，也就是说，它们完全取决于我们准备开始执行的援助政策，不能将这种援助的开始束之高阁。

^① 原文如此。应为：解决。

这里简要地总结一下在关于四川问题的口头报告和辩论^①中已经说过的东西,以及我们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建议中所涉及的东西^②,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 四川的红军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在战士数量上具有相当强大的优势,并不亚于中央苏区红军,它所面临的敌人比江西的敌人软弱得多,四川的这支红军为自己的弊病所困扰,使其不能在中国西部的革命战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威力。

2. 四川红军的弊病首先是:党团组织软弱,在主要根据地的苏维埃后方组织得较差,党在四川国统区、在敌军后方的工作较差,在敌军中的工作也较差。

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四川红军及其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太软弱。问题仅仅归结为这里的干部问题,四川的红军不善于造就在数量上和和质量上所需要的干部。

二

消除四川红军上述弊病的过程,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需要太多的时间,而且不经过曲折和政治领导层的内部危机未必就能完成。如果从外部给予帮助,这个健康化的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它可以被纳入有计划的发展轨道,这样领导危机的危险性就可以降到最低限度。

我们想这样来组织来自外部的帮助:

(1)首先向我们的中亚地区(阿拉木图)投入一个核心领导小组(一位政治领导者,一位军事领导者,一位党的组织者,几位携带通讯器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的代表),他们作为

① 文件没有找到。可能是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和为制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4年8月15日的具体建议而成立的委员会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见第282号文件)。

② 看来是指第282号文件。

中共[中央]西北局开始工作。

(2)西北局最初时期的任务是,研究一方面通过新疆——甘肃,另一方面通过蒙古西部、宁夏——陕西同四川建立通讯联络的可能性。

(3)借助于无线电台建立通讯联络,为此一开始通过上海,然后通过无线电报务员将西北局电台将与四川电台工作时所使用的密码和呼号告诉四川。

其次,通过由对方联络的方式从西北局经过新疆向四川和由四川经过甘肃向西北局发展秘密通讯联络网。

(4)随着通讯网的发展和直接无线电通讯的建立(为此要用六个月时间),西北局可以秘密地进入新疆,接近四川,或者也可以向中国西北各省逐渐派出先头筹备小组,主要是在省军部队里着手组建秘密党支部。

(5)由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为这项工作选派一些中共党员作为西北局的干部。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西北局。

(6)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任,西北局要与联共[布]中亚党组织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得联共[布]的相应干部援助。(很有可能,在中亚党组织的编制内就有来自中国西北各省的可靠的汉族同志或者了解中国西北当地情况的其他民族的同志。)

现在新疆总的军政形势是这样的: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可靠的人士,在他们的帮助下,联络途径和组织本身的发展将会得到强有力的推动。

(7)其次,从莫斯科经常派遣经过培训的新干部,这些干部出自中国组织的编制,应正常进行派遣。也可以从远东(通过突西铁路^①)向新疆输送干部,这些干部来自那些在满洲北部战斗过程中

^① 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

被迫转入苏联境内的游击队，它们在那里被解除了武装。

所有这些在当地经过考验的干部将被派往中亚，由西北局支配。

(8)西北局的任务是通过与四川的联系来组织和领导中国西北各省的游击战。在那里应该利用西北各省的人民革命人士、脱离省军的部队、在上述各省活动的所谓土匪队伍(在甘肃由于闹饥荒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政治上盲目的农民队伍，为使他们的斗争走上自觉的阶级斗争轨道，需要对他们进行政治领导)，最后，还要利用为反对汉族和本民族封建军阀及其帝国主义靠山(英国人、日本人)而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少数民族队伍。

只要与不同组织形式、斗争目标和不同来历的武装队伍建立联系，并向这些队伍派遣经过训练和阶级斗争考验的干部，我们就能够在中国西北部掀起农民战争的巨大浪潮，掀起游击活动^①的浪潮，这种游击斗争最终将与四川红军的斗争融为一体。

(随着游击活动的发展需要经过中亚向当地运送一定数量的小型手提式无线电台和其他军用物资。)

(9)在游击活动的发展过程中，正如我们在前面一点中所想象的那样，可以从滞留在我们领土上的满洲游击队中输送经过培训的大批干部，这些游击队是在远东的斗争过程中被迫转入苏联境内的。

随着这些来自满洲游击队的新队伍(他们正在为自己返回祖国开辟道路)出现在西北地区，整个斗争将会受到强有力的推动。由于这种比较遥远的时刻可能与日本开始进攻苏联的时间相重合，所以限制我们现在就公开给予援助的一些考虑就失去了意义，我们的援助将会成为对西北发展起来的运动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即干部、武器和弹药的支持。

^① 原文如此。这里和以下应为：游击斗争。

(10)在预见这种时刻和为这种时刻做准备时,我们需要在中亚建立一所秘密的军政学校,通过它来培训那些从西北各省派出工作的干部,以及接收从四川红军通过新疆和四川之间目前已经打通的道路派到我们这里来学习的一定数量的干部。

应该毫不迟疑地开始为这所学校招收和培训教师^①干部,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需要这所学校,而一旦与日本发生冲突时,很快就会需要。

(11)可以预见到这样一种情况,只援助培训的干部是不够的。需要援助武器、弹药、飞机等,这种需要可能会较快地——还是由于远东的战争——提到日程上来。在预见到这种情况和为这一时刻的到来做准备时,需要开始往中亚调运武装西北各省游击队5万名战士所需要的一切。要建立秘密基地仓库,储备能装备50人、100人和1000人队伍的成套备用武器弹药。

在我们的仓库里要有足够的别的型号的武器(德国的、英国的和日本的),这种武器可以收集、修理,经检查后将其运往中亚仓库,保存这种武器的仓库距将来使用的地方不要太远。

(12)在不断增加的整个援助四川苏区的计划,可以预见到,应该在一至两年期限内实现。[这项工作的]开始不能再拖延了,应该马上着手做这项工作,否则我们会落在事态发展的后面。

作为中国西北革命主力的四川红军,其今后的发展进程将取决于有计划地开展业已开始的这项援助计划。

至少,不应该舍不得为西北局,特别是为其军事任务抽调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干部。需要一个由军人同志组成的协调得很好的^②支部,即一个能组织和领导西北游击战争和四川红军斗争的小司令部。

① 原文如此。应为:教学。

②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协调的团结的。

其余一切都取决于正确的开端。

弗雷德^①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575, 第 11—16 页。

打印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M. 施特恩。

288

康生和王明给中共 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

1934年9月16日于莫斯科

中央政治局诸同志：

八月三号我们写了一些信给你们，(第三号通讯)^①不知收到否，现在想告诉诸同志以下的问题。

1. 准备七次大会^②问题——国际七次大会^③延长了的主要原因，是为要加强各国党的准备工作，就是要学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④的经验，动员各国共产党员参加大会的准备工作，现在决定在十二月半公布大会政治提纲，和报告大纲，不仅各国党的领导机关要详细研究这些提纲和大纲，而且支部同志也能够积极参加研究大纲的工作，我们党在现在就应当开始准备大会的政治工作，从中央到支部都要开始研究六年来国际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尤其要研究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新的特点，在提纲没有公布以前党应当利用已经有的国际问题材料加以研究，特别是要动员全党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此地代表团与东方部已决定帮助供给材料给你们，决定写的材料(文章，小册子等)如下：(1)目前中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61页注④。

③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最初定于1934年10月召开。

④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

国形势与党的策略,(2)民族革命战争问题,(3)职工运动,(4)党的建设,(5)满洲问题,(6)民族问题(此纲领已经早已送去^①,恐你们已失掉,现决定再送给你们),(7)中国工农民主专政的特点,(8)农民问题,(9)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这些东西在十月底大概可以完全写起,十一月份可以开始送出,当你们在没有收到这些材料以前,你们可以利用已有的材料,进行工作。在进行工作中在白区应注意秘密工作所允许的范围以内,至于在苏维埃区,不但在全党的党员中进行讨论,而且非党的工农群众及红军中都应公开讨论。(在报告时不应将大会真正的期限说出)在讨论中应搜集六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并且能够作出总结,送到这里,尽可能的将进行的工作随时告诉国际,参加大会代表的成分,必须要慎重的选择,在苏区应当经过选举,在白区应当慎重的指定,要使代表成分,能够一方面保证真正总结全党的工作经验,另一方面要有真正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与群众有密切关系的领袖,不要尽是地方党部在机关中作工作的同志。代表的数目,我们党有正式代表三十人,有发言权的代表由中央决定数目,征求国际同意。至于代表来莫的期限最好不要都在会期附近,一方面那时敌人注意力更大,另一方面我们人数很多,很难保证会前按时到会,所以能够早来的,就先来更好。

2. 满洲问题——最近我们得到一些新的满洲各地的文件,及来人的通知,可以看出党在满洲的反日游击运动有相当的成绩,同时客观形势有极大发展的可能,可惜主观力量太薄弱,我们根据材料和报告,已经进一步研究满洲问题,现在正在准备给满洲党几个问题的文件,例如:游击战争与政权问题,职工运动问题等,我们相信这些文件像前次的信^②一样,在满洲工作上能够起积极的作用。

① 见第125号文件。

② 其中就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的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致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21—45页。

因此我们希望中央在没有得到我们这些新的文件以前,不要写给满洲省委关于游击运动等策略问题的文件,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许多主要策略问题,两方面的文件时常有不一致的意见,(如最近中央根据何某的报告决定罗某^①写的信^②,有许多策略问题不正确,不仅与过去给满洲的信——一九三二年底根本转变满洲的策略有不同之处,即将来新文件也不能同意罗某起草信中的某些意见,)因之使满洲同志发生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满洲的组织,现在非常严重,省委只剩了两个人^③,那里的另一同志,我们已经告诉了你们他来到了这里,实际上他已经不能在那里立足,另外两个也是同样的情形,一方面有叛徒杨明佛、杨波,据报告上海孙际明也在那里,另一方面他们在那里不能活动,处在一种极危险的状态里,为了保持那方面的工作,为了保护这些干部,省委组织问题是非急切解决不可,但是我们这里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作到的是一方面讨论了并改变了组织的结构,详细这里不便写,以后告诉你们^④,另一方面是设法帮助建立独立工作的地方党部。至于省委的代替人选问题,请你迅速设法解决。

3. 西北问题——据我们知道陕北的游击运动很发展,那里许多的游击队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央应将这地方的工作的注意力提高起来,党应立刻派许多政治军事上强有力的干部去,宁可将一些没有多大群众工作的地方党部省委的干部,拿去作这样的重要的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在陕南的游击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果在这两方面都加强了领导,最近的将来是可能使这两方面的游击运动联系起来,创造陕西广大的苏区,并且将陕西

① 李维汉。

② 指193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致满洲省党委会的指示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21—141页。

③ 何人详。

④ 何人详。

的运动与四川的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所以我们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据说在北方有许多陕、甘、宁夏的同志,中央必须设法将他们派回去,进行游击队工作与士兵工作,同时利用一切北方同志到这些地方去,完成这些工作,无论如何要求你们派一部分西北与北方的干部来学习军事政治,学生的条件不一定程度很高,只要积极忠实,勇敢便可。

4. 士兵工作与游击运动——在中国革命与战争的环境里,士兵工作与游击运动,应当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没有能将这工作当作工作的中心。过去抗日同盟军^①及孙殿英军队中的工作就是例子,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在这两方面的军队中真正建立了强有力的党的工作,真正派去很得力的干部,甚至那时河北省委及北方局的同志都去参加和领导这方面的工作,那么这两军队不仅不会失败,而且可以将大部分夺取到我们方面来,变成我们领导下的军队,如果这些军队能够在西北存在,那不仅使西北形成另一局面,即全中国的革命运动亦可发展到一个新的形势,有许多地方党部还不了解在现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下党的中心工作是什么,因此将兵士工作与游击运动看为是次要的,实际上兵士运动在目前的环境中决不亚于职工运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在某一时期,集中力量去进行某一种一定的紧急工作,结果样样都想作,样样不成功。因此,我们提议中央将我们党的最好的力量,集中到下列三种部队去进行工作:A、蒋介石“围剿”苏区的基本部队,B、河南的东北军,19路军,孙殿英军队,C、陕甘的杨虎城,胡宗南,马鸿逵,井岳秀等部队。派人去作这些工作时,不要像以前只限一部分作过士兵工作的,或者现没有多大工作的同

^① 原文如此。指1933年5月由冯玉祥成立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志,而是要将工人,农民,学生支部当中,以及地方党部,省委中;积极、忠实、勇敢的干部及一些大城市不能立足的同志,给他们以具体的指示,告诉他们工作方法,大批的动员到军队中去工作。为了这问题有时牺牲一些地方党部的和支部一部分工作,都是完全值得的。游击运动在目前的状况下是自发的极大的发展,各党部应该十分抓紧这一中心工作,开展广大的游击运动,已经有游击队的地方,那里的党部最中心的工作就是领导游击队,党的领导机关就应该学朱毛一样的,直接到游击队中去进行工作。

5. 反蒋问题——前信已经告诉诸同志组织反蒋运动的重要意义,现在还要请同志们注意的是不要像过去只等人家来找我们,而要我们去成为反蒋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这不是说要名义上到处去抬出我们党的招牌,而是说我们在实际上进行一切工作,在这运动中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部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因此我们希望不要将北方已经有的以吉鸿昌为首的反法西斯蒂大同盟运动^①放松,这个运动在目前反蒋的运动中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我们提议中央要派有力的同志去加强和扩大这个运动,特别要注意已经与吉鸿昌等有联系的军队,土匪,义勇军等当中的工作。

6. 无论从中国革命来说,无论从党的工作上说,目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干部,我们想诸同志都懂得这问题,我们现在的提议就是中央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送学生来学习,名额多少没有关系,有时暂时的部分是因送干部来而使某地工作受一点困难,都是值得的。有时中央为招生派专门人出去都是必要的,照目前来人的经验,路上并不十分困难的,中央应趁机派人,多多益善,自然并不是说质量可以不注意。

最近有许多没有经过党的组织的人来到此地,使我们很难处

① 可能指吉鸿昌领导的华北抗日组织,其主要核心是他的部队。

置,我们一方面不能担保这些人不是敌人派来的侦探,另一方面我们如果将他们完全不理驱出境,又恐是我们的同志或同情我们的分子,因此请中央告诉各党部如果有同志或同情者,反日会员等要来,即使他们自己能来,也必经过党的介绍,或群众团体的介绍由党通知到此地,否则我们只有采取不理的办法,因为敌人或叛徒正是利用这些方法混到此地。七八月间来了好几个人,有的说是团员,有的说是反帝同盟的,我们在另外一个纸头上开发他们的履历,关系,及能够证明他的人,请你们务须帮助我们调查清楚,告诉我们。

7. 文件与材料问题——为了秘密工作,我们提议中央应将党内处理文件的工作系统,完全改变,主要的是(1)尽量^①的少写文件,文件减少到最低限度。用活的领导方式去领导地方党部。(2)看完的文件负责毁掉,必须有的某些(如组织组的统计等)主要点用密码写下,(3)负责同志住的地方及机关中不能有任何的文件。(4)文件及报告中绝对不能写同志的姓名,及党的地址。(5)我们的来信看完速送到苏区(摘要的)。将不需要的部分,或特别秘密的部分毁掉。……^①希望中央不仅自己注意,而且要监督地方党部。

此外五中全会^②的决议及第二次苏大会^③的文件,我们收到的只是一个政治决议^④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⑤,其余五中全会及第二次苏大会的一切材料,没有收到,这些材料,我们要得到,以便研究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见第 32 页注②。

③ 见第 32 页注③。

④ 指 1934 年 11 月 18 日中共五中全会关于时局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⑤ 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 1934 年 1 月 23 日所作的总结报告。见《第二届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莫斯科 1935 年,第 58—130 页。

与出版,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①,编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的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②,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因此希望中央务必将五中全会的决议及第二次苏大会的一切文件,报告,决议,记事,报纸,照片,小册子,书籍,杂志统统迅速送给我们,这里一切的同志,如得到这些文件,如获至宝,而摆在你们机关里,却危险之极,希望你们无论如何给我们。再者根据报纸上载以宋庆龄女士为首的三千余人共同发表了一个反日纲领^③,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我们特别要知道的是那些署名的人是谁们,不仅知道几个主要的,而且要全体知道。这材料我们急需的。再苏维埃大会选举的名单,在此地各报及各国党报以及我们的报纸都要发表宣传,但是中央怎么不送来,我们又不根据敌人的报纸为根据,各国党天天向我们索,而我们无法供给。请中央无论如何告诉我们,并以后希望中央对于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国际宣传,特别加以注意!十月报^④现在已改名为中国报^⑤,内容由党报的性质已改为群众报的性质,该报很受一切国家的华侨欢迎,甚至新加坡的学生都来信订阅。

接到这信,希望连上次我们要求的问题给我们以答复,至盼!
此致
布礼!

兹将这次送给你们的的东西,开列如下:(1)我们的信(共三页)

① 《只有苏维埃运动能够救中国》,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4 年,第 13—100 页。

② 毛泽东:《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4 年。

③ 见第 116 页注⑥。

④ 1993 年 9 月出版了唯一的一期。

⑤ 见第 122 页注①。

(2)中国文艺晚会志盛。(3)世界文学家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宣言(英文的)^①,这个宣言因签名的名单不在这里,本文件的名字是不全的,以后再送给你们。此文件只作参考,暂时不发表!(4)李复生给全总的信^②,该件只能作个人的意见,作参考。(5)民族问题纲领^③。(6)共产国际杂志^④五卷第六期七期各二本,中国报两张。(7)毛泽东报告二本^⑤。(8)毛泽东文集二本。(9)防毒面具简单构造。

康生

王明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25, 第 14—16 页。

中文手写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见第 125 号文件。

④ 1930 年至 1937 年在莫斯科出版。

⑤ 《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4 年, 第 13—100 页。

289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4年9月17日^②于瑞金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我们期待……^③这里不晚于9月底^④作出最后决定。波戈列洛夫^⑤。9月17日。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3(1934年收文),第25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上有批注:已交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已送米夫同志、别尔津同志。

② 电报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4年9月22日收到的。

③ 删节号是原有的。从意思上看为:你们。

④ 原文如此。

⑤ 秦邦宪。

290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4年9月19日^②于中央苏区

绝密

[中共]中央致政治委员会

1. 最合适的港口是香港或澳门,我们将派两位同志到那里建立机构。
2. 至今我们与贺龙没有联系。
3. 请你们把告中国人民书寄来,^③直接寄到上海^④。
4. 其他各项我们正在完成。

[1934年]9月19日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3(1934年收文),第 26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该文件是对 1934 年 9 月 4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电报的回复。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 1934 年 9 月 23 日收到的。

③ 原文如此。

④ 文件没有找到。

29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4年9月23日于莫斯科

绝密

政治委员会致中央苏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向广州人提出我们曾向 19 路军提出的那些条件^②，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正确的，会使我们丧失利用广州人和南京人之间矛盾的机会。作为主要条件，请提出援助红军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子弹。装备运到之后[我们可以]用现金[支付]。他们可以在交货地点或上海收取货款。第二个条件是取消经济封锁和帮助开展贸易。第三个条件是广州军队从江西南部撤往广东边界，尤其是，从赣州、信丰和龙南等县撤出。请说明，这样就会使红军获得机动作战和保卫中央苏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签订的协议能保证广州人接受前两个条件，那就不应坚持第三个条件。请务必向我们通报关于与广州人谈判的进展情况。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8(1934 年发文)，第 19 页及其背面。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该文件是对 1934 年 9 月 14 日秦邦宪电报的回复。

^② 见第 236 页注^⑥。

292

阿布拉莫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9月26日^①于莫斯科

绝密

阿布拉莫夫致[中共]中央

我们认为与你们的直接双向密码通讯已经建立起来了。乌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祝贺我们的朋友们——无线电报务员和译电员，并祝愿他们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

英雄的苏维埃中国万岁！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8(1934 年发文)，第 22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电报加密的日期。

293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4年9月28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王明和老板^③致中央苏区、中共中央

现回复你们[1934年]9月17日N号电^④。我们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准备以主力对广州部队实施打击。须知，从你们的前几次报告^⑤来看，现在正在与广州人进行谈判，此外，即便我们现在不能利用，那么我们也应该为自己保留今后利用南京人和广州人之间矛盾的可能性，而现在向广州人进攻就会使我们失去这种可能性，并会使暂时还没有对我们实施积极作战的补充力量仇视我们，因此，请说明你们决定的理由。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8(1934年发文)，第 23 页。

打字稿，原件，最后的建议是米夫亲笔写的。

① 在文件上有王明、康生、Д. 3. 曼努伊尔斯基、B. Г. 克诺林和 П. А. 米夫的签字。

② 电报加密的日期。

③ 康生。

④ 见第 298 号文件。

⑤ 见第 286 号文件。

2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①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②

1934年9月30日^③于莫斯科

致中央苏区[中共]中央

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④。对南京的决定性行动只能在前面的湖南机动作战结束后采取,这意味着,首先歼灭何键的军队,这样我们的力量才能进一步壮大和巩固。但是在湖南作战的时候,应该同时完成其他一些任务:第一,为了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驻扎在那里的南京军队实施强有力的骚扰性打击,留在江西的部队要展开持久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干扰他们在湖南的行动;第二,组建独立的东方军,由第7、第10军团和来自中央苏区的另一个军团组成,目的是在东部四省交界处建立和发展一个强大的根据地,给蒋介石的军队在湖南方向上的集中造成困难,还可以隐蔽我们在湖南的主要计划;第三,我们认为把目前在汀州——连城地区活动的部队留在福建

① 发报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在俄文电报稿上有 Д. З. 曼努伊尔斯基、王明、B. Г. 克诺林、Ф. 黑格尔特、弗雷德 [M. 施特恩] 和 П. А. 米夫的签字。

③ 电报加密日期。

④ 见第 289 号文件。

而不调往湖南是比较适宜的。这个军团应该组成独立的南方军，其任务是在厦门方向或者在东北方向进行机动作战，也是为了在闽赣边界地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请确认电报是否收到和解密。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48(1934 年发文), 第 27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295

盛忠亮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9月^①于上海

米茨凯维奇^②同志就改组中国国统区工作致

[中共]中央电^③

考虑到全国开展革命斗争的需要及其特点、法西斯恐怖的猖獗和党在中国国统区的工作在组织方面的一系列弱点,以及一年来从党组织所遭到的破坏中得出的经验,为了巩固党和对中国国统区劳动人民的斗争实行真正的领导、打败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和建立新的苏区,我们建议在下列方面彻底改组我们党在中国国统区的整个领导体系和领导方式,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

1. 通过远东局从组织上加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使这种联系不受地方党组织偶然事件的影响,以此来保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我们党的经常的和实际的领导,保证及时转达中共中央的要求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

2. 加强中国国统区与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的联系。通过加强运输和通讯网络保证向苏区提供物质援助的能力,使苏区在争取

① 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1934年10月11日收到电报的。

② 盛忠亮。

③ 文件上有批注:米夫和王明同志已阅,布龙科夫斯基、克诺林。皮亚特尼茨基那里有一份。

革命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取得最大的发展。

3. 加强[中共]中央对中国国统区工作的领导,培训巡视员并建立中央与一些最重要省份的直接联系,以便在[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能够很快恢复中国国统区的工作。要改进信使的工作。

4. 重建党在中国国统区的领导机关——上海中央局,规定其职能,提拔新干部,中止该局与[中共]上海组织的直接联系,以此来保证该局的安全和工作不间断。

5. 为了减轻[中共]中央和上海局的工作,在中国国统区的最重要地区设置[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和改进主要省委的工作。

6. 加强省和地区的工作,改进对它们的领导,要教育省委和区委通过地方自治的方法独立地工作和在统一的领导下开展地方工作。

7. 把中层工会组织放在企业,加强上海和天津的领导机关对工会的领导,将其变成独立的具有由党领导的严整等级的群众性组织。

8. 制订干部政策,尽一切可能保留党的骨干,保持布尔什维克传统。

9. 严格实行秘密工作的规定,推广地下工作方法,经常检查所有环节。

10. 重建和改进特科的工作,特科不仅要消极地保卫党,而且还要积极地进攻敌人;不仅要进行特殊的秘密工作,而且还要在党的帮助下改进自己在群众中的工作。

具体措施

1. 在上海设立全权代表及其助手,其具体任务是:(1)会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联络部的代表;(2)监督无线电台和密码;(3)监督财务;(4)保持与信使的联系并从物质上援助苏区。

全权代表不参加[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日常工作,但他代表[中

共]中央监督上海中央局的工作并传达[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他应该有可能与国际联络部的代表保持经常的联系。请任命可以在当地找到的人担任全权代表及其助手。

2. 我们同意屠同志^①关于必须在……^②建立两个商店的意见,以保证汇款和转运货物。你们也应从你们方面与这些城市建立联系。

3. [中共]中央应该培训 20 名巡视员,将他们派往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去进行监督和 在组织游击战的地方做工作,并把他们作为长期的工作人员固定下来。[中共]上海中央局应该能够迅速传达文件和传递从地方上得到的材料(每个月派出信使 12 次)。

河北、满洲、江西、河南等主要省委应该通过信使或信件保持彼此间的直接联系。今后[中共]中央可以通过转由上海局支配的备用无线电台领导中国国统区的工作,但是不要把它与别的无线电台混在一起,那样做是危险的。你们应该与鄂豫皖苏区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系。我们已经搞到了无线电收发报机,但是因为缺少人手无法运到那里去。

4. 为了改组[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工作,必须:(1)把它的工作限定为领导中国国统区,撤销它对其他苏区工作的责任和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进行联系的责任。(2)避免上海局机关臃肿并为领导地方组织的工作建立灵活的巡视员和信使网络,通过该局组织部领导[中共]上海组织,组织部指定一位专门的巡视员与江苏党组织书记进行联系。此外,建立该局与江苏的信使联系,以使该局能够通过书面形式及时地领导上海的工作。这就能保证该局的安全,消除该局与江苏交往过于密切和混乱的现象。(3)该局

①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② 原文空缺。

剩下的两位成员^①都很有名,他们继续留下工作会很困难;一些科的同志曾被跟踪过,也不能继续留下工作。请[中共]中央派三位同志来组建新的局;他们的能力强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要可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保证现在这个局的存在,也不可能开展工作。这个问题应该马上解决。

5. 把最优秀的力量放在最重要的战线上:(1)调[中共]中央驻河北的全权代表^②去做其他工作,因为他不能继续留下来工作,这样也不会削弱华北的工作。(2)在满洲建立[中共]中央局。

我们建议任命[中共]中央驻河北的全权代表为满洲局书记。此外,[中共]中央还应该为这个局任命两位同志。(3)由于距离遥远和信使条件^③,四川的组织与上海局还没有密切的联系。考虑到要加强对省委的领导问题,必须派一位全权代表来四川就地实施独立的领导。(4)中央应该培训一些代表来领导那些正在开展游击战的次要省份和地区。(5)代表、全权代表和各省的[中共]中央局由上海局实行领导。

6. 鉴于省委的负担过重和干部软弱,我们建议加强各省和地区的工作:(1)为加强上海的工作建立上海市委,在镇江建立与之平行的省委,而现在的临时委员会以后就变成省委。为加强江苏各县的工作,为准备游击战争和以后建立新的苏区(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做是必要的。(2)将满洲省委分为在[中共]满洲中央局直接领导下的三个省委或特委。(3)为了联合安徽省南方和北方的组织,成立安徽省委。(4)恢复和加强福建省委。(5)四川省委占据十分辽阔的地域,因此我们建议在省委下面成立三个特委(在该省的东方、北方和南方)。省委的干部不是特别有名就是很

① 盛忠亮和黄文杰。

② 孔原。

③ 原文如此。

软弱,例如,满洲省委只有三个委员^①,其中的邢斯汉(音)^②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留在哈尔滨工作。在河北省委,尽管也有三个同志,但是省委书记^③已经与反党分子勾结在一起,我们已经决定撤销他的工作。其他两个同志都很软弱^④。

江苏省委由于最近一次遭破坏^⑤更弱了。组织部和宣传鼓动部软弱无力。最近几天这两个部因从厦门来了两个同志^⑥而得到了加强,但是还是很弱。河南省委被认为是最好的,但是省委书记^⑦很有名。主要省委处境都很艰难。我们在竭尽全力支持他们,但是[中共]中央应该帮助我们。请派干部来或者组织干部交流。为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地方组织的干部问题和恢复他们的独立工作,需要尽快予以解决。

7. 关于工会的工作,待我们与工会代表一起研究后,再作专门报告。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上海的工会组织应该立即恢复,但是我们没有人手,你们应该帮助我们。满洲的工会组织在遭到破坏之后已经不能活动。我们建议满洲党的机关请求红色工会国际给予帮助,从海参崴派干部来补充并下达恢复工作的指示,但是暂时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工会执委会中只剩下一位同志——主席^⑧,他的处境也很困难。一般说来,工会中的情况比党内的情况更糟糕。工会联合会请你们谈谈自己的意见。

8. 干部培训:(1)到今年9月底我们要竭尽全力派遣 128

① 可能指:林炯、赵毅敏和李士超。

② 原文如此。可能指:林炯。

③ 朱理治。

④ 何人不详。

⑤ 见第 151 页注④。

⑥ 何人不详。

⑦ 吕文远。

⑧ 饶漱石。

名学生。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要向中央苏区派遣 80 名学生。(2)一旦恢复工作安排就绪,我们就着手完成我们的干部培训计划。关于加强党组织和特科的措施,我们将另行报告。

我们请求尽快讨论提出的计划并作出具体的决定。尽管中国国统区的工作形势严峻,但是我们拥有一切可能性来改变这种工作局面并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从你们方面也应该帮助我们。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25, 第 31—36 页。

打字稿, 副本。

296

中共中央给盛忠亮的电报^①

1934年9月^②于瑞金

中央对米茨凯维奇^③电报的回复 致米茨凯维奇,抄送王明

我们基本上同意米茨凯维奇的建议。具体说来,我们还应该考虑到:

1. 内战的严峻形势迫使[中共]中央书记处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军事工作方面。莫斯克文同志^④完全投入到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中,伊思美洛夫^⑤负责政府工作,项英负责游击队运动,波戈列洛夫^⑥负责书记处的工作。此外,他要经常和瓦格纳^⑦去前线。陈云负责邻近苏区的工作和供给工作。因此,我们很难领导中国国统区的日常工作。还应该考虑到通讯联络不畅:已经有三个月时间我们连中国白区的报纸都没有收到。我们只能提出工作的总方针。

① 文件上有批注:米夫和王明同志已阅。皮亚特尼茨基那里有一份。

② 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电报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4年10月11日收到的。

③ 盛忠亮。见第295号文件。

④ 周恩来。

⑤ 张闻天。

⑥ 秦邦宪。

⑦ 奥托·布劳恩(李德)。

2. 随着[中共]中央转移到苏区从中国白区来到这里的只有三位同志:波戈列洛夫、伊思美洛夫、陈云、华吉(音)^①。大部分同志留在中国白区。还需要考虑到在内战条件下干部的消耗、红军的发展、大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建立。虽然有2000名学员的三所军事学校和有700名学员的一所炮兵学校,但是对苏区来说干部还是不够的。到这里来的同志中谁都不可能再回到中国白区去。其他干部对到中国白区工作都准备不够。至于地方干部,鉴于他们文化水平较低、方言特殊及缺少经验,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担任中国白区的领导工作。我们不止一次地要求中共上海中央局派干部到这里来学习,但是派来的学员数量很少,而且多数是没有经验的党员,我们从红军中挑选了一定数量的干部进行轮训,但是他们都比较弱,只适合做地区性工作。因此,在向各地区调配党的领导力量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根据米茨凯维奇的电报和上述情况,我们建议:

1. 为便于领导中国白区各省的工作,在比较安全和通讯联络方便的地方建立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中共]中央局。我们建议该局由康生、科尔萨科夫^②和伊遂^③(音)组成,该局不应该是一个臃肿的机关,只设一部无线电台、一个印刷所和一个保存文件的机构,在香港设一个信使联络点。

2. 在上海设立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其职能是米茨凯维奇所指出的。这个代表不应与地方组织有联系,我们临时暂任命米茨凯维奇为代表,希望你们能派克雷莫夫^④来替代他。如果米茨凯维奇不能留在上海,那就不得不临时召回陈特真(音)^⑤同志来代替他。

① 原文如此。后者可能是何克全。

② 黄文杰(音)。

③ 何人不详。

④ 郭绍棠。

⑤ 孔原。

3. 在满洲及河北要设代表,我们委托王明和康生从在莫斯科的同志中物色人选。

4. 应该为各省委提拔新的干部和从莫斯科派学生回到中国来。

5. 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为中国白区培训工作人员并派 20 到 30 名学生前往莫斯科学习。为此,国际联络部应该保证此项工作的进行。

6. 在莫斯科就这些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之前,我们现在采取下列过渡性措施:

(1)任命米茨凯维奇同志为代表,中断他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联系。

(2)批准临时上海中央局由乔(音)^①、科尔萨科夫和鲍托(音)^②组成。该局应该中断与江苏省委的直接联系。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25,第 17—18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李得钊。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297

王明就党为迎接共产 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 准备一事给中共中央的信草稿^①

1934年10月1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关于中共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② 进行政治准备给中共中央的建议草稿

利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所有时间动员全党进行积极认真的政治准备。总结共产国际和中共自共产国际六大^③至七大期间斗争的共同的和主要的教训，检查共产国际六大和党的六大^④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全会的主要决议的执行情况，发扬成绩，揭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薄弱环节，分析当前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拟定革命斗争的近期目标并确定这个时期的策略方针，如果你们能通过讨论的方式在全党面前突出地提出下述方面的迫切问题，我们觉得那将是有益的，也是合适的：

1. 关于红军和苏维埃的斗争——要特别注意关于保存、加强

① 打字稿副本已送 П. А. 米夫、Г. И. 萨法罗夫、Л. И. 马季亚尔、Ф. С. 科捷利尼科夫、К. Э. 琼森、阿列克谢耶夫、В. Е. 瑟索耶夫、李立三、郭绍棠[克雷莫夫]、廖焕星、王明和 Б. 费尔迪。

② 见第 61 页注④。

③ 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

④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科区五一村举行。

和发展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策略方针,特别注意敌人的新计划和我们的[应有的]继续发展计划(考虑到从被包围和防御状态转入夺取军事行动主动权,开展广泛的、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发展和协调我们的力量和为坚决歼灭主要敌人——蒋介石的力量进行实际的准备),注意将红军和苏维埃的斗争与全中国的革命斗争和今天的革命斗争及其近期前景结合起来,最后是注意非苏区劳动人民为实际援助红军和苏区应有的具体的和一切可能的措施。

2. 关于争取和瓦解敌人武装力量方面的工作——应该着重强调:(1)此项工作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具有头等重要的和决定性的意义,以及党组织至今对它采取的不能允许的轻视态度^①;(2)现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总的条件使我们能够争取相当大部分的敌军转到我们方面来,甚至有他们的大部分中下层指挥人员;(3)每个党组织都应该把这项工作放在第一位,并抽调最优秀人员来做这项工作。

3. 关于反帝斗争和统一战线——应该坚决而具体地谴责在这个工作领域中的宗派主义。指出在这一斗争中利用一切可能的反帝的和诚实的“爱国”力量^②、组织和人士的必要性。指出为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而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和对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要使党意识到,我们的口号和争取组织和进行武装人民的神圣民族革命战争的斗争,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是现实的和有成效的,如果它们带有真正深刻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也就是说,在“武装保卫祖国”的总口号下,它们涵盖最广泛的,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和同路的一切可能的阶层和力量。

4. 关于工会运动——鉴于不同寻常的白色恐怖、中国工人十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分低下的组织性和多年来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工作成效不大,提出在我们的工会策略上实施根本转折的问题不合适吗?意思是要广泛利用合法的掩护和尽一切可能从组织上动员工人群众更有效地进行阶级斗争和扩大我们的影响,也就是说,不再到处组织封闭的赤色工会小组,因为这种小组,像以前发生过的那样,一遭到迫害很快就会瓦解。我们要在各种有形的工人组织——从黄色工会、互助会、体育运动组织和基徒教组织到兄弟会、同乡会、宗教团体(例如,五金工人的老君会、码头工人的乡友会等)和青红帮等组织——中转移我们的工作重心,以便利用其合法存在及活动的可能性和其旧的形式为我们内容新的工作服务,广泛组织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斗争。与此同时,在那些没有任何工人组织形式的地方和企业,我们必须在合法性的掩护下建立我们自己的组织。此外,还应该认真地提出关于善于在企业积聚我们力量的问题,以便有序地^①指导工人的每一次罢工和斗争取得成果;不仅要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组织上使我们的力量得到发展和加强,而不是为了削弱它们或者毫无目的地和轻率地触动它们^②。

5. 关于农民运动——除了党在这个领域的有益教训(首先表现在,中共在实践中已经表明自己是农民革命斗争的唯一领袖和组织者,并且以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等形式建立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牢固战斗联盟),还必须详细地讨论关于党在夺取政治领导权和从组织上掌握基本上是自发的农民群众斗争(从最原始的形式和最基本的要求开始,到武装发动和起义)方面的具体措施问题。应该善于具体地和区别地对待不同地区的不同的水平和不同的规模,以便在那些客观和主观条件真正成熟的地方,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以夺取土地和政权,而在运动还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处在开始阶段的地方,不要过早地去冒险,而善于组织群众的最基本的斗争,目的是准备把群众斗争提高到一个高级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在非苏维埃地区,为了我们的工作还应该注意利用现有一切合法的组织形式(从合作社到各种宗教团体),以便积蓄我们的力量。

6. 关于满洲问题——事实表明,只有中共才是自始至终在满洲和在全中国为收复被占领的领土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唯一政党;要说明满洲的特殊形势和我们的广泛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为了在满洲进一步组织抗日游击斗争,并把这一斗争与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总的革命斗争及其前途结合起来,要讨论具体的政治、组织和策略方面的措施。

7. 关于几个党内问题——除了作出积极的评价,即最近几年来中共在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公认的领袖,还应该认真地揭示党的工作落后于客观条件的原因,应该特别提出下列问题:把培训、轮训、提拔和正确合理地使用干部的问题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说明两条战线斗争和自我批评的作用和意义,特别是它们的正确方法;寻找在新的条件下的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工作方法;不仅在领导机关而且在全党和在群众中进行坚决的和始终不渝的反奸和保守秘密的斗争;使青年工作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特别要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和帮助,克服对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轻视态度。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08, 第 74—81 页。

手稿。

29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处务委员会会议第 15 号记录

(摘录)

1934 年 10 月 4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继续讨论王明同志的报告^①。

发言:朱立、刘^②、米夫、萨发罗夫、李明^③、李复生同志。

决定:责成王明同志在两周内写出致满洲组织的信草稿。

听取:2. ——就[共产国际]第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致中共中央的信草稿^④。

决定:基本上通过。责成王明、康生、米夫、萨法罗夫同志对该信作最后修改。

主席 米夫

秘书

全宗 495, 目录 154, 卷宗 531, 第 90 页。

打字稿, 原件, 主席亲笔签字, 无秘书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何人不详。

③ 李立三。

④ 对第 2 项的批注是:已经完成。见第 297 号文件。

29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4年10月8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政治委员会致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

如果关于蒋介石在最近准备向广州人发起进攻的消息可靠，我们就应该力求与广州人签订军事协议。签订这个协议之后，我们不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策略手段，而应该真正积极参加同广州人联合反对蒋介石这个主要敌人的行动。不要重犯在福建事变^③期间所犯的错误，当时我们没有积极地支持第19路军。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8(1934 年发文)，第 28 页背面。
英文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以政治委员会委员们的飞行表决方式于 1934 年 10 月 8 日通过并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34 年 10 月 9 日非常会议批准(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314，第 3 页)。

② 译成密码的日期。

③ 见第 81 页注④。

300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①

1934年10月11日^②于上海

艾尔文^③致米哈伊尔^④

从最近一次暴露^⑤的教训中得出的简短结论

对中国革命斗争的评述

随着苏维埃政权和革命运动在全中国的发展,革命运动具有了战斗的性质,越来越多的工农群众(农民暴动)参加到这种战斗中来了。整个的生产部门举行了罢工(5次大规模罢工,罢工者有几万人)。战斗的规模不仅巨大,而且在^⑥……组织性的情况下,在斗争过程中表现出空前的组织性。革命化进程在大踏步地进行,并在席卷所有新的地区。在战斗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新生的革命力量。

作为苏维埃政权加强和革命运动发展的一种结果,法西斯恐怖浪潮也在日益高涨。

对法西斯进攻的分析

法西斯进攻的矛头是指向我们战线的最重要环节,指向省委

① 在文件上有批注:Г.季米[特洛夫]和王明同志已阅。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的日期。

③ H. H. 格伯特。

④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⑤ 指1934年6月以李竹声为首的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人员及大量各级党的工作人员被逮捕。

⑥ 原文以下空缺。

和区委(特别是江苏),最后是指向我们党的首脑。近一年来,法西斯分子在“进攻工厂和学校”的口号下在四个方面展开攻势:第一方面是企业 and 学校,第二方面是区委,第三方面是州委^①,第四方面我们的首脑。由于发动这种攻势,近一年来部分支部已不复存在,部分支部损失了大量党员(从120到126人减少到20到23人)。上海的党员人数从4000人减少到600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暴露后还没有恢复,工会组织也受到威胁。

法西斯分子的方法

法西斯进攻的主要工具是奸细组织。国民党组织部设有在陈立夫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处。这个处制订了,在党的各个环节的工作计划,组建了专门的奸细地下支部。

在各个企业以党的名义建立支部。改进监视技术(三级传递)。通过无线电广播、报刊(《社会新闻》杂志^②,发行7万份),最后还通过类似“新生活”会^③这样的团体开展思想瓦解运动。

最近一次暴露的教训

对我们党首脑的最近一次打击,应该认为是近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更何况这次打击是发生在党的领导干部由于遭到前几次逮捕而暂时被削弱的时候,从搜走材料的数量来看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日本领事馆在研究满洲的材料,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及其他帝国主义分子都在研究被搜去的与他们的租界有关的材料。

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全,我们把这次暴露的原因分为四类:1. 组织上的错误;2. 技术薄弱;3. 不遵守秘密工作规定和一些领导同志思想麻痹;4. 挑拨离间活动和与之的斗争。

① 原文如此。应为:省委。

② 1932年至1935年在上海出版。

③ 见第138页注⑤。

组织上的错误

这次打击是逐步而谨慎地准备的,没有进行零散的不必要的个别的逮捕。两个月前党得到一些情报说:江苏省委里有12个至今尚未被揭露的奸细。尽管如此,[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之间的直接联系不但没有终止或改组,而相反更加密切了。大部分会面是在斯拉文、米茨凯维奇和科尔萨科夫^①居住的并保存有各种材料的那座三层楼房里进行的。似乎由于江苏省委的软弱,在很大程度上工作都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进行的,因此出现了需要经常会面的混乱局面。对各部的职责规定得不够明确,其后果也与组织方面的弱点有关。

技术方面的错误

在警察袭击斯拉文住所之前两个小时,[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由于通讯机构的延误,两位同志——组织部长^②和一个通信员^③只是在遭袭前10分钟才知道情况。他们俩分头跑去报告,但为时已晚,他们俩也被逮捕了。如果在斯拉文的房子里哪怕有两枚炸弹,也能轻而易举地消灭门口的5个装备很差的警察,得以逃脱。如果与特科的通讯联系正常(在房子里的人20分钟没放警察进去,有打电话的机会,等等),那么,10个负责保安并武装得很好的同志就可能把被捕的人救出来。如果与特科的通讯联系正常,那么,后来在逮捕人的房子里,在警察防范很差的情况下,那10个同志也可能把被扣留约4个小时的被捕者救出来。

保密工作和思想麻痹以及缺乏纪律的错误

尽管[中共江苏省委]书记^④早已被预先告知,他已经被监视,但

① 相应为:李竹声、盛忠亮和黄文杰。

② 杨天生(音)。

③ 何人不详。

④ 赵立人。

是他在自己的会见中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上海局组织部长^①也属于这种情况,他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发现被监视了,而当他发现的时候,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结果也和他的前任^②一样被捕了。虽然米茨凯维奇已经发现了几乎在租用的工会房子门旁有两个特务,甚至有一段时间还被其中的一个特务跟踪过,可是那所房子并没有立即停止租用,贝克同志只是因为看见了信号才得救的。尽管在斯拉文的房子里信号起了很好的作用并救了先前来到这里的他的妻子^③和米茨凯维奇,可是斯拉文进去了,并被捕了。在特科得到关于袭击的情报时,负责通讯联系的同志没有在岗位上,而是出去散步了。

奸细和同他们的斗争

虽然不久前一名被揭露为日本人做事的叛徒被处决了,而另一名^④受了重伤,但是同奸细的斗争还是进行得不够有力。

对党的干部审查不够,总之,在揭露叛徒的工作中特科表现得不够好。

结论

从上述情况中得出,必须认真地重新研究所有的组织问题。如果说在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极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不能落后于群众和要善于有组织地利用新的革命力量的问题,[那么],在反革命活动同时展开的过程中,也必须警觉地对待敌人的一切组织上和技术上的成就,努力作出预告,甚至抢在敌人前面采取组织和技术措施,因为在枪林弹雨中进行改革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在保密问题上要执行最严格的纪律,对于丝毫违反纪律的现象都要在党内给予最严厉的处分。这后一条也适用于你们的

① 可能是黄文容。

② 何人不详。

③ 何人不详。

④ 何人不详。

代表^①。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0, 第 141—145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A. 埃韦特。

301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10月14日于莫斯科

绝密

王明和康生致中共中央

鉴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红军在敌人侧翼实施迂回机动战术,以及红军有可能夺取所必需的弹药和药品,请告诉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在南方建立采购武器的机构?^① 请立即告知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48(1934 年发文), 第 30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① 见第 285、290 号文件。

302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4年10月15日于莫斯科

绝密

王明和康生致[中共]中央

红军主力是否已经离开中央苏区？现在情况怎样？同广州人的谈判结果如何？^① 请立即告知。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48(1934年发文), 第 29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① 见第 286、289、291、293 号文件。

303

王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4年10月16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中共中央

一切表明,最近在蒋介石和广州人之间可能爆发战争。如果他们之间爆发战争,那么,不管广州人和红军之间是否存在军事协定,红军都应该在反蒋前线的相应地段大力加强作战行动。应该认真地考虑到,在中国目前条件下,蒋介石对其对手的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同时加强我们的主要敌人来对付红军^②。福建事变的教训^③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王明。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48(1934 年发文), 第 32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① 该文件于 1934 年 10 月 16 日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们的飞行表决方式通过并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 1934 年 10 月 21 日会议批准(见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316, 第 3 页)。

② 原文如此。

③ 指 1934 年 1 月南京军队在福建镇压第 19 路军反蒋行动之后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急剧恶化。

304

阿布拉莫夫给中共中央^①的电报

1934年10月18日于莫斯科

绝密

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被警察掌握^②。请采取一切措施与我们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

阿布拉莫夫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8(1934 年发文)，第 33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收报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王明在 1934 年 10 月 21 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曾建议，如果国民党特务机关试图利用被截获的密码以上海党的机关的名义拍发情报，我们可利用以前的密码拍发假情报(见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8，〈发文—1934 年〉，第 34 页)。

3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处务委员会会议第 16 号记录 (摘录)

1934 年 10 月 20 日于莫斯科

秘密

3. 关于中国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王明同志)^①。

责成王明同志在 15 天内起草出关于中国反帝运动的文件,并加快拟订告中国人民书草稿。

请青年共产国际拟订对青年工作,包括对中国学生工作的指示^②。

主席 米夫

全宗 495, 目录 154, 卷宗 531, 第 91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对决定 3 有批注: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没有(以下两个词分辨不清)。

② 文件没有找到。

306

中国红军指挥人员一年制特别培训班教学大纲^①

1934年10月27日于莫斯科

绝密

目的、方针和方法

中国国内战争实习指挥员一年制轮训和进修班要遵循下列目的：

1. 帮助指挥员对照带兵理论和技术思考并检验自己的实践经验。从指挥员过去的工作和将来要起的作用出发，培训班应该讲授以下单位的组织指挥员和政治领导者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起义队伍、游击队、中国红军现有组织编制内的战斗单位（团、师）、单独活动的大队伍和兵团。**

在逐步深化教学内容和加大指挥员作业范围的同时，教程应该考虑到，当指挥员要同时指挥和带领各种形式的武装力量（从处在初始阶段的起义队伍到红军正规兵团的大部队）投入战斗时，他实际上所遇到的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组建、生活和战斗环境。

2. 军事培训教程应该以对中国的总的政治形势的了解的具体前提为根据，以对一些省和地区的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的了解为根据。

为使军事教程不流于可怕的机械教条和脱离实际，应该使军

① 文件标题。

事策略和作战艺术的教学大纲与政治科学和半殖民地农业国革命策略学说的大纲紧密地结合起来。

该教程尽可能不要由分成军事和政治的单独学科组成。两个方面应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3. 除了要了解各种型号武器的技术性能和击发的技术方法,教程还应该通过演示、介绍和在野外作战的条件下进行操练的方法让学员实际掌握每一种武器。

在众多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型号中,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扎实地掌握那些敌人在使用的型号,也就是说,要掌握可能会成为红军财产的那种武器(各种制式的步枪和机枪、手榴弹和枪榴弹、斯托克斯迫击炮、轻型山炮和无后坐力炮、装甲车、轻型坦克、化学武器、水雷和地雷、燃烧弹、破坏器材、防空器材、通讯技术器材,等等)。

这里还需要让指挥员实际了解用身边材料以手工方式生产武器和弹药的可能性,了解用当地原料中的其他代用品替代一些兵器的可能性。

4. 为了更好地掌握战术,特别是作战艺术的问题,教程应该从历史的层面去研究和批判地分析红军在江西和四川的战役,以及参加培训的指挥员直接参加过的那些队伍的战役。

为了用实例说明问题,还需要讲述一些俄国内战中的事件,特别是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游击战争以及起义时期的事例。

战术和作战艺术课程只能通过图上作业、野战作业、分析部队战术演习(到野外和在演习中)的方法来讲授。

侦察勤务、司令部和通讯勤务理论,战役的战斗保证措施、伪装措施,供给、食品和运输勤务,后勤工作和后勤保证因素,补充减员的组织因素,动员人力和物力,卫生勤务设置的因素,训练和教育指战员的方法,前线作战和后方工作的政治保证,后方及其主要基地的警卫,对敌军的政治影响,在敌军中和在敌后组建地下支部

的方法,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解决战术任务的过程中顺便加以讲授并且选出一些题目供课堂讨论和研究。

这应该研究敌军部队和支队(南京的军队、广州的军队、四川的军队及其他省的军队、民团等)的组织编制问题。日本军队以及在中国的其他帝国主义远征军的组织编制和战术也应该纳入研究的范围。

5. 为了全面学习军事地理和中国战区所特有的地形,培训班的全部作业都要在现阶段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那些省份的地图上进行。

这个要求将使我们的整个战术课归结为掌握山地战和文化落后战区(在道路交通意义上)作战的特点和规则。

敌人的军事地理及人造工事的特点(设防区、设防城市、道路上的碉堡等)应该考虑到在野战筑城学课程中讲授,在这门课程中要特别突出城市设防方法及攻破城市防线的方法;属于这门课的还有野战工事构筑的战术和测算问题、地面伪装战术、渡过水域障碍的技术、爆破作业的技术和测算、破坏道路交通的技术和测算、敌人的作战工事和后方工事,等等。

这样,军事地理、地形学、工程艺术课程,作为一般战术和作战艺术主课的综合科目,也应纳入教学之中。

6. 政治科目中特别要详细地讲授下列问题:

- (1)共产国际史和中国共产党史。
- (2)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现代史。
- (3)党的建设。
- (4)苏维埃建设。
- (5)中国苏维埃的经济政策。

7. 一学年共计 300 个学习日。每个学习日由在课堂上学习的 6 小时和在家里学习的 4 小时组成。总共 1800 个课堂学习小时, 1200 个家里学习小时。共计 3000 小时。

按照学科学习的时间大体分配如下：

各学科学习时间大致分配表

	小时			占整个教程 课时的百分比
	课堂	家里	合计	
1. 一般战术和作战艺术	1200	510	1710	57 %
2. 武器和作战技术装备	180	120	300	10 %
3. 工程学和爆破学、弹药生产	80	130	210	7 %
4. 军事地形学、中国军事地理	60	120	180	6 %
5. 中国红军作战史	30	60	90	3 %
6. 后方机构、勤务和警卫	20	40	60	2 %
7. 战士和指挥员的培训和教育	20	40	60	2 %
8. 俄国国内战争史	30	—	30	1 %
9. 联共(布)党史、共产国际史和 中共党史	30	60	90	3 %
10. 列宁主义	30	60	90	3 %
11. 中国苏维埃党的建设、苏维埃 的经济政策	60	30	90	3 %
12. 东方殖民地的帝国主义	30	30	60	2 %
13. 中国时事(每旬概述)	30	—	30	1 %
总计	1800	1200	3000	100 %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08, 第 82—86 页。

打字稿, 副本。

30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关于在华工作的建议

1934年10月28日于莫斯科

绝密

建议提纲

1. 调整与[中共]中央的直接通讯联系,而经过[中共]中央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与四川的直接通讯联系。建立通讯联系是为了领导当前的战役。要逐渐扩大无线电通讯网。

2. 研究各省的军事政治形势(顺序是:西北、东南、西南、西部、满洲和华北各省、华中和华东各省)并向[中共]中央和有关的[中共]中央局提出在一定的期限内要完成的一些具体的作战和组织方面的任务。这样就会为实施统一的有计划的指挥作战创造前提条件。制订局部计划,将其教授^①给地方。

3. 首先着手实施关于西北(新疆)的建议。(见已拟定的文件)^②

取决于我们的工作都应该于1935年1月1日前完成。

4. 批准成立下列局:

香港、澳门、汕头—广州局

北京、天津、张家口—华北局

①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转交给。

② 文件没有找到。

开封、西安府、汉口—华中局

察哈尔——满洲局

重新恢复上海的沿海局。

5. 研究关于暴露的材料并制订出秘密工作的相应准则。

6. 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为上述各局培训相关干部的提纲。

7. 提出关于加强党的自我保护机关(特科)的建议。

8. 制订破坏活动的计划。

9. 制订有关下列问题的准则:游击战、苏维埃建设、红军的政治教育、正规战斗的战术问题、作战艺术、在敌军中的工作、在农业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问题。

10. 建立观测情报点。

11. 提出有计划地为红军募捐的问题(美国——药品、防毒器材等)。研究运送的渠道。

12. 向兄弟党经常广泛通报中国事态发展,以此来宣传武装斗争问题。

13. 向国外的中国纵队进行宣传并把他们列入抗日和反帝斗争的革命战线。

14. 让日本共产党了解满洲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军事工作问题。

15. 出版著作:中国红军一些战役的专著,中共武装斗争史,游击战争理论,山区小规模战争理论,革命军队的作战艺术问题。

出版一些专著:关于与空中力量的斗争、关于与化学武器的斗争、关于与坦克及技术装备的斗争、关于训练和教育指战员的方法、关于侦察、关于通讯、关于后勤机构、关于弹药生产等的专著。

16. 将培训高素质干部的工作纳入有计划的轨道。

17. 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报资料并将其加工整理到需要的水平。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026, 第 3—4 页。

打字稿, 副本。

30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 处关于建立东方作战中心的建议

1934年10月28日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建立东方作战中心问题的建议^①

作战中心的职能是根据提纲中所涉及的作战问题的清单^②确定的。

1. 作战中心将研究有关东方各国武装斗争的问题。把中国红军的经验作为基础。

2. 作战中心是东方书记处的一个处。出于某种考虑,其办公处可以迁出这座建筑物之外的适当地点。

3. 作战中心根据相应的推荐,采取增补的方法吸收一些同志参加其工作,并在他们之间分配有计划的工作。通过参加讨论作战问题、通过研究具体的材料、通过在作战中心的定期会议上交换意见等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锻炼出一批专家,从中可以获得一些干练的工作人员和培训干部的工作人员。

4. 作战中心将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划分为科和组(每组3人)。

5. 作战中心要与军事学院东方系、侦察局和中央各局的一些

① 文件上有批注:收入机密中国案卷。II. 米夫。

② 见第307号文件。

党的指挥人员保持联系。

6. 成立中国科和适当数量的组：

印度支那组

印度组

菲律宾组

马来亚组

中亚组

近东组

阿拉伯组

北非组

7. 作战中心抽调相应国家的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些经过审查的代表,让他们参加专门军事工作问题的培训班。

8. 作战中心将开办正规的培训班——半年制和一年制两种。有选择地送一些学员到相应的学校和学院深造。

9. 东方作战中心的领导人是东方书记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参加这项工作的其余同志仍要履行自己在工作和社会工作方面的职责。

作战中心的领导人应该有办事机构,其编制将根据整个工作的开展而相应扩大。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026, 第 1—2 页。

打字稿, 副本。

309

赖安关于改组中共机关的建议

1934年11月20日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改组上海党的机关的建议^①

1. 无论从迄今集中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中共)中央局工作的非集中化角度看,还是为了直接加强中央和各省委之间的联系,在国统区成立上海、北京^②或天津、吉林三个中央局都是合适的(其成员不超过两位领导同志)。上海局将领导江苏、湖北、安徽、河南南部、山东南部、浙江北部和中部的的工作,直到四川国统区省委和四川苏区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为止。[中共上海]中央局还要领导四川国统区的工作。华北中央局应该领导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南北部和山东北部的工作;吉林局领导满洲的工作。所有这些局,特别是上海局,应该保持绝对少的联系和严格限制的会议次数。所有这三个中央局应该与中央苏区保持直接的信使和无线电通讯联系。还必须在上海和华北局之间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系,一开始可以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而不通过中共机关。还要与满洲局及海参崴建立专门的无线电和信使通讯联系,如果还没有建立的话。

2. 在上海及其他地方现有的或原有的工会机关,基本上都应该取消。出于一些考虑,这样做是必要的。这种机关的取消将消

^① 文件上有批注:收入机密中国案卷。П.米夫。[1934年]11月22日。

^② 原文如此。应为:北平。

除党组织工作的重复现象并将大大简化党的专门机关。此外,这将有助于克服现存的工会工作与党的一般工作的脱节现象,并且将从根本上大大改进工会和企业中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因此,将会使工会运动得到加强,并使工会机关的许多同志解脱出来,去从事地下的群众性工作。以后随着企业中真正群众性工会组织和各种统一战线机构的增多,还可以提出建立特别工会机关的问题。但是现在这种机关不需要,它会削弱秘密工作的建立,成为在革命工会运动中实现必要转折的障碍。

3. 关于上海市委员会和省的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减为3到5名同志,必须把上海和省的各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鼓动部等)的组成人员减少到这样的程度。从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中解脱出来的同志应该调往地区委员会和国统委员会工作,例如,上海的闸北和吴淞港区,河北的唐山区、天津区等等。此外,在企业、矿山和港口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支部领导工作中也需要使用这些同志。根据可能,每一个地区和最重要的区委员会应该有自己的后备机构。一般组织员和工会指导员的体制应该进行大改组,特别是在上海,以便造就固定在一些企业中的组织指导员干部。应该严格限制各省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之间的联系。例如,在上海市委员会和上海九个区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应该做这样调整:市委只能与区委进行间接的联系,也就是通过组织指导员进行联系。这些建议的主要一点,就是使上层领导分散化和把工作集中在建立巩固而积极的地区、区和支部的领导机关和组织上面,而这些领导机关和组织能够在党的政治路线框架内独立地工作。

4. 在安排住房、接头地点和信使联络时,例如在上海,必须要有根本性的改变。许多领导同志的住房总的类型和地区以及生活方式等,警察都是知道的:他们在法租界和国际租界的中等楼房里寻找住房,一般是在“混杂的”地区,白天待在家里,只有夜晚才出去,等等。在某些情况下今后还不得使用这种住房,但是必须更

广泛地利用小型店铺(裁缝店、家具店和食品店)和工人住宅作为秘密接头的地点和住房,或许为一两位主要负责同志租用与机关没有联系的外国同志所住的楼房是适宜的。此外,中国同志以及外国工作人员的会面可以而且也应该,比如说,在吴淞、苏州、闸北、杭州等地的咖啡馆里进行。中国同志和外国同志参加的会议绝对应该在欧洲人租用的住宅里举行,最好,这种住宅的主人具有一定的“地位”。

5. 对于及时准备交流、调配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工作,需要予以更多的注意。尽管存在种种困难,还是应该克服对一些同志调动的迟缓和不愿情绪。前不久的经验,例如斯拉文^①事件和数十起此类事件,充分地证明这样做是必要的。一般来说,在一个地区工作一年到一年半之后,主要负责的同志就应该调往其他地区或省份,哪怕几个月也好。还必须在各区之间,例如在上海,扩大干部的交流。

6. 为中央苏区筹集的所有款项,基本上应该经过香港转送。为华北筹集的款项,可以通过国际联络部转送。不仅各省委,而且大多数区委都应该掌握最少三个月的储备金。

7. 最好是,省和地区领导干部的地址和最重要的秘密接头地点告诉国际联络部并以密码的形式存放在这里或在当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恢复被破坏的通讯联系,否则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恢复。

8. 负责与南部诸海^②各党联系的机关应该与中共完全分开。为这项工作需要在澳门建立一个独立的基地。

9. 必须立即从上海撤走 10 月前^③待在那里的所有外国同志。

① 李竹声。

② 东南亚。

③ 即在到 1934 年 10 月 4 日盛忠亮及中共上海中央局其他工作人员被捕前。

10. 急需审查中国租房同志的担保人。这样做不仅从揭露叛徒的角度看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为了确定在可以信赖的担保人中谁是警察所了解的。

11. 为了确保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以及上海和莫斯科之间无线电通讯的不间断性,必须紧急组建使用外国人工作的常备电台。这些电台也可以作为中共的备用电台。

12. 最后,我坚决建议从这里给党内积极分子及党员群众发一封信,说明最近的暴露和逮捕的意义和教训问题,说明党在发动群众运动和反对奸细及恐怖的斗争方面所面临的任务,说明旨在改善秘密工作的必要性以及具体措施。这封信应该强调指出加强党的合法群众工作的必要性和方法,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将群众工作的不合法形式同半合法及合法形式结合起来。这个文件并有助于自上而下地动员全党;便于进行反对可能出现的惊慌失措和投降主义倾向的斗争;其次,这个文件还将有助于克服存在的宗派主义,特别是由于奸细行为造成的困难所引发的宗派主义,并对动员广大群众反对奸细和白色恐怖的事业有较大的帮助,这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赖安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027, 第 26—30 页。

英文打字稿, 副本。

310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赖安的谈话记录^①

不晚于 1934 年 11 月 20 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赖安对 11 月 14 日向他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经过修改)和对这些问题的补充材料^③

1. 关于外国同志的秘密工作。在上海的所有外国同志,除了共产国际代表^④外,无论在这里发去的电报^⑤之前还是之后,几乎经常违背秘密工作的所有规定和方法,虽然在安排我们的会面,特别是与中国同志的会面上也表现出相当的警惕性,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对秘密事务还是不够警惕,在大逮捕和警察侦察两名外国信使^⑥案件之前,我们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的无忧无虑,并且犯了一系列严重的保密上的错误,这些错误即便确实未给

① 文件上有批注:收入机密中国案卷。И. 米夫。[1934 年]11 月 25 日。

② 日期是根据第 309 号文件确定的。

③ 1934 年 11 月 14 日与赖安的谈话没有发表(见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4, 第 23—36 页),因为赖安提出的问题。赖安回答的内容与已发表的文件完全相同。谈话的参加者不详。

④ A. 埃韦特。

⑤ 指 1934 年 3 月 9 日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给 A. 埃韦特的电报和 1934 年 4 月 27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所发的关于严格遵守秘密工作方法的电报。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 目录 84, 卷宗 47〈发文—1934 年〉, 第 41、83 页)。

⑥ 何人不知。

党的中央机关^①造成威胁,却也给我们的机关造成了威胁。我们与孙逸仙夫人^②的联系,与伊达·特里特、塔斯社代表^③,特别军事机构的联系;我们与信使及我们之间的公开联系;我们相互间的电话联系;通常在最合适的时间即白天我们在住宅里频繁举行的政治会议,再加上常常伴随着的“叫喊声”;在我们的住宅里保存诸如列宁“图书室”这种日常工作所不需要的材料和文件,代表与艾萨克斯之间的联系;代表和以前开设书店的合法同志^④之间的联系;我们的住所集中在彼此很近的街区,等等,数不胜数,这一切都是我们松懈麻痹的很熟悉的例证,这种松懈麻痹大概一直存在到1934年3月,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此外也反映了我们对秘密工作实践和布尔什维克工作方法重视不够。在秘密工作中过于漫不经心和粗暴地违反代表所采用的和维护的秘密工作的基本方法,使我们中的任何人,包括我在内,都不能逃脱对这种无法容忍的状况应负的集体的和个人的责任。至于国际联络处领导人^⑤、军人同志^⑥和我,无论是在个别的讨论上面所提到的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弱点时,还是在我们的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中的个别问题时,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及时地提出过这些问题,我们也没有为在我们的工作中和秘密联络中实现必要的根本转折进行有力而严酷的斗争。

3月前我们所有人都像把头插入沙子中的鸵鸟一样,缺乏警惕性,因为我们都希望“摆脱得干干净净^⑦”,因为我们的几位前任

① 指中共上海中央局。

② 宋庆龄。

③ И. Е. 切尔诺夫。

④ 何人不知。

⑤ H. H. 格伯特。

⑥ M. 施特恩。

⑦ 关于信使案件的材料没有找到。

都是“摆脱得很干净的”。

1934年3月初,在调查信使案件和上海组织暴露^①事件时,我们曾经集体讨论过业已形成的局势,并且作出一些关于改进我们秘密工作的“决定”。这个时候代表还是对我们面临的危险估计不足,虽然从这里发去了几份电报,但他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我们中的其余人都多少改进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和联络方法,至少在我们秘密联络中和工作中的许多薄弱环节都消除了,尽管还远没有全部消除:例如,与宋庆龄的联系实际上已经停止,但不是完全停止;与专门军事机构的联系已经减少,但还是保持了联系;与塔斯社代表的联系也是一样。在征得代表、军人同志和国际联络处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我和J^②同志一起在自己的住所里进行了一系列军事破坏活动的实验,一些同志还是与一些信使保持了联系。根据代表和国际联络处领导人的建议,虽然这决不是要推卸我个人的责任,我以自己的名义为代表租了一套住房并且他搬了进去,但是没在那里住过(这是在他以前的住宅遭袭击之前并且是按照正常的间接商务渠道进行租赁的,因此排除了丝毫的怀疑)。尽管有上述情况,但是作出以下结论也是不对的:外国同志们,除了代表外,无论集体或个人,都没有在自己的秘密工作中采取相当的预防措施,我们平常都是这么做的,甚至违反了某些规定,——这怎么会不使人感到离奇呢——但是没有必要强调我们在这个领域工作积极的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要结合上海党的机关的许多环节遭到一系列搜捕和破坏的情况来批判性地审视我们的许多弱点和缺点,其目的是为改组党的机关和改进外国同志及中国同志秘密工作的方法而采取必要的措施,为把我们的经验传给那些不仅将在上海而且将在其他中心城市活动的同志,并不只是为使我们中

① 见第267、300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知。指爆破工作的教员。

间的那些对上述局势承担直接责任的人能够完全意识到自己的个人责任,并为我们将来的工作得出必要的结论。

2. 关于中国同志的秘密工作和党组织暴露的原因。作为导致上海机关遭到一系列袭击和破坏、起促进作用并相互联系的原因而需要加以分析研究的因素,特别是与7月^①斯拉文^②及16名同志被捕和10月米茨凯维奇^③及其他同志被捕有联系的因素,有以下几个:

(1)由于发动第六次进攻^④,白色恐怖加剧,既然这涉及白区,所以它的矛头首先指向集中在上海的党组织。因此,外国的和中国的秘密警察与“蓝衣社”分子^⑤合作,采用了新的比较完善的策略,而党和外国同志对这种策略反应迟缓。这种策略就是:蓝衣社分子在企业 and 学校的活动重新猖獗起来;英国、日本、法国和中国当局改进协调行动;改进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利用;暂时停止对外国同志的逮捕,以便发现他们与党中央的联系;对法租界和国际租界中国房客的所有担保人进行专门研究;对在上海的所有外国人(包括他们的商务和活动)加强监视;特别监视他们通过银行汇兑的款项,对所有转汇的纸币进行登记。

(2)大量培训和更巧妙地利用在上海活动的数百名叛徒(估计有300多人,包括利用沃罗夫斯基^⑥等人)。

(3)在党和工会机关内有奸细活动,但在揭露奸细方面所做的工作却很少(例如,有14个可疑的或已知的奸细一事,在斯拉文被

① 原文如此。应为6月。见第267号文件。

② 李竹声。

③ 盛忠亮。

④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⑤ 见第182页注④。

⑥ 黄平。

捕后有人向政治保安总局^①作了报告,据说他们全都隐藏起来了)。而另一方面,对于教育和动员全党与恐怖和奸细行为作斗争却做得不够,党也未能充分吸收广大群众参加同奸细行为和白色恐怖的斗争。

(4)在党的积极分子的秘密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党的机关的过于集中及其与工会机关的部分重复使之更为严重,也就是说,领导同志一般都有太多的联系;在一处住所里住着两位以上的领导同志;住所地址和秘密接头地点知道的同志太多;同时有五个以上的领导同志聚集在一起,例如,原上海工会联合会执行局、原上海党的委员会,等等;地址、档案、文件保存在住所里;除了房间和房屋等外,没有充分利用其他秘密接头地点。

(5)外国同志的疏忽和在秘密工作中的缺点可能引起了(敌人)对一些中国同志的跟踪。这特别涉及代表和他与托洛茨基分子艾萨克斯的联系,后者曾经与托洛茨基分子格拉斯合作过,格拉斯是有名的CID^②特务。

(6)几个信使以前使用电汇方法汇寄大笔资金,引起了警察的一系列追查;不合要求地挑选信使,例如,挑选JS^③同志和托姆·贝尔同志,以及在向中国派遣学生^④时犯的一些错误(9名中国同志和2名印度支那学生事件),这些都使共产党委员会机关遭到了危险。

(7)为了保持与马来亚党和其他党的联系而利用上海机关的分部,这同样可以成为共产党委员会机关和外国同志机构的某些环节被发现的一个渠道。

① 原文如此。指中共上海局特科。

② 原文如此。C. I. D——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上海国际租界刑事侦察处)。

③ 何人不详。

④ 指被派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学校学习的高中毕业生。

关于为克服上述缺点而应该采取的措施,我要另外提出关于改组上海机关而要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建议^①。

3. 问题:斯拉文及其一批人的被捕是否与艾萨克斯有关?

(回答:)完全可能,斯拉文和一些同志被捕可能与艾萨克斯有关,因为关于艾萨克斯与当局合作程度的判断尽管可能是设想,但至少已经清楚,鉴于他与格拉斯存在业务关系,一条为奸细钻入党的道路就被打开了。因为艾萨克斯和格拉斯不仅认识代表本人,而且还知道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一位给艾萨克斯当过翻译的中国同志^②,也和党的机关有联系。

4. 问题:在代表住所发现的文件能否导致逮捕和跟踪斯拉文?

(回答:)大量的文件,或者更确切地说,保存在代表家里的大批档案,不会直接导致斯拉文的被捕,至于这些文件可以证明代表与中央委员会之间的联系,那是另一回事了。

5. 问题:由于一些中国同志的被捕,警察是否已经知道您和代表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

(回答:)据我所知,警察不知道在上海的外国同志每个人的确切职务,至少在这方面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但是警察掌握了我写给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和菲律宾共产党的许多信件,这个情况使警察有可能得出必要的结论,尽管在这些信件中使用了各种化名。

6. 问题:在斯拉文被捕后是否还有其他组织暴露?

(回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6月斯拉文被捕和10月米茨凯维奇被捕之间的这一段时间里还发生过三次被捕事件:一次,包括有许多工会同志的被捕,一次,约有上海和一些省组织的7人被捕,以及政治保安总局的6人被捕。除了报刊上有详细报道的

^① 见第309号文件。

^② 何人不知。

政治保安总局同志的被捕外,我不知道这些逮捕的日期。

7. 问题:同志们被捕后表现如何?

(回答:)据我所知,除了属于组织部一成员的一个女的^①和政治保安总局的一个男的^②好像成了叛徒,以及原党委^③宣传鼓动部部长^④发表了反党声明,我们不掌握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信息。

8. 问题:关于此行的目的。

(回答:)有关我的直接任务的指示首先规定,要我从中国、日本、印度支那、爪哇、菲律宾及其他(国家)组织选派学生,因此,要弄清南海^⑤国家党组织的某些工作方面,以及考察澳门的情况。这项任务应该在我到达上海后两三个月内完成。关于我在这方面工作的全面报告已呈交给你们^⑥。在我返回上海后,大约在[1933年]11月1日^⑦我和代表发了一份关于请求进一步指示的电报^⑧。在等待回复(回复大约两个月后才到^⑨)期间,我参加了远东局的一般工作,还负责菲律宾的工作。大约在1月初接到了从这里发去的指示^⑩,规定我的工作有以下几点:担任中国工会的指导员并仍在代表的领导下工作(这在后来造成了一些严重的误会),以及负责做南海各党的工作并要完成从这些国家招募学生的任务。大

① 何人不详。

② 何人不详。

③ 指江苏省委。

④ 何人不详。

⑤ 东南亚。

⑥ 文件没有找到。

⑦ 赖安于1933年10月回到上海(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814,第23页)。

⑧ 文件没有找到。

⑨ 看来,指1934年2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发去的关于米尔顿(赖安)任务的电报,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495,目录184,卷宗97(1934年发文)第23页)。

⑩ 文件没有找到。

约在6月初又来了进一步的指示^①，要我参加反帝工作。

9. 问题：关于我与代表的共同工作。

(回答：)从一开始和到后来，代表、军人同志和我组成了一种类似执行局的机构，有一段时间，代表与军人同志的工作关系，稍后与我的工作关系曾经十分紧张，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集体工作的，讨论一切问题，讨论军事建议，为中央局^②起草文件和声明草稿，等等。我承担了与总的工作有关的一些任务，即起草信函和声明。这是在我与工会同志一起工作及对菲律宾和马来亚工作之外外加的任务，我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完成自己的工作的，一段时间我把所有材料和我自己给这些党的信函^③送给代表审查，但他对我这方面的工作并不特别感兴趣。在军人同志还留在上海的最后几个月以及后来，当我们定期见面并讨论各种问题和文件(主要是与江西和福建军政局势有关的问题和文件)时，就再没有集体工作了，当然，我们的工作也缺少同志式的气氛，这对工作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在提到必须关注白区的问题和任务时。

至于代表和我之间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从一开始就存在(见我就代表为五中全会^④起草的决议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⑤)，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对我们的工作关系产生像与军人同志那样的严重影响。这种分歧的产生是在工会工作和反帝工作上，是在组织问题上和福建事变^⑥时期的策略上，是在艾萨克斯和《中国论坛》^⑦问题上，等等。既然我以前写过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并与这里的个别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中共中央上海局。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见第32页注②)。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 见第84页注④。

⑦ 见第270号文件。

同志讨论过其中的一些问题,这里就没有必要详细讲述了。但是,应该说,在最近两个月来,代表和我之间的关系从各个角度看都是极不正常的。

10. 问题:关于代表与艾萨克斯的关系。

(回答:)在我来到之前很久,代表与艾萨克斯之间的联系就建立起来了,而且十分密切。此外,斯拉文知道这种联系的存在,尽管不完全了解其内容、范围和代表与艾萨克斯之间的各种协议。实际上,在代表与艾萨克斯之间关系中的所有事情上完全是代表主动采取行动的,也是他自己负责的,当然,在艾萨克斯拒绝出版《中国论坛》之后,情况亦如此,当时代表交给艾萨克斯约500美金。正像你们所知道的,1月初,我与代表一起两次会见过艾萨克斯,并拒绝执行代表在这件事情上作出的进一步指示,至于对代表和艾萨克斯之间联系所采取的措施,已向斯拉文和米茨凯维奇作过通报,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讨论过,特别是在一些军人同志的坚持下。国际联络处的领导人从这里发了一封电报^①,代表也确认是从这里发了一份关于他与艾萨克斯联系的电报^②。代表认为艾萨克斯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对艾萨克斯的这种评价、他对艾萨克斯的整个立场和态度,特别是在艾萨克斯公开暴露自己之后,只能说是他对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毫不妥协斗争的必要性估计不足,缺乏政治警惕性的结果,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本性是个调和分子。

11. 问题:艾萨克斯是否通过自己与代表的关系与中国同志

-
- ① 可能,指1934年3月3日H. H. 格贝尔特就Г. 艾萨克斯与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系和对远东局及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可能造成的后果给И. А. 皮亚特尼茨基和А. И. 阿布拉莫夫的电报。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495,目录184,卷宗61(1934年收文),第234页)。
- ② 可能指的是关于1934年1月27日和2月1日А. 埃韦特就与Г. 艾萨克斯谈判关于他离开《中国论坛》编辑岗位给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两份电报。

有联系?

(回答:)据我所知,艾萨克斯与中共的唯一联系,是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宣传鼓动部成员——负责《中国论坛》印数和发行的那个同志^①。其次,艾萨克斯于[1933年]8月在上海组织并参加了一个秘密反战会议^②;他还与各种左翼学生团体有联系。

12. 问题:您对于伊萨克斯同志和他在秘密工作中的表现作何政治评价?

我认为,伊萨克斯同志无论对自己直接负责的工作还是对其他方面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也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在许多问题上都没有采取正确的立场。这一切你们都是知道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评价他的工作、他的优点和缺点了。此外,大家都了解在我们那里存在着许多尖锐分歧的问题。至于伊萨克斯同志对我们局^③存在的非布尔什维克式的工作关系要负的个人责任(很清楚,我们都负有责任,但就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现在只讲伊萨克斯同志),我要说,这种非布尔什维克式的工作关系,虽然不总是由存在的政治分歧决定的,但这种分歧还是使工作关系变得更加严重了,伊萨克斯同志虽然具备政治上的优点和工作上的积极性,但他也具有强烈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这种倾向有时使人很难同他一起工作。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很主观并且根本不接受批评。在我们工作的环境中[这一点表现]很具体,在1934年初,当中央苏区的形势变得极其严峻的时候,伊萨克斯同志不仅竭力攻击瓦格纳^④同志,而且攻击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时由于我们之间存在分歧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拒绝接受他的建议,他就时不时

① 何人不详。

② 指的是关于反对战争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远东代表会议(见第159页注③和第83、197号文件)。

③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④ 奥托·布劳恩(李德)。

地以“辞职”相威胁。所有这一切更加恶化了我们的工作关系并在总体上影响了我们的工作。

至于说从这里发出3月电报前后他在秘密工作中的立场和行为,他在违反许多秘密工作规定方面也有份儿。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必要,我就不列举这方面的各种例子了,但我想指出,伊萨克斯同志在许多场合很尖锐地提出了关于改进我们秘密工作的方法和克服我们的麻痹大意态度的问题。遗憾的是,他在这方面的行为与他的批评和他的建议并不总是一致的。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027, 第 15—25 页。

英文打字稿, 副本。

311

赖安关于国统区革命工会的书面报告

1934年12月4日^①于莫斯科

秘密

关于总的形势和国统区革命工会组织所 面临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的初步意见

在对总的形势作出简要的分析和论述国统区革命工会运动所面临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问题之前,指出过去时期罢工斗争和失业者斗争的主要特点,这是极其重要的。继1933年日益高涨的巨大罢工浪潮之后,1934年上半年出现了广泛的罢工运动及无产阶级的其他群众行动,这是对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向工人和劳动人民疯狂进攻的一种反应,这种罢工运动和行动具有以下主要特点(对国内当前形势和构成罢工运动基础的各种情况的分析,超出了这些看法的范围):

(1)在主要工业中心城市和主要工业部门,即在海上和铁路运输、矿山、纺织、丝织、烟草等部门,以及在轻工业和手工业部门的群众性罢工、示威游行、请愿等运动(主要是自发性的)都在不断高涨,尽管各地是不平衡的。

(2)这种运动具有少见的战斗性和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国民党的性质,虽然这种运动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但是它已经显示出向更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1934年12月20日。

高的革命水平迅速过渡的趋向(这就是:不顾恐怖活动的野蛮猖獗,群众性地违反政府关于禁止罢工和实行军事管制的法令;以意大利式的、反对同盟歇业大批解雇工人的车间、工厂和矿山的罢工形式、为直接的经济要求而举行的罢工,与为实现反对警察和国民党的政治要求而进行的战斗结合起来——这就是开滦矿工、上海和湖州丝织业工人,九江码头工人等等举行的战斗的街头示威游行、占领公安局行动,组织群众性的武装纠察队和与军警发生的冲突,从罢工地区驱逐国民党工会官僚,等等;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强大的声援运动,包括唐山、上海、湖州、苏州等地的总罢工和政治罢工的高涨;失业者的一些罢工和战斗同反帝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华北)^①。

(3)罢工斗争持续时间长,在同一些企业,如在矿山、卷烟厂和丝织厂等等,罢工频繁。

(4)扩充各种组织形式的工人们,表现出了广泛的主动性和顽强的革命精神,通过他们的各种组织顺利地开展了公开的、半公开的和秘密的群众工作,并对战斗实行了领导;从普通工人中涌现出成百上千名新的革命干部,他们表现出高昂的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和领导斗争的才能。

(5)(浙江、广州、上海、开滦等地)罢工运动与失业者运动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企业主和国民党利用失业者作为工贼已经不可能了;此外,蓬勃发展的失业者群众性运动的范围已十分广泛,例如,天津、开封、上海被解雇和被停业的工人占领了工厂;失业者在公共事务局、市政府、国民党党部的大楼前举行示威游行,特别是农业地区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夺取储备的大米和粮食。

(6)工人对国民党、对黄色工会和托洛茨基主义工会头目及其“干涉”罢工运动的行为的群众性不满情绪的增长,导致越来越频

^① 见第106页注⑤、107页注②、③。

繁地发生了从罢工地区和罢工委员会中赶走国民党分子和黄色工会头目的行动(如唐山矿工的罢工、上海烟草和丝织业等工人的罢工),国民党工会和改组派工会越来越无法阻止罢工和群众性发动了。但同时我们仍然面对着这样的情况:背后有国民党国家机关支持的黄色工会还是能把工厂里和失业者中间的许多运动引上谈判和仲裁之路,还是能够破坏和出卖许多的战斗,特别是在铁路员工和海员中间。但是,与此同时还应该指出,黄色工会领袖越来越加强对罢工和失业者运动的领导(其目的是使运动在适当时刻失去领头人),以至大大加强“左”的蛊惑宣传和采用“左”的花招——4月17日和9月18日在英美烟草公司各工厂罢工期间和邮政工人及铁路员工举行的意大利式罢工期间,黄色的上海劳工联盟等就印发了“号召”书,组织了“抗议”集会;还开展了诸如组织工人运动会这样的活动,等等。因此,还必须提到,一些托派小组开始在上海的卷烟厂、丝织厂、电厂活动,但暂时取得的成果还很少。在华北也是这样,特别是在唐山、天津、北平地区,在满洲更甚,日本人作出很大努力向工人中间渗透并组织在他们控制下的“独立”的工会和团体。

(7)与1933年相比,唐山、上海、天津、北平和四川的党和赤色工会组织在罢工运动中的作用增大了,党在工人和劳动人民中间的影响和威信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虽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应该指出,正是由于党未能与大多数罢工取得联系,未能在罢工运动和失业者运动中争得决定性的领导作用;由于党在那些甚至由它独自组织和领导的罢工中未能从组织上加强自己的巨大影响;由于党未能广泛地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充分地利用新的更灵活的工厂组织形式和群众工作来加强革命的工会运动,特别是在向黄色工会会员群众中渗透方面更是如此;由于不善

于经常把争取群众直接经济、政治利益的斗争与为反击第六次“围剿”^①而在组织具体的群众行动方面所坚持不懈进行的群众工作结合起来，由于所有这一切，1934年上半年，国统区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革命高涨，如同1933年一样，基本上没有形成协调一致的运动；未能广泛地把运输工人和军工企业工人中的决定性阶层吸引到罢工运动中来；未能把运动提高到统一的、自觉的、旨在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水平；这种高涨还没有成为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民族革命群众运动和战争的基础，没有变成对红军和苏区的广泛积极援助和群众性支持的强有力杠杆。

二

国统区革命工会组织的现状和工作的具体情况怎样呢？最近一个时期党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但是在工会工作方面，主要是在河北和上海的组织中，在实现真正转折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骤，这首先表现在，党和工会组织在准备和领导华北和上海罢工运动方面已经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在上海和天津码头工人当中以及在唐山矿工当中已开始进行有步骤的工会工作。最近几个月来，在长江航运和近海航运的船员和领航员中间以及在上海丝织业、电厂、人力车夫工人中间的工作有了某些改进。在河北和湖南的铁路员工当中以及纺织厂中的工会工作也有一些改进。这个时期在四川国统区，在组织兵工厂、丝织厂和盐井工人的一些工会小组和战斗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了以更坚决的手段来满足工人们最迫切的直接要求（尽管到目前为止这还仅仅限于宣传鼓动方面），把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斗争与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最重要的企业、矿山和码头集中做出了重大努力。

但是事实总归是事实：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总的组织状况和

① 这里和下面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群众工作仍然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不善于进行联系或争得对工人的多数罢工和其他群众性战斗行动的决定性影响。工会组织停留在以前的组织状态。国统区的工会会员总数,据估算,仍然在 5000 和 7000 人之间徘徊,而最近几个月唐山州^①的 1200 名矿工、上海和天津的近 700 名码头工人又重新组织起来。在上海 4、5 月的总罢工^②期间有近 200 名丝织厂工人组织起来了,我们看到,在诸如纺织、烟草这样的工业部门和在电车工人、印刷工人等中间工会会员人数在下降。严格说来,在国统区没有群众性赤色工会。海员工会只有 150 名会员,上海纺织工会大约有 225 名会员,等等。此外,这些组织的工厂工会小组都非常小,通常与群众联系不够,并且日常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群众工作也很薄弱。的确,在这种总的情景中,我们在码头工人和矿工中间的某些工人小组方面有一些很鲜明的例外,但遗憾的是,这只是一些个别情况。至于众所关注的问题,即在国民党工会会员中间,特别是在铁路和海洋运输部门的会员中间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活动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取得任何成绩。除了一开始在失业矿工中间开展的工作外,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未能把失业者动员起来并掌握他们的斗争的领导权,等等。赤色工会组织在加剧和扩大反帝和反国民党斗争方面的缺点和弱点就不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了。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如何解释在这种非常有利的客观形势下,特别是在前不久工农群众性的罢工斗争浪潮及其他革命斗争形式高涨、苏维埃革命的威力不断增强、劳动人民对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增加和革命的愤怒情绪爆发等条件下,革命的工会运动在组织上并没有发展起来,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脱

① 原文如此。应为:区。

② 指“美亚”公司各丝织厂 5000 工人的总罢工(见第 107 页注②)。

离了罢工运动的主流，未能在国统进区发动和领导旨在积极支援红军和苏区的强大的群众运动。

在这里没有必要列举这样一些极其重要的因素，例如，由于开始进行第六次“围剿”和南京公开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政治迫害和白色恐怖空前加剧，结果群众工作不止一次中断，工厂组织的各个环节衰退，实施领导的一些地区委员会和省委员会暴露，数百名干部被捕；在这里也没有必要提出失业空前增长的问题（这种情况，除了使开展斗争的机会增多之外，也为开展工厂工作造成一些障碍）。也没有必要在这里重新列举党在工厂工作和工会工作方面存在的所有缺点和弱点以及策略错误和领导错误等，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件中已经作出了正确的分析。但是非常重要强调的是强调指出直到现在都未给予足够重视的几点来作专门讨论。

(1) 第一点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即在工厂和工会组织方面要克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宗派主义运用，必须采取新的更灵活的统一战线形式，以及与不合法的群众工作并行的合法的、半合法的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渠道。最近的经验表明，尽管中共作出了认真而坚持不懈的努力，但还是未能实现工会工作的根本性转折；总的说来采用的组织方法和形式还不够灵活，也不适应于目前的形势和现时的要求，多数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还没有完全克服宗派主义、脱离广大群众的自我孤立状态。总之，经验表明，在现时条件下，企图以现有形式建立不合法的独立的赤色工会，只会导致建立实际上以党的纲领和条件来要求会员的小范围的工会小组，在这种小组中仅能把数量有限的最先进的工人组织起来。

存在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从组建独立的不合法的赤色工会的角度过分狭隘和机械地对待建立和巩固革命工会运动的问题，没有充分地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即一个主要直接的问题是寻找和发展合适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在各种各样名称和招牌下的半

合法组织形式,这种名称和招牌就是在本工厂、矿山和码头为统一战线奠定组织基础的工具,而工厂、矿山和码头就可以进行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工作。还可以开展经常性的群众性不合法的工作,为争取工人和失业者最紧迫的需求和切身利益组织具体的群众行动。

在这方面,党和远东局研究得不够,没有从群众的实际活动和广泛的倡议中吸取相应的教训,特别是从最近一个时期蓬勃发展的罢工和失业者斗争的丰富经验教训中汲取教训,在这种罢工和斗争过程中,正如上面已经讲到的,工人和失业者自发地、主动地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工厂、矿山等罢工组织和领导形式,以及进行群众工作的方法——各种兄弟姐妹统一战线组织、工厂小组;互助会、助贫协会;在矿山和企业中建立的众多新的和改组的秘密社团——食火会、大刀会、银衫会;建立了合法的群众控诉委员会和代表团,在准备和领导罢工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开展了群众性的合法请愿运动,尽管许多这种请愿和运动的领导权转入国民党工会官僚手中并被纳入“和平渠道”,但是这种运动已经成为在工人和失业者中间广泛开展合法和半合法宣传鼓动工作的工具,成为团结和吸引群众参加具体的群众行动的工具。我认为,党恰恰应该通过统一战线抓住这种组织斗争的形式和方法,利用它们来扩展革命的工会运动,特别是在主要工业中心城市建立广泛的战斗的工会组织基础。虽然这种不确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可能显得是“原始的”和最简单的(与独立的工会相比)形态,但是它们也具有特殊的价值,是开展与不合法的活动相并行的合法的群众性工会和工厂工作的工具,同时有可能作为某种半合法的机构存在,这种机构能够以工厂、矿山等为基地吸引大量工人参加斗争并使他们联合起来,在这种基础上革命的工会运动可以得到迅速的发展。

(2)第二点也是与第一个问题有直接联系的,是在国民党工会

及改组派工会会员中开展工作的问題，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很少。其原因主要在于轻视这项工作，在于对其重要性和可能性采取了严重的宗派主义轻视态度；在于对在各种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中以及其普通会员群众中开展工作的冷淡态度，还在于企图机械地模仿在意大利、德国等地采用的工作方法；在于对国民党工会官僚的活动及其采取某种蛊惑性伎俩的能力估计不足，以及在于对黄色工会的这些伎俩和整个政策及时进行斗争和揭露不够，这就给在罢工和其他群众性行动期间揭露和孤立反动工会官僚的工作增加了困难。

为了实现必要的转变，要深入到黄色工会会员群众中去，从组织上把他们对工会官僚和国民党不断增长的强烈不满情绪和不断加深的仇恨心理固定下来，以便吸引这些工人参加我们领导的斗争，除了这些之外，十分重要的是，根据每个省、每个工业中心城市以及工会内部的特殊条件，制定出在每一个黄色工会会员中间开展工作的具体的和有区别的处理方法。这个问题是与根除各种宗派主义和以战斗的统一战线为基础在国民党工会会员中进行有步骤的日常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必须考虑到，在许多（如果不是多数的话）国民党工会内部进行工作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多数国民党工会甚至没有具体的工会生活，不举行会议，不进行选举，等等。一般存在着由国民党地方组织或地区组织任命和直接控制的上层官僚，他们与公安局合作，对工作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监督并强行收缴会费和各种形式的苛捐杂税。属于这一类黄色工会的有铁路员工工会、海员工会、印刷工人工会、拖船和驳船工人工会、等等。同时一些由个别人控制的工会，主要是在北平和天津的工会，在过着某种有限的工会生活，在其内部和通过在这种条件下所具有的渠道开展革命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就是电车工人、邮政工人等工会。其次，还必须注意诸如铁路员工工会、海员工会、电车工人工会和印刷工人工

会这样一些国民党工会在组织方面的力量和影响,从被迫缴纳会费的大量工人角度看,这些工会是具有群众基础的。实际上,这些工会并没有包含有关行业的多数工人。像在上海的纺织、丝织、卷烟工业和码头等等行业中存在的这种黄色工会只是一些薄弱的组织,只包含这些行业中的几百名工人。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工作的软弱,还必须承认,国民党工会的领导者还是能够,像上面已经说过的,暂时压制许多斗争或者使其失去领导,尽管他们的影响在下降并且很有限,许多国民党工会,如开滦煤矿工人工会等,都处在全面瓦解和消失的过程中。

总而言之,说到渗透到国民党工会会员中并把他们吸引到群众活动中来,现在最首要的问题就是,根据当地的条件和工会的具体状况以及工人们的迫切要求等等,提出和发展各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组 织方法,诸如普通工会会员选举出来的代表团和抗议委员会(这样的例子,我们在领航员黄色工会、上海发电厂工会、铁路员工工会和无兴^①(音)商贸职工工会等的会员中都看到过)、为检查工会会计管理和支出而广泛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以及抵制缴纳会费的委员会、反对大批解雇工人的委员会和救助委员会,等等。当然,这项工作应该与下列斗争并行,即扩大反对国民党和改组派工会首领的整个政策和活动的斗争,更广泛地揭露他们的作用和蛊惑行为(这是国民党整个反革命政策和活动的一部分),并把这种斗争提到应有的高度。这种统一战线机构使人能够在进行半合法和非法工作的同时进行一定的合法工作,在我们领导下可能变成强大的中心组织,把黄色工会的广大会员以及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联合起来去开展当地广泛的群众运动。

也出现一些与国民党的一系列工会(如唐山的黄色矿工工会)有关的特殊问题,过去一年在唐山的一些总罢工过程中,矿工们自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无锡。

发地和部分地在我们的影响和领导下驱逐了国民党工会的领袖们,停止向工会上缴各种志愿费用并试图建立自己的组织,这种组织不都叫“工会”。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力量和影响以及正在进行的斗争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提出关于建立合法的或半合法的独立工会的问题——正式不称赤色工会,或者根据情况建立合法的群众组织,例如,矿工慈善会。

(3)下一个问题是在失业者中间开展工作,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应当以最坚决、最有力的方式开展这项工作,特别是考虑到失业者斗争浪潮不断高涨、广泛招募失业者加入白军和工人营的情况。鉴于在当前的形势下整个失业者斗争不断增长的政治意义,特别是鉴于无产阶级队伍中发生的变化(顺便说一句,这种变化使失业者的相对作用大大提高了),就更应该这样做。在这里还有一个实现迅速而重要转折的任务,这首先就是与失业工人最重要的阶层建立紧密工作联系的问题,也就是与被从重要工业部门的主要企业中解雇的工人建立密切联系的问题;利用新的,特别是主要由群众自发提出来的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各种委员会、募捐和救助失业者及闹饥荒和水灾地区难民的协会;建立临希^①(音)饥民会、河南济贫会、各种“吃富”团、反对大批解雇工人的委员会等等之类组织;利用和领导各种运动:要求公共事务局、市政厅、中央政府和商会给予资助的请愿和示威游行活动;反对辞退工人和要求向被辞退的工人支付应支付的工资和报酬的罢工,群众性的抵制缴纳租金、债务和捐税行动,反对强制性劳动和国民党军队暴力征兵行动,群众有组织地夺取日本储备库、商人和地主仓库的大米和其他产品);要把这些战斗与立即救助饥荒、水灾的受害者和战争难民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团结和扩展这种运动,并把它与罢工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把罢工运动作为争取

^① 原文如此,何地不详——译者。

粮食、土地、自由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克服现时工会工作与党的工作脱节的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种情况影响革命工会运动的发展和巩固,同时阻碍党的组织基础和整个群众工作的扩展。工会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独立的势力范围”,工会工作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专门的工会机关和人员手中。地区和基层的党委会及组织,特别是支部,根本没有经常积极参加独立工会小组和委员会的工作。只有工厂、码头等部门的少数党员才是工会会员并参加日常的工会工作。最后是上海的一个例子:在上海码头工作的350名党团员中,只有6人是临时码头工人工会的会员,也只有这6人积极地参加了工会小组的工作,几乎在任何一个中心城市都可以补充另一些类似的例子。这种情况应当消除,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向发展群众性工会工作和组织领导罢工方面的必要转变。在这方面的实际步骤应当是基本上取消工会机关,将其承担的组织、巩固和领导企业中的革命工会及各种统一战线组织的直接责任交给相应的工厂党支部和一些党团及党的委员会。其次,这项措施,即取消工会机关,当然只是改变工会工作整个管理体制和以干练的领导取代职责体制的一个部分,伴随这项措施的实施应该在全党广泛开展一场思想运动,克服在工会工作和整个工会问题方面存在的严重混乱和模糊的认识;应该保证最大限度地集中注意力和力量,争取使主要工厂、矿山和码头的党支部、工会及统一战线组织的日常组织生活和政治生活有实质上的改善,并加强和发展它们的独立工作、首创精神、与群众的日常工作联系和它们在成熟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

必须坚决地向全党发一封信,可以作为公开信以中央委员会名义下发,来阐明这些问题,首先要强调利用新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在企业 and 失业者中间要很好地开展群众工作,同时要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这是应该抓住的一个主要环节,以便迅速而坚决地

加强革命工会运动和在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中夺取在国统区主要工业中心城市发生的经济政治斗争的独立领导权,这种斗争尽管还存在某种曲折和发展的不平衡,但它必将会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和更高的革命水平上呈现出更快更猛烈的发展趋势。在这个文件中还要特别注意干部问题,加强企业中的组织问题以及简化和扩展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工作问题;克服在领导罢工方面的缺点和策略错误问题;必须组织群众运动和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奸细反恐怖的群众性斗争;必须更善于酝酿和及时地提出最迫切的局部要求和口号,以及如何更好地把争取实现这些要求和口号的斗争与组织广泛的反帝和反国民党的斗争结合起来,特别要开展支持和保护红军及苏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强大群众运动,等等。如果能在这里准备几篇论述这些问题主要方面的文章,那也是非常有利的。

赖安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12a, 第二部分, 第 80—88 页。
英文打字稿, 副本。

312

赖安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 关于上海形势的谈话速记记录

1934年12月22日于莫斯科

赖安同志关于上海的报告

9月18日我们被告知,警察已经知道我护照上的名字,此外还截获了我的信件。

9月21日我们得到情报:在离我的住所不远的警察局附近有我们的秘密接头点。落入警察手里的那封信,是我写给菲律宾共产党的^①。他们把它寄到了南京,是为了与我写给斯拉文的信件^②进行比较。

我个人从来没有被跟踪过。但是,同志们认为,我还是应该立即离开,不必等待莫斯科的消息。他们担心努伦斯^③悲剧的重演。我声明说,在没有接到莫斯科的通知之前,我决不走。在召我返回的电报到达之后,国际联络部的领导人^④对我说,我应该去澳门并在那里等候航船。我使他确信,这样做没有意义。他同意了,于是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李竹声。文件没有找到。

③ Я. М. 鲁德尼克。

④ 可能是:В. 弗洛赫。

我于10月9日乘轮船前往欧洲。在轮船上有英国警察局的两个特务,这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情况。其中的一个特务问了我几个问题,想知道我是否在香港上岸,对此我作了肯定的回答。

在威尼斯,我也上了岸,但我没有赶上轮船,为了取我的行李,我乘火车来到的里雅斯特。在的里雅斯特警察已经掌握了情况。我雇了一个脚夫并从他那里得知,海关的工作人员说过,我是共产党人。

当我到达维也纳的时候,有两个刑事警察局的工作人员来我们旅馆登记护照。我被请到下面,并且被查问,在的里雅斯特我是否遇到过什么问题。

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的一位同志认为,对安全的威胁来自菲律宾的同志,他们在信封上写地址时犯了错误。

在上海的一个公园里与一位菲律宾同志^①会面时,有人跟踪我们,的确,只是在公园里了。后来当我离开公园的时候,我再没有发现有任何跟踪或监视。

在我看来,威胁不是来自菲律宾人,而是由于与阿图尔^②的联系。

1. 阿图尔离开之后,我的佣人对我说,有人给他打过两三次电话,询问贝格尔先生。阿图尔从他的住所定期地给我打电话。

2. 另一次,在我的住所里国际联络部的老同志^③与哈格尔^④发生了大声的争论,此后哈格尔就被监视上了。争论的声音如此之高,大概在几个住所的半径内都能听到。

3. 有一次,国际联络部的一位同志允许塔斯社的代表^⑤在我

① K. 埃万赫利斯塔。

② A. 埃韦特。

③ H. H. 格伯特。

④ 身份不详。

⑤ И. Е. 切尔诺夫。

的住宅里换钱。为此一开始到我这里来的是塔斯社的代表,而稍晚一点是国际联络部的一位老同志。塔斯社代表在楼梯上碰见了住在我对门的日本记者,此人他认识。

4. 阿图尔在最后一次与中国人会面的时候对他们说,我是从菲律宾来的。已经被捕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事务秘书^①知道,我是美国人,我是从菲律宾来的,也知道什么时候我从那里来到上海的。

从知道我寄往菲律宾的那封信落到警察手里的那一刻起,国际联络部的同志就认为,威胁来自那里。

10月我在菲律宾。后来我们从宋[庆龄]女士那里得到与菲律宾进行邮政联系的地址。我们带走了这个地址,因为国际联络部的代表不能向我们提供任何地址。这个地址是宋[庆龄]女士给阿图尔的。

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6月底,我与菲律宾有书信来往。5月底,菲律宾共产党书记^②来到上海。我们在公园里见面,在那里(在报告开头我已经说了)被监视过。书记从菲律宾来到这里三四天后,按照不正确的地址寄来一封信。信被拆开了,然后按照正确的地址送来了。

我和菲律宾共产党书记还有过几次会面。他在上海的合法身份是一家菲律宾新报纸的记者。6月8日他回去了。

7月底有三名菲律宾学生^③来到上海。他们没有按照我们的指示做。曾经告诉过他们,不要写什么信,只需在报纸上刊登一个预先约定的声明。可是他们从党的书记那里得到了一个地址并按照这个地址用英语报告了他们自己的名字和旅馆的名称。这是一

① 可能是:马纯古。

② K. 埃瓦赫里斯特。

③ 何人不详。

个同情我们的人开的商店的地址。在这封信寄出的第二天，一个警察就来到这个商店进行盘问。

我去旅馆找过那三名同志，后来我们又见过两三次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监视我们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住在这个旅馆里的外国人对他们中的一个人感兴趣；毫无疑问，是英国警察的特务。其中一位学生在出租汽车上向我讲述过，党的书记在返回的路上被扣在香港几天并受到询查。我示意：我们在出租汽车上不能谈论这种事。所以关于此事的详细情况我就无法知道了。

赖安同志和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之间好像在违反秘密工作规定问题上发生过冲突，关于这次冲突，赖安同志报告了以下情况：

“我到达上海后，国际联络部的代表^①和我谈了阿图尔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情况。他向我讲了这一点，但他在阿图尔出席的任何一次会议上一次都没有讲过，也没有反对过这种情况。国际联络部的代表也知道发生的整个情况，但他从未表达过自己对阿图尔的不满或反对态度。”

国际联络部的代表向我通报了所有来上海的人，因为他经常对我说，某某同志在某个时候乘某某轮船来上海。

会见信使要得到国际联络部代表的允许。我与我的前妻^②会见也要经国际联络部代表的允许。我们会见过的信使有绍尔蒂^③、马尔加列特^④、托姆·贝尔、沃伦斯卡娅、赖安^⑤。

总之，弗雷德^⑥和国际联络部代表都想站出来反对违反秘密

① H. H. 格伯特。

② 何人不详。

③ 何人不详。

④ 何人不详。

⑤ 赖安同志的妻子。

⑥ M. 施特恩。

工作规定的行为,但却完全忽略了这样一点:他们自己也违反了规定。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有这样一些细节:

出席宋[庆龄]女士新年庆祝会的有:阿图尔及其妻子^①、赖安、弗雷德、林科利因^②和约翰^③(此两人来自邻居^④的机关),其次,还有塔斯社代表,也就是说,除了国际联络部代表,所有人都去了。

除了国际联络部代表,所有人都参加了约翰在林科利因住所里举行的告别晚宴。

11月7日的庆祝会也是所有人都参加了。

有一次,我在弗雷德的住所里遇见了宋[庆龄]女士,感到很惊讶。

至于我与林科利因的会见,我第一次会见他是在刚到之后,在阿图尔那里。整个一伙人,包括国际联络部代表,随后都去了林科利因的住所,林科利因经常去阿图尔住所,国际联络部代表本人一周去林科利因那里两三次。我一周去他那里一次。阿图尔走了之后,每10天我与林科利因见一次面。在接到电报^⑤之前这种会面都要经国际联络部代表允许。

我对国际联络部代表的电报表示异议,他在电报中说,好像是我违反了纪律^⑥。我只是开玩笑地说过,既然军人^⑦不给我与他会见的机会,那我要前往他的住处去拜访他。这是开玩笑,我再也没有会见过这位军人。

又及: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在我到莫斯科六个星期后

① 何人不详。

② 何人不详。

③ M. 3. 安德烈耶夫。

④ 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 文件没有找到。

⑦ M. 3. 安德烈耶夫。

才讨论。难道不能在我来到这里之后的最初几天就提出这些问题吗？

一点意见：出于对秘密工作的考虑，在中国党、马来亚党和菲律宾党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公务方面的联系。

速记记录和翻译：贝塔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4，第 70—74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

313

中共上海中央局给王明和康生的信

1934年12月29日于上海

绝密

[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①

王明同志

康生同志

在去年^②10月党中央驻上海代表盛忠亮同志(米茨凯维奇)和其他五六位同志被捕,上海的三部无线电台暴露后,同你们和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了三个月。从那时起,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了使你们了解国统区的工作情况,我们通过这一班信使^③给你们寄去我们的一些文件和材料以及地方党组织的一些文件和材料。在这封信里,我们想向你们讲一讲我们现在所经受的严峻形势,并向你们提出一些组织和工作方面的问题。请根据你们所掌握的材料给予我们具体的指示。

现在中国的客观形势有利于开展革命运动(请看我们的提纲和来自地方的报告)^④。然而,由于接二连三地暴露,大大削弱了我们的组织力量,我们留在这里也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遇到的空前困难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和东方书记处。

② 原文如此。应为:今年。

③ 何人不详。

④ 文件没有找到。

敌人的进攻准备和计划及我们组织的暴露

例如：

(1)国民党匪帮——“蓝衣社”^①向上海租界派出了1700多人的别动队。这些匪帮分布在各区和各街道，直到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狭窄过道和里弄（我们往往居住在这里），加紧搜寻我们并企图搞垮我们的组织。

(2)国民党与英法租界当局一起对付我们。国民党为了收买租界巡捕房巡捕花费了巨额资金。社会秩序局^②和租界巡捕房保持经常联系并互换情报。英法租界当局准许国民党的别动队在租界里自由活动。更有甚者，这些别动队还得到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别动队都可以逮捕和拘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一般具有革命情绪的人。此外，根据国民党的要求被捕者会立即移交给中国当局。

(3)来自全国各地的叛徒和奸细聚集在上海从事消灭我们组织的工作。在南京、杭州、牯岭及其他地方，为叛徒和奸细组织了专门的培训班，培养专门与我们做斗争的法西斯干部。

国民党还采取更加恶毒的方法，说实在的，还是些老办法，即在“鼓励悔过”口号下，或在“利用悔过机会”口号下，实行严刑拷问。有时他们实行三四次电刑拷问并借助无耻的蛊惑宣传强迫被捕者招供。在上海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共产党员坦白委员会”。我们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被拉到那里，作为同我们作斗争的工具。

(4)向我们的组织里派遣奸细，直至负责岗位（例如温^③），而且采用了非常狡猾的伪装方法，在我们队伍内进行奸细活动，以便

① 见第182页注④。

② 原文如此。在这里及以下应为：公共事务局。

③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在我们党准备和开始向我们的敌人实施重大进攻的时刻，破坏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组织。

2. 敌人进攻我们的这种惯用手法抱着以下目的：

(1)有计划地周期性地向我们进攻。一开始袭击我们的干部，消灭干部，以便对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影响实行沉重的打击，使我们不得不首先忙于恢复组织和补充干部，而不能对我们的敌人实施总攻计划；

(2)集中力量袭击领导机关和机构，以消灭我们的领导干部和中断领导与地方的组织联系；

(3)干扰和破坏上海与江西之间的联系，以使白区的党组织无法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联系，并在向红军和苏维埃发动军事进攻的情况下，使中国红军失去从我们这里获得物质支援的可能性，在瑞金战斗的关键时刻就是这样；

(4)中断我们的组织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使我们失去获得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的可能性；

(5)破坏我们的群众组织及其领导机构，以便中断他们之间以及我们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

(6)对我们党的特科实施沉重的打击，使我们失去这个锐利的武器，也就是使我们失去“耳目”。

必须承认，虽然由于我们党进行了顽强而艰苦的斗争和反击，由于不断重新组织我们的力量，敌人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计划和目的，但是他们还是实现了自己相当大的一部分计划和目标。

二

领导机关的大暴露

(工会共产党党团和特科)

敌人使我们遭受了最巨大和最惨重的损失。在1934年3月江苏省委组织部暴露后，几乎每三个月和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每个月都发生大暴露事件。11月初组织部彻底暴露。暴露的还有联

络点和报警网^①，因此，(中共)上海中央局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9月底特科大暴露。10月党中央驻上海代表处彻底暴露，还有电台彻底暴露，此后海员工会海外委员会被彻底捣毁。10月底和11月初，共青团中央局和共青团江苏省委彻底暴露。同时被逮捕的有组织部部长徐宝铎(前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党中央局指定他负责共青团工作)。

11月底重新组建的组织部被彻底捣毁。一个联络点也暴露了。此外，这个时期还发生几次局部暴露和逮捕事件。

由于发生所有这些暴露事件，白区党、共青团和工会的领导机关被削弱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这是对白区组织的一次空前的打击，这样的打击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至于发生这些暴露的原因和教训，我们在(上海)中央局的提纲中大体上已经指出。在这封信中我们只向你们通报一些推测和原因以及暴露的经过。

10月5日米茨凯维奇^②的住所暴露。同时被捕的还有和他住在一起的楚章(音译)、修楚(音译)、“大婶”^③，好像还有一个小孩。(我们是在10月8日才得到关于这件事的正式消息)。中央代表处的报警局于10月6日派一个人^④带着东西去米茨凯维奇的住所，[他]也被捕了。10月7日报务员尤才(音译)^⑤去米茨凯维奇的住所，也被捕了。他被捕后成了叛徒并且供出了自己的住址和存放备用电台的雍木(音)^⑥住所的地址(只是到了10月9日晚上我们才知道这件事)。结果两部电台都暴露了，与备用电台有关的

① 原文如此。

② 盛忠亮。

③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④ 何人不详。

⑤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⑥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一些人也被逮捕了。雍木也成了叛徒。他和尤才一起供出了所有详细情况和国际电台的位置及其工作人员。尤才向警察局提出了截获电台的计划。因此,我们很快就停止了这部电台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需要尽快找到新住所,我们派了这部电台的工作人员“王大哥”去寻找住所,他在街上也被捕了,并在被捕后供出了自己的地址,结果这部电台也暴露了,与电台有关的所有人员均被逮捕。

这次暴露使我们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共有14人被捕,其中有许多熟练的老工作人员。我们失去了最重要的通讯联系机构。我们、(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联系中断了。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都无法得到,这使(中共)上海中央局陷入了最艰难的工作条件。此外,我们损失了很大一笔资金(根据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在逮捕工作人员的时候,有1万美金的银行存折以及大量的现金和外币都被搜走了)。确切的数目我们难以确定。可能,荣康(音译)^①知道得更详细。你们可以去问她。被搜走的还有财务统计表、财务收据和其他文件。这一切使敌人有可能监视我们的银行业务和阻止我们购买所必需的特殊商品。

暴露的原因可能是:

第一种说法:是报务员尤才从事奸细活动的结果。根据可靠的消息我们得知,在米茨凯维奇被捕前他曾被逮捕。被捕后他向公共秩序局供出了米茨凯维奇的住所。警察故意把他放了,以便让他亲自前往米茨凯维奇的住所(10月7日)。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当他来到米茨凯维奇的住所时就被捕了,于是他立即供认了米茨凯维奇是什么人,当他被带到租界巡捕房的时候,他什么也不想说,只要求见公共秩序局(中国警察局)的代表,尔后他供出了电台的地址。

① 原文如此。何人不知。

第二种说法：是委托一家商店店主^①为米茨凯维奇同志租房不顺利造成的。（查福（音）告诉我们，荣康知道这件事）这家商店的店主是“大婶”的亲戚。从报警处得到的消息中可以看出，这次暴露好像是对来自湖南省的一个人侦查的结果。

第三种说法：米茨凯维奇被捕前跑了很多地方，甚至在白天也要出去（办理向莫斯科派遣人员的事情），也可能，他受到了特务和奸细的监视。米茨凯维奇一般对自己的这类出行很不在意。6月的暴露，显然也是他去江苏省委和劳工联合会^②时被盯梢的结果。

第四种说法：是米茨凯维奇为营救（秦）曼云经常会见一些他不该会见的人的结果，例如，他会见过自己的同乡——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③。此外，我们在他的档案中还发现一封是没有发出的营救（秦）曼云的信以及沪南和南京的一些地址。可能是，米茨凯维奇的这种来往信件和会见都受到了监视。（我们知道，10月〈秦〉曼云被带到上海去见她的律师。她收到了自己个人的东西并借了100元钱）^④。

第五种说法：是温^⑤的奸细活动造成的，他在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处分开之前直接与温会过面和接触过。他们自己确定会面地点，也可能是，米茨凯维奇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无意中透漏了某些秘密。

在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部暴露后，（中共）上海中央局整个机关处境危险，米茨凯维奇所居住的那个地区受到监视。荣康和“大婶”也被监视。米茨凯维奇决定迁往另一个住所。荣康也离开了那里，可是由于某种不可理解的原因，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取消那个老住所，后来他们又重新回到那里。

① 何人不详。

② 中华全国总工会。

③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④ 看来是指墨西哥人。

⑤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最后,可能是我们与“毛子”^①(外国人)会见地点受到监视的结果。9月底米茨凯维奇接到一份十分令人不安的报告说:敌人十分重视某一条街,如果那里有什么机关,应该立即撤销。可是那里的一个点并没有撤销。只是在米茨凯维奇被捕后那个点才取走自己的东西^②,只把家具留在了那里。第二天,那里就被搜查了(有一份情报说,搜查是米茨凯维奇叛变的结果,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情报不准确)。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他被逮捕前与“毛子”有过多次会面,可是并没有出什么事。

在上面所列举的所有说法中,最有可能的是第一种说法。就这个问题还可以和荣康谈一谈,因为她对米茨凯维奇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她在米茨凯维奇被捕前夕才离开他的住所。

三

地方组织的损失

最近半年来,敌人集中打击的不仅是领导机关,而且还把自己的打击矛头指向一些重要的省级组织和地方组织。地方的损失也很大。在湖南省和在郑州、豫南、平汉铁路的一些组织也有很大的损失。在安徽、寿申(音)^③省也遭受了很大破坏。在四川,省委及韦化(音)^④地区的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县的组织,也不止一次地遭到破坏。在厦门市,在江苏省也遭到过很大破坏,结果是,我们当然不能很快开展工作,也不能在地方开展工作。

我们不能抽调和提拔强有力的地方干部去充实(中共)上海中央局,恰恰相反,中央局的削弱导致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地方工作的削弱,并给地方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局面。

① “毛子”——身上长毛的人(中国话)。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可能是指山东——译者。

④ 原文如此。

四

组织力量尤其受到削弱

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是组织领导和组织工作落后于政治领导。我们可以确定正确的策略和路线，但是常常不善于在组织方面保证很快地去执行决定，不善于迅速地动员力量，不善于物色合适的干部去完成拟定的工作，不善于安排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关于加强组织工作的问题已成为我们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与组织部门遭到破坏有关。在破坏我们组织的过程中，敌人的主要袭击不止一次地对准组织部门和组织工作人员。

3月遭破坏时，组织部长^①及其亲密助手^②被捕。6月遭破坏时，组织部长李得钊本人被捕。9月初遭破坏时，除了一个老高^③和其他几个技术人员外，组织部及其所属机构几乎完全被消灭。由于老高受到监视，他已不能再继续工作，不得不去了河北省，此后我们不得不提拔共青团书记^④去中央局代替老高。我们竭尽全力充实和加强组织部，制定了冬季计划，但是就在执行这个新制订的计划时，新组织部长由于共青团中央局暴露也被逮捕了。这样，整个组织部和中央局的一部分机关面临着威胁，此后我们不得不调回原湖南^⑤省委书记担任组织部长的工作。组织部的工作进行了改组。

新的组织部长刚刚想着手抓工作，他和他的助手^⑥以及整个联络系统暴露。这样，组织部被完全破坏，整个联系系统中断。（这次暴露是北方联络网点的奸细活动和叛变造成的。现在我们正采取

① 黄文容。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③ 高文华。

④ 徐宝铎。

⑤ 原文如此。应为：河南。这里说的是吕文远。

⑥ 何人不详。

措施消灭这些人。)最近一个时期南方联络系统的一个联络点也暴露了。

当然,组织部在经历了这个艰难阶段之后,已不可能实现自己的计划。与各省的联系常常中断。我们也来不及补充干部,因此,组织工作至今仍然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

五

干部的缺乏和极其严重的局势

在国统区,我们的组织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大量干部被很快消灭,老练的有经验的干部几乎全被消灭。你们已经知道的3月和6月所遭受的惨重破坏以及9月所遭受的破坏,被捕和失踪的不少于30人。中央代表处、特科、工会和组织部所遭受的每一次破坏,被捕和失踪的都不少于10人,来不及补充和培养干部。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感到干部严重缺乏。

现在(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处成员只剩下两个人:我^①和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的一个同志^②。我们找不到主持组织部工作的人。我们现在处于残疾人状态,手脚都被砍掉了。我们现在只能修复白区和红区之间的联系,保存技术部和宣传鼓动部及其所属的组织。不断遭受的破坏和被捕者中一些意志薄弱经不住考验的分子(他们往往向敌人投降)以及在上海的奸细和叛徒的集中——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极其艰难的工作环境,给我们这里的同志造成了令人恐怖的局面。

认识我本人的叛徒不下10人,我继续留在这里绝对不可能了。只是由于没人替换和我没有得到中央的同意,我才不得不留在这里,但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那么我的被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① 黄文杰。

② 原文如此。应为:宣传鼓动部。这里所说的是朱镜我。

文化宣传部部长的处境也并非不危险。最近我们收到从监狱里写来的一封信^①，信中说，3月被捕的那些同志曾表现得很坚强，现在却开始动摇了。

今年春天从莫斯科派回来9名军事学员^②，其中大部分人都成了叛徒。据说，卜世奇（普罗列塔里耶夫）在南京工作，还有人说，6月被逮捕的人中多数也成了叛徒。当然，不应该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可能敌人故意散布这种流言，但是这也应该使我们十分重视这些情况。

鉴于军事委员会书记^③受到监视，我们已决定把他派往满洲。在他动身前夕，由于一个联络点暴露，他的住所被搜查。然而，很幸运，当时他不在家，所以他没有被捕。现在他已经走了。

由于9月特科遭到几次大破坏，失去了很多有经验的老战士，也失掉了联系，鉴于敌人加强搜查特科负责人及其住所，我们不得不暂时停止他们的活动。这两位同志^④请求允许去莫斯科，我和“老头子”^⑤已经同意了，只是因为通信联系不畅，我们暂时把他们留在这里。

特科经过改组后工作有了一些进步，但是与去年相比，工作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很难获取情报。在敌人实施一些大破坏之前，我们不能预先得到警报。共青团中央局全部被捕。据说，被捕者都动摇了。

不久前，海员工会海外委员会完全暴露。这是发生在6月工会遭破坏之后。现在那里干部很少，阿石^⑥也不可能继续进行活动，新提拔的干部还比较弱。最近一年来因工会遭破坏而被捕的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何人不详。

③ 柯庆施。

④ 何人不详。

⑤ H. H. 格伯特。

⑥ 饶漱石。

人员中有很多积极的工作者。这就给工会的干部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局面。干部的极度缺乏使至今保留下来的同志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他们不得不更多地奔波。这就会给敌人提供向我们实施更多袭击的可能性。现在极需要补充一批强有力的干部,因为党、共青团和工会的领导处境都极其艰难。

六

活动的范围缩小

虽然上海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在遭到多次破坏后,几乎没有可以安静地工作和安置我们机关的地方。特别是由于我们的敌人的加紧进攻和奸细、叛徒的积极活动,我们甚至连安置我们的机关和进行工作的最起码的条件都不具备。秘密居住的条件极其有限。敌人十分重视旅馆和宿舍。在很多里弄和过道里,敌人都设立了专门的特务岗哨。他们特别注意从一处住所向另一处住所的搬迁。因此,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很难立即迁往某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在搬迁时敌人的搜查行动。

所有这些情况使我们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我们的战线很难巩固,也难以安置机关。每一个行动都会遇到困难和障碍。这一切迫使我们更加认真地研究我们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并提出关于把党的领导机关转移到国统区其他地方的问题(更详细的意见将在下面叙述)。

七

技术工作和联系方法的落后以及敌人更为狡猾的工作方法

迄今为止,对我们来说,主要的联系工具是交通员,我们很少使用电话和邮件。只要某个交通员暴露,我们就会立即中断与地方的联系。只有经过很大的努力,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重新恢复联系。特别是遭到重大破坏后,敌人会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和被捕者所提供的口供继续进行新的逮捕。由于我们的技术设备落后,我们不能及时地向地方通报遭破坏的消息,因此遭受破坏

的网点在扩大。

对你们来说,特别沉重的打击是电台暴露,中断了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使我们不可能得到他们的领导。与各省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络的计划也遭到了失败。由于一个联络点暴露,许多线路就需要重新恢复。

过去的工作方法敌人已经了解。就拿组织部最近的暴露作例子来说吧。敌人事先已经得到了我们与地方来往的大量信件,而且在一些旅馆里又布置了特务网。伪装的方法和与秘密住所联系的方式,敌人也大都了解。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考虑,以便从根本上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

从以上的叙述中你们可以想象到,我们在工作中面对着多么严峻的形势,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但是中央局和中国国统区的党员群众不仅没有向这些困难低头,而且相反,他们在为克服这些困难的斗争中尽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努力,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精神和积极性。

在这个时期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1. 改组组织。在6月遭破坏之后,中央书记处只剩下我和米茨凯维奇。当时我们制订了改组我们国统区组织的计划([中共]中央对此已表示同意,关于这一点也已向你们通报过)^①。

8月我们在改组方面已经取得一些初步的成绩。我们组建了中央局,还建立了中央代表处。我们基本上已经恢复到6月遭破坏以前的状态,并且已经迈出了一些步伐,比如,在江苏。

2. 在取得这些成绩基础上,我们确定了中央局新的工作计划并将该计划传达到地方组织。

3. 我们组建了工会领导机构,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为了领导和帮助工会的工作,从地方调来一些工作人员,还为加强工会补

^① 见第295、296号文件。

充一些技术工作人员。在劳工联合会执委会中现在已经形成了集体领导,还组建了上海工会联合会书记处。阿石也有了助手^①。他在这里工作,是作为劳工联合会的全权代表。他不直接参加执行局的工作。工会的领导机构已经得到加强。除海员工会委员会海外局外,工会已经有几个月没遭破坏了,可是,由于江苏省的工作被削弱,整个上海工会和上海的个别工会在企业中的工作还很薄弱。

4. 开展了民族武装保卫工作,并在民族武装保卫筹备委员会中组建了共产党党团。发表了这个团体的宣言和纲领^②。各地都在积极地进行这项工作。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组织不止一次地遭到破坏,我们未能实现代表会议所确定的在各地地区组建分会的计划。

5. 加强了地方的工作。为了反击敌人在上海实施集中打击的计划,中央局在主要省份的组织中坚决地采取了加强地方工作的方针。我们派老高前往湖北,组建新的省委。湖北的工作进展顺利。湖北组织是最好的省级组织。我们已经做好了组建安徽省委的准备工作,由于寿申(音)^③遭破坏而推迟了。现在我们已经召回安徽省的工作人员,为的是与他讨论工作。

我们已经派人^④去加强安徽北部和满洲的工作。我们向满洲派了一个巡视员^⑤,为的是让他参加省委的工作,直到省委书记^⑥回来(满洲组织不止一次地要求,让他尽快回满洲去)。我们已经通过“老头子”向你们通报过,我不知道他是否回去了。

① 马纯古。

② 详见第116页注⑥和第260、274号文件。

③ 原文如此。可能指山东——译者注。

④ 何人不详。

⑤ 杨光华。

⑥ 林炯,即王德。

为了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最近我们派军事委员会书记^①去满洲参加省委的工作。

在阿音^②走以后,我们派了原江苏省委书记^③去河南省委工作,现在河南省的组织工作正在恢复。

我们召回了陕南文化宣传部部长和江苏省委的巡视员^④。组成了江苏临时省委。此外,我们在福建省的东部地区(那里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大的苏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另有专门报告^⑤)与安徽—浙江边界区(这些苏区有较大发展,关于这方面情况也另有报告^⑥)、与红军第2军团^⑦(也有报告^⑧)和与湖北、河南、安徽的一些地区都建立了很好的联系。

6. 特科新的领导已经确定。他工作很积极。两位原领导人^⑨现在不再工作,他们只是在帮助新的领导人。

7. 加强了对士兵的工作,组建了中央局属下的军事委员会。已派遣大批干部到白军内部去工作。我们在讨伐红军的队伍中建立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基础,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此外,制定了对士兵工作的新方针(见保卫红军北方根据地和抗日斗争的决议和我们的计划^⑩)。

8. 组建了做共青团工作的集体。我们调回了共青团满洲省

① 柯庆施。

② 吕文远。

③ 许包野。

④ 何人不详。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 文件没有找到。

⑦ 文件没有找到。

⑧ 何人不详。

⑨ 何人不详。

⑩ 文件没有找到。

委书记来担任共青团委员会书记工作，并派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①去满洲工作。

9. 最后，我们保持了与各苏区的联系，也保持了贸易关系。中央代表处暴露后，我们与“楚老板”^②建立了联系，并且和他就建立新线路和新基地进行了交谈。同时，我们从一个省召回了两个报务员^③，并对他们进行了重新培训。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建立两个新的电台。我们已经通过福建、浙江和江西省委(第10军和第7军团活动的地区)、通过闽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们与中央有联系)、通过第2军和第6军团(他们靠近中央)为[中共]中央寄去了密码。毫无疑问，我们能够恢复这条线路。只是时间问题。至于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我们通过此次航班的联络员把材料寄给你们。

当然，在这项工作中的成绩还不多，特别是在中央局人员补充问题上更是如此。关于建立组织部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我们自己无法进行这项工作，我们与很多地方都没有联系，有一些联系也不巩固。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还十分薄弱。特别是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既不能领导任何一次大罢工，也不能改善与群众的关系。特别严重的是，我们在组织方面还未能遏制住连续不断的暴露。

关于工作方向问题在提纲^④中大体上已经指明了。我们将根据所指出的方向和对以前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来确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基本任务是加强和重建我们的组织，保护领导机关，为保存国统区党的组织和巩固我们的战线而斗争，从而为对我们的敌人

① 何人不详。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③ 何人不详。

④ 文件没有找到。

发动总攻创造前提条件。

现在我们有以下实际问题需要立即加以解决和你们给以帮助：

1. 恢复[中共]中央驻上海的全权代表处。我们在1934年7月的声明^①中已经明确了这样做的必要性。鉴于现在的局势，这种领导体制是非常必要的。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样改组的正确性。

在遭到逮捕之后，几乎又恢复到6月份以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工作、对苏区的物质援助工作和领导一些年轻苏区的工作，以及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都混在了一起。如果任凭这种状态继续下去，那么我们不仅不能全面地安排工作，而且一旦遭破坏还会造成很危险的形势。我们请求立即从莫斯科派一位合适的人来做党中央驻上海的全权代表。在我们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系之前，你们可以通过政治保安总局通知我们派谁来。如果你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那么，我请求任命郭绍棠(克雷莫夫)为党中央驻上海的全权代表。关于此事早在1934年8月[中共]中央已经电告我们，让我们征求你们对他的意见。如果你们同意，那就请立即派他来，我们在这里为他找一个助手。

2. 我请求共产国际派一个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6月份“胖子”^②走了以后上海遭到了破坏，这里就再没有共产国际的政治代表了。这里只剩下了“老头子”。虽然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在的工作条件很艰难，他不能长期留在这里。他已经停止了自己的活动。最好是共产国际把他召回，并派一位像他那样有能力的人来代替他。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A. 埃韦特。

现在我只与红色工会国际代表^①有联系并和他一起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但是通过一个人既与党的方面又与工会方面进行联系很不方便。现在这里没有共产国际的政治代表,我们与[中共]中央也没有联系,到处遇到困难。我请你们坚决请求共产国际给我们派一位共产国际代表来,这个人要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政治上很坚定,最好是懂俄语。同时,需要他带几个技术人员来(无线电工程师等),因为我们租房子和建立电台感到很困难。要是能通过他们建立电台,那就比较容易,也比较放心。同时我请求共产国际派一位军事专家来帮助我们工作。最近,随着游击战和新苏区的开展,所有这些新的策源地都与我们建立了联系。这里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具有渊博知识的和在这方面能帮助我们的军事工作人员。不过在派遣人员时,应该挑选优秀的,我们对“胖子”的工作不满意。

3. 关于恢复与[中共]中央联系的问题。在米茨凯维奇被捕之前,与中央的联系就已经中断。后来,我们建立了一条新的线路,当时我们只是等待着与朝光^②电台恢复联系,但是在米茨凯维奇被捕和电台暴露后,我们就未能与中央恢复联系。我们派出联络员^③去赣东北恢复联系,甚至想通过他们恢复联系。联络员到了那里,可是方志敏同志却让他去皖南,在那里他遇见了某个联络员,后返回了上海。他只带回来皖南组织的一个报告^④,他并没有完成我们的要求,现在他准备再次去那里。

此外,我们还通过其他途径正在与中央进行联系,但是我们担心,这要很久。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与中央有直接的无线电联

① P. 贝克。

② 原文如此。

③ 何人不详。

④ 文件没有找到。

系。如果有,那就请帮助我们马上与他们建立联系。我们请求,让他们在红军撤离瑞金之前与汕头和香港保持联系,但是在当前这种形势下,这种联系已经失去意义。我们请求在保持旧的联络系统的情况下,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联络点。在我们与中央建立联系后,我们就能立即把东西发往那里(在香港和汕头有许多他们需要的商品^①)。

4. 关于恢复和加强[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问题。现在我们很难保留上海局书记处,各部还没有补充干部,工作太多,联系太集中。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一旦暴露,恢复工作就会更加困难。我请求你们派三个人来重新组建上海局。该局的具体任务是领导国统区的组织,与“楚老板”、共产国际、苏区及其他地方进行联系。

至于对财务的监督,也应该让上海局摆脱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应该转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如果你们确实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三个人,那就请先派两个人来,一个人担任书记工作,另一个人主管组织部。如果吴绍愚(瓦西里耶夫)和斯塔卡诺夫^②在远东,那就请立即把他们派到这里来参加[中共]上海中央局工作。

现在我尽可能减少奔波。我们只通过信件来往实行对工会、军事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和特科的领导,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我才与他们会面。我与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和“小官”^③经常会面。新的工作人员到来之后,我就去苏区。

5. 关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驻地。在目前敌人集中力量在上海对付我们的艰难形势下,中央局不应该再留在上海。即便在调换一两个工作人员的情况下,若是不在近期从根本上改组机关,中央局留在上海也是不可能的。

① 原文如此。

② 相应为:杨松(杨尚昆)和程道南。

③ 何人不详。

我们想把中央局迁往香港或澳门。今年7月[中共]中央也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①。我已经和“老头子”谈过这个问题。他甚至认为,最好现在就撤离上海,可是他认为在别的地方工作会很困难。现在“老头子”正准备去香港和澳门调查研究当地的条件和弄清中央局迁往那里是否可能。等他回来后,我们将作出最后的决定。不过,[中共]中央代表最好还是留在上海。如果你们同意这个建议,那我们就这样做。我们在等待[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到来。到那时我们就转移。

6. 已经改组了省级组织。我们在最重要的一些省级组织里设立了中央代表处或者不大的中央分局,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对一些省级组织进行划分:

(1)在满洲这个广阔地域只有一个省委在工作。应该至少把它划分为三个委员会,那里必须设立中央局。

以前我们曾建议派遣驻湖北的中央代表^②去满洲组建满洲中央分局,但是我们没有收到[中共]中央对此建议的答复。

考虑到现在干部的不足和满洲与我们联系的薄弱,现在最好是你们指定三个人去组建驻在海参崴的满洲局来领导满洲省委的工作并由你们负担费用。为了保持派遣大学生的通道,满洲组织将与他们建立联系。

(2)驻华北的中央代表田福^③很难再继续呆下去了。他几次请求批准他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④的工作。我们已经批准了他的请求。我们等待着一旦联系就绪,就派他去莫斯科。我们将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去替代他的工作。我们将从河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何人不知。

③ 孔原。

④ 见第61页注④。

省和其他省物色几个人去组建华北中央分局,该分局将领导华北几个省的工作。这样,我们将只与中央分局保持联系。

(3)如果上海中央局迁往香港或澳门,那么,在上海还应该有一个中央分局,以便领导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工作。

(4)四川是个十分辽阔的地域,与中央的联系不够密切。按照旧的计划^①省委应该划分为三个特委(川东、川北和川南)。我们请求你们派一个人来做中央驻四川的全权代表并由他负责安排湖南和湖北的工作。今后,如果四川省委能与红4军^②及中央建立联系,那么,他将在川陕省委的领导下(9月份已经派人去川南,已与红军建立了联系,但是这个人^③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或者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5)福建的组织在该省的南部、西部、东部和北部已有了分支。党员数量很多,光在福建的东部,我们就有2000名党员。必须把这个省的组织联合起来并组建省委,以便在省委领导下加强和巩固苏维埃运动和农民游击战。在山东省,党员的数量也很多。其中一部分与河北省委有联系,一部分与共青团青岛市委有联系,在该省必须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委员会,以便以后组建省委。

7. 改进秘密工作和技术工作以及联络方法。为了改进与地方的联系,除了重建联络点和改变工作方法(会见、通讯、传达及其他形式和方法)外,还必须使上海中央局与地方分局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系。为了与各省进行联系,中央局自己必须拥有一部或两部电台。必须在满洲、河北、上海及其他地方各设一部电台。现在我们已经设立了两部电台。这是[中共]中央未来的代表所需要的。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这里说的是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③ 何人不详。

我请你们派三四名能独立工作的报务员来上海(每个人都会架设、安装、调试和选择所需要的零部件,也会自己收发报)。如果有可能,就请派一两个报务员来。以前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捕了。这里只有来自省里的两个人,但是他们的技术不够熟练^①。我们需要工程师来帮助我们安装和维修电台。这对工作来说是很需要的,同时我们还建议在莫斯科继续举办培养干部的无线电培训班。在中央苏区培训的报务员不能独立地工作。

8. 关于对工会的领导。阿石的工作环境很危险。他的身体很虚弱。一旦通讯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就让他去莫斯科治疗。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的负责人员很弱,现在需要阿石的帮助。我请你们和红色工会国际商谈一下,让林仲丹^②来这里代替阿石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的工作并与红色工会国际代表保持联系。此外,还必须从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中和在远东的学生中抽调四五个人来,加强执行局及河北局的工作和恢复满洲工会理事会的工作。

我们还建议,在莫斯科或在远东开办培训熟练工作人员的短期培训班。你们可以从旅苏华工中挑选优秀分子,让他们参加短期工会培训班,然后派他们来这里领导工会工作。今后必须在莫斯科的学生中加强工会运动课的讲授,如果可能,在他们返回中国之前,让他们去进行工会工作的短期实习。

9. 关于[中国]共青团的工作。共青团的工作范围很狭窄。共青团中央很少注意白区共青团的工作。在(最近一次)^③大暴露之后,共青团的工作就更加薄弱了。已组建的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比较弱,地方的领导不健全。除了加强我们对领导的帮助外,我们

① 何人详。

② 李复生,即林育英——译者。

③ 在1934年11月。

认为,为恢复共青团中央局的工作,派一两个强有力的工作人员来这里是必要的。请就这一点和青年共产国际谈一谈,给我们派一个强有力的代表来。

10. 关于选派学生问题。我们感到干部极其缺乏。必须加强干部的提拔和培训。我们首先需要拥有一批能独立领导斗争的工作人员。所以,选派大批学生去莫斯科的问题,就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与此相联系必须立即解决路线问题。以前就是因为缺少路线,我们才未能派遣大量学生去莫斯科。经过满洲派遣很困难,而对于南方人来说这条路线简直是不可能的。让他们乘轮船去也不可能,因为经常没有航班,即便有航班,也不让他们乘坐。经过欧洲派遣需要大量的花销,更不要说对于不懂外语的中国工人同志来说这条路线的复杂性了。

我们现在力求加强我们经过满洲的联系,取消了哈尔滨的联络点,因为后来被捕的原联络负责人^①知道这个点的地址。我们将把来自华北的学生集中在天津,以便经过满洲派遣。

在天津,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分点并委托它选拔学生。来自华中和华南的学生都在上海集中,以便乘坐轮船去海参崴。我请你们请求共产国际批准,允许学生乘坐轮船,以便在每一班轮船上给我们留下一些铺位,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乘坐较大的轮船。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因为现在轮船完全拒绝接纳我们的同志。

此外,我们想开辟一条经过外蒙古的路线。我们建议:从乌兰巴托到苏联由你们来安排,而从我们这里到乌兰巴托由我们来安排。这样做是否可以,是否可靠?请给以回答。

11.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否按时召开?如果轮船的问题能很快解决,那我们就能派华北的一位[中共]中央代表、阿石和特科的几个负责人以及地方的一些负责人前往莫斯科参加代表

^① 何人不知。

大会。

这些问题是很急迫的,需要尽快解决。请给我们指出:怎样克服这些困难,怎样在全线展开布尔什维克式的进攻。 致

布尔什维克式的敬礼!

[中共]上海中央局 海兰^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30,第 12—37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黄文杰。

314

贝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5年1月3日于上海

绝密

致东方书记处

当然,你们已经明白,现在我们局^①的情况变得不妙了,特别是与江西的关系^②。[我们]局关于江西事件和当前形势的声明^③,经过长时间的拖延之后终于发表了,造成这种拖延的原因是缺少信息和文化力量。既然这个声明已通过这次邮班给你们寄去了,我就不再重复它的内容了,更何况语言方面的障碍不是总能确切地表达其内容。这个声明还没有翻译,因为两位翻译^④正忙于更紧急的事情。我们工会的机关刊物《铁锤》^⑤也拖延到局的声明发表时才出版,为的是能刊登一篇有关此问题的社论。敌人开展了“消灭苏维埃匪患”的大规模宣传运动,拖延发表我们的声明是非常不利的,但鉴于我们的危急处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据同志们说,在上海的白色恐怖历史中还没有过像两个月前所发生的这种对我们党实施系统而精心策划的迫害。同时还动员了所有外国力量,其结果是我们机关蒙受了损失,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你们已经知

① 这里和下面所指的是中共上海中央局。

② 指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从江西向中国西北撤退。

③ 指1934年12月15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提纲,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20—440页。

④ 何人不详。

⑤ 指《铁锤》杂志。1934—1936年在上海出版。

道了。最近几个月连续出现了突发事件。除了上面所讲的,我们这里还有消息说,被捕的党内同志(斯拉文^①、米茨凯维奇……^②)中有几个人已经成了叛徒。从那时起,根据一些可靠的消息,我们得知,米茨凯维奇表现得很坚强,但是其他两个人^③似乎已完全转到了敌人方面,虽然我们还没有什么绝对的证据。必须肯定,任何地方也没有出现惊慌失措。相反,改组工作、保护我们组织的工作、从省里抽调一些新的领导同志^④来补充缺额干部的工作和信使工作仍然不间断地在进行。事实是,恰恰在这个最困难的时期,我们把几位宝贵的新同志调到工会的领导岗位上,还以中央局名义向所有党委寄发了一封有关工会的专门信件^⑤。

最近从江西收到的一些材料(间接地)表明,留在我们这里的部队正在赣南和福建作战。我们还没有收到全面的报告,因为一切都由交通员转送。为了恢复不久前被破坏的联系,已经派出了几个交通员^⑥。这期间我们收到了关于在闽东北建立新苏区的报告,这会为恢复党的省委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在厦门地区的工作和组织仅稍微落后于河北。有关这些问题的详细情况,以及用中文写成的一些新材料和报告^⑦通过这次邮班给你们寄去。科尔萨科夫^⑧同志在写一个简短的报告^⑨,以及关于组织解救台尔曼同志的运动问题

① 李竹声。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盛忠亮。

③ 何人不详。

④ 何人不详。

⑤ 指1934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局为加强党对工会的组织领导给各级党部的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09—419页。

⑥ 何人不详。

⑦ 文件没有找到。

⑧ 黄文杰。

⑨ 文件没有找到。

和党所面临的许多其他问题的声明^①。在这些问题当中有把中央局主要部分迁往南方的建议。我对这个措施是否合适不能明确地表态,不过应该说,若是不把这个建议看作是一种临时措施,那我对这个建议持怀疑态度。不与你们商量,我们是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的。

我同意局的请求:请你们尽快派一位代表来,这位代表应该携带某些指示,应该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白区的问题上,因为那里的工作至今仍然落后。在他到来之前或者在收到你们的指示之前,我会乐意继续与局书记^②会面。

现附上12月7日《上海信使晚邮报》^③上刊登的胡汉民的声明^④。这个声明大大地打破了报刊争取南方与南京统一的运动以及就“彻底”消灭红军而掀起的叫嚣。据我们的一些同志说,上海的中国报刊没有转载这个声明。这个声明谈到闽南连城的失守,而且他们损失了1万人;该声明承认,我们的主力撤离江西并不是军事失败的结果,还承认,我们的军队在向川东北大踏步地前进,还宣称,红军拥有10万多士兵。报纸再次预言会团结一致,已不再说消灭红军了。在这方面,驻各省的外国记者对此都持十分怀疑的态度。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比较可靠的消息的唯一来源。根据他们的报道,在安徽有红军1万人,他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阻挠,受到了拥有10万多人口的各城乡委员会的热烈接待。南京的军队直到现在都未能找到这支军队。在湘北地区,贺龙和肖克的联军正在向东和向南展开进攻。似乎由于我们军队的失败,我们倒更前进了。驻四川的一个记者看不到任何希望,尽管南京许诺派兵并每月给他们70万元的补贴。在蒋介石同上海银行家举行会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黄文杰。

③ 1929年至1949年在上海出版。

④ 声明没有找到。

议之后,他们也很少期待刘湘回来。驻贵州的记者报道说,所有关于战斗、红军失败和抗击我军主力的战报皆纯属谎言,红军的主要损失,是偶然落入敌手的一些掉队的小股红军战士。同时,这些记者还报道了红军给居民留下的美好印象,报道了肖克军队为了与贺龙军队会合而穿越贵州时所留下的良好印象。记者们报道了红军战士良好表现的事实,谈到他们不施暴、不抢劫,相反,对居民很友好,当然,他们没收了财主、反动官吏和地主的财产,并把他们处决了。记者们极力描绘红军在白军中所引起的恐惧心理,并且指出,白军军官一方面害怕我们的军队,而另一方面,又害怕打败仗或者自己的士兵逃跑,因为这些士兵在与我军作战情况下都领不到军饷。

由此可见,尽管缺少直接的消息报刊上不停地刊登谎言,但还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再现我们军队在所有方向上有步骤地向前推进的情景,特别是在四川。至于江西,我们不知道,有哪些队伍留在了那里,他们现在在做什么,白军为占领我们撤出的主要城市已深入到什么程度。然而,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局势不应引起惊慌。更可能出现的弱点是在白区,特别是在工业中心城市。根据报刊上的材料,现在除了唐山矿区外,没有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我们从唐山矿区获取的关于宣布戒严、关于风潮和逮捕“共产党魁首”的消息十分有限。最近三个月来,上海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罢工。小型的罢工和革命行动倒是经常发生,伴随着逮捕一些被怀疑是共产党的人。特别重要的是,在一些工业中心城市有许多工厂关门,大批工人被解雇,但却没有失业者的大规模行动。外国记者经常报道各省农民中发生的饥荒、风潮和暴动。在他们的报告中常常列举这样一些实例:占领江苏火车站的数千农民的饥饿征讨,农民与税务官的冲突,要求发放粮食的农民对当地政府机关的大规模进攻,地主房屋和苏州郊区税务官房屋的被烧毁,以及数十起这样的实例,都表明有必要援助农村。这些实例都来自外国报刊,但某

些中国报纸也有报道。最近一个时期,由于机关内的状况,我没有收到党的报告,无法翻译材料。现将这些报告寄给你们,以使你们对党的工作有个印象并得到只有在党的报告^①中才能得到的消息。

(杰克^②)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030, 第 1—5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P. 贝克。

315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德国问题的讲话

(摘录)

1935年1月9日于莫斯科

绝密

[……]我想谈的第三个问题是群众工作方法^①问题。首先，是揭露民族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蛊惑宣传和耍花招的方法。我应该声明，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很长一个时期，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犯过一些错误。例如，以前我们只用直接攻击的方法反对我们的敌人；我们不想同我们的敌人打任何交道。当国民党和蒋介石作出某种表示的时候，我们就声明说，这是欺骗，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但是，近年来，我们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始用另外的方式揭露敌人，也就是用更灵活的和更接近实际的方法去揭露敌人。我举几个例子：

1. 当日本占领满洲的时候^②，蒋介石提出了同日本作战的口

①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对德国形势的评价。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德国统一战线的策略(见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327, 第 148—153 页)。

② 1931年9月18日。

号^①，但我们党知道，这是蒋介石的花招和蛊惑宣传。我们应该怎样去揭露这种花招呢？我们并没有简单地说，这是花招，我们为揭露这种花招组织了群众性的斗争。例如，（1）我们发动群众提出要求：中国立即对日本宣战；（2）自由组建武装抗日义勇军队伍；（3）为了和日本斗争南京政府应该立即给人民群众发放武器，等等。

2. 就这样，过了一个半月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公开撤销同日本作战的口号并且亲自声明这个口号无效^②，就这样他自己揭露了自己。

第二，蒋介石总是指责我们，指责红军和中国苏维埃，说它们打搅他的后方，所以他的军队无法与日本作战。我们是怎样揭露蒋介石的这种蛊惑宣传的呢？我们的红军发表公开声明：为了共同进行反对日本的武装斗争，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任何军队签订作战协议^③。就这样我们又揭露了蒋介石的这个伎俩。

第三个例子：最近一个时期蒋介石广泛开展了一场运动，其口号是：“讲求中国的新生活”。他提出许多纯属儒家的口号。例如，“讲友爱”、“讲家庭秩序”、“讲廉洁”、“讲卫生”、“讲礼节”，等等。

我们的党组织是怎样为反对这种蛊惑宣传而进行斗争的呢？如果我们笼统地反对这种蛊惑宣传，反对这场运动，那么群众就不会听我们的，因为这些都是很好的词语，反对这些好的词语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上海的一些党支部，例如，企业中的支部就组建了

① 看来，指蒋介石在1931年9月至11月间，包括1931年9月29日、11月19日和24日所发表的关于准备反击侵略者和亲自领导开赴华北的军队的一系列声明。见杨汝平、陈泽民：《蒋介石传稿》，北京1992年，第237—238页。

② 可能指蒋介石在1932年1月11日的讲话《东北问题和抗日方针》，在这篇讲话中他称与日本断绝关系和对日本宣战的号召是“毁灭性的”，因为中国不具备抗战的现实力量，并提出与之相反的方针：不断绝关系，不宣战，不和谈，不[与日本]签和约见《民国日报》，上海1932年1月21日。

③ 见第100号文件。

“新生活”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他们说,企业太脏了,这不符合新生活的精神,既不清洁,又不卫生,等等。或者,再例如,我们农村的党组织组织农民向国民党乡党部和市党部请愿,要求国民党在新年前向农民发放大米和衣服,因为在新年前每个家庭都应该有秩序,在新年团拜前大家都应该穿上好衣服。这样一来,某些地方的国民党不得不停止自己的“新生活”运动。

我认为,我们的德国同志也应该根据这种方针进行工作,以便揭露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民主党经常进行的很狡猾的蛊惑宣传和采用的伎俩。否则我们就不能揭露他们[……]^①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327, 第 153—155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下面删去了关于克服德国共产党领导内部的派别斗争部分。

316

贝克给洛佐夫斯基的信

1935年1月22日于上海

绝密

致亚历山大^①

我借此机会匆匆写几句。500份《Hammer》[杂志]^②已经散发。最近几天还会印出100份。下一期的内容也是相当多的,因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③还没有出版。这是由于当前的干部危机迫使我们这样做的。(这一期的)内容:关于铁路员工运动的一封信,干部;企业中的工作和集中^④;罢工消息;皮亚特尼茨基论统一战线^⑤;苏联的工会;关于选举的报道;王明论新策略^⑥;西班牙党中央论西班牙国内事件;关于台尔曼的札记;声援西班牙事件的牺牲者;反对杀害基洛夫同志^⑦。我们为下一期准备了关于统一战

① C. A. 洛佐夫斯基。

② 原文如此。指《铁锤》杂志(见第347页注⑤)。

③ 指《斗争》杂志。

④ 原文如此。

⑤ 见C. A. 皮亚特尼茨基的《国际工会运动问题》,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4年第30期,第3—19页;《红色工会国际》杂志,莫斯科1934年第19期,第16—28页。

⑥ 指王明的文章《新条件与新策略》(1934年11月23日)见:《国际新闻通讯》杂志,列宁格勒1934年第14卷第62期,第1658—1659页;《王明全集》—莫斯科,1985年第3卷,第321—327页。

⑦ 指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遇刺。

线的材料。我们还要刊载洛佐夫斯基的一篇文章^①。中央干部的缺乏迫使我们任命前不久来的一位满洲同志^②担任党的重要工作。同时正在尽力争取从河南抽调一位好同志^③来。[中国]共青团中央和党的省委机关几位重要工作人员的缺额,也削弱了上海的工作,但是正在采取紧急措施,以便不给中央工会机关和下层机构造成影响。最近两周来,我们考察了海员工会的工作以及当地棉纺厂的工作,此后我们还要根据不久前收到的交通员^④的报告^⑤对我们在河北的工作进行考察。我们打算安排这项工作,为的是使我能亲自会见海员和河北的那位同志^⑥。环境仍然像以前那样不利于我们召开会议,开会甚至是冒险之举,因此我们应该只限于街头会面和偶尔在中国人家里会面,不过我们估计情况会有所改善。

新年的战斗(2月3日)^⑦在报刊上已经有反映。在很多企业提出了在1月(旧历12月)前发放传统的一次性补助的要求,其数额为月工资。除了汉口至广州铁路外,所有铁路都声明说,这些钱将作为奖金发放,而汉口至广州铁路只准备增发三天工资,尽管这条铁路是向江西和湖南运送反共军队的主要干线。我这里没有关于我们在这条铁路上的影响的材料。在一些工厂里要求提前停工和早几天领钱的情绪在加剧。许多企业已经关闭,而在一些地方要求发放一次性补助和假日补助的运动在加强。在上海的“信德”

① 见 C. A. 洛佐夫斯基的文章《为了国际工会运动的团结》,载《红色工会国际》杂志,莫斯科 1934 年第 21—22 期,第 15—17 页。

② 何人不详。

③ 何人不详。

④ 何人不详。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 何人不详。

⑦ 指中国阴历新年。

胶片厂 100 多名被辞退的工人要求支付给每人 60 元^①。厂主建议支付 45 元。达成了妥协,结果 66 个男工每人获得 51 元,30 个女工每人获得 7 元。这当然是国民党的妥协,但报纸没有作进一步的报道,而我们的消息提供者也不知道详细情况。上海中国商会企图说服银行和南京政府必须把所有付款再延期一年^②,借口说出现了危机。蒋介石在这里呆了三天并和他们进行了谈判。在商会的声明中说:上海的萧条达到了 1934 的最高水平,因此中国商品的价格下跌空前(但大米的价格仍然停留在 13.5 元的水平上,而在初秋时节才 8 元)。结果每十家工商企业就有九家遭受到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损失。由于上海商贸的这种严重形势,不言而喻,大多数商贸企业在 2 月 3 日调整付款的情况下必然会破产,在像上海这样十分活跃的城市里商贸和工业也会不复存在。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极为有害的后果,我们建议把债务偿付期延长一年,租赁付款期延长半年^③。当地报纸称这种要求是空前的。这种要求的合理性为以下事实所证明,每天都有工商企业关门,当地的五家银行已经倒闭,于是蒋介石匆忙赶来并命令从香港紧急进口 2000 万银元。此事发生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富有的城市,曾经有一个时期全国的白银都涌向那里。新年的战斗,看来将会是极其顽强的和激烈的,并且可能会取得十分可观的结果,因为工人的状况在不断恶化,饥饿笼罩着农村,红军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还因为日本人闯进了察哈尔[省]。我们在这方面还算幸运,我们对新年战斗的指示^④及时传达到省里,并且没有太大的损失,但是,在我们工作中最糟糕的是,我们只能从报刊上了解有关结果,因为汇报过几

① 在这里和下面,看来指墨西哥元。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文件没有找到。

个月才能送到。即使不发动真正大规模的战斗,那也要过去很长时间,我们才能了解到计划和决议的执行结果,因此,根本不可能检查我们决议的实际执行情况。

关于产品、商业周转等的统计材料还没有,但我们了解不多的情况足以直观地显示出该国整个经济令人不安的深刻危机和走向破产的总趋势。

年初,南京认定旱灾和水灾造成的损失为 20 亿元。那以后又发生了几次水灾,政府军把许多地区变成了荒芜不毛之地,而旱灾、各省的通货膨胀和对粮食的强行征收,使农村的状况更加恶化了。根据最近官方的材料,仅一次旱灾,10 个省的损失就有 144.5 万元。统计资料强调说,这里还不包括间接的损失和由洪水、台风、冰雹及蝗虫侵入而造成的损失,今年的蝗灾特别具有破坏性。这些自然灾害使水稻、黑麦、杂粮、大豆、棉花和亚麻的收成减少了 35%—40%。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省份遭受的损失最大,在那些省份稻米的价格与去年相比上涨了一倍。有关丝织品出口和蚕茧生产的材料表明,灾难威胁着农业的所有部门。头九个月蚕丝出口为 5000 担^①,没有超过去年同期出口数量的一半。蚕丝的价格从 1600 元降到 450 元。蚕茧产品比去年减少了 33%,而蚕茧价格却是去年的 1/3。

当然,政府并没有通告,农民暴动具有多大规模,但报刊上偶尔也透露出这样一些消息:众多的饥饿农民群体撬开粮仓,逼迫富裕地主给他们发放粮食,殴打和杀死税务官,捣毁当局机关的办公楼,等等。红军在新的地区轻松地取得了胜利,他们正在从这些新的地域恢复老苏区和组建新的苏区,而各省军队的很多军官却惊惶失措——这些足以直观地表明农民的革命情绪。我还没有得到关于工业产品下降的可靠的统计材料,虽然我知道,几乎每天都有工业企业关门,有的是临时关门,有的是彻底关门。而另一些企业

^① 1 担约等于 60 公斤。

在减少产量。丝纺工业受损害最大。江苏和浙江的 180 家纱厂中有 110 家在最近一年内倒闭,而没有倒闭的也只生产几周或几个月。在上海的 117 家纱厂中有 75 家在春天关门,有 31 家在秋天关门,当时在广东南凯(音)的 25 家纱厂中的最后 10 家也消失了,因此,3000 名女工没有饭吃。

棉纺工业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头六个月有 13 家工厂关闭,有 3 家停止了夜班生产。虽然我们不知道下半年的材料,可是至少已经知道,下半年在商贸方面还不如上半年,而且即将到来的一年注定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改善。一周前天津的一家最大的棉纺厂破产关门了。根据共产党的材料,上海的棉纺工业产品减少了 25%,冶金工业减少了 75%,丝织工业减少了 80%,七种不太重要的生产行业减少了 35%。

过去一年的整个(进出口)外贸额与 1933 年同期(不包括 12 月份)相比减少了 336006647 元。这个时期外贸逆差为 465996671 元,而整个外贸额为 144926525 元。这表明,外贸额已经连续四年不停地下降,连续七年都是逆差,又减少 2 亿元。这就意味着,中国购买力的降低已经影响到几乎完全由日用必需品构成的进口。去年从中国输出白银的数量比任何时候都多。根据非官方的然而可靠的材料,从 4 月到 9 月的合法出口只有 2 亿元。自从实施征收 12% 的白银出口税后,大量白银的出口都是通过走私途径。白银的这种流失也是削弱货币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看来,这里应该指出,旅居海外华侨汇入的外币也大大减少了(还没有总计材料)。这种外币的汇入也是中国外贸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进出口税增加了,可是这种税收收入却减少了 500 万元,如果注意到政府不多的收入和不断增加的支出,这绝不是一个小数。例如现在政府每月支付给四川刘湘将军用于反共的补贴为 70 万,并花费巨大数额用于加强不断贬值的四川货币。最近打算签订贷款 1.2 亿元的贷款协议。在银行界越来越广地流传关于通货膨胀和破产的传闻。专门运到上海

的 2000 万银元也没有改善这些银行的境况,因为资金都转给了政府(政府从 1926 年起卖给中国各银行的国库券为 10 亿元),或者投到为富有的地主和将军们修建豪华的住宅和宾馆上了,他们都向往住在这个由外国人保护的港口城市。中国货币的汇率是稳定的(大约是 2.82 美元),但是这也不足以成为衡量它像德国马克行情那样稳定的标准。

上面简要描绘的片断的不完全的经济衰退情景反映出统治阶级的腐败。官方恬不知耻地劝说人们相信统一,相信共产主义会被消灭,相信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共同进步,这种劝说及其他说教,对于病人膏肓的阶级来说是司空见惯的,这种劝说和说教不断地来自南京无休止的秘密代表会议和不时来到南京又匆匆离开那里的一些特使。不论中国报刊还是外国报刊都已经忘了关于不久前“消灭”红军的报道。当我们的军队穿过贵州的时候,曾把他们说成是“惊慌逃窜的残余”,“被瓦解的逃兵”等等,他们写道,他们每天都被政府军包围,他们每天都损失数千名士兵,他们在挨饿和溃逃,在追兵面前惊恐万状。可是,现在(贵州)第 25 军副军长侯之坦将军由于未能阻止红军渡过乌江和放弃湄潭、遵义、桐梓及贵州其他重要城市不抵抗而被捕了。“这位将军不经批准就放弃对该军的指挥权而匆匆跑到了重庆(四川)。这位将军报告说,他一直在追击红军,使逃窜的红军残余”遭到了一系列失败。现在报刊报道说,贵州省政府主席兼省军总司令王家烈将军“神秘地消失了。”在向红军“进攻”的前夕他出去巡察了,此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尽管江西所有红军都“被消灭”了,现在报纸^①又报道说,在江西西南部出现了由项英指挥的 2 万红军。从西方传来的一家外国报纸特派记者^②的报道,描写了笼罩着统治阶级阶层的惊慌失

① 报纸名称不详。

② 何人不知。

措情绪,讲述了他们怎样变卖贵重物品,聚敛白银,收拾“细软”,急急忙忙地准备逃避不可战胜的红军。这位记者的信函几乎用同情的,至少是客观的笔调叙述了我们的胜利和群众的同情态度。他在一些信中抱怨贵州某些地区明目张胆地蔑视法律,从那里把省军调走了。同时,从北平和南京传来了关于向日本人彻底投降和关于因察哈尔“边界冲突”而满足日本人要求的报道,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当日本人认为执行自己计划的时机成熟时,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察哈尔。

我现在就此搁笔。我们指望很快就会从我们的情报来源处得到一些消息,我会立即向你们报告。在今天的邮件中你们将看到不久前从荷兰来的一位同志^①写给 И. С. (?)^②委员会的便函^③。请尽快证实他的身份。

杰克^④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36, 第 3—8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何人不详。

② 原文如此。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P. 贝克。

317

贝克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5年1月22日^①于上海

秘密

致远东书记处^②

至于领导,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印象,领导是软弱的,不能及时注意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尽管我们的干部遭到很大损失,这是事实,但是关于江西西部战役的声明^③发表的还是太晚了,虽然同志们和工人们都不止一次地要求尽快发表。此外,译文(顺便说一句,很差)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对事件说明不够充分。同志们沉浸于搞分析判断,而形势要求作出简要的说明,这种说明可以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毫不费劲地传给群众。从那以后,报纸上刊登了相当多有关我们胜利的报道(大部分是间接的),而且整个语气都彻底改变了:它已经不再大叫大喊“彻底歼灭”了,而对未来很担心。人民群众会相信,从江西的撤离得到了补偿:我们的军

① 信是1935年3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的。

② 原文如此。应为:东方书记处。在文件上有批注:送王明和米夫同志。据我看,应该通知他,不值得也不应该让信中包含的许多这类材料加重秘密邮递的负担,完全可以把它们写成公开的评论文章或信函。在秘密邮件中最好首先向我们报告关于党和工会的组织状况以及其他秘密事宜。你以为如何?王明。[1935]年3月28日。

③ 指1934年12月15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的声明》(见第347页注③)。

队取得一些重大的胜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我军在全线的进攻。此外,我们重印了王明发表在《Hammer》^①上的那篇文章^②,党把它散发给所有的委员会。

至于日本人在察哈尔发动的新的攻势和由于年终临近,银行、工业部门和商业机构所陷入的困难处境,还是出现了拖延和信心不足的情况。虽然已经决定散发关于反帝工作的新指示,现在的全国委员会^③应该认真给以加强。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不提出来,是不会讨论的。我很清楚,同志们需要克服多么大的技术上和组织上以及干部方面的困难。因此,我总是谨慎地策略地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很清楚,应该尽快采取措施加强领导并在不久的将来向那里派遣顾问,否则就会错过许多机会。同时,他们正在加强中央,增补几个最优秀的工作人员。为了让报纸^④尽快出版,我们最后采取措施与史沫特莱建立联系。关于建立联系的结果将口头向你们报告。两周前,江苏党和共青团的委员会又遭到一次重大损失,只是由于中央的及时干预,才使工会机关避免了这样的损失。

杰克^⑤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36, 第 1—2 页。

打字稿, 副本。

-
- ① 指《铁锤》杂志(见第 347 页注⑤)。
② 见第 355 页注⑥。
③ 不清楚这里说的是什么委员会。
④ 报纸的名称不详。
⑤ P. 贝克。

31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 434(A)号记录

(摘录)

1935 年 2 月 3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9(7052)——米夫同志的建议:任命弗雷德^①同志为东方地区书记处军事工作的负责人,任命琼森同志为东方地区书记处中东部领导人并解除他在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作。

决定:9——建议通过。琼森同志应该完全转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的工作中来,他可以参加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会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333,第 1—3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M. 施特恩。

319

胡秋原给王明和康生的信^①

1935年3月10日^②于莫斯科

秘密

致王明、康生同志

我到达之后，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③委托我向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交这封信，我把它抄下来后，转给了你们。在这封信中谈到了关于该委员会现在的状况及其原则。我希望你们能够正式答复这封信。如果双方都完全同意，那我希望，一切具体问题最好在中国讨论，这样会更具体。我知道，双方之间有联系。如果对于这封信不提出什么问题，那么我希望你们可以提出开始直接谈判的具体建议。我想，毫无疑问，个人会谈是可能的，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最好在香港进行讨论，因为蒋和陈（显然，是蒋鼎文^④和陈铭枢——原译者）^⑤现在都在香港。

祝万事如意

小弟胡成原^⑥

[附录]

① 文件副本已送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Я. К. 别尔津、П. А. 米夫、王明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来当宾馆。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的俄文译本确定的。

③ 关于该委员会成立的材料没有找到。

④ 原文如此。应为：蒋光鼐。

⑤ 原文如此。

⑥ 原文如此。应为：胡秋原。

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I

第一点。(1931年)9月18日事件^①后,全体中国人民和19路军都深刻认识到,不同日本进行有效的斗争,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我们才有上海事件^②。

第二点。上海事件之后,一方面19路军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另一方面,来自南京政府方面的不断压迫仍在继续。因此,19路军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条是与日本斗争到底,另一条是向蒋介石投降和进行反共斗争。

第三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走反对日本和蒋介石的道路。起初我们决定与中国西南联合反对蒋介石^③。但是由于这个集团不坚决,我们就决定与共产党和红军联合。在塘沽协定^④签订之后,我们发表了强烈的抗议书^⑤,然而对方没有向我们作出任何答复。我们只剩下唯一的同盟者——红军。但遗憾的是,当我们已经开始与红军谈判的时候,红军却在连城和延平地区发起了决定性的攻势。因此,我们的军事进攻推迟了几个月。对此只能表示遗憾。

第四点。在协定签订后成立了人民政府^⑥。处在四面包围的条件下,人民政府只有一个同盟者——红军。当蒋介石从西面进攻的时候,我们在军事方面遭到了失败。我们的军事计划没有实现,我们的整个活动失败了。

第五点。人民政府成立后,我们发表了人权宣言,作为我们政

① 指日本开始占领满洲。

② 见第180页注②。

③ 详见谢本书和牛鸿滨:《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郑州1990年。

④ 见第67页注③。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 指1933年11月20日19路军司令部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府的政治纲领^①。尽管这个纲领中的许多条款还可以批评，但是那里包含着下列几点：

(1)承认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对日本的人民革命是当前中国的唯一出路。

(2)承认中国革命必然会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是十分清楚的。在从民族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从一种革命过渡到另一种革命，是福建运动的目的。

II

第六点。在失败后，部分老同志分散到各地去了，部分聚集在香港。现在最忠诚的一些同志彼此逐渐又联系上了。原福建政府和人民党已经解散，所以同志们现在就以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在我们遭受失败和在福建活动的时候，英国、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者一起镇压了福建的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对军阀不抱任何希望。结果，参加过福建革命运动的同志们得出了坚定的结论：

1. 中国革命有无产阶级基础。中国革命只有一个出路，即在不产阶级领导下实现农民、士兵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斗争战线。

2.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高的革命理论。

3. 为了保证中国革命的前途，今后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联合起来。

4.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唯一的真正的同盟军和今后我们与之联合的政党。我们认为：(1)苏维埃口号还不是现在的直接斗争口号。(2)当前正在进行民族斗争的时候，必须全力扩大我们的战线。(3)在直接反帝斗争之前，必须暂时利用“保护色”，因此，虽然我们处在共产党之外，但是我们深刻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也

^① 指1933年11月20日在福建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人权宣言，见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3卷，哈尔滨1981年，第274—275页。

同样有自己的特殊任务和责任。我们对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适用毫不怀疑。因此,现在我们进行工作是为了与共产党同样的目的,虽然我们还不属于共产党(坦白地说:我们在共产党里虽然身体不同,但心是一个^①)。我们只是在策略问题上有区别。今后,一旦中国革命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它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七点。今后同志们在地方工作的原则,应该是以下几点:

1. 要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应该一律平等。

2. 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将其分给农民。

3. 实行 42 小时工作周,提高工资,实行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

4. 争取结社、集会、出版、言论的自由,在国土任何地方居留的自由和个人自由。

5. 同全世界的反帝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人民的武装力量和人民政权。

这不是坚定不移的党的纲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党组织。这只是我们的原则。这些原则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是目前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这是未来社会革命的出发点。

第八点。我们当前的任务有下列几项:

1. 加强我们自己的力量,为此必须:(1)在所有地区建立我们的组织,这种组织暂时应该以中立组织或科研机关的名义进行工作。(2)一般地说,为了参加运动并在某些地区必须同军事力量联合起来。

2. 必须扩大抗日反蒋运动:(1)开展民族自卫组织的运动应该是当前工作的主要方法之一。必须在华南地区和印度尼西亚扩大自卫运动。(2)必须参加抗日反蒋运动。

① 原译者注。

III

第九点。蒋介石与日本勾结，现在是日本对中国积极进攻的时期。这种进攻由于英国的支持以及日本和德国之间存在秘密条约^①而变得更具侵略性。美国和法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沉默，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部分原因是鉴于这种进攻对他们的反苏反共斗争有利。中国资产阶级也正是鉴于蒋介石反共而原谅了他以前的罪过。中国小资产阶级部分被收买并加入法西斯队伍。

第十点。蒋介石和日本的这个联盟是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最大威胁。一方面，这个联盟是英日合作的一部分，并在加强苏联敌人的阵营。同时这个联盟也是中国革命和一切民族民主运动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这个联盟又是对德国反对西方革命运动的支持。

第十一点。因此，现在关于如何粉碎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如何推翻日本的工具——蒋介石的统治，以及如何使蒋日联盟瓦解的问题，就成为世界革命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第十二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毫无疑问，需要整顿革命军队的主力，加强革命的力量。但同时也不能放弃利用一切机会在正确的领导下联合所有抗日反蒋力量。为了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不能不利用削弱蒋日联盟的一切机会。

第十三点。由于最近红军撤离了江西，蒋介石在中国的影响与过去相比加强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虽然同时帝国主义的矛盾在加剧，帝国主义者转入进一步的进攻，蒋介石与中国西南的冲突在加剧，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蒋介石与广东之间的武装冲突很快就会开始。因此，与日本相勾结的蒋介石的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具有越来越严重的性质。此外，在红军撤退的影响下，法西

① 关于签订条约的材料没有找到。

斯集团的活动肯定也会活跃起来。最近一个时期蒋介石与广东之间的冲突只是间接的。贵州是广西省的主要生命线,广西借口反共要攻占贵州^①。但是蒋介石对贵州同样也很感兴趣,所以他停止了对广西的财政补助。在这个地区红军也有部分影响。

第十四点。蒋日协定同时也促进中国统治阶级阵营的分裂。这个协定已经超出了所有统治阶级要求的极限,即超出了反共的极限。在实行新税率之后,上海资产阶级很不满意,亲日派和所谓的欧美派之间的秘密斗争开始了。我们应该加剧统治阶级营垒中的这种分裂,以使资产阶级内部的反对派脱离日蒋阵营。

第十五点。最近几年来在中国除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其他政党。虽然国民党内有很多派别,但是他们都没有超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结果革命力量逐渐聚集在共产党的周围,而反革命力量则聚集在国民党周围。蒋介石的反共斗争在扩大,并在变成国民党的反共斗争。虽然蒋介石组建了“蓝衣社”^②,因为国民党已经老朽和腐化,但是表面上他还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在活动,企图利用国民党来提升自己。实际上只有蒋介石才能支撑国民党。所以我们在进行广泛的民族斗争的过程中还应该开展反对国民党一党制的运动。

第十六点。现在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帝国主义者反对苏联的同时,必然想安抚中国。反过来说,他们安抚中国就是为了进行反对苏联的斗争。所以,支持苏联和扩大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就成了一个问题。

IV

如上所述,我们真诚地本着以前协议的精神在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继续在反对日本和蒋介石的运动方面进行自己的工作。

① 原文如此。

② 见第182页注④。

第十七点。我们完全公开地承认，我们像对待同路人那样对待共产党，但是将来的密切合作和统一的斗争战线，要求我们相互尊重和理解。在福建事件^①期间，《真理报》和中国共产党在它们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友情^②。当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应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然而，对于与之合作的友军在批评中需要体现出友好的情谊。只有在我们背离革命的情况下，才应该对我们进行抨击。当然，我们也应该这样对待共产党，因为一个小的误会可能引起一些大的误会。

第十八点。在蒋介石直接统治的地区，共产党不能公开地工作。因此，扩大和整顿自卫组织^③的工作就应该成为这些地区工作的主要形式之一。然而，民族自卫联盟是民间组织。现在，鉴于在一般人看来，共产党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发展自己的组织，我们建议把民族自卫组织变成一切党派的革命联盟，以便使所有抗日反蒋力量加入到这个组织，尽管其社会成分会很复杂，但我们认为，这一点也不必害怕，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动员中国人民的最广大群众。这样，自卫组织才不会成为干瘪的组织。

第十九点。我们现在还没有党的组织，因为我们在思考，根据我们的政治纲领组建一个党对中国革命是否有利，是否会减少革命力量之间存在的这种误会。但是，为了使以前的力量能够重新组织起来，有时也需要党组织的形式。我们希望提出这个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友军和国际的革命力量来讨论。

第二十点。我们以前的力量和同志们都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与每个地区的共产党人联合起来，一起

① 见第 84 页注④。

② 见：《福建省的形势》，载《真理报》1933 年 11 月 27 日；克雷莫夫（郭绍棠）：《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历史回忆录》，莫斯科 1990 年，第 331—345 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449—453 页。

③ 可能，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所建立的组织。

进行反对日本和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欢迎组织各地联合战线的措施和方法。

第二十一。我们希望与共产党一起在上海组建一个大印刷所,你们可以从物质和干部方面帮助我们。以前我们在上海有过一个印刷所和一家书店“神州国光社”^①。由于缺少人员和资金现在这两个组织都不能积极地工作。如果共产党能够增加我们的资本,我们就可以改组我们以前的出版社。

第二十二。如果上述一切能得到充分理解,我们就想开始进行具体的谈判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便在各地和所有工作领域共同进行斗争。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2,第 60—69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神州国光社”,即上海的一家出版社。

3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通报材料^①

1935年2月11日、3月18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江西红军兵团的西行路线

中共中央关于红军撤出江西包围圈的决定于1934年11月完全实现了。这个决定和向西运动的主要方向的选择，是在蒋介石第六次“围剿”^③结束前所形成的形势下唯一可以实现的。

在分别与广东、湖南、广西和贵州各省军队发生几次遭遇战之后，江西红军兵团的主力，即收拢成一个机动拳头的四五万武装战士，到1935年1月底其先遣队已进入四川省，位于长江南岸重庆与泸州之间的地区。运动的目的一—使自己的部队与四川红军兵团部队会合——几乎在没有来自敌人方面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完全实现了。红军在运动中以及在与广州战线左翼部队的战斗中和在进入广西的战斗中（这是在1200至1400公里的整个行军途中仅有的两次重大冲突）遭到的损失没有超过2500人。为了完全实

① 文件标题。材料是M.施特恩准备的（见全宗495，目录74，卷宗272，第28—29页〈补充部分为手稿〉）。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的整个文本确定的。1935年2月11日的通报材料（见全宗495，目录74，卷宗272，第17—27页）和1935年3月18日发表的经过补充的文本都送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各委员。

③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现给自己提出的战略目标,只剩下 250 公里的地带要由江西兵团和四川兵团一起努力去克服。四川兵团于 1 月下半月开始从自己的根据地经保宁向西南实行正面进攻。经过两个月平均每昼夜 18 到 20 公里速度的行军之后,剩下不太大的地带需要穿越,这是在江西巧妙实施突围之后整个作战计划中最艰难和最重要的部分。在最后的路段上江西兵团应该在宽广的战线上展开,并寻求与敌人的决定性遭遇战。在过去的阶段,机动灵活的艺术就在于在行进途中进行迂回或“清除堵塞”。在快速行进的情况下,许多城市只有几天是在红军路过梯队的手中,红军通过该地区之后又重新转入敌人手中,但不是红军师团补充粮食储备、衣服和武器之前。在行军途中只要有可能,红军的梯队还进行宣传并在贵州和湖南一些被放弃的地区留下地下小组开展游击战。敌人的报纸不得不承认,在红军行进中并没有发生对居民的抢劫行为和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象。这家报纸承认,甚至对那些有理由害怕红军临近的人所采取的措施都显示了严格的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合理性。居民对红军不可能产生不好的印象或者害怕“红色恐怖”。

江西兵团的新根据地在形成过程中

乌江流经贵州省北部三分之一的地区,随着越过乌江和占领遵义城及其地区,江西兵团开始巩固这个地区,将其作为根据地和向北进一步扩展的前沿阵地。现在江西兵团位于黔北和川南新的尚未开辟的根据地,由四五万武装战士组成,他们都具有经过最艰苦环境考验的作战能力和政治上的坚定性。该兵团带有 2—3 万尚未武装起来的后备军,他们主要是由江西和福建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组成,这些不能留在当地继续在失去的地区做地下工作。这些宝贵的政治干部补充了红军的战斗成员。中共中央也和他们在一起。在新地区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不会遇到因缺少干部和必要的领导而出现困难。只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全面开发

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看来,起码 1935 年春天以前这段时期,形势可以保证红军没有紧张的战斗考验。一般地说如果可能的话,1935 年春天之前,蒋介石也未必能在湖南、贵州和四川建立起巩固的统一战线来对付红军。因此,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是使红军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组成自己新的战线之前,从行军疲劳中恢复过来和熟悉新的环境,并借助于武器尽快地巩固和进一步扩大已经获得的根据地。

现在可以认为乌江河谷就是位于黔北和川南地区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南部边界。贺龙同志的第 2 军团和肖克同志的第 6 军团在湖南省西部和湖北省最西边的一角作战,掩护着江西兵团的右翼。协同行动的这两个军团是一个独立作战的兵团,约有 2 万名武装战士。1935 年 1 月,这个兵团的部队曾经与常德地区的湖南军队作战,他们占领了桃源和慈利两座城市。贺龙和肖克同志向湖南方面的行动最有助于保证江西兵团有必要的时间在新根据地进行安顿。

在左翼,江西兵团可以指望得到来自马边和雷波地区方面的某种掩护,该地区位于岷江的西岸。1933 年在这里成立了川西红军,该军当时由刘文辉将军那个军中的两个转到红色游击队方面的旅组成。1934 年再没有收到有关该军的消息。不过,即便假设它再也没有发展并且遭到了失败,那么,由 3000 到 4000 人组成的主要核心未必会被敌人消灭。

如果想揭示江西兵团在新的地区的近期前景,我们可以通过把它与 1933 年初从湘鄂苏区进入四川的第 4 军团相比较的方法来做这一点。当时第 4 军团有 1 万到 2 万名战士,其中党员和共青团员不超过 15%—20%;江西兵团是一支有 6 万到 8 万人的军队,党员和共青团员达到 60%。如果说在 1933 至 1934 年间已由第 4 军团的干部发展成为超过 10 万武装战士的军队,那么在最近的半年内也能由集中了优秀军政干部的江西兵团发展成为 20

万人的一支战斗军队,并且拥有由地方力量组成的相应的后备力量。如今这支干部军队和现在的川陕苏区红军已经拥有在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直接领导下的 20 万人的武装力量,可以不用担心与任何一个敌军的单独集团进行决战。只要江西红军进入新的地区,党中央就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口号:在最近的历史时期内拥有百万红军。只是需要尽快熟悉新的根据地,充分发挥土地革命的力量,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系统,用苏维埃方式改革财产关系、土地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四川实现这一计划的土壤是极其有利的,总的形势现在也对红军有利。

随着江西兵团的先遣队进入长江北岸的泸州和合江地区(对此路透社和新闻联合社在 1 月底作了报道),红军正在进入这个地区,在那里不仅可以依靠当地的农民,而且还可以依靠工人无产者来补充自己的组成人员。那里离泸州有 60 公里,有一个以自流井为中心的很大的盐业地区。在那里从事采盐的约有 30 万工人,并且还有可观的驮路(搬运工)和水路(装卸工和驳船驾驶员)运盐队伍。四川是中国的粮仓,其人口相当于德国的人口,拥有各种自然资源,借助这种资源,苏维埃根据地可以成为真正巩固的根据地,如果需要的话,它也能长时期经受住反革命联合力量的封锁。在这里,苏维埃根据地也拥有煤炭、石油和铁矿。该地区盛产经济作物:棉花和苧麻。

苏维埃政权在开发新的地区时可能会遇到的较大困难是(据许多观察者证明)大多数居民不仅是鸦片的生产者,而且也是鸦片的消费者。根除这一恶习,这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

关于中国西部力量对比的主要材料, 作战方向,红军近期的作战任务

在红军向西南省份运动的时候,广西和贵州军阀的部队也在运动。向贵阳方面推进的桂军的三个师从南部与贵州省的三个师会

合。有消息说，一些部队在从云南省向贵州边界运动来同红军作战。如果这些部队联合起来从南面和西面共同对付红军，那么，这些部队和作战方向对于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也不会构成主要危险。这些部队在12月和1月遭到红军顺路的打击之后，不可能再追求积极的目的。他们最有可能只限于建立防御战线，大概就像广东军队在反对以前的江西根据地时所建立的战线那样。现在红军正行进在向西南诸省运输川盐的路线上，手里握有向这些省份的当今统治者施加压力的强大经济手段。考虑到这些省的军队具有抗日和反对南京的倾向，红军在实行相应的军事和商业政策时至少可以做到使南面和西面的敌军部队保持中立。四川三个军阀(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不久前发表声明：如果蒋介石借口对红军作战而派军队入川，他们就反对蒋介石。应该把这个声明看作是四川红军实行正确军事政策的结果，四川红军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暂时正在与次要的敌军集团进行谈判。这种政策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逐渐将这种次要集团的武装中立变成友好中立，变成反对主要的共同敌人的联盟关系，而后建立一个以红军为骨干的广泛的反帝武装战线。

敌军的主要兵团还在东面，即何键的湘军，并入该军的约有蒋介石的5个师。湖南——贵州方向今后可能成为危险的方向之一，是对南京沿长江南岸行进军队的主要攻击方向的一个补充。在那里的宜昌至万县地区，也就是在长江岸边的巫山和云阳城中，形成被派来支援四川军阀刘湘的南京军队的拳头。由此可见贺龙和肖克同志的右翼兵团用来掩护直至长江的湖南方向的重要性。

红军联合部队，即江西四川兵团的近期行动对象应该是刘湘的军队，这支军队在不久前失败后(1934年9月被击溃并被解除武装达7万人)，又在蒋介石派往四川的贺国光及总参谋部200名军官的领导下重新进行了整编。

这支军队又有15万到25万人，由三个兵团组成：1. 反对四

川红军战线上的兵团；2. 重庆地区的兵团，该兵团打算迎击江西红军并在等待蒋介石的新部队沿长江南岸和从湖南的到来；3. 掩护刘湘在四川省会成都的主要基地的兵团。同刘湘兵团在重庆地区的战斗应该在蒋介石军队到达并在四川集结之前结束，这就意味着，在1935年2月，最晚在3月上半月结束。为此就需要红军的江西兵团让自己的三个主力军团转移到长江北岸并从泸州集结地区出发向重庆展开迅猛攻势，分割刘湘的三个兵团，使它们离开在成都的主要基地。这次进攻行动是同由保宁地区出发向西南方向发起进攻的红军军团密切配合完成的，在这次行动中贺龙和肖克同志军团的作用仍然是从南面威胁重庆，阻止刘湘兵团与赶来的蒋介石诸师的会合。在重庆以北地区要等待第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帝国主义者将其战舰集中在重庆、万县和宜昌一带的长江上，以掩护南京军队和刘湘军队集结的地区。

如果红军的联合部队决定先攻击省会成都，那么该城在3月间就可能落入红军手中。然而，这次胜利，即便很有成效，还远不是决定性的。

虽然蒋介石现在还不能派来数十个师，而最多能派15个师来支援刘湘(其原因下面我们再谈)，但沿长江两岸的方向现在是，今后很长时间仍然是对红军联合部队构成主要威胁的最危险的方向。在对现在留在四川的敌人主要兵团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这个方向会依然如故；红军人数增加一两倍并靠敌人相应地得到了武装，但还不能向东面的湖北和湖南方向实施大规模的进攻。只有占领紧靠长江两岸的万县和宜昌之间的山区，才有保证顺利地发展这个新的广阔地区。虽然这是红军的主要战斗任务之一，但在目前阶段暂时还不是第一位的任务。

对于四川红军北方兵团来说，现在重要的是要及时了解蒋介石准备从北面甘肃省实施的一次突然的危险的袭击。

问题在于，在秦州、西和一阶州和文县这个地区部署了蒋介石

的第1师,该师已开始向南面的红色四川运动。这个师从1933年起就驻扎在甘肃,当时它与其他师一起尾追来自湖北的红4军团。从那时起一直留在甘肃南部的师长胡宗南,扩大了该师的编制,组建了18个团,每个团3000士兵。该师现在共有5万装备精良的士兵,拥有自己的炮兵和航空大队。指挥人员全是从经过法西斯训练班^①培训的法西斯分子中挑选出来的。蒋介石对于这个师(更确切地说是特殊的军队)是舍得花钱的。根据南京的计划,这个师(中国西北最忠于蒋介石的部队)应该把中国这个角落的那些不愿听命于南京的军阀队伍统统收编到自己的手下。这个师也曾准备像远征军那样去“征讨”新疆。英国人对于这支可靠的武装力量特别赏识,他们知道,该师并不准备征讨西藏。

现在这个师正在向南运动,去对付四川的红军。这大概也是蒋介石给予四川反革命的一次最有效的支援。来自这方面的危险性也会由于在四川舞台上出现突然性因素而加大。

中国白军总的部署及其对四川红军当前决战进程的影响

几周前,中国资产阶级为“彻底消灭红军”而大肆庆祝了一番。在南京和上海的宴会上,为蒋介石这位“胜利者”祝贺的狂热和喧嚣还没有来得及消失,红色危险就在贵州和四川又复活了。甚至在距南京只有120公里的安徽省,在那里独立作战的红10军团和红7军团的积极活动,十分有力地显示了自己的威力,以致使报纸在胜利的社论后边不得不刊登来自地方的令人不安的报道。

蒋介石善于将自己的几乎所有兵力集中成一个拳头同江西红军作战,尽管七年来不断遭到挫折,这也使他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军阀,而现在他又面临着必须一切从头做起的现实。为此他又必须向各边远省份分批派出自己的军队,而要把他的军队从各省再集

^① 原文如此。

中起来并不那么容易。蒋介石知道,在四川的战斗不会比在江西的五年战斗轻松。红军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正在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红军主力已经汇合在一起了,并具有进一步迅速和不可遏止地发展的巨大潜力。

蒋介石不能调动自己在四川的所有兵力或其中的大部分兵力有许多原因:1. 因为与广州及整个西南集团的战和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与广州是战还是和,都需要集中在江西和福建的兵力。2. 在江西和福建制伏红色居民需要有大量的兵力,而这些兵力正忙于对那些仍在巧妙作战的红色游击队。从那里撤出过多的兵力,就意味着让一个大的红色战线重新在这两个省复活。此外,安徽的形势要求向那里增调达 10 个师的压力,以便对付这个省里的游击军团。3. 调动自己的军队去同四川红军作战,就意味着长期远离长江下游的主要基地,而那里汇集着独裁者的收入。因为四川预示着失败,而不是胜利,如果蒋介石的朋友少帅张学良坐镇湖北和湖南,这种形势就太危险了。不久前曾建议少帅去四川与红军作战,但是少帅拒绝了,并指出,这个任务是大元帅蒋介石自己的事。

张学良在把约 15 个“自己的”师联合起来,他不会派这些师去四川。在日本人向察哈尔和绥远发动新的进攻之前,蒋介石和日本人签订了十二月协定^①,迫使蒋介石将于学忠的第 51 军的三个师从北平—保定地区调往南方,在那里这些师将归少帅调遣。

日本人、广州集团、张学良、资产阶级社会人士等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让他向四川战区派出更多的兵力,但蒋介石未必会志愿去迎接自己的灭亡。

由此可以得出力量对比、红军当前的任务和 1935 年革命武装

^① 可能指 1934 年 12 月在北平签订的中国与满洲国海关协定,见《中国年鉴(1935)》,第 130 页。

力量发展的前景。

补 充

根据有关 1935 年 2、3 月间事态发展的材料,可以对 2 月 11 日简述中所讲的内容补充以下情况:

(1)红军主力试图从南部深入四川腹地,最初尝试在泸州地区渡江基本上没有成功。后来不得不在泸州—叙州以西的江段寻找渡江的可能性。从那里实施渡江到北岸,要求事先有来自云南方面的作战保证。需要先把云南的敌人赶出沿江地带,红军正是这样做的,它占领了位于云南省北部角落的镇雄和昭通地区。

主要作战中心向西部转移会多少改变总的形势,也就是:暂时必须放弃在重庆地区对敌军主要集团(刘湘+蒋介石)的直接行动。四川省省会成都成为作战的直接目标。渡过长江后要从西面向成都方向进攻,这意味着随后要面对另一条河——岷江的障碍,岷江是叙州(今宜宾——译者)地区注入长江的。关于这条岷江,可以说,它不仅是一个相当大的水域障碍,而且还有刘湘在其渡口设防的驻军,这些军队不久前与被打败的对手刘文辉的残部作过战,从那时起就驻守在这里。红军在刘文辉管辖的地域运动(向岷江以西)可能不会有战斗,也就是说刘文辉会同意让红军向成都挺进。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红军在对两个方案(同刘湘交战还是与他缔结反对主要敌人的战斗同盟)作选择时,会选择后一个方案,因为没有必要延误时间,去完成歼灭软弱敌人的次要任务。

(2)在泸州地区,渡江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因为设在刘湘大本营的蒋介石新司令部及时地把刘湘的第 28 军从保宁地区调往南部。该军从北面几乎与从南面渡江的红军先头部队同时抵达江边。红军的这次渡江没有成功,在渡口也没有发生战斗,而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红军不想在靠近渡口的不利条件下作战,自己主动地调头向西去寻找更合适的渡江地点。

(3)胡宗南的第18师团开始从甘肃进攻四川北部的老苏区之后,白军前线司令部才有可能从前线撤下刘湘的第28军并将它调往南部。这个地区的红军不得不让自己的一部分部队转向陕西方面,去迎接新的危险。从保定地区的进一步攻势,因此就停了下来,这对终止江西兵团在泸州地区的渡江尝试起了不小的作用。

(4)不久前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川北红军攻占了陕西的宁强城,并且威胁着陕甘边界上的风县城。这个报道证实了这样的消息:红军取得了对敌军“第18师团”的重大胜利。我们以前说过的来自甘肃的危险,现在有一半已经消除了。这个重要情况使红军有可能继续向甘肃方面行动。该省的北面与新疆交界。上述情况和显现的新前景不能不引起日本人对于在中国西北角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高度“警惕”。因此,才有不久前的日本外交官关于新疆的声明^①。

(5)这时敌军的湖南兵团(何键+蒋介石的5个师)已接近贵州的乌江,并且渡过了该江,夺取了三座城市:遵义、湄潭和绥阳,这三座城市曾被认为已牢牢控制在位于贵州新地区南部的红军手中。江西红军兵团主力不得不向东南方向派出一些部队,去加强贺龙一肖克同志的军团。现在由于上述两个军团的联合行动,敌人又被击退,逃过乌江,红军又重新占领了失去的城市。

全宗514,目录1,卷宗837,第4—16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可能指日本就苏联在新疆的政策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声明,见《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19卷,莫斯科1974年,第545、655页。

321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斯塔索娃的信

1935年3月19日于莫斯科

绝密

斯塔索娃同志：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打算为旅居欧洲和美洲各国的华侨出版一种中文报纸^①。出版的开支需要苏联货币99295卢布。中共代表团请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执委会拨出这笔款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社主编支配，报纸的整个出版工作由他承担。由于该报将向国外发行，并可以指望，至少每年从该报发行中可以获得四五千金卢布，这些资金可以寄往中国，供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之用。此外，如果您能拨出所需要的苏联货币数额，则也可以从中共的外汇预算中拨出四五千金卢布供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之用。等待您的急速回复。

致共产主义敬礼！

中共代表团(王明)

(康生)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米夫)

^① 指《救国报》，1935年5月至11月在巴黎出版。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72, 第 83 页。

打字稿, 副本。

3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会议第 442(Б)号记录

(摘录)

1935 年 3 月 21 日于莫斯科

机密

听取:31. (7225). ——关于解救鲁埃格两同志^①的运动。

决定:31. ——恢复解救鲁埃格两同志的运动,不必解释他们绝食的理由。关于鲁埃格两同志的小孩^②来苏联的问题留作悬案,责成米夫、阿布拉莫夫和王明同志解决他在中国的住所问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4, 卷宗 341, 第 320—321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Я. М. 鲁德尼克和 И. Н. 莫伊谢延科—韦利卡娅。

② Д. Я. 莫伊谢延科。

323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 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35年3月22日^①于上海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并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在这封信中我们简要地汇报一下新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组建情况。

1. 今年2月19日,我们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又被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发现。中央局的所有成员和中共中央的代表^②被捕。各部之间的联系暂时中断,这些部的工作也部分地停止。但是各部的所有负责同志以及曾经在领导机关领导下工作的大多数党员都在坚定地继续加强自己的基地,防备敌人的进一步袭击。这些同志当中的很多同志仍像以前一样,继续独立地在做自己的工作。3月18日,即巴黎公社周年日,我们的宣传材料,例如传单,在上海各地广为散发。这也是我们对敌人企图在上海彻底消灭革命组织的一个回答。在共产国际代表^③的领导下,很快就成立了临时中央局,并于3月17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在这次暴露的时候,除了上述领导同志外,还有部分在技术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在1935年5月3日收到此信的。

② 黄文杰。

③ H. H. 格伯特或B. 弗洛赫。

部、宣传部和组织部工作的党的工作人员(其中也有负责同志)也被捕了。被捕的还有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①的所有同志。特科、军事部、共青团^②、在中央代表领导下的组织(联络局、商业局、电台)以及组织部和宣传部的部分人员没有受到伤害。将白区和红区党组织与上海领导机关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所有环节都还在我们手中。江苏省委于1月暴露,至今尚未组建新的委员会。

2. 在共产国际代表的领导下,从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局、特科、共青团和中共中央代表所领导的组织的工作人员中挑选了五位同志,组成了负责履行中央在白区的职责的新的中央局。局内分工如下:

(1)A同志^③领导特科的工作,保持与共产国际代表、共青团、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局及电台的联系。

(2)B同志^④负责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局的工作。

(3)C同志^⑤负责共青团的工作。

(4)D同志^⑥领导商业局、联络局、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工作以及白区的一些党组织的工作,还负责恢复宣传部的工作。

(5)E同志^⑦领导军事部和白区一些组织的工作,同时负责恢复组织部的工作。

我们的日常工作由D和E主持,A同志有时也参加中央局的会议。

3.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现在我们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

① 原文如此。这里和下面指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

② 指中国共青团。

③ 刘仲华。

④ 饶漱石。

⑤ 何人不详。

⑥ 浦北人。

⑦ 贺昌之。

项:(1)恢复并重新开展由于敌人袭击而受到损害的各部门的工作;(2)恢复和加强与白区各省党组织的积极联系;(3)坚定不移地发展那些在暴露后保存下来的部门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努力巩固我们的组织,首先,要加强领导机关,以便使领导机关今后能不间断地工作。

现在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局、共青团、特科和军事部的工作继续正常进行,正在重新审查和恢复与其他部门的联系。在对情况进行仔细全面研究之后,我们将制订下个月或未来几个月的工作计划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出关于形势和党的工作的全面报告。

4. 由于新的中央局一些成员没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对党组织的情况了解得也不够清楚,还由于现有的干部远远不够,在工作过程中,无疑会遇到很多困难。当然,我们认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领导下,我们完全有可能克服这些困难。然而,为了加速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和加强新的中央局的领导,我们请求共产国际派几位同志来中国^①担任你们的职位,参加中央局的工作。其次,鉴于在中国存在着危急的革命形势,需要有强有力的领导。所以,我们恳切请求增加领导干部。

5. 我们派遣阿石^②和贾^③同志前往苏联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④的代表。阿石同志过去的工作,共产国际代表是了解的。贾同志曾经负责皖南的组织工作。他在政治上是很坚定的,但是他的实际工作经验还不能认为是丰富的。我们请求你们帮助他,给他提供参加短训班的机会,然后再让他回中国工作。

① 原文如此。应为:上海。

② 饶漱石。

③ 何人不详。

④ 见第61页注④。

6. 我们单独另列新的中央局成员的姓名及其过去工作的材料^①。

致布尔什维克式的敬礼!

中共中央局

又及:正如你们知道的,我们在华北有很大的组织力量,在那里有中共中央代表^②。同时华北的党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之间保持着联系。这样一来,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得不在几个地方工作,目的是加强中国各地的工作和防止敌人对我们党的集中进攻。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2,第 87—90 页。

英文手稿,原件。

① 材料没有找到。

② 孔原。

324

施特恩关于政治工作讲座的速记记录

1935年3月22日于莫斯科

绝密

弗雷德^①同志关于政治工作讲座^②的速记记录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政治工作并把这个题目分成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共产党组织为瓦解白军部队所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这项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提出什么样的口号,用什么方法去接近白军的士兵群众、白军军官,特别是白军的中层军官?

我想提醒的第一点是:中国的白军是封建—资产阶级的军队,并不是铁板一块,因此对待各部队应该采取适当的方法,也就是说,应该根据该部队属于哪个集团,驻扎在哪个省等情况选择工作方法。例如,在省里可能有个别指挥员这样教育自己的部队,为的是以后把这支部队据为己有。然后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该部队的指挥员被排挤出该省盛产粮食的地区。自然,这样的部队对此时执政的部队会有某种对抗的情绪。

我想以此来说明,不仅在同一个范围内,无论是中央部队,还是省部队,我们的工作都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而且对同一个省

① M. 施特恩。

② 讲座的地点不详。三份文件中有一份保存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档案馆。

内的这个或那个部队，你们也应该根据该部队近期所发生的事件有区别地对待。

我们应该记住，这里需要的口号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也不完全是带有阶级性的口号，而在初期我们对待白军应该选择更适合于当时的口号。如果我们能记住中国革命的性质，那么，这种口号就会有的。

首先，需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针对该省最感觉得到的某个帝国主义者尖锐地提出这种口号。在目前条件下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意味着宣传将以抗日材料为主，这将是对待白军部队的最好方法。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我们不应该超前给自己提出争取使白军部队转到我们方面来的目标。在接近该部队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给自己直接提出这一任务。我们可以这样来限制自己：我们将逐步地给自己提出目标：第一，如果可能的话，制造白军各部队之间的误会，甚至械斗。然后鼓励即将开始的械斗，在中国的条件下，白军一些部队之间的械斗总是可能发生的。

我们想达到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使白军部队对我们采取中立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让这些部队相信并向它们证明，一旦一个部队与白军其他部队发生某些误会，我们将保持中立，不去进攻该部队。我们也应该要求该部队作出相应的承诺。

根据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根据我们在给自己提出的第一步目标中所取得的成绩，我就可以提出下一步目标，就是把把这个部队建成人民革命军兵团。我们不提出把这个部队建成红军部队的目标，而只是把它建成在人民革命运动口号下活动的部队。在这里首先应该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和争取一定自由的口号，这种口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给自己提出的最低要求。

苏维埃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提出来，而且应该提出来。这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初口号并不矛盾，因为众所周知，苏维

埃本身首先是实现这些最低要求,只有在以后才提出下一步的目标,即,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

在划分我们任务的这些阶段,我们可能遇到为下一个阶段多少做了准备的某个部队。我们不一定从第一个阶段做起,也不必等待部队之间的械斗。只要出现某些条件,就可以提出第二个目标,也可能提出第三个目标——使一些部队在人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脱离白军。

这就是我给你们提供的标尺,它应该是,你们如何对待某个部队并决定从何处做起的标尺。

如果我们说,需要制造一些将军之间的内讧,在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共产党组织不仅要在基层做工作,在士兵群众中间做工作,而且还要在军官中间,甚至在高级军官中间做部分工作。有受了委屈的将领,有在前次内讧后只剩下司令部的将领。这样的将领在那些已转归该省新军阀指挥的军队里都有自己的同志,他在等待机会,重新与自己的同志们联手夺回失去的部队。

所以在高级军官中间有许多材料,这些高级军官,只要能巩固自己的地位来对付其他将领,不反对在任何人当中寻求自己的同盟者。在这种上层中间的工作就叫做上层路线。

中国同志就是这样划分了下层路线和上层路线。

我们不应该嫌弃做这一部分军官的工作。这种工作主要是外交工作,这里的问题将是,我们有多大本领接近这部分军官,我们有多大能耐向他们表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好处。

不过,这并不是工作的主要部分。许多同志醉心于这种工作,因为这种工作似乎注定会取得巨大成绩,因为一个军官代表某一个部队讲话,你就会开始考虑那个部队具有团和师的规模。在基层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在士兵群众中建立支部,乍看起来,似乎不会取得很大的成果,所以同志们都想放弃我们工作中的这第二个主要部分,而恰恰是这部分工作会导致士兵群众的分化,会造成长

时期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的、很快消逝的结果。

当党要求无论如何要尽快支援在江西作战的红军时，而这种支援应该来自中国白区的所有其他部队，这时只走上层路线的机会主义做法就很突出。所以那里的同志们放弃了白军基层的工作，都去直接研究白军部队上层可能存在的倾向。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与 19 路军的关系。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与孙殿英已经建立的但没有坚持到底的关系，孙殿英曾经拥有一支 4 万人的军队，驻扎在北方察哈尔附近，这支军队几乎同日本人发生了接触并从那里向宁夏地区运动，其目的，如孙所说，是让自己的军队经过山西去同四川红军联合。这是 1934 年初的事情。为了进入中国腹地，避免与山西阎锡山军队发生冲突，孙殿英试图进入宁夏，但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帮助，他曾经向共产党组织提出请求：“在这件事情上能否给以帮助，因为我有意与四川红军联合。”

这里有许多冒险的东西。可能，也有来自日本人方面的奸细活动，他们也插手了这件事情。事实是，在中国的条件下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个将领在试探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渠道，并力求与之达成协议：“请向我的部队派遣共产党的力量来教育我的士兵。”

孙殿英也是这样做的，冯玉祥在 1934 年^①也是这样做的。冯玉祥就说过：“如果你们能够提供什么什么，那我就可以在某一个时期拉出一支 5 万人的军队，而为证明，我是诚恳的，你们可以向我的部队派政治委员、政治领导者，让他们来教育我这支部队。”

所有这些关系取得的成果几乎微乎其微，原因是那些被委托做这项工作并与这位将军建立了联系的同志只呆在将军的大本营里。在大本营里他们被逢迎讨好所包围，没有可能接近士兵群众。曾经向他们许诺，他们将做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但当他们置身于白军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33 年。

的营垒时，他们几乎成了俘虏。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被俘，但他们受到如此的逢迎讨好，为他们举办没完没了的宴会，他们完全被吸引开了，根本没有可能做自己的事情。需要这样的同志具有坚强的共产主义毅力，因为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志有时受到了这类将军的影响。

经验证明，在中国的条件下不能只走上层路线，即使我们开始做上层路线的工作，那也务必在基层做工作。这种上层路线只有作为对基层工作的一种补充，才能取得某种成果。不过，为此需要严格区分这两种路线。

那些正式或半正式在白军部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同志，不应该再做组建地下支部的工作。这项工作应该委托其他同志去做，做上层工作的同志甚至不认识他们，以避免这两条路线的交叉。

在中国的条件下，还会遇到一些自由主义者、左的“人士”，他们吹嘘说他们曾经是共产党人。他们因种种行为被开除出党，但他们又作为某一个将军的政治顾问而抛头露面，看到自己的保护者必然要失败，他们自己就在共产党组织中寻找老关系。这都是些危险分子。

被开除出党的以前的共产党员，正在党内，特别是在北方的党组织内寻找老关系，他们可能成为自觉或不自觉的奸细。这就是说，如果党组织委托某人去做上层路线的工作，那么就要求他尽可能远离在白军部队司令部工作的所有这些过去的共产党员，应当派遣一些新人去做这种工作。

在北方对孙殿英的军队或者冯玉祥的一些部队还没有开始做下层工作；当上层路线的工作再不能继续下去的时候，也就是与将军们发生了误会，不得不放弃这种上层路线的时候，这时，就只有在下层，特别是在教导支队建立一些支部，而这些支部是曾在上层做工作的同志所不知道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将军开始改变上层路

线,那么,基层即地下党支部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是举行起义、脱离白军部队,还是继续留在这支部队里?对这种问题的回答有时必须相当具体,是还是不是。

问题在于,如果支部在这个阶段发动起义,他们未必能把该军的大部分部队拉到自己方面来。时机不成熟的起义,比如说,使一个连队脱离原部队,不会有很大的效果。虽然这是白军部队总瓦解的一个很好的标志,但是举行起义的、经过起义转入游击队状态的这个连队,很快就会丧失自己的生存能力,因为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这样的一些地区,在那里农民运动还没有发展到应有的水平,农民对白军部队一般都不很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不信任就会转嫁到已经分离出来的部队身上。此外,从白军分离出来的正规部队——连或营的战术、整个生活都不适应游击队的要求。这种分离出来的部队很快就会丧失继续生存的能力,并且开始瓦解。一些人回到自己原来的军队,一些人分散在各家各户,只剩下少部分毫不妥协的人在继续斗争。

如果这种哗变发生在大城市附近,那么,这些部队很快就会远离城市进入农村地区,以避免被追击。他们在30到40公里,有时在100公里远的地方停留下来并开始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在这里他们与追击的部队进行战斗,城市周围的形势还没有成熟到他们能够作为游击队长期继续存在下去的程度。

通常,如果我们听到某一个连队哗变了,脱离了原来的部队,那么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再也听不到有关这个连队的任何消息了。

在这样的部队里纪律性并不特别强;要生存嘛,所以就开劫居民。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还不能把工作做好。在多数情况下,部队中的这种小规模起义都不会有很大的效果。

因此,共产党组织要尽可能比较长时间地阻止这种小规模的分​​离倾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党组织要建议他们留下来,更好地加强自己的地下网,在其他营和团发展地下网,以便一旦形势成

熟,真正能发动起一支巨大的力量。

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点特别与那些驻扎在靠近华东地区的部队有关系。至于四川、甘肃及西部其他边区,白军部队的起义及分离,哪怕一支小分队,都有成功的机会,因为红军离他们不那么远,在需要的情况下他们不必为自己打开一条通向红军方面的道路。

这种部队不应该指望长期孤立地在那种无法获得援助的地区生存。在西部他们离强大的红军部队很近,他们可能就驻扎在距离红军部队五、六天行程的地方,因此,这里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我想以此说明,不一定在所有省份都一样地执行这个原则,也就是说,不一定都不发动白军小规模的变化。如果一支部队离红军比较近,那么,可以而且也应该让他们游行起义,即使是一支小部队,并把它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因为很多这种情况对白军前线的其他部队都会起到瓦解的作用。

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同 19 路军打交道的例子,并想指出我们在瓦解敌军工作中的强弱方面。

我们开始仔细研究上层路线,即我们迫使 19 路军司令部同我们和解并接受一定的条件。然而,既然有了一个正式的协议,既然 19 路军以要求我们不干涉该军的内部生活为条件,也就是我们不要去瓦解它,所以我们需要有辅助性的战斗力量,我们就没有整编这支部队。

但是福建的共产党组织是否应该得出结论:它必须承担红军司令部承担的那些条件呢?从这种情况中得出,共产党组织应该直接在 19 路军中认真做下层路线的工作。可是没有这样做,这里过分热衷于与司令部的谈判,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果红军的共产党组织或者红军某个部队的政治部在战斗过程中和在前线情况下,针对某个部队作出某种决定,那么这种决定不应该对后方或白军驻扎地区的地方共产党组织有约束力。

现在我来谈谈工作方法,主要是关于瓦解敌军的方法,也就是

为瓦解敌军创造前提的方法。这里我要说说从基层建立我们的秘密机构问题。

第一个要求是，调去做这项工作的同志是那些被调去与敌军司令部上层人士谈判的同志所不认识的。

第二个要求是，调去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在当地的党组织中不应该是很有名的。党组织一般都是从其他地区抽调一些同志去做这项工作，这些同志来到这个新的地区工作，就不要再做任何其他工作，不参加任何大型集会，不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也就是说，他们不在党组织中表现出积极性。他们只为该省党委中一两位同志认识，他们单独向这一两位同志汇报，向他们报告情况并要求出主意和给予帮助。

整个省委不应该认识这些同志：

这是党的工作一个特殊的领域。被调去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应该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即便脱离了党的工作也不应该影响他们的共产主义坚定性。

需要有所了解白军部队生活的同志。可以选用经过足够考验的原军官或过去的士兵，至少是了解白军内部生活的人。也许有工人共产党员也了解白军的生活，但最好是抽调了解白军部队内部规章制度的人。

一个同志在着手做这项工作时，应该很好地研究自己的工作对象，并且力争至少不是在一个支队，而是在几个支队有一个人。他不要企图个人与同一个支队中的几个人认识和联系。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要在机枪连和团的培训学校找到联系。他不找这个支队中更多的人，同他们建立联系。

他在有计划地安排自己工作的时候，要选择这样一些支队，从那里他最有机会进一步扩大地下网。就拿那个团的培训学校来说吧。

在那里经常会见到普通职业兵，他没有别的生活，因为他已经

连续当兵几年了,他通常是个文盲,是一个失去自己阶级属性的人,一般你不可能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很坚定的工作人员。

进入培训学校的另一类人——是军士,他们在毕业之后可能被提升为下级军官。他们是有文化的人,是城里人,他们中间还可能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为在中国的城市里高等教育比较普遍,而失业率又很高,于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在军队中出现了。他们将被培养成指挥员,通常在那里要比在部队里更好结识革命分子。

你们知道,广州的教导团在广州起义^①的时候,完全转到我们方面来了,并且在广州的战斗期间成为一支最主要的力量。在冯玉祥部队里,师培训学校中的共产党员占30%—40%。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学校里建立了支部,那么,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学校的毕业生将会担任下级指挥员的某种指挥职务或下级军官职务,他们将在各支队中工作。

因此,如果我们正确地挑选最初的对象,那么这将有助于我们联系网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我们要选择那些在中国军队中具有很大分量的支队。在中国的条件下,这就是机枪支队。如果着手工作的同志在团或师的培训学校中找到了一个关系,在机枪部队中找到了另一个关系,那么,他今后就不要再去寻找另外别的关系了。而与他有联系的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支队中建立自己的联系网。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联系网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是与你们联系的那个人,他又联系几个支队。然后,这个人组成一个三人组。这三人中的每个人又同样联系三个人。这样我们就构筑了联络图,也就是说,在第一层中有第一个三人组,而在第二层中你们就有三个三人组。一个人所认识的不超过三人,也就是说一

^① 指1927年12月11日至13日在广州的起义。

且遭到破坏,那么这次破坏也不会波及整个部队和整个联系网,它只限于三个人的范围内。

我们在构筑自己联系网时,始终应该从有人会出卖的这一点出发,如果有人出卖,那么无论如何也超不过三个人。

在大体上建立了这样的网络之后,另一个同志,即地区组织者的助手,就应该根据组建工作的进程,在那些支队中建立自己的联系网,即组建备用网。这个备用网不与已建立的网交叉。它可能只是偶然地交叉,但谁也不知道这种交叉,这种规定作为一个原则应该遵守,要组建备用联系网,但不要交叉。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建设联系网是需要时间的,在要求迅速进攻、很快取得结果的条件下,这个原则常常会被破坏。但是我们将大致知道,它会被破坏,而原则上我们将努力建立这样一种在遭到敌人破坏情况下能保证处于隔离状态的联系网。

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是我们在白军部队中的联系网的主要骨干,它在群众工作中不直接暴露自己,也就是说,这个骨干继续秘密地存在到底,甚至存在到该部队在起义前的一些重大事件均已成熟的时刻。基层支部应该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同情我们的群体,这个群体是经过未加入我们主要联系网的这些基础支部做了工作的。比方说,在我们支部的两三个环节上有三人组,三人组中的一个人将是群众领袖,但我们自己不组织这些群众加入地下支部。一个连 30%—40%的人,我们做了工作,他们同情我们,但群众只知道这个联系网中的一两个人,因为他们是提出这些经济要求的发起人(这些经济要求涉及指挥官克扣的军饷的发放)。这些人也是提出日常生活要求的发起人,这种日常生活要求常见于军营中,经常以激烈争吵的形式表现出来。

你们只有在关系到士兵直接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与士兵群众建立了联系之后,才能开始转入政治行动。在这里大致同罢工时期的做法一样。我们不能直接走近工人群众对他们说:为了共产国

际请举行罢工吧。这里需要具体的口号,要说明百分之几的工资被克扣了,有多少工人被工厂解雇了。

我们在白军部队中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应该在士兵生活周围建立一个积极分子群体,这个群体今后在我们的领导下逐渐走上政治轨道。

地下工作的条件在中国各部队中是不一样的。严格的三人体制作为一个原则,应该在那些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的地区贯彻执行,因为这种白色恐怖可能会消灭我们的一大部分联系网。在其他一些部队,比方说,在西部和西北部并不需要这种严格的联络图,因为这种联络图是长期使用的。在那里可以比较快地取得效果。

我们已经有了在中国一些部队中的工作经验,当我们的两三个同志已经工作了几个月并且找到了与这支部队的共同语言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建立联系,并在不建立这种复杂的联系网的情况下确实能把这支部队拉到我们方面来。

我们在建立联系网的时候,应争取有什么呢?

首先,至少要有三个起点:团训练队、司令部,以及形象地说,武器弹药库的钥匙,也就是要抓住主管武器仓库的人。

在机枪部队中有集中掌管武器的人。我们之所以需要团或师训练队,是为了发展工作人员的联系网。我们之所以需要司令部,是为了知道白军部队将要采取什么行动。我们需要武器库的钥匙是为了准备起义。如果某一支部队决定离开,如果一个营举行起义并离开这个部队,那么它不仅要带走它自己拥有的武器,而且还要带走仓库里的武器。

这就是党组织的某些机关正在做的,或者至少应该做的这种粗线条的工作。

不是在所有省的组织中都做到了这一点,你们培训的同志都需要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因为他们可能会涉及这方面的工作。

来到某一个地区的党的工作人员,如果他是当地组织审查

过的一位十分坚定的革命者，通常他将接受在白军中组建这种联系网和建立联系的任务。那些领导过这项工作的同志，今后在该部队起义、脱离白军或投向游击队的情况下，就成为该部队的领导人。他们已经拥有经他们培养出来的组织的骨干，他们是该部队的指挥员。任何人对他们的权威都不会提出异议。

不过，总会有自发的情况出现，尽管我们不希望该部队采取行动，因为为时尚早，但是该部队还是可能采取行动。在一个连或一个营出现这种情况，这支部队要离开，我们还是不应该暴露我们在其他支队中的联系网。换句话说，我们的整个联系网不能随着白军一支部队的离开而撤离。其余的工作人员要留在自己的支队中，继续做这项工作，以便今后发动其他支队起义。

我们的联系网应该怎样对待将在上层进行的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正在建立的联系网是在这样的部队中，该部队的指挥部允许我们正式教育工作者在那里进行工作，我们的联系网应该怎么办？我们的联系网是否应该公开自己，是否应该成为士兵群众积极活动的发起者，是否应该在政治课上和在那里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网络对此不要作出反应，也就是说，不要以此来暴露自己，以便不使这两条路线合到一起。联系网要关注它所发动的积极分子群体成为白军部队中这种新潮流的体现者，让宣传鼓动者和政治指导员进行自己的工作。

北方的一些军和师中的上层路线失败之后，支部保留至今。我们现在可以准确地说出有多少人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们在继续工作。现在的形势不允许在那里发动小规模起义，一些支队也不能脱离部队。

如果我们想把这项工作与总的运动联系起来，那么为支援这个领域的工作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我们的党组织需要做其他部队的工作，需要在该部队驻扎地区的农民当中做工作，以使周围的农民群众在白军部队举行起义

时已经做好了准备,使举行起义的白军部队能够找到已经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农民组织并与它们建立联系。当这支部队从白军中分离出来的时候,重要的是使它很快增添农民成分和工人成分,不让这支部队继续作为原来某团的一个连或一个营存在下去。应该尽快以注入新的革命农民成分的方法来改组这个组织。换句话说,甚至需要拆散自己的组织,因为一些人总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进行战争,不去联系农民,过着孤立的生活,并成为我们组织内的一个特别的机构。不应该允许他们这样做,任何时候都不能让分离出来的白军部队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即作为原来的营或连继续存在。

可能会觉得,这种支队的战斗力会减弱,因为没有武器没有经验的农民加入进来了。然而,这只是一种感觉,因为该支队作为一支革命部队,其战斗力只会因此而增强。

带有 130 支步枪的一个连经过两天就扩大成为拥有 500 人和仅有 130 支步枪的一个营。具有这种组成成分的部队比较容易完全武装起来。

本可以提出许多此类细小的指导意见,不过,总的原则通过这个讲述好像你们是清楚的。不是在一切情况下我们都想直接发动起义。我们要通过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来做工作。在中国到处都可以提出革命的口号,甚至在那些有法西斯主义中层指挥人员的部队中,即在蒋介石的部队中,都可以提出革命的口号。

在比较这项瓦解敌军工作的可能性时,我们应该说,在蒋介石的部队中做工作,要比在所有其他中国军阀部队中做工作更困难,因为蒋介石的防御组织,即他自己军队中的反侦察组织、他的军事工作人员,是防止我们渗透的相当强大的工具。这种体制应该坚持到底。如果我们不遵守这种体制,那么反侦察组织很快就会发现我们。

至于其他军阀部队中的机构,它们那里没有秘密防御机构,或

者这种机构很不发达。

在预见未来战役的时候,红军正是为了这项工作向今后将要实施战役的地区派遣由两三人组成的小型支部。在向蒋介石部队的驻地派遣人员时,需要预见该部队运动的方向,它将在什么地区停留,以便预先向该部队将要驻扎的地区派出支部。

最后还需要说明,红军的党组织不仅应该通过前线派遣这样的工作人员,而且前线那方面的地方党组织也要为红军的工作做补充,在后方对敌军部队做类似的工作。这样一来,这支部队就会在政治劝说攻势下和我们秘密联系网的渗透下被攻下,这种秘密联系网不仅有前线红军方面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后方党组织的。

速记员 沙波瓦洛娃
打字员 帕夫洛娃

全宗 532, 目录 4, 卷宗 263a, 第 76—93 页。

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 副本。

325

米夫给斯大林的信

1935年4月19日于莫斯科

绝密

亲启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王明和康生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完全可以信赖的同志)很想和您谈谈并聆听您就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战斗有关的一些问题提出的建议。

请告,您是否有时间进行这次谈话^①。

致共产主义敬礼!

米夫

全宗 495, 目录 154, 卷宗 550, 第 81 页。

手稿。

① И. В. 斯大林的答复没有找到。

326

切尔诺莫尔季克和 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5年4月26日于莫斯科

秘密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最近几天“老头子”^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的代表就要抵达莫斯科。最近一年来驻上海的中央机关几次暴露，甚至整个机关(30人)又彻底暴露^②，因此，有必要对“老头子”的活动进行调查。

我们认为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是必要的，该委员会可以了解国际联络部所有涉及他的整个工作^③的材料。

(切尔诺莫尔季克)

(米夫)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451，第 107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H. H. 格伯特。

② 指 1935 年 2 月 19 日以黄文杰为首的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工作人员以及上海和江苏省党组织的工作人员被捕。

③ 原文如此。

32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450(B)号记录 (摘录)

1935 年 5 月 5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6. (7301)——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近期停止在上海出版合法的反帝机关报并立即召回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的建议^①。

决定:6. ——通过。(1935 年 5 月 4 日飞行表决:皮亚特尼茨基、季米特洛夫、库西宁、克诺林、曼努伊尔斯基、哥特瓦尔德、里希特、王明、布龙科夫斯基、艾尔科里^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附录]

米夫、王明和康生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信
致政治委员会^③

① 见附录。

② П. 陶里亚蒂。

③ 在文件上有飞行表决参加者的签名,П. 3. 曼努伊尔斯基预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写道:同意,但我建议追究那些推荐如此轻浮的同志担任此工作的人的责任;Г. 季米特洛夫——“调查!”

根据 1934 年 4 月 3 日政治委员会的决定[第 367(B)号记录]^①,为出版反帝机关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被派往上海^②。

现在我们获悉,由史沫特莱制订的并已交给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人科尔萨科夫^③同志的这份报纸的出版计划,在科尔萨科夫遭逮捕时已落入警察的手里,警察已将该计划的照片寄给各领事馆。在这种情况下出版该机关报已经不可能了。此外,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违背我们的指示,开始会见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国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由于警察很了解她,并且在对她进行密切的监视,所以根据她的行踪,一些外国同志和(通过他们)一些中国同志可能会暴露。

因此,我们建议以征询意见方式作出以下决定:

- (1)放弃最近一个时期在上海出版合法反帝机关报的计划;
- (2)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米夫
王明
康生

[19]35年5月4日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348,第 3、6 页。

记录为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附录为 II. A. 米夫的手稿,王明和康生亲笔签字。

① 见第 247 号文件。

② 这里指的是恢复出版《中国论坛》一事。

③ 黄文杰。

328

贝克^①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

1935年5月9日于莫斯科

总的日程报告^②

1934年4月1日我离开纽约,带着指示前往上海,要在共产国际代表^③的领导下做红色工会国际系统的工作。我于1934年5月2日到达上海。基奥尼格去接我,第二天他让我认识了艾尔文^④。在让我认识埃韦特之前,艾尔文和基奥尼格预先告诫我,同埃韦特和米尔顿^⑤交往要很小心,因为他们对秘密工作的规定采取了轻率的态度:他们酗酒,几乎每天都互相拜访,即使没有特别的必要,并且建议所有新来的同志也这样做。第二天我会见了埃韦特和米尔顿。在讨论了总的形势和我的任务之后,他们告诉我,在我到达之前他们参加过很多不允许的活动,不过这些活动已经停止。然而他们在这次会面和在其他场合都喝了很多酒,有一次,米尔顿明显是在喝了烈性酒之后来到埃韦特家里的。我会见过他

① 作者是根据文件内容和德文稿上的标注确定的:杰克[P. 贝克],上海。该文件德文稿于1935年5月15日发给A. JI. 阿布拉莫夫。

② 该文件的英文原件由一些片段组成,没有统一的页码编号。在译成德文时根据叙述的逻辑对文件进行了重新编排。这次发表时保存了德文译稿的编排(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831,第96—117页)。

③ A. 埃韦特。

④ H. H. 格伯特。

⑤ T. 赖安。

们三四次,根据与他们的商定,我大约是在5月15日前往菲律宾群岛的,6月中旬左右回来的。回到上海后我被告知,埃韦特要被召回,他很快就要动身。但是他在被召回之前租了一套新住宅并坚持让我租用。我征求艾尔文的意见,他劝我拒绝。我没有租用这套住宅,于是埃韦特把它转给了米尔顿。

在我要前往菲律宾的时候,菲律宾共产党书记^①正在上海,他是应米尔顿较早时候的邀请来上海的,看来,我在中国开始工作之前协商我去菲律宾出差一事的时候忽视了对菲共书记的邀请。米尔顿和埃韦特建议我在菲共书记返回马尼拉之前同他谈谈。此事发生在米尔顿和书记受到警察监视之后,而这个情况我只是在米尔顿离开中国前的几个星期才知道的。我和米尔顿一同前往菲共书记下榻的宾馆会见了。经过两个小时的协商后,我们乘小汽车离开了,我大约是在半路上下了车,随后这辆小车一直向米尔顿家的方向开去。

几天之后,艾尔文告诉我,中国的同志准备与我会面。6月20日或21日艾尔文第一次带我去见中国同志(米茨凯维奇^②、梁[朴]^③——中华全国总工会总书记^④和他的事务秘书^⑤)。在这次会面中我们约定下一次会面在6月26日。但是6月26日在那所房子里已经有了警察,鉴于回答我两次电话的人是用中文而不是按约定的那样用英文,我就没有走进那所房子,从而避免了被捕。我想强调指出,我是从街上打的电话,而不是从自己家里。与此同时发生了党和工会的许多同志的一系列被捕事件,其中包括斯拉

① K. 埃万赫利斯塔。

② 盛忠亮。

③ 饶漱石。

④ 原文如此。时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主席——译者。

⑤ 可能是马纯古。

文^①。此后,我与党的所有联系停止了一个多月。埃韦特、米尔顿、艾尔文和我开了一次会,经过短暂的讨论我们得出结论,发生这些被捕事件不是由于间谍的活动,就是由于党本身的粗心大意。我基本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我在上海只住了几个星期,自己觉得没有足够的把握提出别的想法,特别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接到党分析这些逮捕及其原因的报告。大约过了一个月,艾尔文告诉我,基奥尼格已经被警察盯梢,他的家也受到监视。基奥尼格被隔离了,后来才放他回去。

在这之后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艾尔文告诉我,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总书记梁朴没有被捕,准备见我。我们商定,让格尔曼^②同志租一栋属于外国人的房子,他这样做了,直到10月底米茨凯维奇被捕之前我都是在这栋房子里与梁朴会面的。又是约有一个月时间,我与梁朴也中断了一切联系。这期间,除了6月20日的唯一一次会面外,我再没有见过米茨凯维奇。在格尔曼的家里我还会见过一位中国同志(前[中国]共青团书记^③),他应该是接替梁朴。我和他见过两次面,此后改变了原先的决定,梁朴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而来自[中国]共青团的那位同志被派去做党的工作。大约在10月中旬我收到报告,说警察已经知道米尔顿的名字,掌握了他与菲律宾通信的笔迹和他寄往菲律宾的信件及回信的复制件。我与艾尔文讨论过这个问题,并决定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应该由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米尔顿,并建议他销毁自己的文件,立即离开中国。然而,米尔顿坚持认为,在离开之前他应该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因此他把动身时间推迟了几周,直至收到这样的指示。我为他安排了几次在街上的简短会面,为的是向他提供一些补充信息、路

① 李竹声。

② Г. 吉布列尔。

③ 何人不知。

费并帮助他扔掉他的文件、列宁书籍等。在这种特别危急的形势下,从种种迹象和已掌握的情报来看,只有艾尔文和我没有受到来自警察方面的怀疑。我们一周见一两次面,商量和讨论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我们会见的途径和认真伪装的方法,以避免被盯梢。正是在这个时候,“莱斯特”医院发生一起杀人案件,此案导致党的战斗机关工作人员的接连被捕,几天之后,米茨凯维奇及其他人被捕,失去了电台。在讨论这些被捕事件时,我们弄清了其原因是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同志^①的背叛行为所致,党命令消灭此人。此人实施一次未遂谋杀之后,在“莱斯特”医院里被杀死。很明显,在“莱斯特”医院里发生那次事件之后,警察力量全部动员起来,因此要求采取最大的预防措施,诸如停止一切会面和上街。显然,这种预防措施中有些被忽视了,因为一些同志是在街上被捕的,最后,无线电报务员^②去米茨凯维奇的家,在那里他们两个人都被捕了。这些情况使我们相信,这次暴露是由我们影响和控制范围之外的情况引起的。在米茨凯维奇被捕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艾尔文通过科尔萨科夫^③又恢复了与党的联系。科尔萨科夫建议我在通过格尔曼为我们租到的一栋属于外国人的新房子里继续与梁朴会面,而第一栋房子在米茨凯维奇被捕后不得不放弃。这栋新房子在11月初开始发挥作用,在我们没有获悉警察已经知道格尔曼的名字之前的两个月期间,我继续在那里与梁朴会面。当我们弄清楚,警察是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时候,我又中断了与梁朴的会面。我们回忆起来,在基奥尼格开始被警察监视之前,他与格尔曼见过面并去过他住的宾馆。此后格尔曼告诉宾馆管理人员,他要回英国,而实际上他迁到法租界内一套带家具的住宅(他的那个

① 何人不详。

② 何人不详。

③ 黄文杰。

宾馆位于国际租界地区)。米茨凯维奇被捕后,他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住宅,迁往另一个住宅,他对房东说,他要离开这座城市,而实际上是迁到租界另一个边远地方的一套新住宅。我们得知关于格尔曼的这个消息后,他又在上海呆了一个月,直到租期结束;他尽了一切可能来查看对他进行监视或盯梢的迹象并让我们相信,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几个星期之后,在我们还没有租用这套属于外国人的新房子之前,我在大街上,在运动场上和在属于中国人的两座房子里继续同梁朴会面。在后来租用的新房子里我与他见过两次,当时米茨凯维奇还没有被捕,梁朴的处境也没有那么危险,我去一座属于外国人的房子拜访过他,他在离开前一直住在那里。

在10月下半月,或许正好是在米茨凯维奇被捕前夕或之后,威廉^①来到了上海。他在与艾尔文和与我会面时说,已经给艾尔文下达了在中国休假两三个月的指示直到收到进一步的指示,而且他十分明确地强调说,他不知道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他们两人来到我这里并且询问,我能否会见科尔萨科夫,因为艾尔文即将动身去北京^②,而威廉没有翻译无法与科尔萨科夫交谈。我接受了这一建议,因为我想和科尔萨科夫讨论几个工会问题,还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威廉处事很不谨慎并且还有一些别的缺点,我担心,他的这些缺点可能会有损他的名誉。大约在12月我开始每周都与科尔萨科夫见面,直到2月20日他被捕,我一直这样做。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大约在9月抵达上海,据报纸报道,她躺在医院里。1月初她给我们寄来一封信^③,要求会面。我拒绝了,但她继续来信要求会面。我与威廉协商后决定,让格尔曼在离开

① B. 弗洛赫。

② 原文如此。在这里和下面应为:北平。

③ 信没有找到。

中国前两天去会见她。格尔曼见了她。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试图使他相信，她可以去几所中立的属于外国人的房子，在那里完全可以安全地同她会一两次面，并给了他地址。她告诉格尔曼，她没有钱，她想根据与皮亚特尼茨基达成的协议，和某个人讨论自己的计划。我同威廉·艾尔文和科尔萨科夫讲了这件事，他们都同意让我去同她会一两次面，但是要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科尔萨科夫关心开始出版报纸^①的事，早在8个月之前被指定做这项工作的两个同志^②应该和她联系。同时他想向(中央)局^③提出她的报纸出版计划。我在缪勒的家里见过她两次。第一次会面时，我们从总的方面讨论了她的工作，而在第二次会面时，她把关于她出版报纸的计划交给我并让我转交给(中央)局。此后她就去了北京。她在北京的时候，2月20日、21日和22日发生了逮捕事件，这期间科尔萨科夫与30或40位同志一起被捕了。逮捕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得知，在警察搜查的一所房子里发现了她的工作计划。

在科尔萨科夫被捕之后，我们得知他的确处在被捕人员之列之前，我曾与梁朴见过面，他对我说，他家周围受到了严密的监视，有人通过靠近他家的运动场在监视他、他的通信员^④和秘书^⑤，他要离开这栋房子。那天晚上他就去他秘书家了，过了两天在我们定期会面时他对我说，因为那栋房子的位置不好，他不能在那里住下去了，而由于警察提高了警惕又不可能找到另一处住所。我建议他务必离开这个国家，在动身之前要住在属于外国人的房子里。然后我就去了缪勒的住所，告诉他，我在他那儿会见过史沫特莱，并请他暂时让两位中国同志住在他家里。他同意了，第二天我把

① 报纸的名称不详。

② 何人不详。

③ 在这里和下面指中共上海中央局。

④ 何人不详。

⑤ 可能是马纯古。

梁朴和他的通信员带来了,党给梁朴配的通信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①。他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直到史沫特莱回来,我把那个姑娘留在那里做“阿妹”^②,把梁朴带到另一处。过了一星期,梁[朴]会见了[党上海中央局]新的代理书记并且获准离开这个国家。这期间我与艾格尼丝商量过关于通过塔斯社记者切尔诺夫同志(她与切尔诺夫同志保持着联系)获得苏联签证和前往海参崴船票的事宜。由于轮船的耽搁我把梁朴两次带到两处属于外国人的房子里,他大约从2月25日一直住到4月10日。就在我把梁朴带到缪勒家里的那一天,我收到了离开中国的指示。我立即销毁自己的文件,把与党保持联系的关系交给了威廉,没有会见过新的同志。

我没有可能与什么人商量,就把梁朴同志转移到属于外国人的一栋房子里。我觉得必须迅速做这件事,并且我自己承担责任这样做了。我还知道,在这两栋属于外国人的房子里全是我不认识的人,我只有史沫特莱的担保,同时我深信,在那个时候让他去寻找住所,就意味着他肯定会被捕,他的秘书也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一次严重地违背了秘密工作的规则,完全独立地采取了行动。

在上述日程报告中我省略了一些重要事件的许多细节,我打算再单独讲一讲。

关于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儿离开中国的问题,我只能说,我在2月26日才接到2月14日发出的关于让我离开中国的指示。我并不是随心所欲行动的,因为我完全相信,警察还不了解我,大概对我也没有进行监视和跟踪。

① 何人不详。

② 保姆(汉语)。

至于我妻子^①与军事机关的林科利因^②接触的问题,那是我在马尼拉的时候,她被叫到埃韦特的家里打印几份关于菲律宾形势的报告。那一天林科利因来访埃韦特,并且被介绍与她相识,她在11月前再没有见过,那时候林科利因拒绝再与艾尔文见面,但他想归还存放在他那里的钱。通过艾尔文他四次指定了在街上与她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且交给她三包钱和一些报告。最后一次,他请我也参加会见,因为最后一包钱很重(约有5万中国元)。这是我与他的唯一一次见面,持续约10分钟。

关于威廉同志

威廉同志来到上海大约是在1934年10月。在他到达不久,根据他的要求,他、艾尔文和我在我家里会了面。艾尔文建议我们共同发一份电报,说艾尔文不需要休假,而应该留在工作岗位上或者返回莫斯科。威廉坚持让艾尔文去休假并等待进一步指示。在后来的私下交谈中威廉暗示,艾尔文已被解除工作,但我表示怀疑,因为艾尔文并没有被召回莫斯科。过了一段时间,艾尔文交出了自己的全部文档,就去北京了,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然后又回到上海,为的是了解是否有进一步的指示,之后他又去了北京。过了几个星期他又回来了,他想去香港或澳门,并问我:鉴于中心要向南方转移,科尔萨科夫是否愿意讨论他的南方之行。科尔萨科夫同意了,艾尔文会见了他,然而他并没有去南方,因为他接到了返回莫斯科的指示。

在艾尔文动身去北京前,他^③和艾尔文来见我并询问,我能否暂时承担与党保持联系的任务。我表示同意,条件是征得科尔萨

① 刘仲华。

② 何人不详。

③ B. 弗洛赫。

科夫的同意,征得科尔萨科夫的同意后,我开始定期进行会面。我每星期在与科尔萨科夫每次会面之后都与威廉会面,有几次是为了替林科利因转交钱和报告。在会面问题上从一开始我就同威廉遇到了困难。他坚持要在我家里会面,而这是我尽可能想避免的,因为他总是把会面拖得很晚,说话声很大,而且我有理由认为,他根本不遵守有关不可经常往来和利用出租车的基本规定。当我们约定在咖啡馆见面的时候,他几乎经常迟到,在那里坐很久,还建议在主要街道上散步并企图和我乘坐同一辆汽车。在转交现金时他就在咖啡馆里数钱。他经常讲述他如何与报务员一起度过夜晚,试图搜索到莫斯科,并建议我会见报务员并和他讨论技术问题,我拒绝了他的建议。当我对他说我牙痛的时候,他就让我去他自己的牙科诊所,并许诺治疗牙齿只收半费,他自夸地说,从前曾在中东铁路工作过的一位牙科医生^①是他的合作伙伴,他为此人购置了最现代化的设备。他还建议弗丽达[杰伊温]去那里治疗牙齿。在1月最后一个信使^②来到的时候,他又劝她去他的诊所治牙。我在这位姑娘的家里会见了梁朴并意外地得知,在她的牙齿基本痊愈之后,她也常去他的诊所。为了避免被指责反对威廉,我没有制止她。我还知道,威廉也去她家,可是我无力制止他这样做。他告诉我一个新的报务员^③到来的消息,我警告他要远离以前的报务员,而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一起出现在街上或戏院里。艾尔文曾经向我讲述过,有一次,他在咖啡馆里偶然遇见了威廉、两个报务员和埃恩斯特。最后,我害怕与威廉见面,因为他总是以轻浮的态度对待特殊的预防措施。我定期地向他通报了自己与科尔萨科夫的所有谈话、工会工作的进展情况,但是我避

① 何人不详。

② 何人不详。

③ 何人不详。

免与他进行任何政治争论,因为他关于中国革命、德国等论断既有明显的失败主义情绪又肤浅。在征得他和科尔萨科夫同意的情况下,我最终去会见史沫特莱,当时他请我从她那里弄几个通信地址。我同意了,条件是史沫特莱要许诺永远不使用这些地址,也不去访问这些人。在他接到关于禁止他同她会面的指示时,我已会见过史沫特莱两次,同时发来了召我回去的电报^①。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逮捕事件,我设法让梁朴躲在我与史沫特莱会见的那栋房子里。威廉经常打听这个地址,但是我拒绝告诉他,因为我想利用这个地址作为工会通信联系的备用地点。他在交给我召我返回莫斯科的电报时对我说,莫斯科从来不说明这样做的原因,因为莫斯科总是这样做,他举了艾尔文休假的例子,并且问我,是否想执行这个指示。我回答说,我执行,而他又向我讲述,他如何受到委屈,他的家庭如何受到不好待遇。他实际上是对我说,他相信他的家在莫斯科生活并不会比在希特勒德国幸福,如果他把家留在德国的话。当然,我反对他进行这样的比较。我问他是否得到了取得苏联签证的暗号和为梁朴办理签证的可能。他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我去见史沫特莱,请她通过切尔诺夫办这件事。

恰巧在我动身的前夕和在我安排了他与党的代表(通过梁朴)第一次见面之后,艾尔文通知我,有三个中国人跟踪威廉,而要摆脱他们,威廉感到相当困难。因为我要在第二天去见他,为了观察是否有人跟踪他,我就提前来到会面地点。他来了,没有带尾巴,我在咖啡馆里注视着他。在我没有询问他之前,他只字不提被跟踪的事。他承认有此事,但是他说此事不那么严重。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会面,一周之后我就走了。我没有向梁朴讲过这件事,因为他也中断了自己的所有联系并准备动身。我继续与艾尔文会

^① 文件没有找到。

面,大约每周一次或者更少,而且威廉^①有几次和威廉一起来,并且总是征得威廉的同意。在最初的时期,艾尔文动身去北京之前,这样做是因为我要与科尔萨科夫会面和打算去南方。在他被召回后,我几次详细打听过艾尔文所了解的人和事,而这些人和事是我或科尔萨科夫所不了解的,因为很清楚,艾尔文工作了三年之后很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此外,我相信艾尔文在出去会面和返回时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缪勒

在我到达之后就等待史沫特莱到上海来。在斯拉文被逮捕之前,党的上海中央局就指定了两个中国同志^②和她一起工作。米茨凯维奇不止一次地打听过她是否到了。米尔顿告诉我,他接到了与她会面并和她一起工作的指示。我和艾尔文都表示反对,为此米尔顿就应该中断和我们的一切联系,但是这个问题在她到来之前仍处于未定的状态。最后,当她要求与我们联系的时候,我们认为在其他人员到来之前这样做是不行的。最后,当我确信她住在一栋安全的中立的房子里,并征得科尔萨科夫的同意后,我表示同意与她会面。科尔萨科夫对于开始出版报纸和翻译她的一本书^③感兴趣。在她去北京之前,我见过她两次,并且采取了所能想到的一切预防措施(几次换乘小汽车、公共汽车和人力车),而她使我相信,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在发生逮捕事件和她从北方回来之后,我大概见过她六次。上述会面是在两栋不同的房子里进行的。见面是为了给梁朴寻找更合适的住房,为他取得签证和船票,为了动身时的安全 and 我的签证及船票等事宜,以及确定与她接头

① 原文如此。应为:艾尔文。

② 何人不详。

③ 艾路妮丝·史沫特莱:《中国红军长途跋涉》,纽约 1934 年。

的备用地址和其他事情,以备一旦通常秘密接头地点暴露,与工会取得联系。

缪勒住在我与史沫特莱会面的一栋房子里。史沫特莱告诉我,缪勒是被德国共产党开除的布兰德勒的支持者,然后又讲到,1927年以前他曾在苏联驻上海大使馆^①工作过,她最后一次在上海住的时候^②见过他,现在他在为《消息报》和《真理报》撰稿。不久前他为请求恢复党籍去了一次莫斯科,但暂时还是被拒绝了。看来,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就靠他妻子的工资175上海元^③生活,他们花35元租了一套一居室的住房,没有佣人。史沫特莱不在的时候,我找过缪勒,目的是在史沫特莱回来之前让梁朴躲藏在他家里。最后,我同意把梁朴的通信员作为“阿妹”留在那里。这个姑娘按其年轻的外貌,很合适做这样的安排:她一部分时间工作,而早晨去上学。缪勒并不知道对她的安排:在学校里,工会的一个工作人员要与她见一两次面,而此人又要与工会执行局^④保持联系,他不做任何别的工作,直到党得到指示取消这种安排,或者有什么人来到并给通信员写一封商量好的信,说明在事先约定的地点与她见面。梁朴了解有关缪勒的所有这些详细情况,在研究了所有其他消息来源之后表示同意了,因此,当我们走了之后,这项商量好的工作仍然在进行。梁朴离开了缪勒的家,在缪勒及其妻子的陪同下乘坐出租汽车去赶晚上9点30分的轮船。我在轮船上见到了梁朴并把他送到他的客舱,因为委托来送他的同志没有来^⑤。

在船舷上我遇见了切尔诺夫并且认出来了,他就是1927年至

① 原文如此。指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

② 1932—1933年。

③ 原文如此。这里说的是中国元。

④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

⑤ 何人不详。

1930年我在莫斯科很熟悉的那位同志。在讨论关于梁朴、史沫特莱及其他人的各种问题时,他告诉我,他从莫斯科得到一个情报,说缪勒被怀疑与日本政府有联系。这个消息使我非常不安,我坚持要尽快核实这个消息。

我的工作方法和联系方式

我是作为“菲利浦·列维进出口公司”和“迪普石油公司”的全权代表来上海的。我随身带来了商品价格表、委任状和该公司^①驻菲律宾分部的介绍信。这些情况在我两次来这里的时候(第二次是6月份从马尼拉来的)都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过。在我逗留期间我收到了该公司的信函、石油样品等,以及800又1/2金元^②的银行信用证。在马尼拉的时候,我与菲利浦·列维兄弟^③相处一段时间,他对我编造的经历毫不怀疑并向我提供了给上海各种身份的备用介绍信,不过我从未使用过。但我也没有做这方面的什么买卖,因为这需要很多的钱、很多时间等等。何况我的护照给我提供了模仿中国文学艺术领域活动的可能性,因为我的职业是商人艺术家。

从我工作一开始我就认真地听取了艾尔文关于秘密工作的忠告,并且基本上遵循了秘密工作的大多数基本规则。每当我离开自己的家去别人家或者去会面的时候,我总是要消除踪迹,也就是说,一开始去剧院、咖啡馆或商店,然后从那里再去会面;我从不用自己的电话给某些同志或向某人家里打电话;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总是只就工作方面的事情同同志们会面,尤其是在6月发生逮捕事件以后的时期,那种逮捕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与

① 看来,指“迪普石油公司”。

② 原文如此。

③ 身份不详。

之见过面的一位同志被捕了，而我之所以没有被捕是由于我经过一定的犹豫之后还是遵守了[秘密工作的]规定。

我见过艾尔文和基奥尼格，他们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的工作人员，稍后又见过威廉。

我见过埃韦特和米尔顿，因为我参加了共同的工作。

我见过萨夫龙^①、格尔曼和最后那位通信员姑娘，因为我常在他们的住宅里同中国同志会面，有时他们也来我这里。

我见过马尔戈利斯，因为她到艾尔文下榻的宾馆来过，她在上海没有任何熟人。我的妻子见过她，并曾把她带到我们家里来。

迪尔到达上海后我见过她一次，目的是把我的地址给她，万一艾尔文出什么事可以使用。

我还会见过弗丽达·杰伊温，但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情，而是根据威廉的要求，威廉这样做是为了使她留在上海。我顺便提一下，这是一个错误。中国同志中的任何人都一次也没有来过我家，也不知道我的住址。

斯蒂夫·纳尔逊

在不久前与史沫特莱的一次会面中，她向我讲述了她见过一位来自维也纳的姑娘——社会主义者^②，她与上海的一些外国激进的人士有联系，她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位太太问史沫特莱是否认识斯蒂夫·纳尔逊，并请她把一封信寄给美国的共产党人，让他们转交给纳尔逊，她是在开往上海的轮船上认识纳尔逊的，他向她讲解了共产主义原则并告诉她，他是被派往江西工作的共产党人。他给了她自己在上海的地址（“阿斯特”宾馆），她来访问过他，并向他介绍了自己未来的中国丈夫。纳尔逊还告诉她，他在匹

① 身份不详。

② 何人不知。

兹堡做过重要工作,并把自己在匹斯堡的地址(邮政总局待领处)给了她,然后就消失了。史沫特莱说,他可能是一个冒充者,但她还是同意把信寄给《工人时报》^①,据她说,她把那封信销毁了。史沫特莱向我讲述的这件往事,大体上就是这样。

米尔顿、菲律宾人及其他人

从第一次见面时起,米尔顿给我的印象就很不好。他带着一只受伤的手来到埃韦特的家,他是在自己家里和一个德国同志^②进行炸药实验时受伤的。那个德国同志是作为这方面工作的指导员而住在上海的(我从未与那个德国同志见过面,但我知道,他经常去米尔顿家并向他讲授那些对中国同志讲授的课程,有一次,他们去郊外试验了自己的炸药)。那天晚上米尔顿同志喝了很多酒。还有一次,他略带醉意来到埃韦特家里;他到我这里来过几次,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他对我说过,他多次出席过晚上的娱乐酒会。大概,就是他带着一只红肿的手来埃韦特家里的那一次,他自我夸耀说,他如何在自己的家门前痛打了一个外国人,因为那个外国人威胁他的人力车夫。当他说到这样的行为会有危险时,他笑了。由于他的这些缺点及其他弱点,在我们之间产生了小小的不快,因此,我们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面。我认为,米尔顿在秘密工作方面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在我们所处的那种危机的形势下,那样做是特别危险的。当我发现米尔顿隐瞒了关于警察跟踪他的消息之后,我就怀疑,他还隐瞒了许多其他事情,至少是对艾尔文和我隐瞒了。我知道,他很看不起艾尔文,并且总是轻视艾尔文关于秘密工作的一切忠告。在我前往马尼拉的时候,米尔顿可能忘记告诉我了,党的书记不在那里,至少,我那次出差有一部分是徒劳无益

^① 《工人日报》在1924—1958年间出版,先是在芝加哥,从1927年起在纽约。

^② 何人不详。

的。警察是怎么了解米尔顿的？我有自己的看法，是根据米尔顿本人、埃韦特、艾尔文和基奥尼格告诉我的以下各种情况得出的。

当施泰本同志来到上海并收到一大笔电汇资金时，他取走了几大包现金，引起了警察的关注。然而，在这个时期，他们都承认，他们聚集在埃韦特和米尔顿家里，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施泰本被派往马尼拉，据他说，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美国侦探^①，此人早在美国就认识他。到达上海后他在位于雷沙姆的住宅里拜访过米尔顿。从那里他们两人曾经两次乘车前往基奥尼格的家，看来，是为了办理财务。这个时候，他们都知道，施泰本已经被警察怀疑。这个施泰本根据米尔顿的请求安排了菲律宾共产党书记的上海之行。米尔顿把在“新霞公司”商店工作的一个中国人^②的地址给了菲律宾共产党，这个地址是米尔顿为了其他用途从孙夫人^③那里要来的。一位菲律宾同志寄往上海的一些信件被扣留并被拆开，最后送给了米尔顿。据米尔顿说，那个中国人因为那些信件被捕了，又被放了出来。这是报告党的活动的信件和一封党中央书记向米尔顿通报关于他到达时间、他护照上的姓名等内容的信。

上述情况，只是在我们获得了警察关于米尔顿告知自己的名字和格雷沙姆地址的情报之后，我才知道。这些信件都是米尔顿亲手写的，当时他未能找到打字员，而我又拒绝把他的信件带回家让我妻子打印，因此他有点儿生我的气。仅根据这些情况，有效的警察系统就能对我们的整个机构进行搜查，甚至可以搜查到党的机关。在米茨凯维奇被捕后的10月底，这些就已经清楚了。这些情况的实质在最后一部电台失去之前已经通过无线电播送出去了。我确信，我的处境还是安全的，因为我总是采取一切可能的预

① 何人不详。

② 何人不详。

③ 宋庆龄。

防措施,因为我几乎总是在担心损害梁朴名誉的强大压力之下与他见面和工作的。只要有可能,我就尽力回避米尔顿,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我讨厌他,尽管他让人相信他总是有防备的。我的家位于法租界西边的最边上(西边),是完全单独的一栋房子,容易发现对其监视的迹象,因为这条街几乎没有什么人。由于距离远,我必然乘坐出租车去该城的商业区,我经常这样做。每一次我与某人会面的时候,我一开始总要乘汽车去市中心并换乘几次车,有时还坐人力车,而当街上人力车很少的时候,我就根据需要让公共汽车在没有人的车站停车,有时我带着妻子去戏院,半路上我下车,让汽车开往戏院,我自己则采用别的办法继续赶路。我举出这些详细情况,为的是要证明,即便我们及时地了解到这种情况,也还是可以进行工作并避开警察所掌握的那些人的视野。在我与梁朴会面期间,不论是他本人还是那些和他在工会中一起工作的人都没有暴露,这个事实就部分地证明,我没有被认出来,我相当严格地遵守了秘密工作规定。

阿伦贝格

米茨凯维奇被捕后不久,从日本监狱释放出来的阿伦贝格同志来到了上海。在大街上他遇见了马尔戈利斯同志并告诉她,根据布劳德同志的指示他应该会见我。经过一定犹豫之后,马尔戈利斯同志把他带到我家里来了。他告诉我,他在“美国特快货运公司”给我留了一张便条,收件人的名字是“戈贝特”(我用的名字是埃贝特)。他在同马尔戈利斯会面后取走那张便条。此后的三四个月我并没有去“美国特快货运公司”的办公室。他的唯一目的是和我讨论一般性的事情。我对他说,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这个错误可能对中国共产党造成威胁。我向他说明,应该怎样离开我的家(换乘出租车等),并告诉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再和我或马尔戈利斯会面了,而应该回家。我将所发生的这件事向艾尔文

和威廉作了通报,并起草了一份电报,但是由于电台丧失,该电报未能发出。

梁朴的护照

当我们抵达海参崴时,由于护照问题苏联当局在轮船上扣留了梁朴和艾尔文约12个小时,之后我们接到通知,说中国驻伯力领事^①知道了梁朴同志的到达。通知中说,“闵志伟”已从上海来到这里作报告或做这类什么事。同志们都担心,梁朴使用了这个人的护照,这个人向上海警察局作出报告,而上海警察局又向中国驻伯力领事作出通报。鉴于这些情况,我就为梁朴获取护照一事……作了以下汇报^②,在科尔萨科夫被捕后,我和梁朴决定,他应立即离开中国。他会见了党的上海中央局新的代理书记^③并得到了他允许。他是唯一知道梁朴要去苏联的中国同志。当时梁朴还问书记,是否可以在党的机关里找到没有填写的空白护照。而书记委托他的(即梁朴的)助手去请工会委员会主席^④帮助取来没有过期的闵志伟的护照,此人不久前才从国外回来,在海员工会工作。这三位同志谁都不知道这个护照给谁用。护照与很多其他文件取来了并封好交给了我。我把护照拿给艾尔文看了,在我们决定利用闵志伟本人的照片(而不是梁朴的照片)之后,我就把该护照交给了史沫特莱,让她转交给切尔诺夫去办理苏联签证。因为需要备用的照片,我又交给史沫特莱一张照片,而她把照片交给了坎贝尔(英国工程师,梁朴在等待轮船的时候曾在他家里住了几个星期)。坎贝尔把多余的复印照片交给了史沫特莱。护照还给了

① 许念曾。

②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③ 刘仲华。

④ 原文如此。何人不知。

史沫特莱,她又在梁朴动身的那一天交给了缪勒。缪勒就在梁朴登船之前交给了她。护照上用的是闵志伟的名字,而当时船票上却写的是宁志伟。我的船票上和艾尔文船票上的资料也很容易发现与护照上的不一样。海参崴的同志们告诉我,来自史沫特莱的报告中用的是闵志伟的名字。我们是在出发的前一天通过史沫特莱才拿到船票的,而且除了史沫特莱和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这些船票。

米尔顿的厨师^①和我的住所被取消

在我来到上海之后,得到关于警察已认出米尔顿的情报之前,我与米尔顿大体上一个星期见一次面,这个星期在他家,下一个星期在我家。我见过并认识他的厨师。在11月底或1月初,我在离我家不远的街上遇见了米尔顿的厨师。我当时认为,和他交谈几句总比我装作没看见他好。他向我讲述了,米尔顿只给他留下了100美元,并对他说,过几个星期就回来,在电话公司、电力公司、商店、家具公司等单位的人来要钱之前,他应该怎样继续看管房子,怎样买肉喂狗,等等。他花完了100美元,后来就被传到警察分局,让他说明他的主人的情况,主人出了什么事。他给我看了各种人还要求支付的欠账清单,以及他自己要求米尔顿支付的10月、11月和12月的工资数额。我对他说,我不知道他的主人在哪里,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北平,我来这里是拜会朋友。不管多么难为情,他毕竟没有拿到自己的工资,既然他是这样一个好小伙子,我就从自己的钱款里拿出40元给他。关于这件事他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对任何人讲,否则那些人就会要求偿还米尔顿没有支付的其他欠款。我向威廉讲述了这件事,而后又向艾尔文和科尔萨科夫讲过。我在去市中心买东西的路上,大约在离我家三个街区远

^① 何人不知。

的地方遇见了那个厨师。此后,不论我还是我的妻子都没有再冒险出现在这个地区的大街上,而在离开我们家的时候只乘坐汽车。我决定:过一个月之后,当租赁期满时向公司提出调换住房,因为这栋房子太贵和太偏远。一个月后我做了这件事,公司建议我去看一看公司的其他房子。2月26日,当我正准备认真地去看一看新地方的时候,召回我的电报到了^①。我又重新给公司发去一封信,我在信中解释说,我的处境要求我离开该市,并询问如果我不能把房子转租给其他租房者,在什么条件下我的租赁合同可以取消。他们回答说,如果我能够多付一个月的租金,他们就可以取消我的合同。这期间我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声明的办法想尽力卖掉我的家具和把我的出租权转给别的租户。最后,我卖掉了家具并根据与公司达成的协议留下了一个月的房租作为取消我租赁合同的条件。考虑到与米尔顿厨师交往的经验,我决定把自己的厨师安顿到另一家,我也是通过在报纸刊登声明的办法做到了这一点。在我离开住所的同时,他也转做别的工作了,我的家具的购买者也拉走了自己的东西。

全宗 495, 目录 23, 卷宗 267, 第 1—9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① 文件没有找到。

329

卡拉—穆尔扎给共产主义研究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党委的声明

1935年5月16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共产主义研究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联共(布)党委
声 明

卡拉—穆尔扎,1931年的联共(布)候补党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我在(今年5月)12日发表的,后来又寄给党中央的声明^①中,
全面揭露了米夫—马季亚尔和萨发罗夫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的托

① 该文件由于篇幅太长而没有发表(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1033,第2—80页)。在这个以写给П. А. 米夫的信的形式发表的声明中,作者指出,米夫借口中国的富农是“小地主”,在他(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其他工作人员)的文章中所论证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反对富农斗争尖锐化的观点,是与列宁关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必须“与所有农民”(包括富裕农民阶层——富农)一道前进的原则背道而驰的,作者指责米夫等人是“两面派”、“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蓄意歪曲列宁”(同上,第14页),为了破坏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把自己的表述“塞进了”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就农民问题致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与资料)》,第179—188页)、以及中国苏维埃和中共中央的纲领性文件(同上,第18—19、25页)。卡拉—穆尔扎把这条路线说成是可怕的和非常狡猾的反革命路线,他解释说,苏维埃之所以遭到严重失败恰恰是因为在中国执行了这条路线(同上,第29页)。此外,他在声明中认定,与米夫有联系的王明也是“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米夫依靠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上“粉碎了中共中央”,而王明“从此以后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袖”(同上,第53—56页)。他在《托洛茨基的私货》中还指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的多数工作人员在东方各国的农民问题上支持“米夫、马季亚尔、萨发罗夫的路线”(同上,第56页)。在1934年12月C. M. 基洛夫遇刺后到处兴起了寻找“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浪潮,这种形的形势造成了卡拉—穆尔扎对П. А. 米夫及东方书记处其他工作人员的指责,他荒诞地污蔑П. А. 米夫等人为“托洛茨基主义”、“反革命”等等,并在声明中写道,在中国“应该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作用的问题”,“关于第三阵营”(即关于中间力量)、关于必须重新审查土地—农民政策的路线问题(同上第79—80页)。

洛茨基主义反革命路线,作为对我的上述声明的补充,我认为有必要报告一些我所了解的有关米夫在研究所里的工作的情况,这些情况有助于揭露他这个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这些情况如下:

1. 1932年米夫打着研究所的幌子出版了《中国革命》^①一书。把米夫总的观点的正确性问题放在一边不说(这个问题与第一个声明中提出的问题有关),需要指出的是,书中虽然用四分之三的篇幅论述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问题,但是它根本没有批判托洛茨基主义,如果不揭露托洛茨基主义,就不能正确地阐述这个问题,就这类问题党不得不坚持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一场很大的斗争。在整本书中只有一次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而且对于他在1925年至1927年革命后的作用作了不正确的评述(详见:第一个声明第71页)。在书中只对中共内的右倾展开了批评(几乎占书的一半篇幅)。更有甚者,该书歪曲地引用了斯大林同志关于在殖民地问题上两条战线斗争的话:只举出所引文字中讲述与右倾斗争的部分,删去了其中讲述与“左”倾作斗争的第二部分(该书第89页)。书中对罗米纳兹(未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进行的“批判”给人的印象是,它应该证明罗米纳兹是正确的。(该书第161—162页,我的第一个声明9—10页)。

2. 作为研究所殖民地研究室的领导人和研究所一切出版物的责任编辑,米夫审阅、编辑并签发印制了已被揭露的反革命分子马季亚尔、萨发罗夫、西纳尼、戈尔申宁、乌里扬诺夫斯基及在研究所《殖民地问题》、《中国问题》等出版物上发表过文章的其他人的所有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如今这种私货已被揭露(如果确认我第一个声明正确的话,那揭露得还很不彻底)。

3. 米夫在研究所为萨发罗夫和马季亚尔创造了这样一种气氛,他们讲的话和写的东西都要当作指示来看待,这就使人无法公

^① П. А. 米夫:《中国革命》,莫斯科1932年。

开批评他们,丧失了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例如,当埃杜斯同志和阿瓦林同志几乎同时在日本和满洲问题上批评萨发罗夫和马季亚尔的时候,米夫专门来到研究所召集殖民地研究室的共产党员们开会,在会上他谴责上述两位同志的言论,认为他们的言论是“对共产国际的批评”。阿瓦林同志的文章还是发表了,米夫给这篇文章加了按语(我不知道是他自己加的还是根据他的指示编辑部哪个成员加的),实际上是为文^①中所批评的马季亚尔的观点作辩护。(这件事和前一件事,都是众所周知的。)

4. 米夫赞同萨发罗夫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撤掉我的文章《列宁与中国革命》,我在这篇文章中就中国问题对托洛茨基展开了批判,其中批判了(未指书名)萨发罗夫歪曲列宁对1911年革命的评价(关于袁世凯问题)^②。据阿布拉姆松同志说,正是此处引起了萨发罗夫对我的恶毒攻击和说我是“流氓行为”、“孩子气”等叫喊,并建议(据阿布拉姆松同志说,不止一次得到米夫的支持)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是笼统的问题(萨发罗夫“担心”,不然我会忘记中国话)。米夫作为责任编辑,撤掉了我的文章,认为不需要解释在如此重要的政治问题上搞臭该文章的原因,他亲自打电话对我说,不得不撤掉,因为萨发罗夫强烈反对,而稍晚些时候又向阿布拉姆松同志解释说,“文章不太成熟”。我要提醒的是,读过这篇文章的格列尔同志,作为党委成员,表示赞同这篇文章,只指出有必要对第一部分作些修改。(瓦尔加、赫梅利尼茨卡娅、阿布拉姆松、格列尔等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5. 萨发罗夫、马季亚尔等人被捕后,即在对研究所的生存来说特别重要的时期,需要米夫特别积极地参加我们的工作,并帮助

① 可能是:阿瓦林的《满洲在日本占领之前的阶级斗争》,载《阶级斗争》杂志,莫斯科1993年第7期,第76—91页。

② Г. А. 萨发罗夫:《民族殖民地革命的问题》莫斯科1933年。

我们揭露那些曾作为殖民地研究室领导与米夫一起工作过的反革命分子,可是米夫避开了研究所的工作。他没有领导揭露马季亚尔、萨发罗夫等人“遗产”的斗争,他一次也没有再来研究所就这些问题作报告或者发表谈话,他甚至认为不需要帮助由党委会和所长办公室发起的揭露由他米夫本人编辑出版的托洛茨基主义私货的工作。他也不认为需要承认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错误和为出版被揭露的反革命分子的所有著作而承担党的责任。此外,看来,为使自己免遭可能研究所对这些问题的追究,米夫在马季亚尔和萨发罗夫被捕的第二天就发表声明离开研究所,并拒绝领取工资,虽然他还在主持他过去主持的工作(编辑、答疑)(事实是众所周知的)。

6. 更有甚者,米夫不但不帮助揭露马季亚尔、萨发罗夫等人的托洛茨基主义反革命行为,而且还公然对抗这种做法,前不久他向阿布拉姆松同志声明说(看来,他指望这个“指示”将作为训令来接受),我们徒劳地在马季亚尔和萨发罗夫那里“寻找”私货,因为他们是两面派,根本没有打算塞进什么东西,若是当时给他们指出了我们现在寻找的那些错误,他们肯定都纠正过来了。(这件事是阿布拉姆松同志告诉我的)。

7. 已在马季亚尔被捕之后,米夫从我在《中国问题》上准备发表的文章^①的条样中删去了我加上的旨在揭露马季亚尔在中国土地问题上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词句。他在电话里口头上说,“不要与文章连在一起,最好以后作专门批判”。(在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向党委会提供被删去的那个条样,上面有米夫的签字:“不加东西。米夫,1935年4月15日。”)还可以补充一个我刚刚知道的有关普罗宁同志的一篇要在《革命东方》上刊登的文章的类似情

^① 可能指卡拉—穆尔扎的文章《内蒙古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载《中国问题》1935年第15期,第77—135页。

况：米夫从已经排好页码的清样中抽掉了整篇文章，这篇文章揭露了马季亚尔和萨发罗夫在印度土地问题上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他在口头上解释说（不同于对我那篇文章的解释），不要特别注意他们，似乎皮亚特尼茨基也同意这个“方针”，米夫曾给他看过那篇文章。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会^①党小组组长波戈列利斯卡娅同志告诉了我这件事。

8. 米夫接收托洛茨基分子波捷帕洛夫来研究所工作，他很了解波捷帕洛夫的托派历史并以自己的威信向反对接收他的党委施加了非常明显的压力。（党委知道这件事。）

9. 米夫非常卖劲地保护被共青团开除的托洛茨基分子梅尔纳尔克(斯)尼斯，此人曾在我们这里工作过并写过一篇文章^②，那篇文章发挥了我在第一个声明中所揭露的观点（见我的声明和党小组关于梅尔纳尔克(斯)尼斯文章的结论）。米夫在东方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错误开除梅尔纳尔克(斯)尼斯的问题，会上马季亚尔和萨发罗夫都支持米夫，他们和米夫一样，认为开除他是不对的。米夫专门去了区委，花很多时间等候和同文化宣传部部长^③谈话。除了我，同米夫一起在文化宣传部部长那里的还有阿鲁季扬同志，他可以证明这件事。最后，米夫主张修改对梅尔纳尔克(斯)尼斯思想所作的政治鉴定，于是我们根据文化宣传部部长的建议，做了修改（用“半托洛茨基主义”思想代替“托洛茨基主义”思想）。（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10. 我打算全面评论纳索诺夫同志在《革命东方》上发表的一篇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④，米夫禁止我这样做，在那篇文章中，纳

① 指研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会。

② 文章没有发表。

③ 何人不详。

④ H. 纳索诺夫：《远东战争与中国苏维埃的五年》，载《革命东方》杂志，莫斯科1932年，第3—4期（总第15—16期），第160—177页。

索诺夫同志发挥了梅尔纳尔克(斯)尼斯关于中国苏维埃革命(见我的第一个声明第55页)的那些观点(也是从米夫的这个方针中合乎逻辑地引申出来的观点)。(这件事阿布拉姆松同志知道,可能,殖民地研究室其他同志也知道。)米夫后来从《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之间关于中国的文献》的总书评中,删掉了关于纳索诺夫的整整一段文字。这篇书评刊登在《中国问题》第13期上,在关于“左”的错误的一段中只有一行字顺便提了一下纳索诺夫的错误。(这篇书评是根据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改写而成的,其手稿可能保存在出版社编辑部)。

11. 米夫从我的一篇文章^①中删去了对罗米纳兹在关于中国不断革命问题上的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评述以及所有提到罗米纳兹名字的地方。被删掉的这一段指出:“由于1925至1927年革命的暂时失败而发生的各阶级的重新组合,给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家们’(罗米纳兹等人)重新反对共产国际路线提供了借口,他们指责共产国际不理解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并且声称,在那个时期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党委要求,我可以提供手稿的复印件和经米夫编辑的已发表文章的最后稿。)

这就是最近几天因修改我的第一个声明而回忆起的一些情况。我回忆起的大概还远不是全部,此外,这些情况大都与我个人的工作有关,如果其他同志能有类似的“回忆”,那么可能情况就会更加清楚了。不过我觉得,就是不说第一个声明中所写的东西,即使写的不正确,那么根据这些回忆也足够提出米夫留在党内是否合适的问题了。

为使研究所能作出实际的结论,还需要指出由米夫主编出版

^① Г. 卡拉—穆尔扎:《1929年上半年中国的土地问题》,载《中国问题》杂志,莫斯科1930年第2期,第181—197页。

的论文集《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①和两本文集《中国的苏维埃》^②的情况,我在这里还没有提到这些文集,因为评述这些著作是与第一个声明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列举的这些情况,可以认为,与我所作出的总的结论的正确与否没有任何关系。

对于所有这一切还可以补充一个与研究所的工作没有联系的情况(在第一个声明中已提到),但这个情况可以反映米夫的面貌。这就是米夫企图在马恩列研究院的《共产国际与东方》文集^③中发表1929年东方书记处给蒙古党的指示^④,这个指示曾促使蒙古党采取种种过火行为,这种行为于1932年被斯大林同志制止了。我在党的出版社偶然看到了这个文集中的几页,并建议菲赫曼同志(党的出版社编辑)撤掉这个文件。我当时还请阿布拉姆松同志将此事告诉米夫,因为我认为他发表这个文件是一个误会。但是在政治上,这个情况不能不表明,米夫企图用过去的日期,用引用共产国际文件的办法,来为他(米夫)在蒙古推行的托洛茨基主义路线作辩解,企图以维护曾经提出另一种方针的共产国际的威信(即米夫的威信)为借口来诋毁由斯大林同志亲自提出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目前的“新方针”。对这种做法不能作另一种解释,如果不假设他还企图诋毁共产国际的话,而共产国际过去的路线(还是米夫的路线)也是不正确的,发表这个文件的做法也应该向所有熟悉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的人证明这一点。但是,如果认定我在第一个声明中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这其中任何一种解释都不会对

① П. А. 米夫主编:《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以中国为例》,编者 Г. С. 卡拉—穆尔扎,莫斯科1933年。

② 《中国的苏维埃》(文献资料集),莫斯科1934年。同样名称的第二卷已经准备好出版,但由于形势的变化而没有出版。

③ 文集没有出版。

④ 指1929年3月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见全宗495,目录3,卷宗123,第342—344页。)

米夫有利,而是对他不利,同样,发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的文件和苏维埃中国的文件的做法也将对他不利。至于米夫主编的由马恩列研究院出版的文集《共产国际与东方》^①,我认为,根据总的问题的解决情况,让马恩列研究院了解哪怕是第二个声明也是有意义的,其目的是在解决整个问题之前制止该文集的出版。

我想,要是在别的情况下,我是应该把这个声明的副本寄给米夫所在组织的党委的,但是考虑到我的第一个声明已经更广泛地提出了问题,恐怕先解决整个问题更合适,也就是说,等中央对第一个声明作出决定后再这样做为好。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33,第 81—86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文集没有出版。

330

红色工会国际东方殖民地部^①关于中国 革命工会运动给国际工会会议的报告

不早于1935年6月16日^②于莫斯科 不得公布

关于中国红色工会国际拥护者工作 给国际工会会议^③的报告

—

革命工会运动拥护者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④
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扩大会议^⑤以来
领导罢工斗争的若干总结

尽管处于严酷的秘密状态和面临闻所未闻的白色恐怖(1934年在中国国统区死伤约200万劳动者),红色工会国际拥护者仍能越过工会官僚领导一些大的罢工行动。(上海)“美亚”[公司]中国

-
- ① 起草者是根据1935年6月14日文件草稿确定的(见全宗514,目录7,卷宗844,第79页)。
-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打字稿上的手写批注:“最后稿”确定的(见全宗534,目录2,卷宗138,第67页)。
- ③ 会议于1935年8月22日至25日在莫斯科举行。
- ④ 见第9页注④。
- ⑤ 指专门研究改良主义和法西斯工会内部工作的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扩大会议。1933年12月9日至16日在莫斯科举行。

丝织厂 4000 名工人争取实现经济要求的罢工,引发了反对国民党和法国帝国主义的群众性围攻和同警察的流血冲突^①。罢工引起了广泛的声援浪潮(上海 50 家中国丝织厂的 1 万名工人宣布总罢工,纺织工人、烟草工人等表示支援)。在我们拥护者的部分领导下,开滦 5 万矿工(在三个月内)举行了三次英勇罢工^②,反对缩短工作周和关于禁止工会活动的塘沽协定^③,争取建立革命工会等等。在我们的影响下,“华兴”厂纺织工人、“启兴”瓷器厂和水泥厂工人及其他工人,与矿工同时举行了声援罢工。在一些罢工中,我们的拥护者成立了群众罢工委员会和群众纠察队。

这些罢工和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些其他斗争行动(湖州 2000 名纺织工人占领市政大楼并捣毁国民党报纸的编辑部、无锡丝织业工人举行罢工、华北铁路员工采取行动等等),表明中国无产阶级战斗力的进一步增强和统一战线斗争的扩大。

以我们的拥护者为首组织了工人的英勇发动,直接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贵州省赤水(市)兵工厂同城市贫民一起举行起义^④;福建省公共汽车司机举行罢工,反对国民党调运武器,组织“毁路队”不让白军通过等等)。

开展了抗日运动。满洲发生了铁路员工拒绝运送日军的情况。5 月 1 日这一天,天津工人没收了日货。“反日同盟”网扩大,等等。

① 详见《关于“美亚”股份公司工人斗争的文献》,载《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资料》,莫斯科 1934 年第 8 期,第 58—90 页;《中国 1934 年上半年的工人运动》,载《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研究会中国室通报》,莫斯科 1935 年第 1 卷,第 39—41 页。

② 《中国 1934 年上半年的工人运动》,第 45—49 页。

③ 根据在塘沽签署的日中停战协定(见第 67 页注^③),开滦煤矿进入了非军事区,实际上在日本控制之下。

④ 详见《1935 年第一季度工人运动记事》,载《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研究会中国室通报》,莫斯科 1935 年第 4 卷,第 48—49 页。

但是,我们的拥护者在领导经济斗争方面存在许多严重不足:

(1)罢工缺乏准备或准备不足。结果在罢工斗争中自发性和分散性仍居主导地位。

(2)忽视通过罢工来加强和建立阶级工会组织的重要任务。罢工常常被看作是目的本身。

(3)罢工策略缺乏灵活性(不善于把积极的斗争形式——罢工、占领企业、与警察发生冲突、围攻等)同群众请愿、派遣代表、“意大利式(消极)罢工”等结合起来。

反对资本家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我们的拥护者在争取建立反对资本家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广泛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例如,在中国轮船舵手反对国民党在这类工人中间进行技能等级考试时,我们的拥护者在属于各种不同组织的所有舵手中开展了广泛的征集“反对考试的签名”运动。还成立了由各轮船公司代表组成的斗争委员会。因此,斗争在所有中国轮船上得到顺利开展,并以海员的胜利而告终。

在“美亚”罢工时,由于法国巡捕和国民党警察枪杀“美亚”工人([1934年]3月11日),在广大劳动群众当中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和法国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运动。就此向各社会团体发表了特别宣言。根据我们的倡议,成立了各社会团体支援“美亚”罢工的委员会,作为群众性的统一战线机构。

在满洲和华北,反对资本家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结合,特别明显地体现在矿工、铁路员工、纺织工人等的大罢工上。

但是,争取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斗争还远远落后于群众日益要求采取反对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统一行动的愿望。

争取建立统一战线斗争中的不足之处

(1)缺乏彻底性,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方面还没有根除宗派主义。我们的许多拥护者认为统一战线策略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不是主要的斗争方法。

(2)统一战线被认为只是从下面实行,并且不是经常实行。

在“美亚”罢工期间,我们的拥护者断然拒绝同黄色工会领导一起讨论举行罢工事宜。此外,他们甚至不与还受工会官僚影响的群众建立联系。结果黄色工会官僚得以削弱斗争战线(工会官员说服一批工人和职员开始工作)。开滦矿工罢工期间,为同企业主直接进行谈判,组成了由各矿群众选出的代表团。但是我们的某些拥护者反对这种代表团,认为这是上层的联合组织。

(3)经济斗争中的统一战线同反帝斗争结合不够。

例如,开滦矿工罢工时,日本占领者派遣以汉奸赵潭春为首的代理人来破坏罢工,加强自己的影响。我们的拥护者本可以利用这个具体的时机来广泛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并将这种斗争与争取实现罢工中提出的直接要求结合起来,但却没有这样做。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我们的某些拥护者把统一战线策略归结为同工会官僚合作,而不去捍卫自己的政治路线。总之,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尤其是在从组织上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和实行统一战线的方法问题上,还存在着混乱,需要加以说明。

二

(一)革命工会运动在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内部工作中的经验

1. 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的现状,国民党在工会问题上的策略

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特别是我们的拥护者影响的增大,在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内“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斗争会越来越

激烈。

这方面的征兆是：

[1]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公开表示反对这些工会的政策和领导。群众不仅反对个别首领，而且力求把这些被国民党和工会官僚捆住手脚的工会变成独立于国民党的工人工会：

(1)开滦矿工罢工时，群众拘捕 200 多名工会官吏，迫使他们同意以下四项要求：一是在每个矿井举办戏剧演出；二是每个国民党工会官吏必须缴纳 300 元^①，由工人们组建自己的工会；三是国民工会官员必须向工人道歉，并散发 6000 份传单，宣布今后不再破坏罢工；四是将俱乐部交给工人们组织的工会。

(2)香港海员公开主张改组广州现有的国民党海员工会，恢复 1925 至 1927 年大革命时期由著名的已故领袖苏兆征领导的原革命海员工会。

(3)上海电车工人要求在群众大会上选举工会执委会委员。

(4)上海市政厅的机械工人不久前表示反对国民党工会，主张成立“自己的工会”。

(5)上海电气工人反对通过国民党工会发放工资。这些工人有一天将所有工会官吏赶出了工会机关。

(6)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工人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合法的工会，还有种种其他驱逐和殴打工会官吏直至捣毁工会机关^②的情况。

2. 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某些中下层职员의 革命化

某些中下层职员对国民党和工会高层官僚的叛卖政策越来越表现出不满和愤怒，他们被群众推举参加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

^① 此处和以下看来是指墨西哥元。

^② 原文如此。

治斗争。下列事实可以作为最明显的例子：上海吴淞两条铁路修配厂^①的工会分会中下层职员参加了要求增加工资、发放补贴等的罢工，并积极反对由国民党委任的一名铁路官员。结果国民党逮捕了该工会分会执委会全体9名成员。

上海邮政工会职员为抗议国民党拒绝接纳该工会代表团参加国民党召开的中华全国邮政职工代表会议而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罢工；天津电车工会执委会的一些委员因参加斗争也被逮捕。

3. 工会上层机关同国民党政府的进一步勾结

迄今被认为是独立于国民党的阶级工会——上海印刷工会不久前发出特别呼吁，宣称完全赞同国民党和蒋介石反对红军和共产主义的反革命政策，并公开宣布阶级合作的政策^②。类似情况在其他黄色工会中，尤其是在邮政工会中也可以看到。

(二) 国民党和工会官僚在镇压群众性工会运动方面的政策

由于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加剧以及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内部发生的变故，国民党在工会运动方面的反革命政策目前具体表现如下：

(1) 进一步取缔和改组群众性的合法工会和群众团体。企图成立法西斯式的工会。

去年，国民党禁止上海吴淞两条铁路修配厂工会分会举行活动，而今年初，该工会被改组。汉口邮政工会去年被国民党取缔。去年底和今年初，国民党打着“改选”工会执委会的幌子改组了许多黄色工会。此外，1933年在上海警察局长杨虎的主持下，国民党成立了法西斯式的上海海员工会。不久前在上海成立了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拥护阶级合作和“生产稳定”，反对罢工和怠工的“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最后，国民党在上海

^① 原文如此。指位于上海郊区吴淞，为沪宁和沪杭甬两条铁路线服务的修配厂。

^② 文件没有找到。

和广州开办了“培训干部的工会运动训练班”。国民党正在收买旧组织形式(“青红帮”)、某些破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和作为工贼的失业者的首领。不久前国民党还组建了由堕落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新的法西斯式的“劳动服务队”。

(2)国民党以各种名称成立各种组织来分化工人和破坏斗争。例如,在南京成立了所谓“工人福利委员会”。在汉口港务人员中成立了“调解纠纷的总仲裁委员会”。市政厅没有解决的纠纷交由该委员会处理,委员会的决定是不容修改的。国民党在上海港务人员中也成立了这种组织。

加强了全国和社会的蛊惑宣传(宣传“国家困难时期生产要稳定”、“全国工人运动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宣传建立“工人村”、“工人储蓄所”、合作社等等)。国民党还在上海工人中组织体育活动。

(三)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组织能力的削弱

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高层威信降低不能不导致组织能力的某种削弱。国民党政论家罗传华援引了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的如下数据^①:

年 份	工会数量	会员人数
1928	1117	1773998
1930	740	576250
1932	621	—

虽然我们没有近两年的数据资料,但工会数量和会员人数在

^① 见罗传华:《面对中国的劳工问题》,上海1934年,第50页。

减少这不会有什么疑问。上海有名的“七大”黄色工会只剩下了三个^①。河南省“岳峰”纺织厂的工会在去年垮掉了。在上海纺织工人当中,眼下还没有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满洲和华北的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已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取缔。

海员工会分裂为两个大派:广州派和上海派。在这两个工会的首领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例如:上海工会的首领不接受广州工会上层同“吴淞”轮船公司签订的协议^②,借口是该协议没有确保海员的利益^③。上海海员工会在去年年初借口建立统一的海员工会宣布广州海员工会为非法,并请求国民党禁止广州海员继续活动。这两个工会之间斗争的加剧乃是广州集团和南京集团之间军阀内讧加深的反映。

连广州最老的反动机器工人工会也在经历着严重的内部纷争。

现在最大的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有:邮政职工工会(按类型像改良主义工会)、机器工人工会和海员工会(按类型像法西斯工会)。但是,国民党和工会官僚仍然把相当一部分工人群众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甚至在某些企业,特别是在小生产单位,还在成立新的工会。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是我们主要局限于捣毁这些工会的机构,而没有在这些工会内部真正进行顽强的、耐心的和系统的工作,以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

① 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七大合法工会包括“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工会、“商务印书馆”职工工会、该馆发行部职工工会、报业工人工会、邮政职工工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工会和中国“电力”公司工人工会。到30年代中期,上海只剩下三大工会:“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工会改组后成立的上海第5区烟草工人工会,印刷职工工会和邮政职工工会。

② “吴淞”轮属于“中国航运公司”。

③ 原文如此。报告稿上是:似乎没有确保海员的利益(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846,第13页)。

赤色工会在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中的工作

的确，我们在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例如，在一些覆盖最重要生产部门的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中建立了革命派。在反对日本侵略和国家自卫的口号下，在北平召开了全北平黄色工会群众代表会议^①，500名当选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在有些场合，我们的拥护者积极参加了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的改选。但所有这些为数不多的成果没有得到巩固。其主要原因是：

(1)对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作用估计不足。严重忽视在这些工会中的工作。宗派主义还明显存在，对会员群众、官员和首领，以及各类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没有区别对待。

(2)分化和捣毁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机构，驱赶和殴打工会官员仍然是我们的拥护者在这些工会中采取的基本策略。结果，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里，我们的拥护者捣毁不少工会机构，特别是驱赶和殴打许多工会官僚，但没有做系统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被捣毁的工会往往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恢复，而被赶走的工会官员又返回自己的岗位。

(3)在这些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一开始，我们的拥护者就力求建立平行的赤色工会，实际上是脱离群众的集团。甚至在该黄色工会机构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情况下他们还在建立这样的工会。(如“金星”瓷器厂。)

在老式群众组织中的工作

众所周知，中国在数百年间已经存在各种老式的按行会或同乡原则组成的群众组织。其中最为流行的是所谓的“青红

^① 原文如此。

帮”。公认70%以上的中国工人都是这些组织的成员。这一数字就足以说明该组织的重大意义。此外,这些老组织是合法存在的。现在这些组织还在发展壮大。例如,今年年初,由于一名海员在英国轮船上自杀(英国检查员^①行使暴力所致),就是以像“礼仪社”^②、“群安会”^③等老式海员组织的名义组织了抗议行动。这类老式组织活跃起来的主要原因是,近来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的工会官僚的影响越来越下降,群众不想参加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由于秘密工作条件的限制,许多工人也难以加入赤色工会,尽管赤色工会在群众中享有很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在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内的工作以外,在老式组织中的工作也是中国赤色工会的迫切任务。我们的拥护者对这项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在这一领域也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工作方法。

三

国统区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

尽管处于极其秘密的状态,受到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们的残酷迫害,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④还是在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和中国苏维埃政权胜利的斗争中,顽强地和忘我地完成了自己极其艰难的任务。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9月)^⑤在指出赤色工会工作成绩时说:

① 详见周毅:《关于中国1934年1月和2月的罢工》,载《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研究会中国室通报》,莫斯科1935年第5期,第34、36页。

② 原文如此。可能是指“联谊社”。

③ 原文如此。

④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应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⑤ 原文如此。应为1934年1月(见第32页注②)。

“四中全会^①以来,党和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坚决执行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指令和指示,反对立三路线的错误,粉碎罗章龙反革命派,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在面向工厂的基础上,白色区域内的革命职工运动方向,曾得到了许多成绩;党和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曾创立了许多重要的宝贵的工厂阵地,创立了重要企业内的大的产业支部;建立了群众工会(上海纱厂、烟厂、华北等地)。国民党区域内的革命职工运动渐渐开始走上了坚决转变的轨道。”^②

现在赤色工会的状况是这样的:

(1)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在上海,赤色工会发生了一系列暴露事件,但是党和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得以在上海、天津、满洲里等城市的大工厂重新建立和加强工会小组和赤色工会。在上海,在海员、码头工人、公共汽车工人、人力车夫、电气工人、邮政职工、纺织工人和铁路员工当中,以及在军工企业工作的工人当中,都有了赤色工会组织,每个组织拥有数十、数百甚至数千会员(如在码头工人当中)。在最重要的铁路、煤矿、纺织厂以及华北的印刷工人当中都建立了据点。

去年,由于罢工运动的迅猛发展,华北赤色工会会员人数增加了1000多。在开滦煤矿,由于矿工的英勇罢工斗争,赤色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尤为显著。另外,去年“开滦煤矿总工会”和“华北铁路员工联合会”的成立,无疑说明了华北赤色工会在组织上的某种发展。

(2)我们的拥护者在组织工作中所取得的一定进展,表现为成立各种各样名称的各种群众组织,例如:反日同盟、救国会^③、互助

① 见第223页注①。

②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3页。

③ 指以宋庆龄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会。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

会、同乡会、夜校、拳击队、足球队，等等。在华北的这些组织当中，有些组织拥有几千名成员，其作用是巨大的，它们必然成为赤色工会的后备来源和合法掩护。

但是这些成绩还远没有得到巩固。赤色工会的组织能力还大大落后于罢工浪潮的蓬勃发展。赤色工会还有很大的流动性，这是国统区革命工会运动工作中最薄弱的方面之一。其基本原因是我们的拥护者在组织工人群众方面存在宗派主义，不善于随机应变。我们的许多拥护者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赤色工会在现时条件下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群众性工会”。许多人表示怀疑“赤色工会是否应该在这种情况下脱离地下状态而保留地下领导”。

企业中的工作极为薄弱也是赤色工会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在企业中成立了工会小组，但这些小组远没有得到巩固，其中多数还带有封闭和宗派主义性质。例如，赤色工会及其追随者在纺织工人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的工会官吏虽然作出种种的努力，迄今也未能在纺织工人当中建立多少个群众组织。然而，由于采取宗派主义立场和不善于利用我们今天的合法机会，我们的拥护者未能在纺织工人当中建立较为巩固的群众组织。

因此，中国红色工会国际拥护者的近期任务应该是：同宗派主义残余作无情的斗争。我们的赤色工会具有巨大的潜力，在大胆而巧妙地利用合法机会的同时，应该在保留地下机构的情况下利用任何一种名称和掩护摆脱地下状态，并成为能够引导广大群众走向中国未来决定性战斗的群众组织。

苏区的工会

苏区的工会是中国整个工会运动的主导环节。它们同国统区的所有工会组织、同总的中心——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有机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红军主力向西转移之前，苏区工会会员有 356600 人。建立了

四大工会:(1)农业工人工会,(2)店员和手工业者工会,(3)苦力工会,(4)造纸业工人^①工会。

一年间中央苏区工会为苏维埃机关、红军、共产党、共青团以及其他各种群众团体派遣了1万多名工人干部。在各地苏维埃机关负责工作人员中,工人成分占1/3到1/2。在红军指挥员中,工人的比率超过50%。

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工人师。一般说来,在红军新战士中,工会会员平均占20%。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苏区工会对国统区工人的帮助。苏区的工会在它毗邻的国统区开展工作,组织援助国统区工人罢工的运动。在1932年的上海保卫战^②期间,经苏区工会向上海罢工的纺织工人汇去了1.4万元。苏区工会也向举行罢工的开滦矿工和去年“美亚”的罢工工人提供了金钱援助^③。

从红军主力向西部转移时起,苏区工会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暂时我们还没有得到有关这一时期的工会状况及其工作情况的信息。但是毫无疑问,红军的顺利西征和在川贵两省占领新的地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区工会积极参与红军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争取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全宗 534,目录 2,卷宗 138,第 110—118 页。

印刷稿。

① 原文如此。

② 见第 180 页注②。

③ 原文如此。

331

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信^①

1935年6月20日^②于上海

诸位代表^③：

去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大暴露^④之后，[中共]中央与上海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就中断了。在长时间的西征^⑤期间，我们曾打算通过[中国]红2、6军团恢复联系，但也未成功。至于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我们只能收到消息，而莫斯科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功率太小。所以我们向西部进发时，没有随身携带这套设备。因此，共产国际与我们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也就中断了。[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国际与国统区党以及与[中共]中央之间这样长时间地失去联系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如果有可能恢复这种联系的话，那就应该立即这样做。为此目的，我们受派遣来执行以下任务：

1. 我随身携带了进行无线电联系所必需的呼叫信号、波长和时段，应该直接同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以设法恢复无线电联系。[中共]中央制定的措施是：(1)请你们为我们安排

① 文件上有批注：收入中共机密文件。米夫，9月13日。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的批注确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5年8月1日收到该文件。

③ 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④ 见第300号文件。

⑤ 指中国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至1935年从江西中央苏区向西部的撤退。

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无线电联系。(2)设立直接联系的单独电台。他们不想让我直接同中共上海中央局建立联系,因为我们认为,既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破坏,其内部必有暗藏的叛徒。如果我们先找到[共产国际]代表,那么地下工作将会更有保证。但这次我先找到了新的上海局,还没有同你们见面。

2. 在同你们见面后,我应在适当地区[不一定在上海]建立稳定的联络点,同时建立同四川南部的信使联系。[中共]中央看到中共上海中央局不断遭到破坏和国统区群众斗争领导薄弱,决定加强领导。同时[中共]中央新的负责同志——波克利洛夫^①(他的中文名字叫张闻天)和陈云认为,鉴于红军进行长期行军和长期内战,同军队一起转移的[中共]中央无力领导全国的工作,应该改变自己的领导方法。因此,他们要求我们同你们会面并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同意,我将在某些合适的地区设立代理人机构以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建立电台和同川南的信使联系。在我离开[中共]中央前往上海之前,曾专门派出一名同志^②去建立联系,由于该同志到上海后先同中共上海中央局会了面,我也就同该局联系上了。

我从[中共]中央出发前,党已决定在云贵川边区建立根据地。我出发后,看来,因为局势发生变化他们放弃了原来的计划。他们渡过金沙江同红4军^③会合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再次讨论是否应该改变领导方法的问题。此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同你们讨论:

1. 关于目前统一战线方面的实际工作和党与苏维埃策略

① 原文如此。张闻天在苏联的化名是伊思美洛夫。

② 何人不详。

③ 原文如此。应为红四方面军。

的运用方式问题,我有不少从实践中得出的看法。在福建事变^①期间,有一段时间我作为苏维埃代表呆在福州,并同反对蒋介石的军阀集团有过接触。因此,我有机会听到各种意见,迄今[中共]中央还没有进行研究和讨论。现在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探讨一下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问题。

2. 陈铭枢(福建事变的领导人之一)表示愿意前往莫斯科。但他要求,全国反帝运动直接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他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质疑。在我们作出答复后,他就能去莫斯科。这是我想同你们赶紧讨论的一点。

3. 至于目前华北的局势,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搞阴谋,要采取进一步步骤唆使南北方军阀反对蒋介石。需要讨论党和苏维埃在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方面的策略。

4. 至于建立侦察网的问题,红军现在在获取敌人情报方面遇到了比第一、二、三、四次“围剿”^②时更大的困难。由于我们没有掌握敌人的情报,因而未能确保西征时取得大的胜利。我们应当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在国统区的广大群众中建立侦察网。我在上海时,曾负责特科工作,我去苏区后,获取军政情报,特别是红军所需要的材料的工作没有取得进展。有必要讨论一下某些新的[工作]方法问题。

我认为,[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七八个月时间持续进行运动战的过程中,失去了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直接领导,这一事实是个严重的现象。现在我们急需共产国际在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以及苏维埃和红军在国统区开展反帝斗争条件下对蒋介石的斗争策略问题上的指示和帮助。

尽管我带来了无线电呼号并把它们交给了中共上海中央

① 见第84页注④。

②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

局,我们还是没有收到对我们呼叫的回应。因此,我恳请同你们会面,进行面谈,以便你们能够帮助我完成哪怕是一部分的工作任务。小 K^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30,第 48—49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① 潘汉年。

332

郭绍棠关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任务的书面报告

1935年6月21日于莫斯科

这里提交的材料只是一个草稿，只反映我个人的看法，既没有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讨论，也没有在中共代表团内讨论，[我]在这里提交的材料比较广泛，以便以后从这些材料中抓住最主要的东西。

[克雷莫夫]^①

关于中国的局势和中共的任务^②

在中国，武装的革命和武装的反革命正在进行激烈的搏斗，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的国内战争，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占领、武装干涉和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反对中国人民反对中国革命的反革命殊死战争。现阶段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的特点是：革命力量还不足以用一次决定性打击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而现有的反革命力量也无力把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镇压下去。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正在进行动员和重组的总演习。大决战还在前头。在部署力量和准备进一步发展革命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到中国革命斗争的持久性和长期坚持不懈的过程，这种

① 郭绍棠。

② 文件上有批注：未经校对。

斗争“一定会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一定会步步深入，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决斗”，而且不是同一个帝国主义，而是同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从而“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斯大林语)^①。目前革命力量发展还不平衡，除了苏维埃革命在某个地区取得胜利之外，在其他地区运动还很落后，特别是在工业中心城市和大都市，群众斗争还没有达到直接夺取政权的程度，因为这些中心城市实际上为帝国主义者所占领，那里集中了中国反革命的全部力量。党的总路线应该是保存、积蓄、聚集和加强革命的有生力量，将其作为进一步全面准备和开展行将到来的决战的基础，争取中国革命在中国决定性地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党最主要的任务是：

(1)千方百计开展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和领土完整，反对国民党这个背叛民族并是民族耻辱的政权，而首先是在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反对日本占领和南京蒋介石集团，吸收各居民阶层，甚至不太坚定和暂时的同盟者参加，利用民族解放革命的一切潜力(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争取在这一运动中造就无产阶级骨干，从组织上巩固反帝的群众基础，争取武装人民保卫祖国的自由，组织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2)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红军，依靠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阶层扩大其后备力量，把百万红军口号变为具体行动。巩固中国西部以四川为中心的具有全国意义的根据地，围绕该根据地建立广泛的游击区，在原苏区和敌人武装力量强大的省份开展和加强游击运动并使之变成更灵活的群众性运动，争取扩大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将其与红军主力总的战略行动结合起来。

^① 见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5月13日)，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32页。

(3)苏维埃国家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政策应当适合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要利用一切经济资源和新的经济建设来确保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在非苏区宣传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将其作为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动员因素,尤其要宣传苏维埃政权作为反帝民族革命斗争的基地和领袖的意义。

(4)领导和组织非苏区无产阶级的日常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实现工人反对克扣、拖欠工资、缩减工作和解雇工人等迫切的日常要求,争取在现有的一切工人群众组织中积极地耐心细致地开展工作,建立广泛群众性革命组织的各种符合工人传统和适合野蛮恐怖环境的无产阶级联合体,并在那里建立、保存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坚决反对赤色工会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倾向。

(5)在知识分子、学生和其他城市小资产阶级阶层中的工作要实现根本转折,利用和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蒋介石向国民党政权^①投降,争取起码的民主权利,争取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反对宪兵警察干预学校、出版和文化工作,反对强行给学校、文化机关委任国民党法西斯领导人、教授和讲师,反对国民党对学生实行强制的法西斯式考试,争取降低并取消高额学费,争取减少住宅、公共服务和教材的费用,反对租房时的连环担保,反对各种苛捐杂税,争取提高国营和公营商业企业店员和职员的工资,争取每周有一天休息日,每年有一个月带薪假期,反对解雇,争取[提高]徒工工资和缩短学徒期限,反对恐怖和惩罚,支持反帝活动和激进思想,支持就所有涉及人民利益和保卫祖国的问题进行自由辩论,以便揭露蒋介石法西斯的民族和社会的蛊惑宣传,争取在一切现有的、甚至是反动的、法西斯的组织中开展工作,争取通过各种组织形式把小资产阶级群众联合起来。

^① 原文如此。按意思是:向日本侵略者投降。

(6)领导国民党乡村中日益发展的自发性农民运动、反饥饿游行、大米风潮和游击斗争,口号是:反对各种苛捐杂税、反对国民党的租金、高利贷和饥饿政策^①,反对厘金^②,反对食盐专卖。争取救济饥民、发放补贴、增加食品供应点、提供医疗救助、同传染病作斗争。靠国家用支付外国首先是日本的赔款和借款利息的基金来整修灌溉系统,反对在难民和饥民集中营实行强制劳动和强制性地粗野地对待其中的囚犯,要求没收所有日货并将其无偿地分发给饥民、破产农民和失业者,让他们住进公共和教会场所,反对投机商和囤积居奇者人为地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争取建立武装民防队和自卫队,保护农民的收成和财产,使之不受强盗……^③和外国占领者的侵犯。争取通过各种符合老传统的农民群众性组织把农民群众联合起来,并利用合法机会,争取在农民自发的迷信组织中积极地经常不断地开展工作,争取加强农村党的核心。

(7)采取坚定不移的方针来加强在反动军队中,特别是在靠近前线地带的反动军队中的工作;在为士兵群众的迫切需要开展斗争的同时,还要反对粗暴对待士兵,争取改善服装特别是冬装,争取增加和及时发放军饷等;必须在中下级军官中开展工作,利用他们的爱国心和对南京政府的对立情绪来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作斗争,争取加强在挨饿和贫困化的农民和失业者当中的工作,把他们当中正在沦为雇佣兵后备队的相当大的阶层组织起来。

(8)在占领区(满洲,内蒙古和华北)内开展抗日民族革命游击战,同一切现有的抗日军队建立战斗联盟,争取保存游击队的有生

① 原文如此。

② “厘金”是地方当局在省界甚至在县界收取的内部关税。

③ 原文空缺。

力量,保护并培养战斗干部,争取通过抗日同盟和其他组织形式把抗日群众联合起来,没收汉奸的财产,支持并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和劳动人民的斗争,争取建立人民革命政权。

(9)保存、储备和培养党的干部,爱护党的有生力量,造就有首创精神、能独立领导地方组织机构的干部,加强反奸细斗争。简化并从根本上改组秘密机构,巩固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据点和企业中党的核心,争取在不稳定的苏区建立并保存秘密的和非法的党组织,争取把党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苏维埃政权机关的行政惩罚措施不应代替党内的原则性思想斗争。要同“左倾”宗派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使党团结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周围。

全宗 494,目录 1,卷宗 39,第 1—5 页。

打字稿,副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四卷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丛书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页数=457

SS号=12054675

出版日期=2007.9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原书定价=59.60

主题词=共产国际 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 1931
1937 史料

参考文献格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北京市：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内容提要=本书共5卷，主要内容介绍了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期间有关档案11份，有些文件联共（布）、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在上海保卫战期间对中国事态发展所持的立场，有些文件披露了莫斯科对中国红军于1934年秋放弃中央苏区的计划及联共与共产国际对中共和中国红军领导人所持的态度等。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1934年1月1日）

施特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施特恩的电报（1934年1月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4年1月5日）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中国红军状况的第9号综合报告（不早于1934年1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4年1月1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4年1月12日）

埃韦特关于《中国论坛》问题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1934年1月1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1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施特恩的电报（1934年1月20日）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的电报（1934年1月25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1号报告（1934年1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鄂豫皖苏区委员会的信（摘录）（1934年1月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4年2月1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1号报告的补充部分（摘录）（1934年2月5日）
赖安关于中国工人和工会运动状况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4年2月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55（ ）号记录（摘录）（1934年2月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施特恩的电报（1934年2月5日）
中共中央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报（1934年2月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4年2月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施特恩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2月1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356（ ）号记录（摘录）（1934年2月11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4年2月13日）
施特恩给中央苏区的电报草稿（1934年2月15日）
埃韦特给施特恩的信（1934年2月16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2月22日）
李竹声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4年2月27日）
埃韦特给李竹声的信（1934年3月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64（ ）号记录（摘录）（1934年3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3月25日）
李竹声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4年3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67
（ ）号记录（摘录）（1934年4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
电报（1934年4月9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2号报告（1934年4月10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4年4月10日）
李竹声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4年4月1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
368（A）号记录（摘录）（1934年4月1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68
（ ）号记录（摘录）（1934年4月11日）
王明给埃韦特和李竹声的电报（1934年4月23日）
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4年4月2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4月2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76
（ ）号记录（摘录）（1934年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李竹声的
电报（1934年5月26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1934年6月2日）
赖安给哈迪的信（1934年6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
381（ ）号记录（摘录）（1934年6月8日）
红色工会国际国际联络部给贝克的电报（1934年6月13
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
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6月1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

的电报（1934年6月17日）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和阿布拉莫夫的电报（1934年6月2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给格伯特的电报（1934年7月1日）

赖安关于中共领导人被捕一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4年7月3日）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4年7月3日）

赖安给米夫的信（1934年7月3日）

赖安关于艾萨克斯的声明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4年7月3日）

雷利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便函（1934年7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9号记录（摘录）（1934年7月4日）

王明和康生给盛忠亮的电报（1934年7月10日）

赖安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1934年7月1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给格伯特的电报（1934年7月20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盛忠亮和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4年7月2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92（ ）号记录（摘录）（1934年8月3日）

盛忠亮致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4年8月10日）

赖安同志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1934年8月1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95（ ）号记录（摘录）（1934年8月15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声明（不晚于1934年8月2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国工

作的决议（不早于1934年8月2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策略的决议初稿（1934年9月1日）
赖安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4年9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4日）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4年9月14日）
施特恩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1934年9月16日）
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1934年9月16日）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4年9月17日）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4年9月1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23日）
阿布拉莫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26日）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30日）
盛忠亮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
中共中央给盛忠亮的电报（1934年9月）
王明就党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一事给中共中央的信草稿（1934年10月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15号记录（摘录）（1934年10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

的电报（1934年10月8日）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4年10月11日）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0月14日）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0月15日）

王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0月16日）

阿布拉莫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0月1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16号记录（摘录）（1934年10月20日）

中国红军指挥人员一年制特别培训班教学大纲（1934年10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在华工作的建议（1934年10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建立东方作战中心的建议（1934年10月28日）

赖安关于改组中共机关的建议（1934年11月20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赖安的谈话记录（不晚于1934年11月20日）

赖安关于国统区革命工会的书面报告（1934年12月4日）

赖安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关于上海形势的谈话速记记录（1934年12月22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给王明和康生的信（1934年12月29日）

贝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5年1月3日）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德国问题的讲话（摘录）（1935年1月9日）

贝克给洛佐夫斯基的信（1935年1月22日）

贝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5年1月2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434（A）号记录（摘录）（1935年2月3日）

胡秋原给王明和康生的信（1935年3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通报材料（1935年2月11日、3月18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斯塔索娃的信（1935年3月1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442（ ）号记录（摘录）（1935年3月21日）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35年3月22日）
施特恩关于政治工作讲座的速记记录（1935年3月22日）
米夫给斯大林的信（1935年4月19日）
切尔诺莫尔季克和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5年4月2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450（ ）号记录（摘录）（1935年5月5日）
贝克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1935年5月9日）
卡拉-穆尔扎给共产主义研究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党委的声明（1935年5月16日）
红色工会国际东方殖民地部关于中国革命工会运动给国际工会会议的报告（不早于1935年6月16日）
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信（1935年6月20日）
郭绍棠关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任务的书面报告（1935年6月21日）